# 历史的逻辑

#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lliam H. Sewell Jr.

经典之作
修订重现

##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美] 小威廉·休厄尔 著
朱联璧 费滢 译

历史学
×
社会学

我们是结构和必然控制下的棋子？
还是在事件和偶然中行动的人？

休厄尔揭示了社会转型的本质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William H. Sewell Jr.

# Logics *of* History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 历史的逻辑

##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美] 小威廉·休厄尔 著　朱联璧 费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美）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著；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书名原文：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BN 978-7-208-16772-8

Ⅰ．①历… Ⅱ．①小…②朱…③费… Ⅲ．①社会学②社会转型 Ⅳ．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13241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吕子涵

封面设计 COMPUS·道辙

历史的逻辑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美］小威廉·休厄尔 著

朱联璧 费滢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6.25

插　　页　2

字　　数　358,000

版　　次　202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6772-8/C·624

定　　价　98.00元

小威廉·休厄尔　William H. Sewell Jr.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与历史学系弗兰克·P．希克森（Frank P. Hixon）杰出贡献教授，著有《历史的逻辑》《法国的工作与革命》（*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修辞》（*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等。2020年，休厄尔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首次颁发的杰出职业生涯奖。

小威廉·休厄尔以兼顾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思考著称。《历史的逻辑》认为，只有把历史学家对时间性的复杂理解与社会学家深刻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催生出令人满意的社会理论。在本书中，他透露了这种结合可能是怎样的形态，也展现了如此结合能为哪些议题提供指引，以及此举将如何影响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本书于2008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理论分会杰出理论图书奖。

# 名家推荐

《历史的逻辑》发起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理论的讨论，展现了历史学家对于当前的理论讨论所能发挥的重要贡献。由当下最具影响力、最广受尊敬的历史学家著成的这本书，将会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史的一部分。

——米谢勒·拉蒙，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社会学学会前任主席

根据小威廉·休厄尔的说法，如果“事件”是“关键性地转变了结构的日常发生的、数量相对稀少的子集”，那么《历史的逻辑》的问世无疑是一个事件。他对不同社会科学专业的知识和文化的惊人涉猎，使他能建立新颖而卓越的连接。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关系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谢里·奥特纳，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

这无疑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历史的逻辑》将为未来讨论社会转型的本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间的关系设定新的理论讨论议程。

——基思·贝克，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在历史的深度内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理论的对话中构筑出一个好故事。史学出身的小威廉·休厄尔，生长于结构功能论与历史社会学并生的浪潮下，他对事件与结构的独到解析，亦能促使我们反思中国本土语境中的个人、关系与社会。《历史的逻辑》一书告诉我们，只有历史学家们打破缄默，彻底审视并且重整从社会科学借鉴的理论，我们才能发展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洞悉这个时刻变动的世界的学说。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对这本书的最佳肯定，也许来自作者休厄尔荣获的美国社会学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首次颁发的杰出职业生涯奖（2020年）。休厄

尔对社会、结构、文化、事件和时间性等基础概念的解答，为社会学家带来了基于历史学的不同思考。读者既能看到休厄尔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解读理论名著，又能看到他以哲学人类学的方式将理论难题一步步展开为日用实践，还能读到他从历史经验作品中归纳与反思理论。这本书是多面的、综合的，也是多彩的，值得对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议题有兴趣的读者品读。

——孙宇凡，公众号“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创办人

# 目 录

献词
前言
第一章　理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
第二章　社会史及文化史中的政治无意识：曾经的计量历史学家的自白
第三章　三种时间性：迈向一种事件性社会学
第四章　一种结构的理论：二重性、能动性与转型
第五章　文化的（诸种）概念
第六章　历史、共时性和文化：反思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研究
第七章　一种事件的理论：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的可能理论”
第八章　作为结构转型的历史事件：为巴士底狱发明革命
第九章　延续的历史和复杂的时间性:1814—1870年马赛码头工人的奇特职业生涯
第十章　重塑社会科学中的“社会”：一位阐释主义者的宣言
参考文献
再版后记

# 献词

致我的同仁：

社会史工作坊（the Social History Workshop）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研讨会（the IAS Social Science Seminar）

象征人类学研讨会（the Seminar on Symbolic Anthropology）

象征主义和社会变迁研讨会（the Seminar on Symbolism and Social Change）

戴维斯中心研讨会（the Davis Center Seminar）

国家人文研究基金会之工人史夏季研讨会（the NEH Summer Seminar on Labor History）

亚利桑那社会学午餐会（the Arizona Sociology Brownbag）

MSG—图森（the MSG-Tucson）

MSG—安阿伯（the MSG-Ann Arbor）

社会机构研究中心（CRSO）

社会转型研究中心（CSST）

社会运动和国家建构研讨会（the Seminar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State-building）

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研讨会（the CASBS Seminar）

芝加哥大学巴黎研究中心（CCP）

比较政治和历史社会学工作坊（the Workshop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社会理论工作坊（the Workshop on Social Theory）

当代法国工作坊（the Modern France Workshop）

社会理论小组（the Social Theory Group）

梅隆抗争政治研讨会（the Mellon Seminar on Contentious Politics）

维尔德楼教员研讨会（the Wilder House Faculty Seminar）

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社会项目（the CIAR Successful Societies Program）

以及，芝加哥大学当代理论中心（CCCT）

多谢你们的友谊、交流还有慷慨的批评意见，此书才得以完成。

# 前言

20世纪80年代晚期，我在担任密歇根大学社会转型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 CSST）首任主任时，萌发了写作此书的念头。该中心由大学资助，旨在试验跨学科研究。一批卓越又求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定期在此聚会，讨论关于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充满张力和吸引力，分散在午餐时间、派对和无数走廊研讨会里。这三个学科的学者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能相互学习，这无疑暗合了中心发起者的预期，但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分野同样清晰，不同领域之间的分歧显著，时常有激烈争论。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在这些激动人心的跨学科讨论里渐渐成形。彼时，我同时任职于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并在研读人类学的著作，经年累月混迹于人类学家之中。自那时起，我确信，糅合出一门兼具历史学家对社会时间性（social temporality）的敏锐触觉、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权力和复杂性的肯认，以及社会学家对严密解释的责任感的社会科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在讨论中坚持强调，我们肯定所有社会形式都具有根本的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我同样确信，理解社会时间性的运作，对研究“当下”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而言，和对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而言同样重要。我认为，像“文化”和“结构”这样的核心理论范畴，需要被重新界定，从而能够直面历史转型这一不可抗拒的事实。这本历时多年而成的书，致力于将有关历史转型的问题意识放入社会理论的概念性词汇中进行解读。

1991年，我同时受聘于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系和历史学系，以一名参与式观察者的身份，拓展了有关第四社会科学学科（a fourth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1]的研究体会。那时，我已完成三篇将要被收入本书的论文，另几篇也在构思之中。但忙碌的当代学术生活让我很难得闲坐定下来写完全书。取而代之的是，我利用了受邀在各地发表论文或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写成一篇篇文章。所以，这些论文散见于不同的期刊和论文集。除却它们各自的历史不论，书中文章都

是为本书而写，唯有第九章经过了较大的改动来配合本书的主旨。我希望过去曾经读过这些文章早期版本的读者能发现，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读，可以加深对单篇的理解。

学术似乎被圈外人看成是一种孤独的职业，但圈中人深谙这种职业是极具社交性的。我们的理念，源于知识共同体的疑惑、问题和偏见交织而成的社会性网络，并在无尽的探讨和论辩中提升。对这本意在构筑不同学术专业之间对话的书来说，这一粗略的观察尤为紧要。我在这本书里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解答问题的自信，靠的是我在过去四十年里和几个不同城市的学者针对相似问题的跨学科对话，这些对话尤其在一系列或多或少有组织的讨论小组里保留至今。虽说讨论小组的形式、焦点和所在机构各不相同，但都让我得以探索作为研究个体无法触及的广泛话题和思考，并且讨论起来无拘无束、直击要害又互相尊重。正是在讨论小组里，我对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得以被激发、试验、批判和重组，但愿还能有所提高。我认为，书中的论点是我多年来和许多身边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完成的。我要把这本书献给诸位同仁，以及让我们展开对话的讨论小组。

学术研究同样离不开物质支持。本书写作期间，我获得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资助，并在位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ural Sciences）和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度过了为期一年的、令人愉快的学术休假。前者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基金编号BNS-870064）支持，后者得到了国家人文研究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Humanities）支持。我也获得了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还有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社会项目（the Successful Societies Program for the 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提供的慷慨资助。

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戴维·布伦特（David Brent），他纯熟的职业技能指导了本书的出版。出版社的两位审稿人米谢勒·拉蒙（Michèle Lamont）和基思·贝克（Keith Baker），都对原稿提出了有价值和中肯的建议。简·戈尔茨坦（Jan Goldstein）爱

的陪伴，贯穿了本书写作和删改的最后两年，她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也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她总是放下自己的写作，聆听我的新想法，或是阅读我的新章节。希望我们能在彼此的陪伴下，完成更多作品。

---

(1) 所谓第四社会科学学科即历史学。美国大学阶段将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编号，历史学排在第四，故有此称。—— 译者注

# 第一章　理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

本书旨在发起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关于社会理论的严肃对话。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互相讨论、互相研读对方的著作，并都在自己的著述中讨论且运用过社会理论，这为方才所说的理论探讨奠定了基础。但我认为，由于后文将提到的种种原因，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关于社会理论的对话。尤其是历史学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时间性（temporalities）有着复杂且多角度的认识，以至于他们的观点很少进入社会理论的辩论之中。由于我在学术生涯的黄金岁月里，同时涉足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因此我相信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理论上的深层交流对彼此来说都有启发意义。在本书中，我会指出这种交流将以何种面貌出现，阐释哪些议题，以及它将如何在两个学科领域中引起思考。即使我的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也希望它们能引来反驳的声音。我深信，唯有自由、开放、充满活力的思想交流才能使社会理论、历史学、社会科学，还有更为重要的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探索得到进步。

##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在21世纪初，寻求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话算不得什么新闻。以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为例，他们于1929年创办颇具影响力的法国著名历史学期刊《年鉴》（*Annales*）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一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科都深受来自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视角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采用历史学科知识的现象也逐渐增加：尤其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越来越关注有关历史变迁的问题。此外，至少是在大体上可以说，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同一些基本性问题：社会关系是如何运作、再生产以及转型的。究其根源，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是从同一个话语领域中诞生的学科。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社会

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还有经济学，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逐渐独立和专门化的学科。在那之前，思想讨论通常游走于界限尚未明确的不同学术类型之间。我们该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当作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把马克思当成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抑或认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还是政治学家？我们往往很难用现在的标准把那个时代的学者归入某个单一的学科。直至20世纪早期，学术界才出现了用系所、讲席、课程和博士研究项目来划分的不同学科。学科也就成了真正的（或许也是人为的）彼此不同的思想宇宙（Abbot, 1999; Clark, 1973; Keylor, 1975; Lepenies, 1988; Novick, 1988; Ross, 1991）。只有当历史学和各种社会科学之间有着足够明确的界限，我们才可以考虑发起对话的必要性。如今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的跨学科涉猎，也可以由此被看成是我们这门学科将要回归学科分野之前的黄金时代的预兆。

划分学科界限彻底改变了18世纪末或者19世纪初那种伊甸园般的智识图景。而“学科”（discipline）也名副其实地形成了控制与约束学术的种种强大的规训（disciplinary）机制。学科通过垄断学位颁发和管理课程设置、聘评教职、分配资金进一步加固了这种边界。历经好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当下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语汇和评价标准都已截然不同，以致他们彻底变成了两个独立的话语共同体。虽然不免出现“盗运”和经常性的“边界争端”，但正是由于学科分野如此有效地分割了知识领域，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才必须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对话。

学科之间的壁垒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无疑日益松动。人们已经习惯了称赞在论文或学术训练中的跨学科实践，尽管实际上这些实践往往缺乏明确目标。这种情况在涉及聘评教职的时候显得尤其突出。目前，历史学研究中突破学科界限的情形已数见不鲜，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用渊源各不相同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历史学研究。由此可见，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每天都在进行着对话，而且它们都默契地扩大了交流范围，涵盖了对人文学科的理论借鉴。在过去的二

十五年里，“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席卷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把始于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的关于意义和表征（representation）的理论带入了跨学科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一波对话都带着参与者各自学科文化的浓重印迹。有鉴于此，即便目前跨学科交流已经为人所熟识，我仍然乐于指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探讨社会理论的必要性。

理论之于历史学远不及它之于社会科学那样至关重要。在19世纪末系统性学科划分才刚开始的时候，历史学家旨在记录研究对象之独一无二性的“个殊式”（ideographic）或“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和社会学家力求建立通用法则（或至少是有效的概括）的“律则式”（nomothetic）或“解释性”（explanatory）[(1)] 研究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这一特性是理论和形式化的方法论使然；而历史学尽管需要谨慎处理档案或“原始”材料，严格采用时间顺序并熟练掌握叙事，但形式化不足（却同样有效）。这一差异在两学科的研究生课程中一览无遗。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在学术生涯之初都要先学习本学科的理论和（或）研究方法；而历史学研究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基本都是纯粹的选修课程（如果有的话）。对历史学系的研究生来说，最重要的学科训练场所并非必修的理论或者方法论课程，而是研讨班。在研讨中，研究生们学习使用原始资料和撰写历史叙事，而不是掌握本领域的理论和清晰的方法论以成为一名历史研究者。等到修完正式课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但已经可以熟练地进行研究和写作；而社会科学家们尽管在理论方面有无限深入的见解，却常对如何开始一个研究课题感到迷惘。

这种对待理论的差异将始终贯穿在两类学科学者治学生涯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期刊的文章几乎都是以有关理论的探讨开始；而历史学期刊中的文章倾向在开头写凸显其研究对象特质的内容：一段轶事或者是来自当代资料的为人熟知的引文，而非理论性或历史阐释性的论述[1]。同样的差异还体现在职业的定义上，人们往往在招聘告示上看见某职缺和社会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理论相关，但我本人从未见过告示上写着历史学理论。有数不清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以理论著述享誉学界，而同样以理论作品成其大名的历史学家不但寥寥无几，而且能举出名字来的几位基本没有单独的历史学教职。他们之中我能想到

的唯一以理论研究闻名的历史学家，就是在学术生涯中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Santa Cruz）分校的跨学科意识史人文课程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73, 1978, 1987, 1999）。其余的比如琼·斯科特（Joan Scott），她以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为人称道；或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他既是思想史家，也在文学理论界中有相当的地位；还有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他关于情感的社会和历史意涵的理论著作极具开拓性；以及一位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他以经验研究成名并且在这一领域仍有著作。这些学者在历史学之外涉足其他学科绝不是偶然[2]，他们的理论著作在历史学之外获得关注这一点表明，理论不再是历史学家的禁地，但长于理论的历史学家不仅少有而且并不总是被归入历史学界也显示出理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处于边缘。

现在历史学家阅读并在他们的写作中引用社会理论家的观点已经很常见，引用的对象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lie Durkheim），这些都是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常见的名字。不过，即便理论在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频率增加，这仍然不能被称作是一个真正的对话，因为历史学家很少作出回应。在从不主动介入社会理论的辩论之余，他们只在提出思考时运用社会理论，或借用社会理论的词汇来审视史料或者构筑观点。在这种社会理论概念的借鉴中，我们常会发现概念本身并不太恰当，要经过调整、细分，或者和其他明显不相干的理论话语结合起来之后才能被用于历史研究。由此可见，历史学家对待理论的态度事实上是批判性的，但我们从未在作品中反映出这种调整、细分和结合。我们不仅回避质疑历史研究中突兀借用的理论是不是本身就有缺陷，也避免提出可能改善或代替现有概念的新词汇和概念图式[3]。所以，尽管我们在实践中常常隐含着对社会理论的批判态度，但对历史学家和其他专业学者现有的理论储备几乎没有影响。拜本学科的训练和当前历史学界的主流文化所赐，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主动参与理论辩论的勇气。

我想在本书中指出：如此裹足不前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学家对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意见不仅重要而且有启发意义。在我看来，社会理论亟须融入历史学的思维，而这当然不能依靠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来完成。只有当历史学家们打破缄默，系统地批判和重整我们从社会科学借鉴的理论，我们才能发展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共同追求的、洞悉这个流变不居的世界的社会理论。

## 历史学家知道什么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自己所知的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俄国革命、意大利城邦、印度洋贸易、罗斯福新政、明朝官僚制度、布尔战争、巴西流行文化等等，当然还包括如何运用和阐释相关的出版物和档案材料。但在他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之外，历史学家还懂得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时间性。历史学家的共同主题就是人类行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我们对时间的思考往往是隐性而非显性的，它只有在表现特定的一系列事件或者共同体、国家或话语场域的特定转型的叙事中才能具体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并不能说自己已经发展了一套关于社会时间性的理论 。但我认为，事实上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时间如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构成和转型有一些共同的假设，并且这些假设能够被抽象地表述。简言之，历史学家们对社会时间性已经有了隐性的、可行的理论。我甚至敢说，这些已经相当精细复杂的理论远胜于困扰社会科学的大多数繁复难懂的同类假设。历史学家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社会时间性的理论家的身份投入到社会理论的辩论中去。

然而，历史学家自己如何看待社会时间性呢？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时间是决定性 （fateful）的。时间无法逆转，已经完成的某个动作和经历过的某个事件是不可磨灭的。它会留在受其影响的人的记忆里，并就此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发生那一刻所处的状态。就像尽管我可以作出许诺接着再毁约，但我曾经许诺某事的事实是无法撤回的。对我本人和其他知情人士来说，我从此就成了一个作出过承诺又撤回了承诺的、与先前完全不同的人。当然，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会改变当时的状况：在走廊里遇见同事时点头致意仅仅是

重申我们在同个机构工作的事实，但这个简单的姿势本身对我在工作机构（于我而言是某校政治学系）中后续的社交关系史非常重要。假如我之后不再有点头问好的动作，就会立刻被注意到。如果我是径直走过、没有任何表示，这个动作可能会被认为带有暗示性，意味着我在系内派别之争中处于敌对派别，或者我打算稍后投票反对让这位同事升职。尤其是如果我再三这么做，缺少应有的问候将使我和被怠慢的同事形成紧张的社交关系。两种动作——不管点头与否——都形成了一种历史残留，这会影响我和那位同事乃至整个系的社交关系。毋宁说更戏剧性的举动，比如在教职员会议中指责某位同事，或者激烈反对学系中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分支专业聘请新职员，或者邀请只有点头之交的同事合作授课或者合写论文，这些都将对系内社交关系的进程产生更大影响。

尽管个人行动看似会造成决定性的社会效应，但其实每个行动都是一个行动序列（sequence）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行动在这个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假如我最近已经三四次没有在遇见点头之交的同事时问好，或者这位同事曾被已知是我朋友或者同伴的人冷落，又或是我近来曾经在系内会议上大肆抨击她的研究，我和这位同事之间的关系将会因为我的不点头变得严重不和。与此相反，假如我和她曾经在争取改革学系的投票程序时站在同一阵线，或者业内最重要的期刊刚接受了她的一篇论文，我没有点头致意的负面效应将大大降低。历史学家认为，不清楚事情发生的时序就无法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这意味着历史学家认为任何行动、事件或者趋势的结果可能都是偶连 的（contingent），其效应将取决于它所处的特定的复杂时间序列。某个特定的日常发生（happening）的影响可能会被之前、之后或者同一时间出现的日常发生所抵消、放大、偏转、加重、疏导，或是散播。某件事的结果的偶连性，并不仅仅由更广泛的行动、趋势、事件决定，同时由包括其发生在内的确切时间序列决定。这意味着历史上的日常发生是不可预测的。

诚然，社会科学家也承认时间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的决定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能意识到，生育婴儿，决定换工作，被伴侣离弃，和改变自己想法的同事做朋友，得知自己的孩子患

有危及性命的重病，这些都对一个人的生活有着重大且不可预测的影响。我认为其中的差异在于，尽管社会科学家也将时间的决定性视为日常真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拒绝把这个真理纳入他们的科学意识里去。他们注意到了日常和个人经验的决定性和痛苦，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仍然认为这些存在完全是随机的，一如杂音。作为社会科学家，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偶连性和混乱性，找到实际支配着生活整体的有效规律。而历史学家拒绝在研究中割裂日常生活和社会总体，认为个人经验中的时间的决定性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

历史学家用来建构或分析社会生活的偶连性和时间的决定性的概念就是事件（event）。在他们看来，社会生活的流变由意义重大的日常发生或改变历史进程的社会行动的综合穿插而成。因此历史学家反复提及历史中的“转折点”或是“分水岭”，不惜花费大量的概念精力将历史的进程划分成不同年代，并用各种事件将它们标记出来：汉朝的建立、十字军东征、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日俄战争、纳粹掌权、古巴导弹危机、电子媒体的兴起、柏林墙的倒塌等等。在历史学家眼中，这些改变全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中离婚、跳槽、在学系会议中发怒失态之类的普通事件一样，都具有改变我们个人生活轨迹的决定性和偶连性。尽管如此，历史学家通常并没有就事件如何造成了戏剧性的、历史转型性的效应进行理论思考，他们只是在无数次叙述某个日常发生的序列如何改变了某个集体的历史：牛津大学的研究员、上海劳工、纽约客、俄国人、罗马天主教徒，甚至是全人类。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隐性地认为社会变迁是平稳、渐进、可预知的线性过程，与之相反，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时间性是波澜起伏、不均衡、不可预知且不连续的。

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引出了另一个关于时间性的重要假设，尽管在个人经验的层面（的确）并不突出，但社会时间性确实是极度错综复杂（complex）的。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总是结合了拥有不同时间性的社会进程：渐进或者长期的社会趋势，大众反复无常的舆论声音，特定突发事件，中期政治策略，突然的个人决定，经济波动或者气候变化，然后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方式发生，组成特

定序列。在任一当下的时间性都具有的多样性给理论分析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我们处理的不是一连串离散的、时间精确的决定事项，而是长期进程与瞬时进程的纠缠，我们该如何解决排序的问题？在一个混合不同社会进程和时间性的事件中，到底是由哪一个社会进程和时间性主导？短期进程会在什么时候、用何种方法，凌驾、偏转甚至改变长期进程？而几乎被某个更为紧迫的政治进程掩盖的长期趋势可以在何处、用什么办法来扭转形势呢？书写可信的历史叙事总不免要回答这些难解的时间谜题。

历史学家“事件性”（eventful）的时间性概念无疑假定不同时期的变迁速率都不同，也就是说，事件可能会“加快”历史的进程；同时这一概念还假定事件可以转变或者重塑社会关系。其结果是他们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异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动力。换句话说，历史学家认为时间是异质 的（heterogenous）：社会世界中存在怎样的实体、它们如何运作以及它们自身的含义都会随时间彻底改变。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无时不处于流变和混乱之中；历史学家假设的社会时间性永远都是持续和变化的混合。但我们的可行假设是，社会关系的每一种重要形式都有可能被改变：不论是观念、制度、身份，还是工具、住所的样式、性别、神灵、气候、疾病、作物和语言。换言之，历史学家暗示，从根本上组成了社会生活的是文化，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塑造了从农业、生育到诗歌、宗教在内的社会生活所有层面的人类实践、习俗和信仰。由于文化都是人为的，不论是无心还是故意为之，人类也具有毁坏、歪曲、忽视、遗忘或者激进地重塑文化的能力。

时间的异质性意味着因果异质 （casual heterogeneity）。也就是说，某个行动的结果并不是该行动内在固有的，而是由其发生的社会世界的性质所决定的。相比于主流社会科学家的行为模式就是发现和运用或明或暗地独立于时间和场所的普遍 因果规律，这种看法无疑格格不入。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行动者（actor）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且供求规律是万能的。历史学家当然也承认某些时期存在普遍因果规律，但过去和现在并不是被同一套规律支配；相反，他们认为支配现在的社会世界的逻辑和过去的截然

不同。因此，重新发掘并且厘清过去的逻辑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时间的异质性也意味着要在历史的语境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中理解和解释社会实践。我们无法脱离行动发生的世界所特有的语义（semantics）、技术和惯例（简言之即逻辑）去理解某个动作或者言说（utterance）及其后果。比起用普遍性的或“一般性”的法则（“covering” law）去解释，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事物和它所处的语境联系起来。

最后，假如行动发生的世界具有时间异质性，那么历史学家对年代顺序（chronology）的执着完全是合理的。日常发生或事实在时间上的精确位置（即年代顺序）如此重要是因为：如我所说，历史学家坚信，不知道日常发生在时序中位于何处，我们就无法了解某事发生的原因和意义，而一丝不苟地专注于年代顺序是保证能掌握可靠时序的唯一办法。同时，年代顺序的重要性还在于行动和事件的意义都依赖于其所处的时间语境。只有清楚知道社会事实的时间边界是否位于拥有特定历史逻辑的同一“历史时期”内，我们才能理解不同社会事实之间的联系。年代顺序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指出了阐释行动、文本或是人造物的时候必须置入的历史语境。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想指出，历史学家关于社会时间性的一系列隐含的理论化设想，如决定性、偶连性、复杂性、事件性和异质性，都是相当融贯的（coherent）；其注重年代、时序和语境化的方法论推论也和这一理论吻合。尽管现在的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会反对我这番构想中的一小部分，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大体上认可这些我代表他们提出的理论。我特地将这些理论抽象化，所以即使是认同大意的历史学家也会对其中如何展开形成分歧：何为充分的语境化？哪些社会因果规律会因时代而异？是什么让事件得以“改变历史进程”？在特定变迁过程中，什么是偶然的，什么是必然的？

历史学家（至少是含蓄地）用努力和智慧将社会时间性概念化。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止步于此。对他们来说，对社会生活的时间性的可行假设只是习以为常的事实，而非理论问题的一部分。通过研读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并内化他们叙述历史的变迁与延续的方式，历史学家潜移默化地认识到了时间性的概念。他们对社会时间性知之

甚详，但只当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甚至就像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样，是因为这个学术常识和个人经验的时间性中的常识基本一致。此外，经验告诉我，历史学家有过分依赖叙事的通病。在论证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喜欢用叙事来解决问题，尝试从史料中挖掘更多细节并举出越来越多的样本、实例和轶事。这通常意味着到最后，重要的概念性难题——有关时间的动力学（dynamics）、因果规律、事件或实体间联系的本质——并没有被安置于适宜的理论中，而是被大量的叙事细节湮没。历史学家或许是社会时间性的专家，但常常因为理论意识不够成熟，并没有从概念层面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知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许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关于时间性的假设更接近我在前文概括的历史学家的模式，而非主流社会科学的模式。诚然，我在本书中有关时间性的历史学概念化的多数例子都是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而非历史学家收集的[4]。选择这些例子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必要说明，对时间性的精细理解并不是历史学家独有的；同时部分原因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由历史学论点衍生的理论问题比历史学家本身更敏感。这便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对话的原始状态的征兆：这些社会科学家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知觉十分敏锐，但他们对时间性的设想通常并不清晰。所以，这再次说明更完善的理论对话将使历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双方受益。

## 社会科学家知道什么

社会科学家比历史学家更有理论自觉，所以历史学家与他们进行理论对话是很合理的。不过，发起对话的同时，应该留意到社会科学内在的多样性，不论是学科内部还是学科之间。把历史学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专业化过程，同时也在各社会科学之间划下界限。在美国，大多数社会科学的主流认识论文化都是实证主义的，只有人类学却转向了迥异的阐释主义。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的理论假设大多与历史学家而非其他社会科学家更为接近。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更关注的是人文学者而不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

的著作。相比之下，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为精确和量化的学科，与此同时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却被理论和方法的争端严重割裂，正如社会学中符号互动论者（symbolic interactionists）和人口学家（demographers）在认识论上几乎没有交集。社会科学家在理论观点上的多样性，意味着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对话的观念无法体现实际上的复杂性。事实上，和人类学家的对话从形式到内容都会和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之间的不同；与人口学家的对话也和与符号互动论者的对话不同。再者，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擅长或乐于和历史学家对话。事实上，大部分开展“主流”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所设定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学家的可行假设如此矛盾，可以想见两者之间进行交流会是怎样的对牛弹琴。[5]

实际上，对历史学家而言，最有价值的对话对象是那些对历史和文化问题感兴趣、使用或至少乐意支持“阐释”或者“定性”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家。几乎所有写过人们所说的“社会理论”的社会科学家都可归入此列，如大多数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但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地理学这类主要开展实证和定量研究的领域中，这类社会科学家是持异见的少数。以本人经验来看，倾向阐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对与历史学家进行理论对话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自己学术领域中的挫败意识。我在本书中试图进行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普遍对话，而是与那些准备好与历史学家为共同事业合作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理论交流。与此同时，有必要认识到历史学家的理论见解并不只对研究特定历史题材的社会科学家有意义。因为社会世界事实上是时刻变动的，以及这个世界是由复杂而偶连的时间性构成的，所以理解历史的逻辑对研究当代社会世界和研究过去的人同等重要。

除了相对较高的理论敏感度，社会科学家认为他们还能为与历史学家的对话带来些什么呢？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家最宝贵的就是他们对结构性 思维的强烈嗜好，不管是阐释主义者还是实证主义者都拥有着这样嗜好。与偏好多重因果关系和详细的、视情况而定的叙事的历史学家形成对比的是，社会科学家更倾向在社会世界中少数持续、确定、因果关系明确的特征中寻求答案，例如阶级关系、主导意识形

态、长期的职业或人口模式、重要的经济利益、顽固的文化信仰或者是组织的固有特性。历史学家往往满足于多线程的、但最终因果关系分散的描述，社会科学家则尝试厘清他们认为在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并系统性地阐述它们的动力学。用定义清晰的结构性特征解释现象，往往能使研究者对理论和方法的了解更为清晰。在我看来，结构性思维是社会学科中值得历史学家效仿的长处。事实上，历史学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从社会理论借用更多概念的原因，正是为了把更多的结构性的思维方式引入历史研究。

但社会科学家的结构性思维的不足是缺少充分的时间性假设。在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中，“结构”一词至少被含蓄地认为是既有 的，是决定了社会行动现象形态的坚固的社会现实，或基础性的、不可改变的逻辑。社会行为、制度的具体特征，或者特定的信仰和观点虽然形形色色，但这些差异都被视为受到基本结构的有效形塑或规制。在社会科学的话语中，修辞通常止步于结构。只要把社会文化的差异都归结于结构——制度设置、职业分布、性别成见、二元对立的分类法、消费偏好等等——的时候，这些解释就被认为是完整的。问题在于，基本的因果结构会随着时间流逝发生突变或转型，它们也有自己的历史。许多社会科学家虽然意识到结构最终的历史性，却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我认为，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理论对话最能产生实质性好处的地方之一。他们都需要与时间的历史性概念相容的各种结构性思维。

另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学习的宝贵思维习惯来自自视为社会学小分支的历史社会学家，他们对解决宏大历史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意愿。注重史料、精确的年代顺序和详细叙事的历史学家，往往对自身学术专长以外的问题十分谨慎。截然不同的是，历史社会学家向来乐于提出最宏大的问题，例如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的诞生，革命的动力学，帝国的统治，以及文明的兴衰。[6] 历史学的学术规范要求历史学家熟练掌握相关历史文献，且要能够以原语言阅读原文，社会学家却少有这些令人敬佩和畏惧的顾虑。这使历史社会学家得以自如地寻求历史学家原则上关心却无力进行研究的更宏大的历史模式。通过提醒我们留意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存在，并向我们提出挑战，去检视、确

认或是驳斥他们的论点，历史社会学家借此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7]

社会科学家具有值得历史学家效仿的重要长处，但也有不足之处。从最根本上说，多数主流社会科学家都被他们对自然科学模式的迷信所阻碍，批判全无或者不足，阐释主义者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艳羡物理情结”（physics envy）。自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19世纪早期建立“社会学”以来，社会科学的理想就成了追求物理学在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时代已经达到的精确度。孔德的图式从此众口相传：研究最简单的现象的物理学将最早成为一门科学；其次是研究对象较为复杂的生物学；尾随其后的社会学（或者我们称其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最为复杂，所以最后完成科学化的过程。由此可知，社会科学是未成熟的科学，它必须效法先辈，尽可能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用数学和量化数据来达到成熟。这一纲领在经济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施，它在近几十年里已经在自然科学模式的倡导者中达到了仅次于物理学的地位。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创立一个半世纪之后一门科学居然还“不成熟”，甚或是仍然受限于早已被超越的牛顿式物理学。用数学方法使社会科学更为精确的尝试屡战屡败，似乎证明了新孔德主义的图式不可能实现，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历史结构，一个顽固的知识创始神话，在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看来，放弃这个神话就等同于完全放弃追寻精确的社会知识。正如我稍后在第三章中所说，以历史学家在社会科学中最显而易见的盟友——历史社会学家看来，这个神话也极为强大。自然科学的崇高声望，效仿“科学方法”的愿望，或是用准实验的严谨性来寻求合法性，这样的想法即使在社会科学中最具历史学倾向的学科中也萦绕不去。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对话的一大障碍就是，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自然科学模式是社会生活研究通往真理的康庄大道。

过分重视自然科学模式使社会科学家越发抗拒当代历史学的核心思想，即社会是由文化建构的。假如不同社会确实在某种深层次上是有文化差异的，那意味着任何假定的“社会规律”都只是在局部有效，而不存在通用的社会规律。也就是说，社会物理学（包括由经济学家

创造的、并被广大量化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沿用的社会物理学）的模式是不切实际的。承认社会关系由文化建构就表明，采取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所假设的牛顿式统一时空坐标系实际是扭曲的、有裂缝的，牛顿式的社会科学不足以了解如此混杂的世界。事实也确实如此。分析如此多变的世界需要阐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建的概念工具，本书就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

基本回避了自然科学模式的社会人类学家及文化人类学家，在许多方面是开展理论性思考的历史学家的天然盟友。人类学家一般认为社会世界是由文化建构的。20世纪70年代时，人类学著作已经使历史学家为之着迷，而那时人类学中有关文化的概念往往完全是共时性的（synchronic）。尽管他们能够解释看似奇特或异域风情的生活形态是如何由文化体系（cultral system）融贯地构成的，但却无法解释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内的历史变迁。在过去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历史问题对人类学来说已经接近核心，人类学家对历史时间性也有了更为复杂缜密的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后结构主义哲学和文学批评与人类学的相遇给后者的理论造成莫大冲击。人类学家过去认为文化是一个融贯的意义体系，这可以解释社会生活的秩序性，而今批判性的人类学家解构了这个旧观念。这一哲学性的批判还夹杂着对学科本身道德立场的深切反思。正如批评所指，人类学从学科初始就和欧洲及美国的殖民主义有关，尝试为其研究对象发声的举动自然无法摆脱道德和政治上的模糊不清。这类道德和政治上的批评被广泛接受，而发展一个更为碎片化的、自相矛盾的文化概念也当然值得褒扬，在民族志中引入不同声音的尝试也是如此。

但我认为，许多当代人类学思想过度批判性的主旨，会导致学者们舍弃了这一领域最有力的洞见和最有益的概念。更经典、更结构性的文化概念对构建一种社会理论的适宜的历史学形式来说，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极高价值。人类学经典的文化概念和社会学经典的社会结构概念一样，需要与历史时间性结合。我们有必要发展出一套视变迁如再生产一般常见的文化概念，并使其成为文化意义的持续实际斗争的一部分。我认为，这需要人类学在解构主义转向之前所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概念作为其开端。系统性地关注历史变迁的逻辑，将有助于

恢复这一更热衷审视过去的错误，而非开拓未来的学科的某种严谨性。

## 如何展开论证

组成本书的文章在不同场合下写就，写作年份跨越了十五年，其中许多已经发表过，但大多数文章都是为本书而写。之后的章节将用不同方法尝试进行前文所倡导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对话，并举出例证。

第二章某种程度上是我本人对进入研究生院四十年以来的历史学生涯的自传式反思。这期间最为人瞩目的发展莫过于社会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随后又以惊人的速度被文化史所取代。我曾经热衷参与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过程，但近来渐渐认识到，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转变中，我们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深刻影响了社会关系，我尤其担心的是现在主要的文化史研究模式无法理解由此引发的历史转型。我将尝试在第二章中为目前的历史学思想体系作批判性的诊断及历史性的阐释，同时指出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的相遇在政治和智识意义上的竞争局面。

第三章将批判性地评价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相遇，并指出历史社会学家保守且限制性的时间性概念已然削弱了历史社会学认识论潜在的激进力量。在批判性阅读代表作品的基础上，我将厘清历史社会学家使用的三种社会时间性的概念：传统的目的论时间性、实验时间性，以及更偏向历史学（也更有趣）的事件时间性，并指出使用目的论时间性和实验时间性的经典作品之所以在智识上取得了如此成功，是因为它们利用了未经理论化、但相当关键的事件性历史分析。而社会学，也包括历史社会学在内，则需要认识历史学家习以为常的社会时间性，并将它融入到自己的理论工具之中。

正如第三章那样，第四章会尝试将更为历史性的时间性概念引入社会学的思考。为此，我会向读者呈现社会学中关键的结构概念。我将提出的有关结构的理论不但连接了社会学及人类学对这个术语的迥异理解，还将能动性（agency）的概念纳入其中，并能够解释结构在

历史中的转型。我将主要通过对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两人著作的批评及评价进行论证。

如果说第三章和第四章从历史学的角度批判及重整了社会理论，那么之后的三章主要对比的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在第五章中，我将剖析长期以来作为人类学核心的文化概念。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文化这一概念已经不只限于人类学，还被许多别的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和文学研究所采用。与此同时，由于文化概念逐渐染上了帝国主义或东方主义的色彩，人类学家对文化的态度也愈发暧昧不清。就像人类学家曾经断言的那样，我认为文化是人文科学无法逃避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更仔细地完善这个概念，而不是放弃或者回避。

第六章将评论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向其他学科广泛传播了文化概念的著作。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尤为深刻。表面上看来，历史学家采用格尔茨的论述是相当矛盾的，因为他坚持共时性而显得反历史（anti-historical）。本人则认为，正是格尔茨杰出的共时性论点吸引了在时间性概念中结合共时性与历时性（diachronic）元素的历史学家。最后，格尔茨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既反映社会生活，又构建社会生活的模型，从而奠定其共时性文化分析的基础。这种文化定义能够作为一种解释文化及历史变迁的方法而用于历时性的研究。

另一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建立了一种利用事件范畴来分析历史变迁的复杂的人类学理论，第七章将分析他缜密的论述。萨林斯深受法国著名“结构主义”学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影响，把欧洲人初次抵达夏威夷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作为发展一种可能普遍适用的文化转型理论的途径。他认为夏威夷土著视库克船长为神的化身，因为库克的船抵岸时恰好是土著人祭祀神明下凡的季节性庆典。萨林斯分析了夏威夷土著从最初敬畏库克船长到最终杀害他的举动如何同时再生产及改变了夏威夷文化。易言之，这些举动将欧洲的事物引入夏威夷的文化范畴，而这种在传统范畴中引入外来元素的做法不仅改变了该类别的内涵，还改变了整个范畴体系。在我看来，虽然研究采用的实例独特且充满异域气

息，但萨林斯的理论仍然具有普遍意义。与此同时，他的历史变迁理论还有待改善，尤其是论证中历史延续性的概念应当更加多样化。

第八章仍然以事件为主题，继有关大洋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后，我将剖析欧洲历史上发生于1789年7月14日的重要事件：攻占巴士底狱。该章将从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历史学的观点认为此事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的诞生，此其一；通过这个例子建立一种更为普遍的事件理论的分析样板，此其二。我尝试在该章中把历史学家关于社会时间性本质的传统假设发展为清晰的理论，并以此阐明攻占巴士底狱这一重要的历史实例。

第九章与前两章一样是由理论引导的案例研究，这一章分析的对象可能会被认为与转型性的事件相反，是一种在看似不可逾越的不利条件下依然持久的反常制度。研究将分析19世纪马赛码头工人行业社团的历史。在当时结社被视为非法的情况下，社团仍然保障了其成员的特权。我将进一步通过这个案例，反思资本主义发展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和不同工人群体大相径庭的政治经济经历之间的关系。本章结合了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旨在说明19世纪马赛的社会时间性中的不均衡性，并反映人的能动性、偶连性以及不可阻挡的社会进程如何交织成一系列令人惊奇的戏剧性历史。

最后，第十章将从不同于前文的、更为哲学式的视野概括前九章所阐述的全部领域。该章将试图为社会科学中的“社会”（“social”）作定义，以此详细说明使前九章中具有历史学色彩的社会理论得以成立的本体论假设。“社会”意味着人类相互关联性的复杂总体，在我看来是一个异常模糊但又极其宽泛的字眼。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社会范畴是由各种相互重叠和联系的符号实践（semiotic practices）流所构成。为了充实这一点，首先我将说明，大多数文化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或明或暗地假设社会生活应该被理解为由语言构成的，也就是一种复杂而开放的文本。为了进一步论述并拓宽这种社会范畴的语言学概念，我将严格来说不算语言的符号实践也包括在内，研究不同种类的符号实践之间的衔接，指出这些各异的符号实践怎样生成了依靠定量或者机械论推理才能解读的人类行动模式。通过以上所说，我重建了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科学图景，包括文化／符号学、

定量／机械论方法，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科学中，符号学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本体论基础完全不同，而我则尝试把两者建立在单一的、且与阐释性方法相协调的本体论基础上。我认为，这一共通的本体论可以生成本书致力探索的历史的逻辑之全貌。

注释：

1 ．我查阅过一些最近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期刊，根据其中论文的起首段落确定它们是理论性还是描述性来证实这一观点。在2002年的《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和《美国政治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中，以引入理论问题开篇的论文数量，远超用时空有限的趋势、状态或者事件来开头的论文数量（《美国社会学期刊》30篇中有27篇，《美国政治学期刊》56篇中有51篇）。在同2001年和2002年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和2002年的《现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中，以写某种趋势或事件开头的论文数量则是以理论问题或阐释开头的论文数量的两倍（前者在《美国历史评论》31篇中有22篇，《现代史期刊》12篇中有8篇）。

2 ．斯科特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中的跨学科社会科学学院中任教；拉卡普拉在康奈尔大学的人文学研究课程中以教授职位任教；雷迪同时受聘于杜克大学的历史学系和人类学系；查卡拉巴提同时受聘于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系和南亚语言及文化系。（我本人在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系和政治学系都有职位。）以上这些历史学家的知名理论著作如下：Scott（1988），LaCapra（1983，1985，1989，1991），Reddy（2001），Chakrabarty（2000）；此外还有Scott（1974，1996），LaCapra（1972，1982），Reddy（1984，1997），Chakrabarty（1989）。

3 ．一个有启发性的特例是简·戈尔茨坦的《后记》，此文收录在时隔十四年再版的《安慰与分类》（*Console and Classify, 2001* ）中。《后记》是针对社会理论诸范畴的彻底反思，在社会学理论中尤指关于专门化/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以及福柯的规训与法律的对立。

4 ．尤见本书第三章和第七章。

5 ．参见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 1988）对定量社会学通用前提的经典批评。必须在此声明，本人并不反对定量研究，而且也曾经做过相当一部分类似研究。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专门论述了定量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但本人所持的理论观点和现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意见大相径庭。

6 ．案例包括Eisenstadt （1963）， Moore（1966），Wallerstein（1974a）， Bendix（1978）， Skocpol（1979），Mann（1986, 1993），Tilly（1990）和Arrighi（1994）。

7 ．这绝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范围整体上比历史学家更广博。例如，即使是最平凡的历史学著作，也很少会如经验主义那般琐碎，而这种琐碎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学中政治科学这一子领域的常态。这一学科持续产出的论文致力宣扬琐屑的知识，如用统计学估算拉票活动对投票结果的作用，政党的影响力或竞选活动如何左右国会唱票表决；还有用数学方法为立法—司法互动中的信号传递、国会中用策略操纵综合条例草案，或是权力分立对国会决策的影响建立博弈论模型。

---

(1) ideographic和nomothetic作为一对术语出现时，指的是两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前者强调个案、特殊性与主观现象，而后者强调普遍性、规律性和客观现象。—— 译者注

# 第二章　社会史及文化史中的政治无意识：曾经的计量历史学家的自白

本章内容将跨越学术论文、个人反思和政治评论的界限。自196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学位以来，我在过去四十余年间的研究课题都是社会史的历史。在美国的语境中，过去的四十年恰好对应了这门通常被称作“新社会史”的研究纲领抛物线一般的大起大落——它的理论涌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在八九十年代迅速被“新文化史”取代。在本章中，我将以局内参与者的身份重点讲述这一过程在美国的情况，同时也会不断比照英法两国大致平行但在思想内容、政治和时间性上不尽相同的发展过程。我要研究的不是社会史或文化史的学术成就，而是奠定这两种历史研究类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预设。我会特别谈到社会史/文化史的认识论和政治之间复杂、矛盾甚至反常的关系。因而本章也在清醒地反思我和我的文化史同行们过去二十五年间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本章还论述了我们应该如何在保留语言学转向给历史学研究中带来的巨大知识增益的同时，重拾社会史研究中业已失落的某些观点。我想开宗明义地表明自己是以一个全力投入的参与者的身份书写这段历史的，所以这番评论首先应该被视作自我批判。鉴于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阐释态度，我尝试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及政治变动如何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运作造成了无意识的影响。尽管本章的题目受到了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　1981）的启发，但我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学术史研究的方法更接近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73, 1977）的著述。不过和威廉斯不同的是，我倾向在历史书写而非文献作品的话语中，在作者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根本性转型的经历中，追溯“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话语的涌现和表达。

首先应该在此指出对我的研究造成巨大影响的三方面个人经历。其一，本人的研究对象是法国历史。声名显赫的“年鉴学派”引导了世界上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的社会史研究和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史转向，这毫无疑问地影响了美国的法国史学家。它使我们意识到

历史编纂学中何为先锋（avant garde），也意味着尽管政治史是法国以外的大多数历史学家的专长，其影响力却异常微弱。过去四十年间的历史在美国的德国史学家或美国史学家看来都会有很大的区别。其二，事实上，我是被培养成一名实证主义者的。我的父亲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使他的学科更加彻底地“科学化”，还对建立威斯康星大学以实证主义而声名狼藉的社会学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中为社会学争取一席之地时，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Sewell, 1988）。我成为历史学家的同时，就已经具备了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得到的科学的实证视野。我在研究生时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尝试以假设检验这一实证主义概念解释马克·布洛赫的比较历史（comparative history）（Sewell, 1967），同时本人还完成了大量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学位论文（Sewell, 1971）。显然，与同辈的社会史学家相比，实证主义观点对我有更深入更长久的影响。

其三，我受历史学系的约束远少于一般历史学家。即使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时期，我受到的训练也跨越了学科界限：我主修跨学科的经济史，完成了相当数量的经济学课程，还辅修了社会学理论。而且在我得到第一个教职后的三十五年中，完全受聘于历史学系只有十年时间。除了单独受聘于历史学系（1968年至1975年于芝加哥大学，以及1980年至1983年于亚利桑那大学）以外，我还有五年受聘于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机构（1975年至1980年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院），有七年同时受聘于社会学系和历史学系（1983年至1985年于亚利桑那大学，1985年至1990年于密歇根大学），还有十四年同时受聘于政治学系和历史学系（1990年至今于芝加哥大学）。这种不寻常的跨学科学术经历使我对社会学科中的理论、方法和修辞实践进行了相当多的参与式观察，[1] 这让我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更能意识到学科间认识论实践的多样性及其“由文化建构”的特性；诚然这也是我比一般历史学家对理论更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最后一点当然也可以被反过来解释为，正是我对理论的兴趣造就了我不寻常的、跨学科的学术生涯。

尽管有上述的个人特质，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方法论或历史研究风

格与同辈的主流社会史学家有太大差异。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我是坚定的新社会史学家，在著述中使用了相当多的定量数据；其后我越来越倾向于文化史的研究。我稍后会说明，这样的人生轨迹在我的同龄人中很常见，而且绝不仅限于美国的历史学家。同时很惭愧的是，在我这一辈的历史学家中，本人的政治观点和经历最为典型。像多数同辈学者一样，我参与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及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大学抗争（于我而言是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以及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进入20世纪70年代，我对政治的参与逐渐减少，部分原因是一些运动声势减弱，[2] 还有部分原因是私生活和职业的转变——家庭责任的增加、担任教职，以及为了得到终身教职要持续出版作品。但在政治上我还是个左派，还在里根和老布什在任总统期间成了被右翼评论员大肆埋怨的对象（Kimball, 1990），如今还是美国主要大学（不仅限于历史学系的教员）中占相当数量的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之一。

## 社会史

“二战”后，社会史几近一门国际性研究，早期的研究中心在法国。在吕西安·费夫尔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带领下，与《年鉴》相关的历史研究学派在思想和机构中都占领先地位；在英国，相当多与我同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导了这一学科；在美国，通常被称作“新社会史”的学派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3] 我也曾经是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的“新社会史学家”中年轻一代的一员。

在1971年论及社会史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它在学界处于令人瞩目的繁盛时代”，并总结道“这是成为社会史学家的好时代”（Hobsbawm,　1971:43）。对我和许多同代的历史学家来说，确实是赶上好时光。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研究生院，写作社会史主题的学位论文，以及在迅速扩张的美国大学系统中得到一个好教职，在如今看起来简直轻松得令人作呕。这一代崛起的社会史学家大部分属于自学成才，尽管我们选择的论文导师对我们

想做的研究持支持态度，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能给我们详细指导研究方法，因此我们只有通过修读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课程，自学方法和理论。尽管有许多前辈学者的著作在美国和海外被奉为重要的研究范本，但我们之中的大多数只能在书本上受教。三种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的书对我影响至深，这恰好是在我准备学位论文开题的时候。它们分别是E.P．汤普森（E.P.Thom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旺代之乱》（*The Vendée*， 1964），以及斯蒂芬·特恩斯特伦（Stephan Thernstrom）的《贫困与进步》（*Poverty and Progress*， 1964）。在20世纪60年代末，即便是大多数新社会史的“元老”也才刚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不久，直到我们这一辈的社会史学家入行，并在70年代中发表了论文和专著，社会史在美国的地位才得以上升。20世纪70年代中期，新社会史在研究机构中取得了强势地位，并很快成为专业中的主导方向。社会史兴起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社会史学术期刊的急剧增加。在1960年之前，创办于1958年的《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是美国仅有的社会史领域的专门期刊。《社会史期刊》（*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以及《历史学方法通讯》（*Historical Methods Newsletter*， 稍后改名为《历史学方法》[*Historical Methods* ]）创办于1967年。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社会史期刊出现，包括1970年的《跨学科史学期刊》（*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71年的《国际劳工及工人阶级史》（*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1972年的《农民研究》（*Peasant Studies* ），1974年的《城市史期刊》（*The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1976年的《社会科学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 ）和《家庭史期刊》（*Th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此外，有关社会史的论文也时常出现在综合性的期刊如《美国历史评论》及《现代史期刊》，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社会史专著，[4] 社会史学家不断被授以终身教职，而且在主要学系中的地位节节攀升。

社会史在美国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出现，同时也开启了历史学界类似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的过程，对思想的转型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这表现为从研究议题、方法到智识风

格的改变。其中，一个重大且持久的成就是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史研究了过往历史学一直忽略的人群。过去，历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政治人物和重要的思想家，而社会史更关注默默无闻和受压迫的人：仆役、工人、罪犯、女性、奴隶、店家、农民，或是儿童。这种对成千上万的被遗忘的普通人的兴趣，无疑与20世纪60年代政治激进主义中的平民主义（populism）倾向相一致。其次，社会史并非注目于狭义概念上的政治，而是试图记录普通人生活经验的全貌，例如工作、养育子女、疾病、娱乐、越轨行为、亲属关系、民间宗教、社交能力、生育和消费。社会史不仅研究新的人群，还针对他们提出新的问题；为了回答关于新研究对象的新问题，它也自然使用了新的论据。过去被认为是不包含历史学研究可用资料的各种记录顿时成了文献宝库。像是古旧的人口普查手稿、税单、遗嘱、通知书收发登记簿、财产目录、流行歌曲、城市指南、互助会章程、建筑许可证，以及婚姻、受洗和死亡记录，和许多其他文件一起，成为了关于社会结构、制度和成千上万普通人的生活经历的证据。

新的分析方法也被用于研究这些新形式的文献。新社会史的一大特征就是系统地使用定量研究。社会史学家研究的人群通常目不识丁，即便是能够读写，也很少留下关于他们生活的书面记录。但这些人有不得不和政府接触的时候：缴杂税或什一税（tithes），被征召入伍，为合同做公证，登记出生、婚姻和死亡，接受人口普查，或是被警察逮捕。社会史学家基本上是通过汇集这些记录了普通人与政府间日常接触的文件中少量而刻版印象化的信息，才能重构出这些无名氏的生活面貌。因此，定量研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与社会史对研究主题的大幅扩张有密切的联系。

历史学家正是从社会科学中借鉴了用来分析这些新式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但这种借鉴远不止是简单的方法转移：与方法伴生的新颖的理论及认识论也随之而来。借鉴方法只是在我们自己和著作中自觉模仿社会科学的其中一种表现。我们倾向于认为所谓“传统叙事史”在理论和智识上濒临枯竭，而另一边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地理学看起来是如此具有吸引力。在20世纪五六十年

代，由于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力扶助，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在上述领域成了压倒性的主导（Kleinman, 1995； Ross, 1991；Steinmetz，即将出版；Turner and Turner, 1990）；到了60年代，这些偏向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在学术界中声名显赫，而且似乎远比历史学方法严谨、理论缜密。无怪乎新社会史会引入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立场。

新视角的引入和社会史的发展相辅相成：前者得以形成了一套相当融贯的理论，为后者建构出不同以往的认识对象。新社会史学家的“社会”所在，首先应该是我们跟随社会科学家同行所言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客观的、超越个人的模式或力量，行动者并不能完全意识到这些模式和力量的存在，但其行动和思考深受其约束。社会结构包括行业分工、商业周期、人口模式、继承制度、财富等级、城市定居模式、土地占有制度等，它们在历史记录中，尤其是在为我们提供所谓“硬数据”（hard data）的可量化的记录中有迹可循。我们认为，社会结构本质上是在政治史或思想史以外自主运作的。尽管历史学家过去认为政治或思想发展是最主要的，实际上背后还存在着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甚至是由后者决定了前两者。计量史学的“硬数据”与政治或思想史的“软”数据或“主观”数据之间的区别，隐隐揭示了二者在本体论基础上的区分，即是由社会结构主导，还是由政治和文化主导。简而言之，社会史的兴起不仅重新定义了历史学知识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政治或观念转为鲜为人知的社会结构，还发现了研究这一对象的新路径。

上文所述当然是新社会史范式的理念型（ideal type），但并非所有社会史学家都全然遵循这套认识论的方方面面。受人口学或者经济学影响至深的那些学者对定量研究或者“硬”数据尤其感兴趣，而研究叛乱和社会运动的社会史学家更偏好把定量数据和从档案、回忆录或报章中拣选出来的语言表述结合起来。尽管社会史学家内部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他们的共同之处都在致力于得到学界认可、力主跨学科借鉴的必要性、承认定量方法纳入历史学家的工具箱、将历史学的主题拓宽到政治和主要思潮以外、认可普通人的经验在历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等方面。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成功的主张，社会史成功地重新

定义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甚至可以说在美国的历史学界短暂处于支配地位。尽管社会史学家在人数上并不占优，但其支配在于重新界定了历史编纂学讨论的内容，于是政治史或思想史学家也开始提出社会史范畴的问题，并尝试新的社会史研究方法。[5] 及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使是对社会史的主张和方法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处于历史学研究的“最前沿”。

社会史的研究纲领与美国新兴一代社会史学者的政治承诺和情感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史学者的政治承诺绝不简单。我在前文曾说过，定量方法符合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中的平民主义冲力，因为这让传统历史学家所用史料无法覆盖的阶级或群体的历史得以被细致研究。换言之，定量研究是实现平民主义者“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的研究目标的重要途径。但社会史学者的政见同时也使他们拥抱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姿态显得暧昧不清。容我提醒各位，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格局里远不止高涨的平民主义而已，当时的激进学生还极度反感他们认为是当代美国现状一部分的机构性一致（bureaucratic conformity）[(1)]。彼时的激进主义，尤其是其中的“反文化”时期，必然抗拒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主流的福特主义（Fordism）[6]，即主张“大政府、大型企业、大量劳动力”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协同效应。福特主义宏观的社会经济调控，决定了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延续到70年代初期的二战后经济繁荣，其主张包括批量生产技术、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稳定的劳资谈判制度、凯恩斯式的总需求管理、全民就业措施、福利国家政策，以及在公营或私有机构均实现的高度官僚化（Aglietta, 1979； Amin, 1994； Gramsci, 1971b； Harvey, 1989； Jessop, 1992； Lepietz, 1987）。

从21世纪初竞争激烈、掠夺成性且极其不平等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福特主义的调控模式显得尤为人道，俨然准社会民主化的“失落的世界”。但在20世纪60年代年轻的社会批评家的眼里，福特主义的成就（比如经济稳定和生产力持续增长）几乎不值一提。这些成就被当作是现代性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进步所给予的永久且理所当然的馈赠。与此同时，福特式资本主义的缺陷，包括全体一致

（corporate conformity）、千篇一律（bureaucratic monotony）、道德压抑、大众文化单一的形式，对作为学生运动的主力的年轻且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令人反感且无法忽视的。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反文化风格，例如迷幻音乐、精神药物、沉迷“东方式”的冥想、奇装异服和性试验，大多是在反抗伴随社会经济调控的福特主义模式的标准化。尽管左派政治运动和反文化并非同一事物，但在当时，参与政治运动的同时很难不探索或接受反文化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我相信20世纪60年代的这种反福特主义的张力，增加了许多社会历史学家对习得的定量方法和实证主义哲学假设的潜在暧昧态度，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毫无疑问，定量方法是克服“传统”历史学中的“精英主义”，即拓展历史学的社会边界和主题，以便纳入穷困、被压迫和边缘化的群体的必要方法。但我们社会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采用定量方法论的同时，我们也参与了大科学的官僚主义和还原论的逻辑——而这正是我们意图批判的系统的一部分。至少在我的个人经历中，这种警惕部分来自与政治学和社会学之类学科中的左翼学生的交往，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批判了自身学科实证主义方法中的盲点。乔治·施泰因梅茨（George Steinmetz）曾经指出，这些批判实际建立在含蓄的反福特主义的政治计划之上（Steinmetz, forthcoming, 2004; Steinmetz and Chae, 2002）。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新社会史学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运用福特主义式的大科学方法，却追求一种至少是部分的反福特主义的政治议程的客观上自相矛盾的处境。

我和许多同辈学者的暧昧态度的标志之一，就是对E.P．汤普森的著作所扮演的角色的态度。该书曾经启发了包括我在内的热情接受了计量史学所具有的可能性的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尽管汤普森认为计量是对生活经验肌理（texture）的粗暴抽象，并对此反感到了几近深恶痛绝的地步，但许多人仍然非常仰慕他的著作。汤普森在著作中探查了英国贫民的思想、感情及经验，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尝试帮助他们逃离“后世的不屑一顾”（Thompson, 1963:13）[2]。回想起来，我认为汤普森如此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他不仅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英国19世纪早期的成功看起来更像是偶然而非必然，还用生动的细

节解释了劳工阶级共同体捍卫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他令人信服地重构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形形色色具有活力或反叛性的独特生活方式，表现出了劳工阶层经验史之丰富，这很快撩拨了意图在形塑了我们社会的大相径庭的福特式资本主义文化中寻找激进的替代性路径的青年男女们的心弦。于是，新社会史学家常常把少许E.P．汤普森的论述混合进他们的定量社会学，混合进他们尽可能搜刮到的所有贫民生活经验的定量分析中。[7] 尽管我们社会史学家的认识论立场最终并不融贯，但在实践中，无论是定量方法还是汤普森式的定性方法，显然都能帮助我们达成理解过去的普通人生活这一最终目标。就我本人而言，有关生活经验的定性史料对我以定量为核心的研究起到了补充作用，这体现为我学位论文引言部分中的一个关于认识论的比喻：对于好比是血肉的定性数据来说，定量方法就像是提供了让血肉得以依附的坚实骨骼（Sewell, 1971:17—18）。[8] 总之，尽管计量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令人兴奋且在政治上不可抗拒，彻底接受计量的道德暧昧性和我们无法融贯的认识论立场，使我们社会史学家容易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

和美国的相比，法国及英国的社会史有着多少不同的时间节奏、关注点和政治亲和性，而前文中所说的对历史学知识对象的重新定义则是三国社会史学家的共同成果。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战后英国的社会史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尤其是E.J．霍布斯鲍姆、E.P．汤普森、乔治·鲁德（George Rudé）、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他们都是英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的成员，直到他们中的多数人在1956年退党（Kaye, 1984；Hobsbawm, 2002）。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集中出版，以至于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学派”，然而他们对社会史的观点和美国的新社会史学家有许多差异。第一，尽管有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也用了定量研究的手段，且大多不像汤普森一样彻底反对计量，但毫无疑问，他们完全不像美国新社会史学家那样对定量方法有着学科纲领式的热情。[9] 第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所谓“平民史”（history from below）和“自下而上的历史”有着特别的兴趣。在实践中，这不仅仅能尝试重构普通人生活中社会结构的或

经济的决定因素，还能尝试从贫民的角度去书写历史。第三，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以同情的笔触描绘贫民的信仰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斗争。这些普通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并不只是被分类或当作表格中的类别或数据，而是他们自身历史的能动者（agent）。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中对这个观点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但这也是每一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的重要元素（Hill, 1964a, 1964b, 1972; Hilton, 1973; Hobsbawm, 1959, 1964; Rudé, 1959, 1962, 1964）。第四，英国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比折衷的美国或法国同行有着更自觉的理论导向。他们所秉持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教条，但清楚地将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且认为解释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正确方法就是将之与源于生产方式及其转型的阶级动力联系起来。[10]

最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出于自己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而在机构中深受边缘化，所以他们的经历和学术史地位快速跃升的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大为不同，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学者差异更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后者不仅成为历史学界让人仰望的高峰，还被更普遍意义上的法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视为重要同伴。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创办和管理国际上最具声望的英国历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尽管他们有出色而丰富的学术产出，但只有任教于牛津大学的希尔一人拥有牛津剑桥的教职。希尔顿任教于伯明翰，霍布斯鲍姆则任教于伦敦大学伯贝克（Birkbeck）学院，鲁德大多数时候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教书，汤普森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任教于华威大学，并在五十岁左右退休后投身写作和激进政治运动，靠个人收入维生。[11] 英国当时的同代人中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知名社会史学家，如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E.A．里格利（E.A.Wrigley），他们都比马克思主义者同行们更受优待。但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主流史学界仍然对社会史持怀疑态度，敌视马克思主义，同时非常重视政治史、制度史和叙事史。年轻一辈的英国社会史学家尽管不是前代先锋的学生，却非常尊崇他们的著述，并至今都在试图保持学界中的政治左派和对抗

意识。他们都在英国学界站稳了脚跟，但大多是在“红砖”大学（“red brick”universities），而非牛津剑桥这两所大学。1976年创办的两本优秀的新社会史期刊《社会史》（*Social History*）和《历史工作坊期刊》（*History Workshop Journal*）标志着这一代历史学家的到来。

在法国，社会史对其他形式的历史学科的胜利比其他国家来得更早也更彻底。说起社会史在法国的兴起，我们就必须回溯到1929年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夫尔创办的新的历史学期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2]。《年鉴》从创办之初就不仅致力于发展社会史，同时还促进了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接触和合作。在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在法国史学界仍然属于少数的异见派；“二战”后，费夫尔组建并主持了迅速超越索邦大学成为法国最具声望的历史学研究中心的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第六系（the sixth section of th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高等学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即EHESS）。 1956年费夫尔去世后接替他出任院长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学术带头人。在他的领导下，“第六系”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不仅巩固了在法国历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还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与美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中，历史学的地位更高（Burke, 1990; Dosse, 1994; Revel, 1995）。直到1985年，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才出现第一位社会科学家院长——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而1995年接替奥热的又是一位历史学家雅克·雷韦尔（Jacques Revel）（Dosse, 1994:143）。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名副其实且令人难忘的长篇论文（thèses d'État）发表浪潮愈发巩固了社会史在历史学界的优势。[13] 年鉴学派是如此成功，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学派的学者出任了索邦大学全部的现代史教授职位。[14]

年鉴学派对社会史并没有严格的整体定义。布洛赫、费夫尔和布罗代尔所主张和实践的历史学范围广博且自觉地包容，从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到社会结构史，再到今天所说的文化史都被囊括其中。同

时他们的历史书写也在其他层面展开：布洛赫长于比较历史学，而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始于16世纪居住于地中海沿岸和汪洋的全部国家和文明，进而延伸到全世界。但大多数的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研究的地理范围和前人相比要狭窄许多，并且大多使用特定的研究步骤。首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长篇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一个界定明确的法国区域，不是朗格多克（Languedoc）、利穆赞（Limousin）、奥弗涅（Auvergne）或普罗旺斯（Provence）之类的整个省，就是一个像亚眠（Amiens）、里昂、巴黎或卡昂（Caen）这样的城市，并且通常会声称把当地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在法文中这被称作总体史（l'histoire totale）。其次，他们认为社会总体都有同一个内在模式。这些论文以分析被假定为组成社会基础的地理、经济、人口和职业结构开始，且往往在数百页篇幅的扎实的唯物史分析之后，才接着论述有关民众心态、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都相信某种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内在的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型。最后，多数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都大量使用了定量研究方法，他们的论文中几乎总是用上百页的图表来归纳定量研究的结果，有时这些图表甚至可以独立成册。所以当时的法国社会史研究模式尽管有各种重点或风格上的差异，但和前文描述过的美国式社会史研究区别并不大。

虽然人们确信年鉴学派的创始人是共和主义者，[15] 但他们不一定是左派。战后进入高中学习的多数年鉴学派“第三代”，在政治上一开始都属于极左阵营，其中还有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16] 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选择经济史学家C.-E．拉布鲁斯（C.-E.Labrousse）为论文导师。拉布鲁斯是计量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索邦大学的经济史教授，专长18世纪法国的物价研究；身为社会学家弗朗索瓦·西米安（François Simiand）的弟子，他认同马克思主义，却从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布罗代尔的朋友，赞同年鉴学派的纲领。在这样一位极具魅力的论文导师的指导下，年轻的左派历史学家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成了年鉴学派的拥护者。[17]

我们或许会推测，年鉴学派对这些年轻马克思主义者的轻易接受，使后者相对容易地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至少大多数

人的确如此。只有像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样因为最初政治倾向而不得不自发组成反对派群体，才不会轻易地使自己的智识立场滑向中间派（glissement vers le centre）。但不管怎样，年鉴学派对左派思想还是持开放态度。1968年参与“五月风暴”的年轻左派历史学家，在接下来几年中进入了《年鉴》和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领导阶层。他们对学派的拥护再一次掩盖了政治倾向，于是和英国的同行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法国的历史学职业群体诚然能够包容左派，但也正是这种开放态度遏制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即使是米歇尔·沃韦勒（Michel Vovelle）这样仍然坚持着马克思主义政治信念的年鉴派学者，往往也缺乏清晰的马克思主义智识结构。在一个知识生活宽容、甚至是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实际上却没有人尝试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历史反思形式，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和上述情况不符的例外亦是明证：在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里，马克思主义的支配地位日益明确。20世纪60年代，列斐伏尔和索布尔（Soboul）[3] 的学派支配了这一研究领域，他们是一批和年鉴学派保持相当距离的社会史学家。 18 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拉布鲁斯的学生、曾经的共产主义者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的抨击下，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变得一蹶不振（Furet, 1971, 1978）。菲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还被晋升为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中庸（juste milieu）的校长。

无论是社会史的成功，还是它在政治上对左派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都没有局限于法国、英国和美国。时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几乎流行于所有西欧国家。其中，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的社会史研究模式，这是两国学者前往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访学的成果。尽管德国历史学家受韦伯的思想影响很深，但该国和北欧的研究院更偏好美国的社会史研究模式。社会史在印度兴起时，最先效仿的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无论在何处，社会史都被视为一种各不相同但互相联系的国际性话语的一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在不同国家之间不断辗转流动，从而增加了国际范围内对这类研究的关注。

尽管人们很容易识别出这些形式各异的社会史研究，但要准确定

义学者用社会 史一词表达的含义并不简单。彼时少有清晰的定义，多数界定要么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社会史的本质就是描述和解释生活的形态”[Stearns, 1967:5]），要么同义反复（“社会史即社会的历史，准确地说，是社会的结构、进程以及趋势的历史”[Conze, 1967:7]）。霍布斯鲍姆在1971年发表的总结性论文《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From Social History to History of Society”）或许对“社会史”一词的含义作了最有趣的说明，他在文中指出“社会史”一词和“经济史”“思想史”或“政治史”等对应词有所差别，因为定语“经济”“思想”“政治”指明了某个人类活动的清晰领域，而“社会”一词却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人类活动。正如他所说，“社会史不可能成为经济史或者其他用复合名词表达的专门化的历史，因为我们不可能单独分离出它的研究主题”（Hobsbawm, 1971:24）。换言之，社会史的内在含义就是成为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这也是为什么他用“社会的历史”（history of society）代替了多数论文中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一词。但“社会的历史”不过是转移了定义中的疑问，因为“社会”（society）就像“社会的”（social）一样模糊且含义甚广。显然霍布斯鲍姆也拒绝为社会史定义：“我不可能界定我们所说的社会或为其建立一个模型，甚至不可能列举出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意图了解些什么。即便可以，我也不能确定这些信息是否有用。”（29）

但是，霍布斯鲍姆后文中给出了关于这个范畴的定义，在我看来，他清楚声言了有关社会是如何被构成的问题，“历史学家之间的默契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共同的研究模式（working model）”。这个模式从来也说不上清晰，却是“研究重点的大概优先顺序和关于是什么构成了我们主题的核心节点或联系复合体的可行假设”。以下是他对这个“研究模式”的描述：

> 从研究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开始，然后到生产力和生产技术（人口问题介于两者之间），再到随之产生的经济结构—— 劳动分工，剩余产品的交换、积累、分配等等—— 还有从中衍生的社会关系。随后是社会的制度、图景以及埋藏其下的功能运作……（这一研究模式的）实践就是由特定场景中的社会生产进程开始，自下而上，由内而外进行。（Hobsbawm, 1971：31）

这似乎是重述了年鉴学派的范式，还带上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色彩。我认为这相当准确地把握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数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模式。无论在法国、英国还是美国，社会史作为研究纲领的融贯性都基于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即经济结构是最基本的，它构成了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可被整体把握的这一优先立场。

此外，这段时间进行的多数社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都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冲击。当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尤甚，但在法国和美国也是如此。前文提及的许多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早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一部分人在1956年以前是共产党员。安德烈·比尔吉埃（André Burguière）指出，尽管许多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研究的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历史，但和他们的老师拉布鲁斯一样，他们也普遍关心20世纪60年代期间同时受W.W．罗斯托（W.W.Rostow）和马克思影响的问题意识：法国资本主义“起飞”的经济、人口、社会及文化前提（Rostow，1960）。据比尔吉埃说，有关“现代化”（或现代化的失败）的问题贯穿了年鉴学派第三代的著述（Burguière，1995：257—261）。而在美国，社会科学的战后腾飞是以“现代化”范式作为铺垫，而新社会史的核心问题意识就是“工业化”兴起的原因、前提和结果。不管是研究美国还是欧洲的美国社会史学家，大部分研究的都是工业革命造成核心且不可避免的冲击的19世纪城市议题，而非法国历史学家所偏好的近代早期乡村题材。虽然多数美国社会史学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且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未能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但围绕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始终被视为新社会史的构成部分，就像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国年鉴学派所做的社会史研究一样。

## 文化转向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这种“研究模式”的共识越来越受到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的历史学形式的质疑，这种质疑和社会史一样是国际性的。我对此的描述将从详细讨论美国的实例展开，并且在详细阐述我自己在美国语境下的个人经历之后，我才会将之与英国和法国的同

一发展进程开展比较、评估。

我早在1971年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开始为实证主义计量史学的局限性和“研究模式”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局限性感到苦恼。在我看来，尽管定量方法论帮助我们越来越理解形塑人们生活的结构性约束以及社会力量，但关于理解人们如何厘清和对抗这些外力和约束——换言之，关于他们如何在实际上创造历史——却没有提供指引。新社会史认识论中一直以来的客观主义——被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戏称为“抽象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Mills, 1959）的思考模式——将许多有关过去的有趣问题排除在外，比如在E.P．汤普森论著中占核心地位的人类能动性、文化、经验的肌理问题。我无从知道这个疑问从何时开始困扰美国的其他新社会史学家，但我知道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疑问。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朝所谓文化史的转向，实际上是由一部分原本支持新社会史的学者领导的。在我个人研究的法国史领域，像我一样从早期研究计量史学转向文化史的还有琼·斯科特和琳恩·亨特（Lynn Hunt）。[19]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新社会史不同，后者是一代学人努力的成果，前者则至少是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学实践转型的一部分。回想起来，我认为自己的学术生涯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是我60年代的激进思想中反福特主义面向的迟来结果，而且我深深怀疑许多人也被同一个隐藏的政治动机所驱动。但在开始讲述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的政治文化动力之前，我会先讲述转向在何时、如何开始。

受文化人类学鼓舞，我放弃了许多人都曾经认同的新社会史的抽象经验主义。人类学为我指出了寻找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的途径。当然，对意义的历史的疑问在思想史中向来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文化人类学之美在于，它使我们不仅能在伟大思想家的文本中，还能在仪式、传统、语言和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使一种贫民、被边缘化者、被压迫者、文盲和半文盲群体的思想史成为可能，而这些内容也是社会史的日常所需。可见，社会史朝人类学的转向，完全符合自身真诚开阔的气质。正如定量研究方法使社会史学家得以把握形塑上述群体生活的社会、经济及地理结构，人类学方法则使我们得以把握他们的文化体系。于是，运用人类学方法可以通过将

文化结构叠加到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结构之上，扩展或者说补充了我们对社会范畴这一概念的理解。在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结构在本体论地位上其实与社会结构同等，而不应被视作根本性社会结构的反映或产物。

因此尽管研究文化结构与社会史广阔的精神气质相一致，人类学转向仍然需要解决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问题。这是因为人类学，或至少是历史学家意图采用的格尔茨的“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Geertz，1973a），本质上与新社会史学家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和客观主义本体论不兼容。新社会史假设，要先分析社会结构再分析社会行动，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则是社会世界是由行动者的阐释性实践构成的。所以，转向人类学的社会史学家不再是分析反映客观社会世界结构的“硬数据”的科学家，他们要把自己重新定位成生产主体间文化模式的、必然是阐释性的实践的阐释者。文化人类学家似乎认为，即便是表面上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石或框架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本身也是人类行动者阐释的产物。

对新社会史学家来说，文化转向在激动人心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困扰。我相信别的社会史学家和我一样认为，迈出这一步意味着某种改宗——对个人智识和道德世界令人振奋的骤然重塑。在1972年到1974年间，我本人在芝加哥大学发生的最初的“改宗”深受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和罗纳德·因登（Ronald Inden）影响。[20] 1975至1976学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参与的一次象征人类学研讨会确立且深化了我的人类学转向。这次由克利福德·格尔茨主持的研讨会包括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希尔德雷德·格尔茨（Hildred Geertz）、詹姆斯·费尔南德斯（James Fernandez）、戴维·萨丕尔（David Sapir）、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埃伦·巴索（Ellen Basso）、基思·巴索（Keith Basso），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以及五位历史学家，分别是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威廉·雷迪、拉尔夫·吉西（Ralph Giesey）和我本人。这次研讨会引起了有关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它不仅蔓延到我们的餐桌谈话，还延伸到普林

斯顿大学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中心（Shelby Cullom Davis Center）举行的另一次研讨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这次互动，让我深以为自己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部分来自两个学科之间更大的交汇点。人类学家在将他们传统上属于共时性的学科历史化方面，似乎和历史学家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引入历史研究有同等程度的兴趣。[21] 不过，我本人的例子也证明，转向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无疑会招致昔日的新社会史学家同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我研究的劳工史这一分支领域，任何含有“唯心主义”的意图都意味着政治乃至智识上的背叛。[22] 但人类学中生动而可信的民族志包含了一种双重保证：其一，用阐释性方法揭示的意义的结构或体系，在真实性和影响深远性方面丝毫不比定量研究揭示的社会结构逊色；其二，阐释性方法可以使被新社会史边缘化的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的维度重新回归历史。总之，人类学化的历史学尽管看似有风险，却是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智识探索。

在结合定量方法和阐释性方法变得切实可行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作出某些平衡。这些过去的文化体系的开创性探索当中的陶醉感和发现感，曾经让社会史学家难以在实践中秉持兼顾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综合研究策略。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数据集、图表和统计抛诸脑后，全心全意地投入文化研究之中。我的个人经历可以证明，在实践中结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方法是何等困难。在尝试将自己有关马赛工人的博士论文成书出版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发现了文化人类学的可能性，但在完成此书之前，我在1976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象征人类学研讨会上报告的一篇受人类学启发的论文，却被发展成了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Sewell, 1980）。这使得我对马赛的研究中止了好些年。当我重拾未完的马赛研究时，我最终只出版了原定两卷的著作中高度数据化且完全社会学化的第一卷（Sewell, 1985b），而原本计划结合文化和定量方法的第二卷从未开始着笔。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强烈吸引我的问题，即变动的社会结构与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涌现间的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已经无法让我提起兴趣[23]。从那时起，我就不再是社会史学家。

并非所有社会史学家都通过人类学转向文化史，另一种或许更为常见的途径是文学研究。这批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后结构主义思

潮时经历了转变，德里达（Derrida）、拉康（Lacan）和福柯等名字与此密不可分。社会史学家如何与文化转向进行协商，正是取决于当地的知识生态。我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的职位让我两次身处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的重要交汇点。琳恩·亨特和琼·斯科特两位和我同辈的优秀的法国社会史学家，基本是通过与所在地的文学研究者的交流完成了文化转向，尽管方式有所不同。亨特在其过渡性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前言中写道，她刚开始研究时“酝酿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但她“最初有关大革命时期政治的社会史越来越趋向文化分析”。她把上述改变部分归功于“我在伯克利的朋友的影响”，但没有指明这些朋友的身份（Hunt, 1984:xi）。不过在1983年，也就是亨特完成那本书的前一年，著名跨学科期刊《表征》（*Representation*）创立，亨特加入了编委会，或许从中我们可以一探她的社交圈子。稍事查看这个编委会成员的学科背景，其中有七位英文系教授、两位法文系教授、三位历史学家、一位人类学家以及一位相当特别的政治学家。这种和人文学科的联系同时也反映在她著作的第一部分（题为《作为权力的诗学》[“Poetics as Power”]）的理论参考书目中，包括引用了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苏珊·苏莱曼（Susan Suleiman）、诺思罗普·弗莱（Northrup Frye）、海登·怀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和E.H．贡布里希（E.H.Gombrich），同时还有历史学家J.G.A．波科克（J.G.A.Pocock）、恩斯特·坎托罗维奇（Ernst Kantorowicz）、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以及弗朗索瓦·菲雷，而被提及的社会科学家只有埃米尔·涂尔干和随处可见的格尔茨。

琼·斯科特在文化转向期间任教于布朗大学，同时也是彭布罗克女性研究中心（Pembrok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的负责人。在她同一时期所写的《性别与历史政治》（*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一书引言中，斯科特写道，这些论文源自研究中心研讨会上的交流。当时被女性主义“文学学者”包围的斯科特，说她“不得不认真对待后结构主义理论，并与这一理论对社会史学家的影响角力”（Scott, 1988:1）。她书中的理论引用证实了这一句话：后

结构主义人文学者米歇尔·福柯、特雷莎·德·劳雷蒂斯（Teresa de Lauretis）、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雅克·德里达、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玛莎·米诺（Martha Minow）、嘉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丹尼斯·赖利（Denis Riley）、吕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同时还有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学家T.J．克拉克（T.J.Clark），四位人类学家（格尔茨、米歇尔·津巴利斯特·罗萨尔多[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盖尔·鲁宾[Gayle Rubin]、莫里斯·戈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两位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和卡罗琳·拜纳姆[Caroline Bynum]），以及一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斯科特和亨特都在理论上大量参考了人文学者的研究，但前者参考的绝大部分是后结构主义学说，后者仍然引用了一部分传统人文学者如伯克、弗莱和贡布里希的著作。此外，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作品也在斯科特的主要参考文献之列，据我统计，这几近总数的一半，对比鲜明的是亨特只参考了一位女性主义学者（苏珊·苏莱曼）的作品。这种显著差异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人文学科的基础性分歧，当时，传统人文学科认识论正面临来自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从这些理论参考可以看出，斯科特的著作包含了对历史思维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批判，这正是亨特和她的合著者在认识论立场温和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一书中明确反对的（Appleby, Hunt, and Jacobs 1994:226—228）。显然，不同的文学理论都可以引入历史研究，只是结果不尽相同。

相当有启发性的是，斯科特和亨特的理论参考文献和我在过渡期的拙作《法国的工作与革命》（*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Sewell, 1980）引言中所引用的相当不同。我引用了五位人类学家（格尔茨、戴维·施耐德[David Schneider]、维克多·特纳、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和马歇尔·萨林斯），两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还有四位历史学家（E.P．汤普森、罗纳德·因登、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和伊丽莎白·吉诺维斯[Elizabeth Genovese]）。这些学者的背景和斯科特与亨特参

考的学者的差异显而易见：人类学家占了更大比重，没有文学批评家或者女性主义学者，以及（让我也感到吃惊的是）各学科中占最多数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拙作中11人中有5人，而斯科特的书中19人中有3人，亨特参考的14人中无一是马克思主义者）。[24] 对引用的这一番粗粝分析表明，看似同步的文化转向的路径，在各自的结构之中也有着很明显的不同。

不过与此同时，以上的三个事例都说明了历史认识论前沿的重大转变。如果说新社会史在很大程度上由借鉴自定量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界定，那么新文化史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人文学科大规模嫁接而来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塑造的。即便是像我这样在文化转向中仍然相对遵循“社会科学”路线的人的理论参考，也包括了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的作品，更不用说经济学家了。事实上，斯科特、亨特和本人都引用过的社会学家著述只有埃米尔·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 of Religious Life*，[1912] 1965），一部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同等推崇的奠基性著作；以及由早年从事人类学，其后转向高度阐释性的社会学的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感》（*Le sens pratique*）（Bourdieu, 1980）。此外，即使是最初通过借鉴官方意义上属于社会科学的人类学以进行文化转向的历史学家，也意识到他们身处的知识界愈来愈由文学研究说了算。格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论文（Geertz, 1973b）这一最广为历史学家所知的人类学研究之一（见Walters, 1980），就以把文化作为文本这一概念引入人类学而闻名。他的文本阐释模式诚然最初来自诠释学（hermeneutics）和新批评（new criticism），但许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道的人类学家（其中一部分是格尔茨的学生）越来越受到垄断文学系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吸引。1986年出版的相当于人类学后结构主义宣言的论文集，甚有深意地名为《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Clifford and Marcus, 1986）。从那以后，人类学向其他学科输出理论渐少，而从文学研究引入理论更多。[25]

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文学科的边界出现缺口的时候，大多数进入历史学界的理论来自后结构主义。随着与文学研究的联系日渐紧

密，福柯、德里达和拉康也成了历史学界的重要名字，其中福柯带来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见Goldstein，1994）。我认为这部分是源于与德里达、拉康和他们的追随者不同，福柯一直在研究与历史相关的主题，还关注边缘群体以及话语、权力、不平等三者之间的联系，这与社会史学家关心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既吻合也形成了挑战（尤见Foucault，1977）。[26] 假如说格尔茨式人类学的诠释学路径至少为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带来了认识论断裂的可能性，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涌入则是激化了这种断裂，使发展一种结合两者的社会—文化史的尝试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

女性史（women's history），或是现下更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性别史（gender history）不相称地促进了文化史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兴起，也加剧了其与社会史之间的认识论分歧。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史是历史学研究中最政治化、最具智识创意的领域。[27] 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有条不紊的努力，与上一个十年相比，数量更为可观的女性在80年代进入了历史系，于是女性史也成了历史学科里发展最快的领域。在整个70年代，女性史和社会史等分支学科都在关注相似的议题，如记录过去被忽略的人类群体的经验，以及女性特有的社会经济压力的结构性根源。但到了80年代，受女性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学者的影响渐深（如前文提及的斯科特）的女性史学家们，开始探索现代女性主义运动内在的激进的认识论涵义。毕竟女性主义挑战的是男性和女性之分这一可能是最自然的社会区分，它认为两性差异的意义是偶连的，易受本质性再定义的影响。于是正如斯科特最有影响力的陈述所言，历史学家要解决的问题并非记录女性独特的历史经验，而是破译那些建立、维持、改变社会性别（实为生理性别）差异的社会进程（Scott，1988）。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提供的方法被证明尤有价值，这种对核心文化范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批判性、解构性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激进化及活化整个文化史。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人们认为是自然的、稳定的身份实际上是如何被话语建立、维持和改变的问题成了美国文化史的核心问题意识，其影响在关于种族、性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学中尤为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领域的历史研究维持了性别史特有的政治激进态度和概念创新。[28]

不过，社会史甚至是计量社会史仍然没有消失，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历史学界的霸权地位，急遽沦落为80年代末的知识界边缘，其衰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其衰落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最有名的社会史学家自行转向了文化史，不再“新”的社会史已经无力和崛起的文化史相抗衡。在受文化转向影响的性别史的蓬勃发展的怂恿下，以及在女性进入研究生院甚至取得教职的鼓舞下，文化史迅速成为历史学界主要的发展领域，吸引了研究生院中最优秀的学生。1989年，由琳恩·亨特编辑、影响深远的论文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的出版，或许标志着文化史已经夺取了社会史仅仅占据了十年的统治地位。

由于我也曾经是文化史领域的先行者，或许有人以为我会为文化史取得知识界霸权地位而激动不已。胜利之迅速和彻底当然令人振奋。就在不久前的1985年，我还坚信自己要在余下的学术生涯中为争取文化被社会生活承认而进行漫长而身心俱疲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拼命争取的地位，到1990年时已成为普遍接受的知识，这固然令人惊喜，但我越来越担心文化史对社会史的胜利实在过于轻松，因为人们不经抵抗就放弃了力量颇大的社会史方法论，也几乎未经争论就抛弃了诸如社会结构这样重要的基本概念。在我看来，文化史基本上省去了它和社会史基础性问题及方法之间的关系这项潜在的重要任务，而可以对这些问题多少不屑一提。[29] 我担心这会导致这种历史学形式尽管有着种种令人瞩目的成就、持续的活力和政治关联性，但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提出某些重要问题时显得毫无防备。令人苦恼的矛盾确实存在：在历史学家欢欣鼓舞地废除了结构决定论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已经被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变迁所改变。对此我将在下文详述。当我们面对着21世纪之初出现的政治和智识挑战时，我认为历史学抛弃社会史的概念和方法遗产只会让自己面临严重风险。[30]

然而，社会史的成就为何又如何被如此快速地遗弃？我曾经注意到，文化转向拒绝了社会史幼稚的客观主义，即社会结构在本体论上先于思想和行动，以及各种“硬数据”更能体现这些社会结构的观点。反对这些客观主义偏见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承载着“硬数据”的记录

本身就是需要阐释或批判的文化产物。琼·斯科特的作品再次成了我认为在历史学文化转向期间传播甚广的思维模式的代表。在一篇于1984年[31]写成并在后来收入《性别与历史政治》的论文中，她对19世纪中叶巴黎的工作进行了统计数据调查，并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政治和文化角度的解读。在这里，她把统计学范畴本身当成话语，而不是将统计数字当作反映社会生活的客观数据（Scott，1988:113—138）。她对调查中使用的范畴的狡猾解构证明，统计文本是由一种特别的性别政治所构造的。斯科特对常规的实证主义研究步骤作出了摧毁性的批判，指出“寻找可靠数据的历史学家们”只采取报告的“字面意思，采用记录却不质疑其范畴和阐释”。她认为这样的步骤是错上加错，它既同时“将经济学和统计学当作本质上客观的事业”，又“使历史学家们沦为一群对另一个时代的政治一无所知的人”（Scott，1988:137）。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斯科特本人抗拒将统计报告当作史料，她声言，“我旨在反对简单而实证地运用数据，并支持一种对数据所展示的‘现实’的更充分、更复杂的概念化，支持一种将其自身的范畴和结论问题化和语境化的统计报告解读；换句话说，我支持不再分隔统计报告和其他种类的历史文本”（115）。

但斯科特没有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旦对调查中的范畴进行批判和再阐释，调查中的数据本身能否用一种统计学式的批判风格研究？或许由此能够揭示出在范畴化和阐释步骤中被模糊的、由数据呈现的模式？通过用文化的角度解读调查，斯科特成功发现了调查者隐藏的心理范畴和政治策略。不过，用统计学方法“逆向阅读”（read against the grain）文本，也有可能发掘出报告表面上揭示的工作世界之外的另一面。报告中的数据有可能完全通过意识形态范畴呈现，这使得使用这些数据根本无法探察到报告自称已反映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我认为斯科特没有提出这个疑问，但她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非常复杂缜密的批判性定量研究（尤其见Scott，1974），并在其中连篇累牍地论述了历史学文化转向的认识论假设。如果说社会史认为只有可量化的数据才具有独一无二的客观性，那文化史至少在其后结构主义的模态（modality）中否定了抵达文本所呈现的话语结构以外的任何现实的可能性。[32]

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德里达的思想，使社会史论证实践中的根本性的非反思性现实主义（unreflective realism）显得尤为幼稚。这让我们明白应该用敏锐的批判性态度解读被当作证据的一切文本和文本类比物（text analogues）（比如斯科特的统计调查）。曾经被当作是过去的“现实”的直接证据，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对另一文本性层次的文本指涉。文本的“不可判定性”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潜在的无限性，都使文化史学家默默地将社会结构、社会力量、生产方式或者阶级关系作为文本逻辑不予讨论的事实。于是，文化史学家乐于谈论的历史也成了这种话语的历史，尤其是那些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伸手可用的话语形式。这种在表述何为“超文本”（extratextual）的社会性时的沉默，引出了许多超出新文化史范围、却是新社会史的核心的问题和问题意识：比如财富分配、经济发展的动力、土地所有权或就业的变化、人口结构与地理集中和分散的模式等问题。

与此同时，我认为文化史学家对象征意义丰富的人造物——通常是文本——的合情合理的偏好，渐渐使我们从凝视贫民和没有权力的人这一新社会史最重视的主题，转向凝视那些优势群体，他们的思考更容易形成文字，这些文件也更容易保存下来。这种从社会边缘群体的疏远还伴随着后结构主义认识论上对了解和再现贫民的思想是否可能的怀疑。所以雅克·朗西埃（1981）说道，19世纪的法国劳工诗人和知识分子被（他、我本人和其他学者，见Faure and Rancière, 1976； Sewell, 1980）视为工人阶级立场发声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本人和他们作品中赞颂的劳工已然相去甚远，导致这些作品的意涵也从根本上值得怀疑。嘉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1988）甚至更激进地认为，我们尽自己所能也不可能让底层发声。在欧洲的历史学中，流行趋势显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人和农民研究，转向了80年代开始的资产阶级研究。为免让人认为我在责备那些放弃研究贫民和被压迫者的历史学家们，我在这里先陈述一下我本人的学术生涯轨迹，最初由研究马赛的劳工阶层开始（Sewell, 1971, 1974b, 1974c），然后转移到有关受过教育的手工业者和激进知识分子间政治和思想联系的研究（Sewell, 1980），再到最近的有关法国大革命中最主要的立宪理论家之一——西耶斯神父（Abbé Sieyès）的[4]、更偏重文本的研究（Sewell, 1994）。

然而，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经历根本性转型的时期——在日益增强的经济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推动下，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被削弱，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家福利供给普遍下降，劳工和左翼遭到遣散——尽管我有着这样的学术之路（或者正因如此），我担心现今纯粹的文化史的历史研究形式来得极其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生活中愈发表现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的时候，不知为何，我们这些文化史学家不仅不再尝试把握这种结构，甚至还不再承认它们本体论上的现实性。在本章下一部分，我尝试用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本身和过去三十年中社会经济的转变密不可分这一事实，来凸显历史学家正在面临的问题。假如我们这些历史学家想要投身之后几年中的政治和思想的大型角力——在世界资本主义这头庞然大物和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霸权中恢复政治和社会的有效能动性——我认为有必要首先理解我们自己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晚近社会史的认识论和政治上的纠缠。

## 后福特主义与文化转向

任何已经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能设计出一个“内在主义”（internalist）（以及“辉格式”）的故事，来讲述文化史如何以其智识和哲学优势，毫无悬念地战胜了智识上存在不足的社会史。确实，我在前文中已经从自己的角度大概勾勒出这种观点的轮廓，但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任何纯粹内在主义的解释持充足的谨慎态度。首先，这种解释倾向于认为社会史范式或多或少在思想上已经枯竭。我认为并非如此。[33] 社会史研究纲领内部的许多重要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现在都仍然有待解决，数据的来源也还没有开始枯竭。正当历史学家开始背离定量分析的时候，个人计算机的发展使这类研究变得远比以前容易。一名拥有当时最新式笔记本电脑的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生，和70年代我靠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两三名研究助理和大笔经费的情况相比，能随意使用更多可供计算的数据来源。此外，以新社会史模式完成的出色研究仍在不断出现，但越来越多地是由历史社会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完成。在历史学家基本放弃计量史学事业之后的这些年，在我个人研究的法国大革命领域出现了三种优秀的新社

会史式的定量研究，分别是马克·特劳戈特（Mark Traugott）关于巴黎1848年革命的著作（1985），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关于巴黎公社的研究（1995），以及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有关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的论著（1996）。这些著作证明靠定量分析方法仍然能够作出开创性的历史研究，而历史学家并没有穷尽新社会史的一切可能性，只是出于不同原因回避了它。

其次，任何有关历史学文化转向的纯粹内在主义的解释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历史学转向文化史的80年代，对文化的兴趣风靡一时，并几乎成为了一种文化狂热，席卷了相当一部分人文学科。文化研究的关键一着，就是运用当时支配学界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范畴，来分析过去被置于文学经典以外的文本与文本类比物：流行小说、科学写作、电影、新闻、电视、博物馆、广告和嘻哈音乐——简言之，广义上的文化。过去二十年中，文化研究这一新兴跨学科学术领域正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中蓬勃发展。[34] 即使是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这样长期秉持科学主义、并因此非常抗拒研究文化的学科，现在也发展出了研究文化的重要分支学科。毫无疑问，文化已经成了美国大众话语中的流行词汇，打开电视新闻或者收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时候，很难听不到评论员谈论“硅谷的商业文化”或者是“参议院文化”。有关文化独特性的价值，尤其是事关种族和族群的政治主张更是无所不在。我们历史学家想要竭力相信，自己采纳的新的研究问题和方法的确在内在智识层面更好，但同时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实是某种所向披靡的强大社会力量狠狠地把我们推向了文化转向。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詹明信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些社会力量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他们提出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和思想层面的变异，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世界资本主义模式系统性剧变的回应（Jameson, 1991, 1998； Harvey, 1989）。1984年，詹明信在论著中确认了他在绘画、雕塑、文学、电影和建筑中都辨别到的后现代感性（postmodernist sensibility），这种后现代感性的特点是肤浅、空间方向迷失、高雅和流行文化之间边界的崩溃、历史真实感的丧失、情感的衰微、模仿作品的兴起（Jameson, 1984）。[35] 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相当超前地发现了在艺

术中表达诞生于新兴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情感结构”的方法。[36] 詹明信的论点基本是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和后现代艺术形式特征的相似性之上。几年之后，大卫·哈维试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结构更具体的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本轮的“用时间消弭空间”（annihilation of space through time），使各种后现代美学和哲学观成为可能（Harvey, 1989）。尽管詹明信和大卫·哈维专门解释了后现代感性的产生，但我认为他们的观点仍然和80年代历史学等领域的“文化转向”有密切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观察认为采用宏观经济调控的福特主义体制渐渐瓦解，并将被另一套不同的体制取代。哈维把这套新体制称作“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Harvey, 1989:141—188），但这是诸多名称中的一个，许多学者只是平平无奇地称其为“后福特主义”。这种体制转变可以被追溯至1973年。这一年发生了“石油危机”，标志着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的彻底崩溃，此外还有通货膨胀伴随经济停滞（即“滞胀”）的开始，证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方法已经无法解决问题。新体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基本成形，且有关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对宏观经济的掌控是否渐渐形成了一套与过去的福特主义体制一致的体制产生了争议（Amin, 1994）。但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和福特主义制度相比有显著的不同，这几乎无可非议。在本章提及的四十年间，我们都在经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本质上的划时代转变，[37] 而我认为这种巨变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这些年中历史学思想的历史。

哈维（1989）用“弹性”来形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以此意指这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那套体制在某些关键特质上存在明显差异——后者的这些特质在70年代早期变得功能失调且“僵化”。战后经济腾飞时处于垄断地位的科层制且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在70年代漫长的经济危机中开始采用“裁员”、“外包”、“转包”，以及增加临时雇员、营业顾问等更能灵活应对供求关系和技术变化的措施。数控编程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入，使企业能够从批量生产转向小规模但更为利基导向的生产，并因此也显著缩短了资本周转的时间。对面向消费者的行业来说，设计业和广告业渐渐成为商品生产的

中心。福特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所传播的“时尚周期”已经远远超过了创造它的服装业，而在后福特主义时期，这一周期的运转速度再度加快，广告业和设计业通过创造商业化开发大量的“生活方式”使消费者的品位变得更为多样。设计业、广告业和生产行业的成功融合使得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分野也渐渐消失。同时，娱乐业——包括电影、影院、运动、景观和旅游业——也成了经济的重要部分。

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集装箱运输、廉价航空、远程通信、计算机和互联网——使企业进一步跨国化。跨国企业采用全新的空间劳动分工形式，在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增加生产设施，而设计、管理和财务运作则遍布富裕国家如美国、西欧和日本。当劳动、资本和商品的市场进一步国际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严格固定汇率制度随之终结，这使全球投资和金融投机活动的机遇也大为增加。同时，新的信息技术实现了所谓的“实时”全球交易，新的金融产品尤其是衍生金融产品的诞生导致了金融市场爆发，各地的生产者也因此越发受到期货市场的短期逻辑的控制。过度膨胀的金融业日益“离岸”化，意味着即使是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调控它。这即是说，反复无常的“全球市场”（即离岸全球金融业）日益决定了企业、产业、阶级、区域和一个个国家全体国民命运，但几乎不能指望个别民族国家能对此进行有效干预。资本主义的完全转型无疑是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巨变和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无论是撒切尔—里根模式还是克林顿—布莱尔模式，不是扫除了社会民主话语，就是像德国和法国那样让社会民主处于维持现状的守势。有别于福特主义时期扩张性的凯恩斯式福利国家，后福特主义时期的国家越来越不情愿，或者是无力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调控经济活动。当代的国家倾向于紧缩自身，比如通过选择性放松管制、减税、削减昂贵的福利以及限制工人运动，来将国有或者在地资本投放到全球市场进行有效竞争。

这些经济调控模式的系统性变迁，已经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社会经验，以下是一些事例：

1．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动性的剧增，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移民数量的激增，尤其是从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

洲的贫困国家迁移到西欧和美国的移民潮。移民同时发生在社会的上层和底层，包括了在工厂和底层服务行业工作的墨西哥和北非贫民，同时还有受良好教育的印度程序员和工程师。这造成了规模惊人的国际化大都市肌理以及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 1996）所谓的“全球族群景观”（global ethnoscapes）在西方城市的兴起。这种景观指国家边界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不再保持一致，例如近年来在印度崛起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正是依赖着移居美国的富裕印度侨民社群提供的资金援助。

2．“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也就是成为了畅通无阻的全球经济中极其密集的通信和控制节点的巨型都市聚集区，早已远离制造业，并依据各自的文化生活方式，为了获利最多的金融和商业服务公司、最有才能的经理人和“信息”专家进行愈发激烈的竞争。城市美化、发展艺术区和相关的波希米亚文化聚落或是“高雅文化”机构，如歌剧团、交响乐团、剧院区、画廊和博物馆，都成了当代全球经济中生产和保持第一流节点的标志或途径。正是这些全球城市才具有最高层次和复杂性的跨国族群的多样性。

3．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原本是福特主义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经在各地都失去了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这一群体受到里根阵营共和党人的正面抨击，工会的成员数量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最富有的人在过去三十年中收入激增的时候，工人的实际工资一直停滞不前。各职业阶层的人们的就业安全感已经灰飞烟灭，同时，在福特制的企业中，不论是管理层还是生产工人都面临着完备的晋升阶梯日益被某种职业流浪所代替的情况。在不同企业中频繁流转、临时性工作、短期的自雇、频繁地再培训以及换工作都成了常事，就连中产阶级雇员也是如此。[38]

4．这些经验上的变迁也与话语转变紧密联结在一起，并为后者所加深。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评论员、名嘴、社论作者和学者都喋喋不休地说：我们正身处新的世界，旧的经济范式已经被取代，新的创业时代已经到来，当代人口和观念的全球性流动规模空前等等。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使有关不必产生实际收入就可创造财富的“新经济”的无休无止的繁杂言论沉寂下来，但夸大现

状新奇性的说法仍然很常见（清醒地说，本章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无论如何，经济和社会关系变迁对经验的影响在前二十年中被声言新的无拘无束的关系如何重要的话语夸大了，正如福特主义时期的话语放大了我们对社会经济可靠性和标准化的感觉。所以毫无疑问，尽管职业的确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具有不稳定和创业性，但福特主义时期的职业不如我们彼时想象中稳定，当下的职业反而比我们如今想象中更稳定。我们经验的变迁都是社会关系的变迁，以及我们赖以理解这些关系变化的文化范畴改变的产物。

我赞同詹明信和哈维把后现代感性根本上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和经济中人们体验到的不稳定性的时代性增长。但后现代主义兴起，只是面对微妙却无所不在的社会世界转型产生的各种可能的思想回应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的学术界文化转向，完全有可能建立在福特主义模式转为弹性积累模式的基础上。我们体验到生活变得不规律和不可预知的时候，“社会结构”就看起来不那么稳固和确定；“主流”文化的逐渐相对化，以及信息和美学在经济生产中日渐重要的地位，当然也让我们理解自己正身处的这个世界可能是由文化构成的。[39] 所以，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结构和当下生活经验肌理所产生的变迁的回应。过去三十年中社会关系的不稳定化并未在严格意义上决定了社会思想的任何具体改变，但它的确使结构决定论显得不那么合理，同时启发了知识领域、政见和认识论倾向各异的学者转向更微观、更基于行动者的解释。于是，社会理论对于能动性与行动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中社会网方法论的发展，福柯提出的超越国家权力陷阱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的优势，80年代微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学的胜利，以及政治学和哲学中兴起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所有这些高度多样化的、不亚于后现代主义和各学科“文化转向”的思想活动，都可以被视为对体验到世界资本主义转型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的不稳定化的替代性回应。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思想运动——微观经济学、理性选择和社会网方法论——都是高度数学化和实证主义的，且与政治左派没有任何选择性亲和。近年社会和经济关系上的转变，对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认识论都有重要的影响。[40]

任何时候我都认为，本人和同辈的社会史学家在进行形式各异的文化转向时，都受到了由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形式引起的无处不在又细致入微的生活变迁的显著影响。而在进行转向的当时，我们关心的社会秩序模式仍然停留在逐渐崩溃的福特主义，而非新出现的全球弹性积累。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者，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在对抗统治美国企业的、连锁的、造成幽闭恐惧症的制度的社会决定性——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1964）中描绘的这番图景最为人所熟知。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对自然的持续扩大的技术控制，和通过社会组织对人类及其相互关系的日益完善的行政管理”（Habermas, 1973:254）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威胁着人类自由的希望。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政治激进分子和反文化的参与者，我们满怀热情地尝试用刻意的行动去否定企业化社会秩序的压迫性的决定论。然后十年过去，我们反抗了社会史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转而研究社会世界的文化建构，大概我们在心里都认为，这是在将历史学研究（和我们自身）从无法辨识人类创造性、缄默无言的社会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我可以证明这的确有解放之感。

但回想起来，我们的尝试似乎与社会经济现实在政治上不协调。当我们开始抨击社会史潜在的福特主义时，福特主义的社会调控体系已经陷入致命的深重危机。另一波学术思潮，即女性主义，以其在60年代其他社会运动早已衰微时仍然生气勃勃的社会运动，加强了这次抨击的强度和激进性，同时也以自身的认识论解决了决定论式的思想。所以当文化史学家踢开了福特主义社会决定论的大门时，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通过社会组织对人类及其相互关系的行政管理”的情况正在崩溃。在日渐无政府主义的新兴社会中，决定人类关系的系统的行政管理渐渐由市场力量取代，福特主义式的社会组织被重构成企业行动者的网络。鉴于设计、广告和娱乐业越来越重要，经济生产本身就愈发成为“能指的游戏”（a play of signifiers）（尽管这绝非“自由游戏”[free play]）。所以，进行文化转向的60年代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反政治文化计划，在当时的语境下不见得合宜。

但我认为承认这个事实并不可耻。政治经济学家直到20世纪70年

代后期和80年代，才认为197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不只是商业周期的再次重复，而是预示着资本主义的重大重塑。[41] 这种全球经济重整只是零零星星地开始，在这些碎片连接成某种系统之前，我们都很难把握它。对当代政治经济学了解不多的社会史学家仍然在用我们习以为常的旧有模式是意料之中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与约翰·厄里（John Urry）和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在安阿伯开展讨论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世界经济结构正在经历巨变。不过，旧研究模式也不是严肃的、有政治责任感的学术工作的障碍。70年代末和80年代是女性主义在思想上突破最为深远的时期，也是福柯的理论在历史学家之中最广为接受的时期。哈贝马斯也在同一时期提出了一套影响力颇大的基于福特主义观点的哲学思想，即“生活世界”（lifeworld）渐渐被“系统”（system）殖民（Habermas，1984）。此外，尽管福特式经济调控体系已经崩塌，福特主义社会科学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仍然活跃。[42] 在思想和政治上，如今还是有批判抽象经验主义和发展阐释性方法的必要性。

我要声明本人仍然坚定支持文化转向，但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认清，我们没有察觉文化转向在某些方面隐然是由与新兴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亲和性所推动。作为对福特主义社会决定论的政治性批判，文化史总是赞颂一切社会模式的可塑性，但在弹性积累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语境下，它的批判性力量远不明显。实际上，这种赞颂意味着文化转向和资本主义弹性积累的兴起有着不为人知而又棘手的联系。在我看来，文化史对社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缺乏关注（实际上是拒绝），在这一作用仍然显著、并将成为我们对历史进程的概念化的一部分的时候是一种潜在的缺陷。我认为批判性地看待资本主义的当代模式和纯粹文化史之间的潜在共谋，是目前在历史研究中作出清醒、有效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性工作的必要条件。

## 英国和法国的情况

尽管我说过社会史以及曾挑战前者的文化史都曾经是国际性的现象，但我至今为止的讨论仍完全聚焦于美国的文化史所具有的政治无

意识。我对美国历史学界文化转向的重要语境——新的“弹性积累”体制代替了福特主义宏观经济和宏观社会调控模式——的补充在于，这不仅仅是美国的，而是一种全球性现象。或许会有人认为，这意味着过去三十年间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编纂学发展有着显著的相似性。尽管国家之间在文化转向的时间点、政治倾向、侧重点上有着明显不同，我会尝试用法国和英国的例子表明也存在着很多相似性。

英国和美国在历史思想、政治倾向和政治经济学上非常类似，近期两国在政治和政治经济史上的相似性尤为显著。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只相差一年——前者在1979年而后者在1980年；两人都是实行强硬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者，也都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派。他们抨击工会和福利国家制度，将之前的公共职能部门私有化，采取了大量经济“放松管制”措施。他们还轻率地无视了各自国家传统工业中心区域的困境：美国的“铁锈地带”（rust belt）和英国的北部工业区，分别成为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票仓并非偶然。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经济政策分别倾向美国的“阳光地带”（sun belt）和英国的东南部这些政治上更为右倾的地区。“放松管制”政策鼓励以金融而非工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在英国和美国，工会的力量和人数都急剧下降，过去在保守党/共和党和在工党/民主党治下一样得到发展的福利津贴被系统性地削减。两国的经济体制时刻都在膜拜新自由主义，即企业家精神、冒风险、自力更生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削减成本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强调福利的道德和经济危害，对强力“财政激励”的需求以鼓励资本家投资创新，以及经济上的当务之急——减税，尤其是针对高收入的群体。

换言之，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国家向全球化和弹性积累开放。这对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累积效应都影响深远。在20世纪80年代，伦敦城和纽约华尔街成了全球金融的双子司令部，制造业就业率暴跌的同时服务业就业率急速上升，政治共识也明确转向右翼。即使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1988年和1990年相继下台，反对党若不是基本采纳里根—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无法得到支持。所以，克林顿和布莱尔在1992年和1997年的先后上台标志着右派势力得到巩固，同时承认了新自由主义不可撼动的地位。重要

的是，是克林顿而非里根最终在美国终结了“我们所知的福利制度”，与此同时他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仁慈地目睹了骤然的全球化和90年代末投机金融泡沫的危机。英国和美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政治方面惊人的相似性，意味着两国倾向左派的社会史学家无疑被相同的挑战和压力所困扰，也难怪他们给出了大致相似的回应。

20世纪60年代投身学界和政治运动的一代英国社会史学家，和同时期的美国社会史学家一样倾向左派，但前者是更为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且大多数人和工党的左翼打成一片。尽管受惠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前人，第二代英国社会史学家也和前辈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体现在1976年创刊的《历史工作坊期刊》和《社会史》两本刊物中。它们都由60年代一辈的社会史学家主持，和《过去与现在》相比，这两本期刊才是第二代英国社会史学家的主要发表途径。70年代后期流入的阿尔都塞和新阿尔都塞式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深深影响着这一代的社会史学家，但这种理论热情并没有波及长期尊崇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排斥任何理论严格主义的初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种差异引起了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和E.P．汤普森之间的激烈论战，后者的《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针对这种情形进行了猛烈抨击。[43] 就70年代而言，英国的社会史学界较美国的同行在理论问题上更好斗，左翼倾向也更坚定。

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的历史编纂学和理论风气似乎和美国的一样已经转向了文化史。转向的一个标志是1983年出版的文集《阶级的语言》（*Languages of Class*）中收录的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长篇论文《宪章运动再思考》（“Rethinking Chartism”）。斯特德曼·琼斯早期所撰都是无懈可击的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著作，他在此文中激烈地辩称，宪章派的政治意识更多地由已经存在的反对话语的语言学转义（trope），而非设想中的阶级的迫切愿望决定。《历史工作坊期刊》很好地体现了向文化史发展的转变以及女性主义日渐重要的地位，后者与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史有着一定的亲和性。早在1980年（第10期），编者导语就在敦促关注“语言与历史”。在1982年（第13期），期刊的副标题从“社会

主义史学家的期刊”改为“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史学家的期刊”。在之后的一期中，男同性恋史的先锋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发表了题为《历史学家的福柯》（“Foucault for Historians”）（1982）的论文。接着，1983年（第15期）编者导语题为“文化与社会性别”。《历史工作坊期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是文化与女性主义史学研究，以及探讨新的史学研究趋势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平台。

尽管这本期刊仍然保持了对社会史的强烈认同，但刊文的题材和论调已经大体趋向文化史。或许有人会引用1996年（第41期）有关“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编者导语，其中说道“生理性别既是虚构的对象也是物质的实体”，但是其“截然不同的内在——由欲望和恐惧构成，是地位和奖赏的来源，也是认同和意义的来源——并没有必然的、本质的一致性。它们粗略、表面的融贯性更像是文化的产物”（v）。在20世纪90年代，期刊编委会的两位著名成员发表了评价文化史的论文，并就其正确的发展路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分为两部分的论文《解读符号》（“Reading the Signs”, Samuel, 1991, 1992），以及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的《决定论的困境：历史学的语言学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发展面临的一些障碍》（“The Determinist Fix: Some Obstacl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History in the 1990s”, Stedman Jones, 1996）。此外，还有特定主题的一系列相关文章集为“特辑”——1989年的“语言与历史”（第27期）；1993年的“女性的历史”（第35期）及“殖民与后殖民历史”（第36期）；1994年的“战后消费的文化与政治”（第38期）；1995年的“空间的历史：空间理念再思考”（第39期）；1996年的“殖民地的相遇”（第42期）；1997年的“认同”和“历史”（第43期）；1998年的“精神分析与历史”（第45期）；1999年的“叙事与记忆”（第47期）；1999年和2000年的“梦”（第48和49期）；以及2001年的“地标建筑和公共空间”（第51期）。与此同时，编委会在1995年第39期中决定放弃副标题，即“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史学家的期刊”，并解释说“上一次修改刊名之后的十四年间，我们身处的政治环境的变迁已经基本超出了我们的认知”。编委们解释道，现在的一些作者和编辑“无论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理念抱有何种情感，都情愿用别的名义来界定自己……

修改副标题能让我们涵盖一些正在生成的新前沿问题——男女同性恋史，还有后殖民史或环境政治。我们期望能够以自己本来的色彩前行，摒弃任何简化我们立场的意图”（iii）。这种历史学家多样化的激进身份几近完美地概括了大西洋彼岸的发展状况。

《历史工作坊期刊》的主要竞争对手《社会史》，在近十年以后才犹豫不决地接受了文化史。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于1989年发表的题为《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家的意义》（“Post-stracturalism, Post-modernism: Implications for Historians”, 1989）的简介首次参与了语言学转向的辩论。戴维·梅菲尔德（David Mayfield）在1991年发表了关于《语言史和社会史》的评论文章，而1992年梅菲尔德和苏珊·索恩（Susan Thorne）还发表了一篇对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阶级的语言》的批评。这篇论文引起了名副其实的混战，主要包括：再三加入论战的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 1993, 1995, 1996）、梅菲尔德和索恩（Mayfield and Thorne, 1993）、乔恩·劳伦斯和迈尔斯·泰勒（Jon Lawrence and Miles Taylor, 1993）、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 1994）、内维尔·柯克（Neville Kirk, 1994），以及杰夫·埃利和基思·尼尔德（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 1995）。在此期间，《社会史》也开始发表关于文化史的纲领性文章，但没有参与梅菲尔德和索恩挑起的“内讧”：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hony Easthope）的《追寻劳伦斯·斯通：历史书写与修辞》（“Romancing the Stone： History Writing and Rhetoric”, 1993）；卡罗琳·斯蒂德曼（Carolyn Steedman）的《来自地狱的蠢货》（“Bimbos from Hell”, 1994）；米格尔·卡布雷拉（Miguel Cabrera）的《语言学路径抑或是回归主观论？寻找社会史的替代性路径》（“Linguistic Approach or Return to Subjectivism?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to Social History”, 1999）；詹姆斯·爱泼斯坦（James Epstein）的《空间实践/民主前景》（“Spatial Practices/Democratic Vistas”, 1999）；以及安托瓦妮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的《跨界思考：帝国、女性主义以及历史的领域》（“Thinking Beyond Boundaries： Empire, Feminism and the Domains of History”, 2001）。《社会史》名副其实地抵御着崛起的文化史，但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它似乎和新的思潮已然相安无事。[44]

1991年拉斐尔·塞缪尔对《历史工作坊期刊》的评价似乎可以看作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史》的写照："《社会史》早期的主要议题——劳动过程几乎已经从我们的刊物上消失……而表征和身份政治——尤其是身体政治——越来越崭露头角"（Samuel, 1991:97）。

英国的历史编纂学发展和美国的并不一样，转向文化史的时间晚了将近五年，而社会史学家的抵御更为强烈。我认为比起美国的同行，英国的历史学家对"社会史"仍然保留了相当的认同，即便是正在研究文化和身份认同形成的学者也一样。阶级在美国历史学界已经不再重要的时候，在英国还是受到突出的关注。一直以来，作为日常生活和政治中持续的文化焦点，阶级之于英国就像种族之于美国；即使是长达18年的撒切尔主义时期和英国工会力量的瓦解，都不能使政客和历史学家放弃这个议题。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两国的相似性仍然很显著。在它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有着极其相似的转变的同时，两国的历史编纂也发生了极其相似的变化。这让本人关于美国的例子对英国也有效的说法多少更为可信。

历史编纂学、政治和经济在法国的发展都和英美两国有本质上的不同。"二战"刚结束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界就主要支持左派。人们普遍支持马克思主义，法国共产党即使是少数派也在选民中永远有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之中，1968年五六月间的左派起义大概是60年代最戏剧性的政治剧变，大量左翼小团体（groupucules）——大部分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也在之后数年间持续煽动零星的事件。但在其后的70年代，左派力量消退。1968年的革命热情已经燃烧殆尽，在制度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原本只是勉强参与了1968年的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在改良式"欧洲共产主义"几乎进入法国以外的欧洲国家的政治议程的时候，因为他们残留的斯大林主义而声誉不保。此外，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出版的《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又在法国知识分子间引起了一波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浪潮，其程度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法国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破产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关于哲学中"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或者"元叙

事”（metanarrative）危机的声明被广泛接纳提供了重要的语境（[1979] 1984）。

但法国的选举政治出现的转向，和在英国和美国出现的大为不同。1981年，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当选为法国总统，为左派带来了短暂的希望全盛期。但若干年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显然受制于世界经济力量，故而无法实现他们纲领中大部分的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法国经历了彻底的去工业化，工会成员急剧减少，无法不服从经济全球化和自身经济的金融化。但密特朗直至1995年结束的任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法国推行得远比英美两国迟缓，而新自由主义在法国也从来没有像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治下那样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例如，法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哪怕在密特朗之后继任总统的戴高乐主义者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执政期间仍基本保持完好。此外，法国更为惊人的经济改革是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尽管有相当多的放松管制和解除贸易限制的政策出台，但它们当中来自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倡议的政策数量与来自法国的政策数量不相上下。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已经全面退却；实际上，正是法国的“调节”（regulationist）学派经济学家，最初引入了福特主义，并将原有体制取而代之（Aglietta, 1979； Boyer, 1986； Lepietz, 1987）。法国中左政治的持续影响及其全面参与欧盟，缓和了福特主义衰微的影响，也使其意识形态地位比在美国和英国要低。

在这种政治和经济背景下，法国的历史编纂学发展有着与英美迥异的内容和节奏。法国曾经是文化史的先锋，部分是因为文化史与自布洛赫及吕西安·费夫尔时起就曾经是年鉴学派研究一部分的“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高度重叠（Burguière, 1983）。心态史是文化史的一种形式，但心态（mentalités）代表的是本质上无意识的态度和习惯，它们高度抗拒变化，并因此被认为与高度持久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所以进入70年代后，“心态”发展出一套与“文化”不同的内涵。1975年，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关于中世纪比利牛斯山中一个纯洁派（Cathar）村庄的“民族志”研究著作《蒙塔尤》（*Montaillou*）出版，并轻松成为畅销书。

从这时起法国的文化史领域才开始发展。勒华拉杜里被视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导者，曾经支持并从事过计量史学研究，这使得他转向文化史这一举动更有影响力。但在《蒙塔尤》出版时，其他一些重要的文化史著作已经酝酿成熟（Ozouf, 1976； Furet, 1978, 1981；Agulhon, 1979），文化史的势头也贯穿了整个80年代，并且延伸到下一个十年。[45]

文化转向并未激起年鉴学派社会史学家的尖锐批评，这或多或少并非偶然。部分原因是法国的文化史似乎缺少了在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包袱，引领文化史的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辈，而是勒华拉杜里、阿居隆（Agulhon）[(5)]、菲雷和奥祖夫这些政见成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受共产党影响的历史学家。自然有人会猜测，这种如此关注过去被轻视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与共产主义的彻底决裂。此外，法国的文化史也未和激进的女性主义建立亲密联系。女性主义确实未在法国历史学界获得立锥之地，毋宁说在整个法国知识界都是如此。发源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也是如此，在法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许多的追随者。即使是法国最有创见且理论广博的文化史学家之一的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也对他口中的“美国语言学转向”（1997:4）大加批判。[46] 不管怎样，在法国并没有出现英美两国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史之间的明显关联。80年代法国文化史最著名的成果，或许是巩固了弗朗索瓦·菲雷关于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保守阐释（如Furet and Ozouf, 1988； Furet, 1988），还有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一部不融贯但畅销的三部七卷的法国集体记忆合作研究巨著，它在政治或其他方面唯一可辨识的价值就是普遍的怀旧感（Nora, 1984—1992, 1996—1998）。

诺拉和合著者捕捉到的怀旧感值得我们驻足思考。他在引言中称，法国近来已经失去了昔日对自己历史的清晰的认同感。“我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我们自身和造就我们的事物只存在偶然联系的世界。图腾的历史成了批判的历史……我们研究民族的庆典，但不再歌颂这个民族。”（Nora 1996, 1:7）诺拉暗示道，对过去的认同感的遗失，是对未来缺乏信心的结果。“就像未来——曾经是

当下的可见、可预知、可操控的清晰的延伸——已经变得不可见，我们对过去的观念也从可见转向不可见……作为彻底的他者出现的过去已经和我们全然割裂开来。”但矛盾的是，“距离需要再次接近来抵消其效用，并形成感情上的共鸣。我们再渴望不过的是感受到靴上的泥泞，在公元1000年对魔鬼的恐惧，抑或是一座18世纪城市散发的恶臭”（12）。诺拉及其合著者们在《记忆之场》中提供给那些贪婪的法国读者的，正是这种与无法挽回的遗失的过去建立联系的怀旧感。这并非法国文化史满足怀旧感需求的唯一案例，从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1975）中对比利牛斯牧羊人自由生活的浪漫表述，到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在《大地的钟声》（*Les cloches de la terre,* 1995）中再现19世纪乡村教堂的钟声，法国读者已经可以随时想象靴上沾有法国的泥泞。

怀旧从来不是一种政治中立的情感。诺拉、勒华拉杜里和科尔班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怀旧保守主义者；我猜三人都支持的是社会主义而非戴高乐主义。《记忆之场》中的怀旧，首先是对信仰进步、神化法国大革命、信任中央集权化的法国的理性和进步力量的19、20世纪民族共和运动的怀旧。尽管密特朗漫长的任期使法国免于部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弹性积累最猛烈的冲击，但1973年开始的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重整也对法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上，这些影响在心理上具有尤强的毁灭性。美国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弥补了经济重整给美国人带来的个人创伤。“新世界秩序”让美国人在方方面面都感到不适，但该秩序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都首先位于华尔街、华盛顿为中心的坐标系之上，这使全国上下、无论左派或右派的美国人，都有感于他们正生活在当代历史的中心。英国尽管明显逊于美国，但仍利用其对世界商业和政治的第一语言的控制、帝国时代残余下的国际联系，以及伦敦城的金融实力和技能，在世界金融系统的管理中扮演了和美国同等的角色。

法国则难以找到心理上的补偿。他们用着曾经的国际性语言，怨恨英语现在的地位也情有可原。法兰西共和国似乎在不久前的1968年仍有潜在危机，如今看来则是全然稳固的，并为自己的名义而战。从1792年起与左派的纠缠，如今已是随风往事。所以弗朗索瓦·菲雷在

1978年宣称“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也不无道理（Furet, 1978, 1981: 尤见1—17）。甚至，远在布鲁塞尔的欧盟行政中心和法国政府共同决定着法国面对来自经济全球化和弹性积累冲击时的回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法国社会生活首要推动力量的国家，已经日益沦为执行欧盟决定的地方管理角色。[47] 简言之，在全体西方国家始终坚持的政治体系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就渐渐失去了戏剧性和实质内容。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包括法国历史学家在内的法国人都日渐回归怀旧——缅怀政治斗争激烈的旧日好时光，以及靴子上的泥泞的感觉。正如雅克·雷韦尔指出，法国公众如今从历史中寻求的“不再是教训、从前的参照或是理解现状的方法，毋宁说是对当下不确定性的逃避”。他认为，历史已经成了“一座异乡，一座怀旧的乌托邦”（Revel, 1995:34），只有更新政治目标，连同更新政治批评的资源，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从一开始就保持严格政治中立的《年鉴》，不太可能成为发展有关政治的历史研究的合适平台。

这并不是说法国历史学家全然卸下了英美历史学话语近来标志性的思想重新界定和斗争。尽管《年鉴》缺乏英文期刊中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激辩，法国历史学家还是意识到他们正身处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危机之中。导火线似乎来自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出版于1987年的《碎片化的历史学》（*L’histoire en miettes*），该书对年鉴学派尤其是其无视政治和政治史这一点大加批判。书名意为“碎片化的历史学”或是“历史学的碎片化”，暗示着年鉴学派已经失去了全部凝聚力和方向感。[48] 1988年，《年鉴》的编辑们（以完全的法国学界作风，没有指明多斯和他的著作）回应道，当下的社会科学范式（包括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定量方法）的确“渐渐失去结构化能力”并且“研究的多形式发展……使通过对等社会范畴和现实范畴来证明社会统一性这一内在共识变得不可接受”（*Les Annales*, 1989:291）。编辑们否认历史学的危机，将当时对《年鉴》的谴责描述为“懒惰之举”，同时承认历史学正处于“关键性的转向”中，并宣布即将发行评估当时状况的特刊（192—193）。

次年特刊问世时，编辑们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让我们进行尝试》（“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Let Us Attempt the

Experiment”）为名，号召有关历史学研究假设和范畴的全面再思考。他们努力辩解道，遵循年鉴传统的研究已经被社会范畴的物化（reification）严重破坏，并坚称“社会客体并非天生被赋予性质的物，而是在不断适应的构型内，变动的相互关系的总和”（*Les Annales*，1989:1319）。他们认为历史学家比起书写既定的社会范畴的历史，更应该研究这些范畴的产生和转变的历史：“行动者通过自身有意识或未察觉到的行为来不断重新定义社会的构成——正是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1320）。

上述观点也是《经验的形式：不一样的社会史》（*Les forms de l’expérience*：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的主题，该书是《年鉴》主编（sécretaire de la redaction）贝尔纳·勒珀蒂（Bernard Lepetit）编辑的方法论论文合集，大多数作者是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项目负责人（Lepetit, 1995a）。该书明确地批评了年鉴学派的传统，并详尽说明了一种新的集体的历史编纂学定位。[49] 尽管勒珀蒂和合作者认同“社会史”这个名称，但他坚持“社会”必须被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范畴”而非一种本体论的现实。如他所说，“社会身份或社会纽带没有本质，只有运用”（Lepetit, 1995b:13）。勒珀蒂提出年鉴学派提出的纲领的“新的融贯性”应该围绕着“协调”（accord）这一概念来构筑（16），这一概念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洛朗·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的著作，他们以行动为中心（action-centered）的社会学认为个体是包含不同甚至是矛盾的规范性秩序的“多重世界”当中的有能力的参与者（competent participants）。在他们看来，社会秩序是由行动者凭借多重能力，在和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协调”而产生的。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将社会学家通常所说的“社会结构”或“制度”重新定义为“协调”或“惯例”（conventions），即进行中的策略性互动的偶连后果（1987, 1990）。在这种新的社会体系下，历史将成为这些协调或惯例形成、变异及消失的历史。

除了认同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行动社会学，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还尝试反思了他们学科对微观史的强烈兴趣。微观史是一种起源于意大利的自觉的历史编纂学运动，最有名的代表作或许是卡洛·金兹伯格

（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其研究对象是一名16世纪异教徒磨坊主的世界（1980）。但另一位知名的意大利微观史学家爱德华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认为，这场运动在认识对象和思想风格上极不统一（1996）。他指出，金兹伯格的兴趣主要在于文化关系的微观重构（亦可见Ginzburg, 1983），而其他学者，包括乔瓦尼·莱维（Giovanni Levi, 1988），则更关心社会关系的微观重构。乔瓦尼·莱维则认为，微观史学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意大利左派之中兴起，当时“盛行的乐观主义信念，即世界即将向着革命的方向发生巨变，正面临危机”（Levi, 1991:94）。据莱维所说，微观史学家通过缩小他们观察的历史进程的范围来脱离“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体系”，以“更现实地描述人类行为”。在他们看来，社会行动就是“一个人在无所不在但允许个人阐释和自由的规范性现实面前，不断协商、处理、选择和决定的结果”（95）。只有通过深入挖掘当地的历史，并且巨细靡遗地重新叙述，才能展现其中有限而真实的人类的社会自由，才能使人们得以理解社会约束的真正本质。尽管微观史在意大利已经发展完善，缩小研究范围和详述地方历史细节在文化转向时期仍然风靡各国学界，在法国、美国、英国和德国都有同样令人瞩目的实例。[50]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进行微观史研究的一个案例，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关“微观史和微观社会”的研讨会，集合了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并且推出了一本题为《比例尺的作用：一个微观分析实验》（*Jeux d'échelles：La micro-analyse à l'expérience*）（Revel, 1996a）的文集。该书由《年鉴》1975年到1980年间的主编及长期编委、1996年就任社会科学高等学院院长的雅克·雷韦尔负责编辑，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中也有《年鉴》当时的主编贝尔纳·勒珀蒂的论文。这本集体著作的主要内容来自研讨会上的报告，并在会上讨论后修改成文，此外还收录了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乔瓦尼·莱维和爱德华多·格伦迪的文章。[51] 显然，微观史恰好迎合了年鉴派历史学家们彼时关注甚至着迷的范畴去物化（dereification）。雷韦尔在引言中写道，微观分析的“主要价值”就是它“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社会逻辑的错综复杂——以及抵御物化行动和关系，以及使我们得以思考它们的范畴的诱惑”（Revel, 1996b:13）。他期望通过回到最小的社会单元进行

详细研究，以此理解社会进程的普遍逻辑。“微观分析（可以说是实验性的选择）的赌注是小群体乃至个体最基本的经验都是最为清晰的，因为它最复杂，也因为它在大量不同语境下写就”（Revel, 1996c:30）。雷韦尔指出，微观史有可能反而是了解最广泛、最大规模进程的最佳途径。微观史认为，“每一个历史行动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不同维度、层次，从最地方到最全球的进程（并因此写入其语境中）。一个个体、群体或者是空间的经验能够让我们理解是作为整体的历史的一次特定变迁”（26）。如雷韦尔所说，对微观史的兴趣不一定意味着在回避《年鉴》理解大规模社会进程的长期目标，这更像是法国人所说的“以退为进”（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但假如雷韦尔的构想暗示着对全球性和地方性实践有着同等的持续关注，那么微观史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学或全球军事对抗之类的大规模或全球进程？这一点并不明朗。

尽管雷韦尔重新定义的年鉴学派历史学保持着对全球史和总体史的野心，即一种同等接受宏观和微观进程，并尝试将它们整合为整体的历史学，但《年鉴》近期的历史编纂学辩论都没有说明这种雄心何以实现。我个人的观感是当下这种从微观进程开始研究的主张，无论是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所说的从有能力的行动者的互动中生成惯例的形式，还是意大利式的微观史，都没有真正触及大规模社会进程的动力学。由此我同意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在评论《经验的形式》时的精妙意见：

> 一种历史观假如不仅拒绝经济和其他形式的结构决定论，还用个人语言方式的创新和情境语义中的微观多样性来代替话语的规律性，其危险在于整体的结果会过分缺乏历史学阐释所基本要求的框架。过分强调行动者面对结构时的资源和能力，以及过分关注对立的信念体系间的阈值点所给予的自由，会导致这种唯意志论路径无法指引的历史现象整体从视野中消失。（Stedman Jones, 2002：103）

我认为，历史学需要的是理解小规模与大规模进程间持续的辩证

法的方法。而《年鉴》当下的思维似乎只解决了这种必要的辩证法的一半。

年鉴学派对历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重新定义，是否会对法国现行的历史学研究方式造成重要影响，现在判断还为时太早。和大量理论化社会研究实践的尝试一样，新的理论化可能只是自觉整理和阐述了现在已有的实践，而不是开拓了全新的道路。但法国历史学家显然没有躲过横扫了英美历史学界的理论辩论和重新评价，只是开始得更晚，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并且问题也不尽相同：转向文化史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忧虑，即便年鉴学派的论著主要关于文化问题，他们仍然认为他们自身无疑是社会史学家；此外，在法国的辩论也没有像在英美两国那样看重政治取向。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法国的事例仍然符合我关于美国历史学发展的阐释。鉴于法国特有的后福特主义经验，文化史发展与怀旧而非身份政治更协调，是完全合理的反应。还有，尽管在法国和英美两国的表现形式各异，但三者的学界都普遍回避了宏大叙事和对历史进程的物化。法国历史学界转向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的行动社会学，以及微观历史的技巧，都显示出对结构性思维的不信任，和自下而上重构历史学推理的欲求。这与英美两国的文化转向一致，甚至与差异显著的社会网方法论、理性选择分析，以及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等模式一致。雅克·雷韦尔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历史学家的评价，似乎适用于欧洲和北美所有的人文学科学者：“我们的社会中蔓延着一些疑虑，这些疑虑有如各种无法被理解，甚至无法被描述的危机，无疑促成了一种信念的扩散，这种信念认为，至少暂时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全面理解我们的社会”（Revel, 1996c:18）。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解体与逐步重组，似乎消解了社会和经济结构中曾经是不证自明的稳定部分，导致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左派社会科学家，要在混乱中自下而上地开始重建他们的认识论、本体论和研究方法。

但我认为，对各国历史学概念和方法的各种再思考都受困于同一个缺陷，那就是回避了普遍的宏观因素，尤其是逃避思考资本主义的动力学。在资本主义的力量具备深入破坏和彻底重塑我们社会、政治

和文化生活的力量时仍是如此。更让人不安的是历史学家逃避的方式，即对小规模、地方的、基础的、文化建构的事物兴趣大增，而这些新鲜的知识，都在逻辑上和当代资本主义特有的放松管制和日益提高的经济弹性如出一辙。讨论美国案例时基本上基于我自传式反思的结论，同样也适用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现在，清醒、有效的历史学研究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对目前思维模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间的潜在共谋发展一种批判性意识。

## 迈向对社会范畴的重构

这种批判性意识的含义，当然是讨论和思辨的必要性。我认为，美国的文化史学家应该反思自己全面放弃社会史的后果。前文已经说过，文化史在美国基本没有遇到阻力就全面取代了社会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社会史学家（包括本人）已经转向文化范畴，以至于没有引起任何智识上的抵抗。但社会史的许多长处仍然重要，例如，社会史强调的研究普通人的经验，这点非常符合当代经济政治不公平日益尖锐的背景。我们将对贫穷和弱势群体的忽视，过分归结于历史编纂学越来越注重丰富的文本史料，以及我们支持的民众运动在政治上令人失望的失败——例如，第一世界的劳工运动因为工业生产边缘化而被迫陷入防守，以及小农经济的全球性边缘化导致第三世界农民运动彻底瓦解。这些不公平现象持续恶化的现状，难道不应该激起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剥削过程以及被剥削者经历的同情和好奇吗？

同样地，社会史主张的定量方法现在仍然是历史学家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它使我们能够采用其他研究方法无法记录的人群的重要且独特的历史经验。然而，在现在这样一个无法被察觉、更谈不上被解释的匿名的、无计划的结构转型正飞快改变着我们的世界的时刻，在缺乏足够严谨的统计资料下，处理这些数字论据的能力更是至关重要。例如，制造业被当代欧美城市中的“服务”业迅速取代，改变了“工人阶级”和“精英”的本质；或是货币期货交易的惊人发展，使印度尼西亚或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先后在1998年和2002年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货币投机骤然陷入贫困。用数字评估来理解目前的重要进程有着

无可否认的价值，这点应该能使我们了解，在研究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定量方法仍然和过去一样有效。

最后，社会史一直主张，社会经济结构和进程十分重要。我们在振奋人心的60年代，或是迷惘、矛盾的70年代完全可以想象到，经济决定论的观念完全只是幻象；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强力重整显然控制着我们，经济模式和经济力量的变化对当代生活造成了重大冲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回归原始的经济决定论——毕竟世界经济转型本身就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想象等领域的话语变革造成的。但这无疑会引起有关现在和过去的世界如何与生产方式、交换和经济管制相联系的疑问。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某种形式的社会史自始至终都一样重要。

这不见得是我的一己之见，我个人想法的改变通常和其他美国历史学家步调一致。善于发现历史学家时代精神变化的琳恩·亨特，最近和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合作编辑了一本名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的重要论文集。和亨特赞扬历史学家转向文化的《新文化史》相比，十年后的《超越文化转向》的立场更加暧昧不清。邦内尔和亨特在引言中说，该文集的作者都“深受文化转向影响”却“拒绝承认最激进的文化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强调的社会范畴已经消失。尽管社会范畴的状态和意义还没有答案……但没有它的生活是不存在的”（Bonnell and Hunt, 1999:11）。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后现代主义”到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化”——人文学科中主要流行词汇的变化也标志着类似的转变。“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含义都很清晰，但时常指向几乎同一套极具异质性的现象。我认为，一个术语从具有认识论意涵到转而具有实质性历史意义的过程，再次显示出用社会或社会经济角度阐释现状的潜在欲求。

我相信，假如要振兴社会史，就必须重新建立这个学科。其他这么想的人和我一样都不提倡回归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我无欲重振“新社会史”不加批判的客观主义、对定量数据的前设偏好、默认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对有关意义的问题的忽视。我仍然和在70年代一样

认为，文化转向对历史研究来说是智识上重要的积极发展。但现有的文化或语言学模式已经被证明不足以应付世界资本主义结构转型对知识界的挑战，因此目前最迫切艰难的任务是在文化转向后更丰富灵活的认识论领域重建更坚固的社会范畴概念。本章的重点在于诊断、探察和描绘历史编纂学研究的现状，本书的余下部分将通过展示结构性思维与强调文化、偶连性以及能动性之间的相容性，提出超越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二律背反的理论语言，来尝试回应这一浮现出的历史编纂学挑战。

注释：

本章是对同名论文的扩写，见George Steinmetz ed.,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Copyright© 2005 Duke University Press。获得杜克大学出版社准许后转载。第二章也从“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Social’ in Social History”中截取了一些段落，该文收录于Joan W. Scott and Deborah Keates ed., *Schools of Thought: Twenty-five Years of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Copyright© 2001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准许后再版。我要感谢下列学者在过去为本章提出的意见，他们是：劳拉·唐斯（Laura Downs）、杰夫·埃利（Geoff Eley）、简·戈尔茨坦、达格玛·埃尔佐格（Dagmar Herzog）、琳恩·亨特、雅克·雷韦尔、琼·斯科特和乔治·施泰因梅茨。

1 ．上述列举的教职里，没有被提及但影响了我的学科是人类学。本章稍后会表明，人类学在20世纪70年代对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2 ．这一系列运动衰退之后，只有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崛起，并比60年代益发激进。但这次我只能作为一名支持者和同情者，而不是切身参与其中。

3 ．以我所知，在美国并没有关于“新社会史”的正式历史研究，只在Novick（1988）著作中有相关的章节。关于年鉴学派，请见Burke（1990）和Dosse（1994）；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部

分，请见Kaye（1984, 1988），以及Kaye and McClelland（1990）。

4．社会史著述的涌现，在我从事的19世纪法国历史研究中可见一斑。下列作品的出现改变了这门研究：Bezucha（1974），Johnson（1974），Scott（1974），Moss（1976），Margadant（1979），Judt（1979），Hanagan（1980），Lehning（1980），Smith（1980），Sewell（1980），Aminzade（1981），Moch（1983）和Reddy（1984）。

5．关于通称的“观念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有两篇重要的早期论文可见Darnton（1971a, 1971b）。

6．议题相近但以讨论同时期欧洲社会运动为主的研究，请见Hirsch（1983）和Steinmetz（1994）。

7．在我所研究的19世纪法国劳工史这一领域中有三个例子，请见Bezucha（1974），Scott（1974）和Sewell（1974b）。Ronald Suny（2002）也强调了汤普森的研究及从中诞生的人文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性，因为这使得社会史学家参与了其后进行的“文化转向”。

8．完成论文后不久，我在重新阅读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贵族的危机》（*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时，发现他也在引言（Stone, 1965:3）中用过同一个比喻的另一种表述。

9．霍布斯鲍姆早期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劳工史和生活水平的论文，也非常依赖定量论述，其中多数收录在1964年出版的论文集中。此外，Rudé（1959, 1962, 1964）和Rudé and Hobsbawm（1968）都使用了定量研究方法来确定集体暴力事件中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特征。

10．尽管E.P．汤普森强烈抨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但这一论点对他仍然适用，请见Sewell（1990b）。

11．霍布斯鲍姆在最近的自传中写道他曾经“数次被拒绝授以剑桥大学经济史教职”（2002:182）。

12　．《年鉴》每隔一段时间就改名一次：1939年改为《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Social* ），1946年改为《年鉴：经济、社会与文明》（*Annales: Économie,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92年改为《年鉴：历史与社会科学》（*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

13　．有关“第三代”年鉴学派，请见Burke（1990:65—93）。这个时期法国的这种长篇论文，通常是600页到上千页的洋洋巨著；有些长达2卷，Maurice Agulhon（1970a, 1970b, 1970c）甚至出版了3卷，还未包括惊人的252页补充论文（1968）。这期间的长篇论文还包括Baehrel（1961），Bois（1960），Corbin（1975），Daumard（1963），Deyon（1967），Flandrin（1976），Garden（1970），Gascon（1971），Goubert（1960），Lebrun（1971），Lequin（1977），Le Roy Ladurie（1966），Meyer（1966），J.-C.Perrot（1975），M.Perrot（1974），Poitrineau（1965），Roche（1978）和Vovelle（1973）。

14　．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和阿兰·科尔班先后教授了当代史，米歇尔·沃韦勒（Michel Vovelle——原文为Michelle，译者更订）教授了法国大革命，以及丹尼尔·罗奇（Daniel Roche）教的是现代史（在美国通常称作“近代早期史”）。

15　．布洛赫在“二战”期间因为参加法国抵抗运动（the French Resistance）而被捕，其后被枪杀，通常认为他是为共和国而死。相关讨论请见Fink（1989）。

16　．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包括莫里斯·阿居隆、安德烈·贝桑松（André Besançon）、皮埃尔·德永（Pierre Deyon）、弗朗索瓦·菲雷、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莫娜·奥祖夫、雅克·奥祖夫（Jacques Ozouf），米歇尔·佩罗（Michel Perrot）、让-克洛德·佩罗（Jean-Claude Perrot）、德尼·里歇（Denis Richet）以及米歇尔·沃韦勒。有关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如何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内容翔实的回忆录，见Le Roy Ladurie（1982）；关于这个时期年轻历史学家的政治取向，请见Agulhon（1987）及Perrot（1987）。

17 ．关于拉布鲁斯的讨论，请见Le Roy Ladurie（原文拼写为Le Roi，译者更订）（1982:220—222），Agulhon（1987:25—27），Perrot（1987:275—278），Goubert（1996:134—142），Burke（1990:53—56, 86），Dosse（1994:51—53, 71—73）以及Revel（1995:17—20）。

18 ．另一个例外是研究现代加泰罗尼亚社会经济史的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 1962），他曾经写过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方法的作品（1982），但似乎对其他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影响甚微。

19 ．斯科特曾经进行过定量研究（Scott 1974, Tilly and Scott 1978），但她关于社会性别差异之语言建构的历史的著作（1988），其中所收录论文全部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私底下斯科特从未承认自己是文化史学家，但我认为大部分历史学家都会认为这些论文属于文化史范畴。Hunt（1978）是一部典型的新社会史著作，Hunt（1984）正体现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其中一半为定量的社会史研究，更为重要的另一半则是有关文化史。与斯科特相比，亨特更接受甚至推崇“文化史”这个标签，在20世纪80年代末，她编辑了一本宣示“新文化史”成就的文集，并写了引言（Hunt, 1989）。但有必要在这里指出，研究法国文化史的美国历史学家中，真正的先锋是1975年出版《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的作者娜塔莉·戴维斯，其中许多论文完成于成书前的十年。

20 ．科恩是历史人类学的先锋人物；因登曾经是科恩的学生，并在某个时期曾经追随人类学家戴维·施耐德。见Cohn（1987），Inden（1976），以及Schneider（1968）。有关我的最初转变请见Sewell（1974a）。

21 ．有关这个时期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请见Cohn（1980, 1981）。

22 ．有关人类学转向引致的不友善气氛，请见Eley（1996:197—178）。

23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马赛的论文，其中使用了本来意图

在更大的研究中结合运用的定量社会学和阐释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Sewell　1988）。本书的第九章是这篇论文的重新整理版本。有关长时段研究中结合定量社会史和人类学历史的研究，请见Sabean（1990, 1998）。

24　．这样的归类当然并不可靠。在我的引用中，萨林斯并没有计算入内，当他写作我所引用的著作时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没有算上朗西埃，他被引用的作品是马克思主义主导无误，但他稍后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说引用马克思主义论著之多让我吃惊，是因为在写作《法国的工作与革命》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25　．公平起见，应该在此说明，由文学学者引入人类学的“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学科之间的“知识差额”（Veeser, 1989）。

26　．福柯是除了格尔茨以外唯一被亨特、斯科特和休厄尔都用作理论参考的学者，这绝非偶然。

27　．有关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女性史的政治取向和认识论简介，见Scott（1991）。

28　．部分事例请见Bederman（1995），　Briggs（2002），Chauncy（1994），　Holt（1995），　Roediger（1991）和Stoler（1995, 2000）。

29　．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期刊中确实曾经有过激烈的论战，但与社会史/文化史之争相比，更多是文化史学家就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辩。琼·斯科特在过去是好些论战的中心人物，她的一部论著（1987a）是对Gareth Stedman Jones（1983）的回应；出版后引来了三种评价（Stansell, 1987； Rabinbach, 1987； Palmer 1987）；Scott（1987b）稍后一一作出回应。Scott（1992）基本上是对John Toews（1987）的批评。Laura Lee Downs（1993a）对斯科特的批评稍后得到Scott（1993）本人的响应和Downs（1993b）的再次反驳。Robert Finlay（1988）和Natalie Zemon Davis（1988）之间的论战也广为人知。而对话语史最猛烈的批评则来自另一个领域的社会

史学家Bryan D.Palmer（1990）。

30 ．有关现在历史编纂学难题的评估，请见Cabrera（2004），视角不同，但有启发性。卡布雷拉认为“新文化史”试图解决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尽管后者仍然被认为是客观存在。他提出“新文化史”正在被“后社会史”取代，后者视所有社会现实为话语建构的结果。由于我在本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为“后社会史”冲锋陷阵，并且，作为一名未经改造的新文化史学者，我发现了各种不同的历史编纂学形式差别并不是太大，这点似乎不怎么令人感到惊讶。

31 ．这篇文章题为《对工作的统计性再现：对巴黎工业的统计，1847—1848》（“A 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 of Work: *La Statistique de l'industrie à Paris, 1847—1848*”）。 斯科特在脚注里（1988:113）说该文最早是一篇发表于1984年的公开演讲。

32 ．我并无意指控琼·斯科特在认识论上制造麻烦，只是赞赏她直率地说出别人的想法，但有些论点作为发表论文不够直接清晰。

33 ．有关这个观点的不同看法，见Bonnell and Hunt（1999:7）。

34 ．有关文化研究富于启发性的讨论，见Readings（1996:89—118）。

35 ．这篇论文稍后被收入Jameson（1991）作为第一章。

36 ．“情感结构”一词，詹明信借鉴自Raymond Williams（1977）。

37 ．有关这段转变的历史，见Brenner（1998），以及Brenner（2002）。

38 ．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他们时常在博士后研究、助理职位或者顶替性岗位上花费了好几年时间，直到终于得到终身教职——实际上具有上升空间的新星会遥遥无期地一直待在助理位置上。对那些拿到终身教职的人来说，并非自愿的职业流浪汉生涯则到此为止。

39 ．我的观点受到乔治·施泰因梅茨有关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的转变对认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论在社会运动的目标和话语中，还是在学术话语中都清晰可见（1994，2004，Steinmetz and Chae 2002）。用同一个方法研究社会运动，请见Hirsch（1983）和Mayer and Roth（1995）。

40．这个观点来自普殊同（Moishe Postone）对本章节较早版本的评论。

41．见Aglietta（1979），Boyer（1986），Gordon，Edwards and Reich（1982），Jessop et al.（1988），Lash and Urry（1987），Lipietz（原文为Lepietz，译者更订）（1987），Piore and Sabel（1984）。

42．George Steinmetz（即将出版）认为福特主义社会学仍然活跃，即使不如以前那么强势和自信。

43．对E.P．汤普森的激烈批评，见Johnson（1978）和Anderson（1980）。

44．我想《历史工作坊期刊》比《社会史》更早投入了文化转向的潮流，是因为编辑人数众多而且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女性（1976年，10人中有4人；1986年，17人中有7人；1996年，19人中有7人；2002年，21人中有9人），而《社会史》从创刊起就只有珍妮特·布莱克曼（Janet Blackman）和基思·尼尔德两位编辑。显然《历史工作坊期刊》的编委定期进行关于期刊走向和内容的谈话和辩论，这意味着时常出现新的题目和观点。在1976年值得一提的是编委中有相当数量女性成员，这使80年代代表对社会史正统最激进挑战的女性主义也得以充分呈现。《社会史》的编纂并没有出现《历史工作坊期刊》编辑过程中的自由辩论，尽管《社会史》的编辑中有一位女性，和《历史工作坊期刊》的编辑群体相比，女性在编委组成中的比例却一直较少——1976年，15人中有4人；1986年，18人中有3人；1996年，14人中有3人；2003年，15人中有3人。

45．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显著的发展包括阿兰·科尔班关于人类感官的文化史研究（Corbin，1982，1994，1995）和罗杰·夏蒂埃关于近代早期法国阅读行为的研究（Chartier, 1987, 1988, 1995）。

46　　　　　　　　．关于夏蒂埃态度的详细说明和评论，请见Sewell（1998）。

47　．另一个前欧洲强权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着决定性的历史创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德国人比法国人对形成一个主要问题由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解决的“常规”民主体制更满意。

48　．但英译本错误地题为《法国的新史学：年鉴学派的胜利》（*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全然没有提及该书的批判性议程（Dosse 1994）。

49．勒珀蒂在引言中（1995b）对此有清楚的说明。他号召人们重新审视认识论，但在该书出版后不久的车祸中意外去世。

50　．见Le Roy Ladurie（1975），Farge（1986），Darnton（1983），Davis（1983），Sabean（1984），Steedman（1986），Lüdtke （1995）。

51　．与会的五名历史学家中有三名来自意大利，分别是西蒙娜·切鲁蒂（Simone Cerutti）、毛里西奥·格里包迪（Maurizio Gribaudi）和萨比娜·洛里加（Sabina Loriga），并且都任教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其余两位是雷韦尔和勒珀蒂。

---

(1)　这种生活是指20世纪5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城市家庭生活模式，核心家庭的成员在大型机构（bureaucracy）中工作，追求类似的经济和物质生活目标，生活形态趋于一致（conformity）。——译者注

(2)　在1963年的版本里，这句表述出现在第12页，1968年再版后出现在了第13页。——译者注

(3)　即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译者注

(4) 全名为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法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父和政治作家，著有《第三等级是什么？》（*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译者注

(5) 全名为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译者注

# 第三章　三种时间性：迈向一种事件性社会学

过去的三十年中，历史学方法帮助美国社会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在20世纪60年代中的大多数时候，关于当代美国的研究在美国社会学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民权和反战运动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和前人相比对社会变迁更感兴趣。新一代学者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主导权的冲击如何改变了世界上不同的社会，而不再是寻找美国社会——常常含糊地等同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运作的永恒法则。这些由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1966）、查尔斯·蒂利（1964）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74a）等无畏的历史学家最早提出的观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1] 由众多年轻社会学家继承。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历史社会学作为学界的重要发展点而受到瞩目。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两个倾向于历史学的分会的成立，制度性地确认了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被我的一位社会学家朋友称为“左派韦伯主义”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以及由沃勒斯坦学说主导的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分会。[2] 尽管历史学的路径不太可能在社会学学科成为主流，但它日渐增长的声望给美国社会学的轮廓带来了重要的变化。

历史社会学家最重要的纲领性宣言主要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比较的方法（如Stinchcombe, 1978; Skocpol and Somers, 1980; Skocpol, 1984; Tilly, 1984）。“比较历史社会学”这一历史社会学家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中所属分会所选的名称就有其象征性意义：它同等重视比较方法和历史学的研究主题。历史社会学家就是以这样的名义进入了美国社会学的主流，通过强调比较方法，他们也热切地参与了社会学试图证明自己是科学的热潮。毕竟，比较方法是案例数目不足时，主流统计学方法的标准备选，这样的自我表述有助于学界的其他领域接受社会学化的历史研究。历史社会学，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在理论和认识论上不构成任何威胁；它不过是用着在现状的社会

学中也同样可行的方法，研究过去的社会学。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社会学家对方法有着相当的自觉，毕竟他们几乎永远都要在时刻警惕着人文主义倾向、持怀疑态度的实证主义者们环伺的学系中求存。强调方法论无疑帮助历史社会学保住了在社会学界的阵地，但这也掩盖了社会学“历史转向”潜在的激进内涵（Calhoun, 1996）。我认为现在历史社会学的稳固地位足以让它的内涵经受公开检验，所以我在此尝试指出，历史社会学向社会学主流提出了深刻却几近无声的挑战。

此前，很少有历史社会学家能够详细说明他们的社会学如何与历史 相关。假如历史社会学只是有关过去的社会学研究，那它的价值只在于增加了可供使用的数据点。许多社会进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假如我们研究这些进程的时候止步于目前，那么不仅有时间序列未完成的可能性，同时也严重限制了案例的数目。但是历史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数据点吗？难道将社会学与历史相联系不是引入了让多数社会学思维感到陌生的时间性观念吗？[3] 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白时间性如何被概念化。目前历史社会学中主导的对时间性的概念化模式——我称之为“目的论”和“实验”时间性——削弱了该领域对主流社会学的挑战意味。第三种概念化模式，即我所谓的“事件性”的（eventful）时间性——尽管目前地位不如前两者，但可能更有颠覆性。[4] 我将在下文中提出，主流的目的论时间性和实验时间性的概念都有严重的缺陷，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历史社会学需要更有颠覆性的事件时间性的概念，即一系列在很大程度上是偶连的事件决定了历史的过程。

## 目的论时间性

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有目的论的征兆。19世纪伟大的学科奠基者，例如孔德、马克思、涂尔干、斯宾塞（Spencer）和滕尼斯（Tönnies）都把历史视为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时间性表现——不管是从宗教时代到形而上学时代再到科学时代，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再到不断增进的个体化

（individuation），抑或是从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到法理社会（Gesellschaft）[(1)]。这些社会理论家认为是超历史的进步法则塑造了历史。历史的方向和意义并非组成其表层的、很大程度上是偶连的事件的结果，而是不为人知的长时段的因果力量的结果，对后者来说，特定的历史事件充其量只是它的表现。这种对进步的信念在19世纪近乎真理，它的衰微渐渐导致社会学思想放弃了明确的目的论，但在我们的研究中，目的论的余韵仍然挥之不去。

目的论的解释不是将历史上的日常发生的成因归咎于构成它的行动和反应，或是形塑、约束了这些行动和反应的具体条件，而是归咎于导致某些未来的历史状态的抽象的超历史进程。换言之，即未来的事件才能真正解释一些历史现在时（historical present）的事件。但这种错误的解释策略在近来的社会学论著中俯拾皆是，甚至在社会史学家的论著中也不算罕有，例如在将政治或社会运动标识为前瞻或是保守的常见做法中就有所体现。“保守”运动通常来说是珍视特定时期生活和文化的某些方面的运动，但分析者的后见之明的眼光指出这些运动必将被历史抛弃；而“前瞻”运动是被认为前景光明的特定时期生活与文化的某些有价值的方面。这样简单地为社会运动贴上标签隐含了对其历史的目的论阐释。[5] 无独有偶，分析者若为一些过程或能动者贴上了现代 的标签，是指它们做的是一些未来的工作，若贴了传统的标签，则是指它们做的是一些过去的工作。社会科学中的整个现代化学派都是以这样一种目的论时间性为基础，而目的论的谬误也在许多致力于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历史社会学家的著作中被提及。我希望通过简要考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查尔斯·蒂利的著作来证实上述论点，这两位历史社会学家在推翻现代化学派的理论路径、建立当代历史社会学理论路径的过程中尤其重要。

## 作为社会天文学家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是尤其清晰的例子，他撰写的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多卷历史巨著，显露出他找到自己学说的可靠科学保证的急切不亚于其他社会学家。但由于他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单一且宏

大，常用的定量和实验科学模型不再适用，因为几乎没有其他单位可以和现代世界体系相比较。沃勒斯坦在第一卷的引言中讨论到了这个难题，并对自己的忧虑直言不讳：假如他的“分析单元”真的“只此一例”，恐怕他的研究只能被化约为撰写其历史。但他“对书写它的历史毫无兴趣”。他更想发现它的规律 ：

> 这种唯一的事例中会存在规律吗？严格来说当然不可能，因果性或可能性的阐述需要一系列相似的现象或者实例……目前只出现过一个“现代世界”，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其他星球上发现具有可比性的现象，或者会在地球上发现另外一个现代世界体系，但此时此地，毋庸置疑的现实就是—— 它只有一个。（Wallerstein, 1974a：7）

沃勒斯坦用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类比挽救了他研究的科学地位。他解释道，假如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只有一种，那么研究可以建立在探索单一系统独有发展过程且完全得到承认的强有力的自然科学模式——天文学之上，更准确来说是天文学中研究整个物质宇宙的分支——宇宙学。沃勒斯坦如是自问：“天文学家的工作是什么？”

> 在我的理解中，他们论述的逻辑包括两种独立的运作。其一，他们运用从研究更小的物质实体中归纳的物理规律，并认为（或许有一些特殊的例外）这些规律可以类推至整个系统。其二，他们主张后验（a posteriori），假如系统整体将会在时间$y$具有一种特定的状态，那么它在时间$x$ 很有可能已经具有一种特定的状态。（7）

我认为，这个宇宙学的类比在沃勒斯坦的研究成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新性误用。此说提出了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即认为地方性现象研究中发现的规律也适用于整体层面。地方性和全球性进程共享同一因果关系这一关键论点具有非常深远的可能性，沃勒斯坦因而具备了有力而统一的观察角度，这让他认为不同时间、地点的各种地方性事件并非由地方性条件中的

意外决定，而是它们所属的世界经济的动力学使然。我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角度，以及在局部动力中看出整体的动力学的能力，使沃勒斯坦成为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并吸引了自成一派的众多追随者。

但沃勒斯坦在应用天文学家论点时（即世界体系中因果关系是统一的），颠倒了局部—整体关系中的方向。在天文学中，从小规模的地球物质研究中发现的物理学原理，不管是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还是当代粒子物理学的发现，都同样地适用于宇宙物质——无论是行星的轨道还是在恒星核心的核反应。这些法则的确被认为作用在作为整体的宇宙层面：究竟宇宙会无限膨胀还是最终向内坍缩这一重要的宇宙学问题，取决于对宇宙中所有物质总引力的计算。如今的天文学仍然和牛顿时期一样，即使是它最伟大的发现也仍然是还原论（reductionist）科学的又一例证。当代天文学理解无限大的动力学的关键正是从研究无限小的动力学中发现的。

但沃勒斯坦拒绝来自行为心理学或是微观经济学的模式，这些模式或许能用支配其中最小实体（即人类个体）的原则来解释世界体系的动力学。他也不认为地方共同体的动力学提供了理解全球社会发展的关键，而是正好相反：地方共同体的命运是由全球性、系统性层面因素的运作，并非由地方性因素决定的。要理解波兰或秘鲁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认识两国在世界体系分工中的位置，也就是依附核心的边缘社会的地位。但一旦开始把有时空局限性的地方性事件视为它们在世界总体演化中的位置的结果，我们就有接近目的论阐释的危险。

沃勒斯坦误用的天文学类比也以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巩固了目的论。他相信天文学让他能够后验地讨论，也就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晚近或当下的状态来反推之前的状态。最吸引人的是，天文学家用星系目前的退行速度来证明时间起源时“大爆炸”的存在，这一原初宇宙事件决定了物质宇宙后续的形态和演变。社会天文学家沃勒斯坦实际上提出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大爆炸理论。因封建主义瓦解而陷入危机的欧洲经济，被称作“大发现”的欧洲地理扩张开启了无法抑制的全新发展动力。在沃勒斯坦看来，这些地理大发现建立了作为其后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重要经济、地理和政治关系，即过于庞大以至于其中的任何相互竞争的政治单位都无法控制的、具有空间差异的世界经济体

制（38）。

沃勒斯坦误用的天文学类比再次证明有利也有弊。我相信他观察到的独特经济—地理—政治动力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确实非常重要，而且无疑是被地理大发现所推动的。但沃勒斯坦认为所有资本主义后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大爆炸固有的，这扭曲了他对地理大发现及其后果的理解。尽管他的修辞压抑了其叙事的事件性特征，但沃勒斯坦的研究中包括了不同时期欧洲政治史和经济史的事件性分析。他探讨了边缘小国葡萄牙发起大航海之旅的始末（50—52），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如何试图建立控制世界经济的霸权却最终失败（165—180），还有尼德兰革命（the Dutch Revolt）如何实现了尼德兰至关重要的新商业和金融制度的发展（199—214）。沃勒斯坦对这些事件的讨论事实上充满偶连性、非预期后果和决定性选择，但在沃勒斯坦的分析中，世界体系创造伊始即成为其一部分的必然性预先决定了这些偶连性、选择和结果。沃勒斯坦的大爆炸理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地理大发现这一重要的开放性事件怎样引起了一长串后续的开放性事件，且最终并非不可避免地催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天文学家的后验推理在科学上为人所接受，是基于物理定律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这一假设的可信性。假如运动、重力和高能物理的定律能够作用于过去，那么就可以推导出造成宇宙目前状态的大爆炸的时间和特征，或者是演绎出大爆炸发生十分钟后的抑或是距今一千亿年后的宇宙。但我们都知道人类和社会远比物理学物质更无理可循。人类不同于行星、星系或亚原子粒子，他们可以理解自己存在于其中、且可以通过行动改变的结构，尽管行动的后果不能完美预测到。即便人类历史中的确存在一些转折点或是重要事件，但大爆炸是不可能的。建立在和天文学类比基础上的历史学观点，带来了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误认为是包含了潜在社会体系全部未来的纯粹起源的目的论，一些并非完全偶连的后续效应也被其抹杀，并被还原为指向必然未来的路标。

## 查尔斯·蒂利和历史的主导过程

在蒂利的论著中，目的论远不如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突出。但我将尝试证明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关于旺代叛乱（the Vendée rebellion）和关于法国集体暴力的历史——都包含了强烈的目的论时间性观点。[6] 研究1793年在法国西部爆发的大规模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叛乱这一特别事件的《旺代之乱》看起来尤为不寻常。但蒂利的著作并非关于这次叛乱的叙事史，事实上，他通过抨击目前无数叙事史的社会学幼稚性带出了自己的观点（1964:6—13）。这些叙事史将叛乱起因都傲慢地归咎于叛乱者的假定动机，而蒂利坚持提出社会学的因果关系问题。他试图了解旺代地区导致了叛乱的社会组织，并主要通过比较法国西部的两个毗邻地区，即支持革命的瓦-索米尔（Val-Saumurois）和支持反革命的莫日（Mauges）来进行分析。蒂利用以分析这两个地区社会组织差异的主要社会学概念是“城市化”，这被他引申为“通常伴随社会中大规模协同活动的发生和扩大的一系列转变的统称”（16）。所以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城市的发展，还有“农村共同体的成员对超出所在地的一系列活动、规范和社会关系的越来越多的参与”（11—12）。

蒂利认为莫日和瓦-索米尔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它们城市化的程度和时间。瓦-索米尔经过了“彻底、均衡的城市化”（57），即便是乡村居民也已经长期生活在相当大型的村庄聚落，并且在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市场中售卖自己的产品。均衡和完全的城市化使瓦-索米尔良好地适应了大革命带来的更为理性和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体制。相反地，莫日尽管城市化水平相对很低，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尤其以乡村纺织业发展的形式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城市化过程。这种后发但不完全的城市化使莫日地区的社会组织极不统一，并在大革命的权力流向城市资产阶级及其乡村代理人时引致了激烈的对抗。

蒂利对两个地区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如何造成革命中不同政治和社会经验作出了出色的分析，但目的论时间性的无端引入损害了他对这些差异的社会学阐释。在他看来，莫日和瓦-索米尔代表了一个单一的发展连续体（continuum）中城市化程度从低到高的不同点。蒂利认为自己的研究步骤“比较了发展自同一根源，但在大致同一时间被假定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群”（12）。这种研究步骤的显著优势在

于它的可概化性（generalizability），意味着在两个地区之间观察到的差异不只是地方的特殊性，也和发生在不同时空的城市化程度的差异具有可比性。引入单一的连续体，使蒂利得以将一个地方性的研究视为关于城市化对政治影响的普遍科学化的社会学思考。

然而问题在于，莫日和瓦-索米尔两地社会组织的差异显然不是同一主导过程（master process）中的不同阶段导致的。蒂利认为是渐进式发展中出现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社会组织形式——瓦-索米尔被敞田围绕的大型核心村庄，和莫日在用篱笆隔开的田地间散落的更为孤僻的小村庄——实际上是乡村环境中未经改变的延续的特征造成的。区分瓦-索米尔和莫日的界限，是前者与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在中世纪早期已经存在的不同“农耕文明”之间悠久的地域划分（Bloch, 1970）。简言之，蒂利的谬误在于将社会组织在社会地理学上的固定差异，变成了城市化这一抽象的主导过程的线性发展中的某些假定的阶段。

蒂利把城市化作为线性目的论，并未确实损害他有关区域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政治效应的比较研究，但将其主题描述成普遍社会进程中的地方性案例会歪曲该书的贡献。如此会隐匿该书在我看来最具原创性的成就：它敏锐地分析了地方性社会结构的变迁如何帮助瓦-索米尔的旧体制顺利转化为革命政府，但也致使法国大革命重整并重新定义莫日当时已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分裂，最终引发了不断升级且无法预料、以广泛且持久的集体身份转换告终的一系列对抗事件。蒂利的研究在误用普遍化科学的表面下，隐藏着一部事件性社会学杰作。

有人或许会反驳，《旺代之乱》是蒂利的第一部著作，他后来成熟的研究都避免了这些早期的错误。毕竟他之后放弃了之前过于抽象的城市化概念，将其细分为国家集权和资本主义发展两个更具体的观念。但在《旺代之乱》之后，他对法国集体暴力的长期研究中，仍然基本保持了前者沉迷于潜在主导过程的目的论视角，同时却失去了其不完整却不失为优秀的事件性分析。蒂利沉迷于自己的普遍化修辞，试图证明政治抗争来自不为人知的大型社会进程中的渐进变迁，而不是政体的变迁对已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分裂的重整和重新定义，从而创造出新的集体身份。

蒂利在他有关法国集体暴力的多部著作和文章中认为，过去三个世纪中暴力形式的转变——简略来说，是从“反应性”、保守、地方导向的暴力，转向“主动性”、前瞻性、国家导向的暴力——是不可抵挡的国家集权和资本主义逐渐兴起的结果。[7] 这不一定是目的论的论证，例如当蒂利证明暴力抗争目标的转变部分是因为国家在地方的在场的特点和变化时，并没有运用目的论。但他的论证通常带有目的论的色彩，大体上是因为那些被强调的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集权——在蒂利的论述之外，即在现实中根本上被认为是永在且不断发展的力量，是某种永恒的催化剂。[8] 所以，蒂利多次描述的暴力冲突只是被塑造成不可见但永在的因素的结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事件，因为它们只是转变的效果，而不是转变的起因。蒂利在关于法国集体暴力历史的后期著作中放弃了事件分析的明确征兆，是因为他认为即使是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学家的重大事件也没有明显改变集体暴力的本质。在他看来，这种重大事件，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当时业已存在的趋势（Tilly，1977，1986）。因此，即便蒂利在《旺代之乱》作出过具有启发意义的事件分析，他关于法国集体暴力的著作中主要语汇仍然没有突破目的论时间性的概念。

## 西达·斯考切波与实验时间性

沃勒斯坦和蒂利是历史社会学中一直以来受制于目的论时间性的例子，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则是实验时间性的主要倡导者和典范。她在《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中明确支持美国主流社会学的标准“科学”方法论，并将其引申到了历史研究。她声称，“比较历史分析”，

> 和数量上更多、可操纵、适合实验研究的现象，以及统计分析所需案例众多的现象相比较，尤其适用于阐明从来只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比较历史分析，实际上是研究变量过多却实例不足的问题时可以选择的多变量分析模式。（Skocpol，1979:36）

斯考切波将她的比较方法运用于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三个在现代发生社会革命的主要国家，尝试用分析建立能够梳理社会革命起因的比较“自然实验”。她研究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还有两场没有最终成为政治革命的重要政治危机（1807年至1814年的普鲁士改革，1868年至1873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两场没有变成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1640年至1688年的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1848年至1850年的德意志革命）。在对这七个案例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斯考切波发展了一种有关社会革命成因的重要且精深的理论。她首先提到法国、俄国和中国三国在革命之前都在军事竞赛中落后于对手，这使它们要通过实施长远的行政、经济和财政改革来试图赶上竞争者。但三个国家的改革都遭到主导的地主阶级抵抗，当时他们在国内有足够坚实的基础来阻止、拖延和颠覆这些改革。这造成了深重的财政和政治危机，只能靠一场革命来解决。这些思考让斯考切波提出了社会革命的两个条件：一个在军事竞赛中落后于对手的国家，以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有足够力量阻挡国家改革的地主阶层。她通过检验普鲁士和日本的例子来强化以上特定原因，这两个国家都因为军事竞赛落败而陷入危机，但由于普鲁士和日本的主导阶级在国家面前几乎没有政治优势，国家机构内部的改革者在得以成功振兴国家的同时避免了政治革命的干预。

但斯考切波还发现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由军事落后导致、并被顽抗的地主阶级加重的财政危机足以引发政治革命，但要让它成为社会革命——即引起国家阶级结构的转型——还需要农民阶级的大规模起义。所以，社会革命也需要有组织且自治的农民共同体来利用政治革命导致国家权力垮台。斯考切波再次证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革命并未像她研究的三个案例那样满足了这个条件，以至于英德的政治革命无法推进为社会革命。简言之，斯考切波用准实验性的归纳方法找出了社会革命的三个必要因素：（1）军事落后；（2）政治实力强大的地主阶级；（3）自治的农民群体。在我看来，斯考切波将这些因素概念化的顺序是：第一个因素诱发了政治危机；第二个因素的加入使政治危机成为政治革命；进一步加入第三个因素之后，三种因素将政治革命转化为社会革命。

斯考切波通过这个七个例子展开的解释可谓是极为有力，也非常可信。但这些解释的力量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来自她在研究中运用的准实验性归纳法。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1989）指出，仔细审视斯考切波的逻辑和论据就会知道，她书中的“自然实验”完全不可能证明她的解释。实际上，她的论据不止在一个方面站不住脚。布洛维指出：第一，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革命其实并不符合斯考切波因果理论的第一阶段，它们是完全的政治革命，而非由军事落后引起。1640年的英国革命起因的确是财政危机，但这场财政危机的起因却和军事落后无关，而1848年3月的德意志革命既不是来自财政危机也不是来自军事落后。斯考切波的比较事实上证明，在她提出的前两个因素缺失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意义深远的政治革命（Burawoy, 1989:767—768）。

第二，斯考切波所比较的众多例子，并没有证明必须三个因素俱全才能引发社会革命；除非她能找到一个实例，其中军事落后和地主反抗的叠加引发了政治革命，最终因为缺少自治的农民共同体而没有发展成社会革命。但是斯考切波并没有这样的例子，明治维新和普鲁士改革只具备第一个因素，英国革命只具备第二个，而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则无一符合。在斯考切波的论据看来，军事落后和强势地主阶级的结合在逻辑上已经足以引发社会革命。

斯考切波对中国革命的分析的确符合这一点。中国在社会革命发生的时候只具备她的前两个条件，但斯考切波仍认为这个例子证实了她的理论。她写道：农民阶级不能独立于地主阶级自治，这使1911年的政治革命始终无法发展成社会革命；直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内组织了自治的农民群体，至此能够完成社会革命的农民反抗力量才真正诞生（Skocpol，1979:252—262）。但这番论述实际上极为含糊。或许有人会简单地认为，1935年的日本入侵激化了国家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长期僵持局面，并在国民党控制地区以外创造了社会革命胜利的条件。在这种不同的表述中，建立独立于地主阶级的自治农民群体，与其说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毋宁说是军事失利使僵持局面瓦解从而引发的、共产党人率领下局部胜利的社会革命的结果。

斯考切波论述中的这两个错误反驳了她已经在经验上证实的社会革命理论。她既没有阐明是军事落后和强势地主阶层对改革的反抗就可以共同导致政治革命，也没有解释自治的农民群体是政治革命转化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诚然，并不是比较方法自身导致了这些谬误。斯考切波研究的现象是如此少有，以至于她无法积累足够的事例来测试她的理论中所有逻辑的可能情况。或许，由于在比较论据缺少严密检验的情况下贸然作结论，作者陷入了窘况，但这对她提出的方法来说几乎算不上严重的问题。研究相对常见现象的历史社会学家自然可以进行更准确的实证检验（见，如Paige[1978]，其中用数据分析了大量农民起义的案例）。但仅仅局限于更容易驾驭的现象，无疑大幅提高了拯救比较方法的代价，因为这限制了社会学阐释如社会革命这样罕见却形塑世界的事件的能力。《国家与社会革命》中的论据和论证都难以证明斯考切波的信心：在“变量过多却实例不足”的问题上，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学家的万灵药（Skocpol, 1979:36）。

斯考切波的逻辑困境并不只限于此。准实验的比较方法最麻烦的谬误并不在于难以积累足够的实例（这只影响到一些研究问题），而是来自紧密依附于实验逻辑的、非历史性的时间性假设。在我看来，实验时间性概念与传统的比较方法是无法分开的，而只有布洛维所说的“冻结历史”（freezing history）才能体现这一点，稍后我会将整体的历史时间分割成可人工互换的单元，以此延伸这一隐喻。

斯考切波研究的革命，必须被概念化为类似于同一实验中的不同“试验”（trials），才能够运用于她的比较方法。也就是说，这些试验必须是等价且相互独立的。等价原则意味着每一次新的试验（即此例中的新的革命）都是先前试验的精准复制品，保持着所有相关变量。这暗示了关于时间性的明确假设。实验逻辑中的时间性对试验来说完全是内在的：假定的诱因必然先于它们假定的结果存在。与之相对的是，根据定义，历史时间的外在时间性——不管一次试验在何种程度上先于或晚于另一个——都必然被视为是不相关的，这样才符合实验性试验必须严格等价的要求。

不同试验必须等价的要求，给斯考切波有关社会革命成因的论证造成了相当大困难。为了进行归纳比较，她必然要假设研究中的三场

大型社会革命实际上是同一因果规律作用下的同一种对象。但某种程度上鉴于新的阶级、阶级关系以及政治制度不断形成，这样的假设是极不可靠的。相应地，造成社会革命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也会被改变。举例来说，介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工业革命，造就了新的工业无产阶级。因此，即使不适用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有人或许会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起义对1917年的俄国社会革命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布洛维所说，如果不舍去不同革命间等价关系的关键假设，斯考切波就无法审视这种可能性。所以，由于她认为无产阶级起义在另外两场革命的成因中不属必要，在俄国革命中也是如此，因此斯考切波没有检验俄国工业无产阶级作用的经验论据，反而无视了这种可能（Burawoy, 1989:769；Skocpol,　1979:113）。等价假设作为斯考切波的比较方法的逻辑基础，使她无法追究革命之间发生的事件将怎样影响到革命的发生和结果。[9]

实验逻辑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实验性试验必须相互独立，这在斯考切波的分析中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若试验要相互独立，则任何给定试验的结果都必然不会影响后续试验结果。[10] 但认为早前的革命对后来的革命没有影响是荒谬的，毕竟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自觉地吸取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来形成自己的革命模式，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毫不避讳地模仿布尔什维克，还直接接受了后者的援助。这再次证明，将这三场革命的历史视为相互独立而不是一系列有历史关联的事件的话，只有“冻结”和“切割”历史才能支持这一假设。简而言之，由于从实验方法的角度来看，斯考切波的比较既不对等也不独立，因此它在逻辑上存在根本的缺陷。

尽管我们偶尔可能发现一个同时满足等价和独立的假设的历史客体的全集，但这种情形一般来说很罕见。尝试证明历史案例的等价关系，通常会不可避免地降低案例之间的独立性，反之亦然，几无例外。确保案例间独立性的简单方法，就是比较在时空上距离遥远的现象。例如，人们有理由相信18世纪日本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皇家仪式中的任何相似性并非出自模仿，但这种支持独立假设的遥远距离无法支持等价假设。在经济、社会分层、宗教信仰、性别观念等等截然不

同的社会中，我们如何能确信相关差异已经被控制了呢？

正是由此，马克·布洛赫在有关比较历史的重要论文中警告道："彼此影响或是共同起源的理由显然都无法解释在时空上相距如此遥远的社会之间任何的相似之处。"（Bloch，1967:46）[11] 他认为这样的比较太不准确，于是他会选择具有如下特点的社会进行比较：时间上属于同一时代的相邻时段，彼此有着相互持续的影响，终其整个发展过程都包含着相同的原因带来的行动，且起源也多少相同。布洛赫选择比较邻近的社会，是因为这些社会最接近等价假设（47）。我想这是布洛赫一如既往的明智选择。但他显然也让比较历史偏离了在逻辑上同等必要的独立假设。由于布洛赫研究的社会对彼此造成"相互持续的影响"，他将难以判断两个案例的相似结果到底是出自一系列假定的内在因素，还是受外在影响的作用。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只有降低历史案例间的独立性，才能够产生等价性，反之亦然。对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提出却无法付诸实践的缜密的实验归纳来说，这个悖论让历史看起来俨然是一个无法突破的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斯考切波实验式归纳研究在逻辑和经验方面有所不足，但她有关社会革命的分析仍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这意味着她和沃勒斯坦与蒂利一样，并未用清晰的理论和方法论表述厘清书中完成的重要论证。[12] 我认为，这部分不为人知的表述体现在她对事件的把握上，著作的主体并未缜密地衡量证据的可比性，而是结构严谨地陈述社会革命如何在三个案例中产生。有一条脚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斯考切波的叙事策略，她在其中抱怨"对革命进行社会科学的分析，几乎从未 ……充分重视原本分别决定的进程间势态性（conjunctural）展开的互动"（Skocpol, 1979:320）。

强调"原本分别决定的进程间势态性展开的互动"，正是斯考切波书中与众不同的叙事策略，它有别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常用的策略。社会学对革命的分析，常会突出革命某单个起因的重要性，并将其他起因视为前者的系统性附庸。历史学的分析则通常试图描绘革命进程中独特的、错综复杂的表象，只有当革命进程的不同因果性特征在叙事过程中显现出来时，才会讨论这些特征。但历史学分析策略的问题在于，往往将重要的因果过程混在叙事性细节的泥沼中，很少足

够清晰地区分出它们自主的动力学。而社会学分析策略的问题在于，尽管能详细描述单个因素的前因后果，但常常将其他的因素和选定的单个因素混为一谈（如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研究中仅仅将国家视作阶级力量的体现），或是把这些其他因素都当作背景（如多数革命研究都提到的国际军事背景）。斯考切波的手法是两者具有启发性的折中，她挪用了社会学策略来研究多个，而非单个不同的因果过程。但通过强调“势态性展开的互动”之外，她还挪用了历史学策略中关于事件、时序和偶连性的思考。与比较实验归纳法大不相同的是，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发展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为多重因果叙事（multiple causal narrative）的有效策略。[13] 也就是说，她要研究出一种革命进程的初始理论，研究事件在扭曲或重整结构的过程中怎样引发后续的转型事件。但在该书的引言和结论中，她都没有传递出这个重要的修辞和理论创新，而只在第三章的一条脚注中顺带阐述过。斯考切波过分沉迷准实验性的比较方法，确实埋没了她对事件性社会学极具原创性的贡献。

斯考切波形式化的比较方法和实验性的时间性概念，对她革新事件性社会学来说意义不大。但我认为，在她发展革命进程的初始理论过程中，严谨的比较思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方法的形式逻辑（formal logic）早已被专门拓展成评估理论假设的经验准确性的手段，以此解决科学研究中被拉卡托斯（Lakatos，1978）称为“辩护的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的阶段。但我认为《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比较的最重要作用其实在于“发现的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也就是在生成理论观点的研究阶段。斯考切波在研究中对历史的描述很能说明问题。她告诉我们，自己最先是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然后发现中国和法国的革命发展有着不为人知的相似性，并最终用中、法两个案例中展开的分析图式来阐释俄国革命历史（Skocpol，1979:xii—xiii）。有人或许会质疑，每个案例都依据其他的案例来相互解读会造成无尽的循环论证：例如，托洛茨基所强调的落后的俄国在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军事竞赛中落败，必然会指向法国旧制度危机中的相似现象；乔治·列斐伏尔（Georges Lefebvre）对法国大革命中贵族抵抗和农民起义之重要作用的分析，必然有助于厘清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地主和农民的角色（Trotsky，1932；Lefebvre，

[1949]1971，1973）。

我怀疑斯考切波只是把批判性叙事从一个例子扩展到另外一些例子，以此来阐述和深化对关键性革命事件的阐释。粗略的因果逻辑无疑会引向这种类推式扩展：假如面对德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威胁，沙皇俄国试图改革自身这个无序扩展的农业国家，那么情况大致相似的法国，是否会在被英国反复击败后出现同类的改革企图呢？但斯考切波把比较方法作为一种检验已有的一般性命题的手段，无异于缘木求鱼。更准确地说，从比较得出的命题是否具有潜在的普适性，要看命题是否能解释三个案例中类似的因果过程的势态性展开。假如主要问题是斯考切波假设的成因在一系列事例中的出现与否，那她并没有必要用上一本书的篇幅来陈述，一篇附上简单图表的概要文章就已足够。一系列表格式的形式逻辑不足以说服斯考切波的读者，但就类似的因果过程的运作的角度而言，三场革命确实都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叙述 ，这意味着关注相似性的叙述起码厘清了大量或许只被当成意外的细节。“证据”与其说是在形式逻辑上，不如说是在环境细节的成功叙事排序上。斯考切波比较历史的真正收获不是对抽象概括的严格测试，而是发现了可以建构新的、可信的、关于事件性序列的叙事的相似性。[14]

## 事件时间性

事件时间性承认历史中事件的力量。社会生活可以被概念化为由人与群体在其中参与社会行动的日常发生或者日常接触（encounters）组成。构成了人群身处的社会的结构会约束或促成他们的行动。我将在第八章中说明，大多数日常发生几近一成不变地再生产着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亦见Giddens, 1984）。事件可以被定义为日常发生中能够显著改变结构的相对罕有的一类。所以，事件时间性是考虑了由事件引发的结构转型的概念。

要解释事件时间性概念，可将其与实验时间性和目的论时间性加以对比。实验时间性基于两个基本假设：因果规律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以及每一系列偶然事件（occurrence）都与之前之后的偶然事件

因果独立。而事件时间性的概念否认以上两个假设，并主张事件通常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的，时间序列上不存在独立的因果关系，即在较早时间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潜在结果，但路径依赖也不一定意味着因果结构会随时间改变。事实上，是经济学家最早提出路径依赖的概念，他们认为所有行动者在任何时候都会理性地逐利，但即使在这个经济学家的基本因果假设下，同一时刻、同等理性的不同备选技术可能也会造成稍后选择上的分歧（Arthur，1988）。完全的事件时间性的概念，必然会否定因果结构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致的假设。事件不只能改变运作着的因果力量的平衡，还改变着偶然事件或情境下的特定逻辑。例如，用事件性的观点看待法国大革命中贵族的命运，会认为贵族们失势不仅是因为失去资产（如土地、税收优惠、封建税费、官职）导致他们的资源相对其他阶级减少，也由于社会和政治博弈的规则已经发生巨变，使贵族们过去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他们的贵族身份，在“恐怖统治”（the Terror）时期[(2)]变成了沉重的负担。我认为，不论是这个例子中还是普遍来说，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改变形塑和约束人类行动的文化范畴，引发了历史转型。因为社会关系中的因果规律无论如何都有赖于文化范畴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事件从而能改变社会的因果规律。[15]

事件时间性的概念因此认为，稍后发生的偶然事件在因果关系上取决于较早前发生的偶然事件，且社会性因果规律在时间上是异质的而非一致的。因此，事件时间性从本质上区别于实验时间性，也不同于目的论时间性。目的论时间性和事件时间性都假设路径依赖，但目的论时间性否定时间的异质性，起码是普遍的时间异质性（目的论分支之一的阶段理论[stage theories]，不仅假定各阶段内具有因果同质性，还认为不同阶段之间具有高度异质性）。但在偶连性的问题上，目的论时间性和事件时间性就相去甚远。目的论时间性和某种位于社会关系的表层的偶连性并存，但不兼容于我认为是事件时间性基础的根本的偶连性假设。例如，目的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会认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冲突的特定情境会影响双方斗争的结果，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组织的局部性倒退，譬如手工业在某个地区战胜了工厂生产。但这种局部性倒退的积累不可能引起完全的“倒退”。因果力量内在的方向性使局部变异必然只是表层的微小变动，不可能对历史的进程造成长期

影响。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事件时间性的概念假定偶连性是全局性的（global），这同时牵涉到社会关系的表层和核心（或深层）。这一概念认为，偶连、非预期且本身不可预知的事件，能够抵消或改变历史最持久的趋向。这当然不是指人类社会的流变是永存且普遍的，或社会变迁很容易完成，或历史变迁没有规律可言。我并不是说只要希望如此，或者希望历史只是痴人说梦，我们就能消灭资本主义、全球劳动分工或性别不平等。历史有着顽固的持久性，也有骤然的断裂，即使是最严重的历史断裂也夹杂着相当的连续性。认为事件是结构的转型，正意味着从事件中产生的结构总是现有结构的变形。有关全局偶连性的假设，并不是说所有事物都在持续变化，而是说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最终不可改变的。

事件时间性概念因而认为，社会关系的特点就是路径依赖、时间异质的因果关系以及全局偶连性。这与多数职业历史学家的固有智识成见很接近，但他们对事件的效力太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往往缺乏理论优势。马歇尔·萨林斯引用了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格言——假如深海鱼会说话，水是它们最后一件说出的事物，从而指出历史学家“生活在叙事元素当中”，结果对作为理论范畴的事件相当缺乏自觉（Sahlins, 1991:15）。我个人的经验也验证了这一警句，即使作为批判过时的“叙事史”的“社会史学家”，我也安于叙事。只有和社会学及人类学话语的持续接触，尤其是在社会学系中与之接触，我才认识到作为一个范畴的事件需要理论工作。

沃勒斯坦、蒂利和斯考切波的著作证明，即使社会学家在著作中包括了典型的事件分析，他们大多也没有意识到事件是一个理论范畴。但也有一些研究实践清楚证明了事件的重大意义。而我要在本章余下的部分来分析两部这样的著作：马克·特劳戈特的《贫民的军队》（*Armies of the Poor*，1985），以及霍华德·基梅尔道夫（Howard Kimeldorf）的《左翼分子抑或是敲诈犯？》（*Reds Times New Roman*，1988）。我不认为特劳戈特或基梅尔道夫大大推动了将事件发展成理论范畴的工作，但两者都利用了即便是在非主流社会学家身上也非常典型的高度完善的方法论意识，向存有疑问的读者证明事件

在他们研究的案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他们的著作本身没有形成关于事件的理论性观点，但仍有助于发展和说明这一观点。

## 特劳戈特的组织假设

特劳戈特的著作可以被看作是对同一重要事件造成的不同效应的研究，主题是1848年的法国革命对两个法国工人群体的影响：其一是政府救济失业者的组织，即国立工场（the National Workshops），组成了1848年6月大型劳工起义的核心；其二是征召工人组成以镇压前者的半军事化的流动卫队（Mobile Guard）。特劳戈特旨在揭示，为什么参与这两个组织的工人会站在街垒两边的对立阵营。有关他们政治路线分歧的主要解释来自马克思，他认为流动卫队毫不留情地枪击起义工人，是因为它特地征召了都市贫民中的渣滓，也就是无根的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特劳戈特用了大量篇幅——无疑还耗费了更多的研究时间——对这番论点进行了缜密的定量检验，证明在二月革命前，六月革命的起义者和卫队其实拥有相同的职业构成（Traugott，1985:65—77）。仅靠阶级背景不能解释工场和卫队成员迥异的政治行为。

典型社会学解释的失效，让特劳戈特转向他所说的“组织假设”（organizational hypothesis），即卫队和起义者行动上的差异并非源自1848年以前他们的生活状态，而是来自他们在1848年2月到6月之间的集体经验（83）。特劳戈特用“配对比较”卫队和国立工场两个组织的历史来验证他的猜想。两个组织有着许多共同点：都是因为二月革命后劳工阶层压力高涨而临时组成；同时被临时政府当作缓解失业和拉拢可能起义的工人的工具，以缓和他们的政治情绪（115）。此外，由于害怕两个组织会变成社会主义起义的温床，保守的资产阶级对它们怀有强烈的不信任。特劳戈特通过配对比较，让我们看到两个组织原本都是极为成功的拉拢工人的组织，而国立工场直到被敌对政府取缔时才发动起义。

特劳戈特进行的组织分析借鉴了凯瑟琳·乔利（Katherine Chorley）的《军队与革命艺术》（*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1943）。1848年4月时，原本是乌合之众的流动卫队满足了乔利提出的军队成功镇压革命运动的三个必要条件：团结的军官团队、军队与普通民众的有效隔离，以及能快速回应士兵的实际不满。流动卫队的军官整体主要来自正规军，人员补给来自军队中仔细的选拔，因而在4月就成了高度职业化和团结的团体。由于卫队住在兵营而非自己所在的街区，所以他们实际上与一般民众隔离开来。实际的不满则是迟迟不发放制服严重地损害了卫队的士气，但也在6月之前被完好解决了。因此，原本可能涣散的流动卫队被塑造成了一支守纪的武装力量，使之在4月和5月的数次对峙中愿意对抗他们的工人同胞，乃至在6月起义爆发时举枪镇压（Traugott，1985：86—113）。

尽管国立工场不是武装力量，特劳戈特也用了乔利的模型对他们的组织历史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工场是以军事化模式组织的，包括班、连、旅和身着制服的军官团队。工场的年轻指挥官埃米尔·托马（Emile Thomas）在他的母校中央工艺制造学院（École Centrale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一所国立工程学校）中招募上层成员，以此保证军官团队的团结。下层军官则从士兵中选拔而出，但受到上层的严密行政监管。团结的军官团队不仅让托马能对国立工场保持严格的行政监管，也使他个人在士兵中受到欢迎。托马在克服实际不满方面的收效则不如流动卫队，主要是由于工场从来没有为他们的整个失业劳工群体（6月时达到120000人）提供足够的、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工场的成员也没有全然与普通民众分开来，他们占巴黎工人阶级的近三分之一，并且一直居住在自己的街区。但托马也尽了全力，他坚持让成员不管有没有工作都要每天向旅报告，并在有示威或政治骚乱时将他们派往周边地区。他还成立了国立工场的政治俱乐部，试图令工场成员远离他们街区中的政治俱乐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148—165）。

有效的隔离措施、团结的军官团队以及托马的个人声望，确保了国立工场在近5月末时仍然保持政治温和。如果政府没有解雇托马并取缔工场，这样的情况有可能一直保持下去。但形势的变化让班、旅中选拔出的军官左倾，脱离了托马和他忠心的校友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监管，并使自己从中立派转化成革命派（165—168）。当6月21日国

立工场被宣告全面取缔时，班和旅在军官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简言之，国立工场和流动卫队的成员在6月选择了相反的阵营，并不是因为不同的阶级背景，而是由于两个组织在政治事件进程中的不同组织历史。

特劳戈特有理有据地总结道“组织假设”最能够解释他所观察的行为。但在我看来，组织假设 一词并没有准确地捕捉到特劳戈特理论观点的本质。这个术语暗示了这种假设只是另一种社会学假设，而特劳戈特只是要求读者思考阶级背景、收入、宗教倾向或同僚关系以外的另一个解释性因素。但其实他想做到的还要更为彻底：他想体现出社会学家考虑了一种新的、本质上是事件性的解释性论述。有关国立工场起义和流动卫队镇压起义的组织解释，实质上是对于组织如何被逐渐塑造的因果叙事，有着鲜明的事件时间性。此说还带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即事件的时机严重影响了结果。流动卫队对缺少制服的极度不满在6月前得到圆满解决，确保了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假如在事件解决之前就爆发起义，很难说卫队会不会听从命令镇压工人同胞。特劳戈特的时间性也是因果异质的。如果去考虑组成了起义领导骨干的工场的班、旅的军官的角色，他们的领导地位源自埃米尔·托马的家长式策略，后者既培养了他们对托马以及政治的忠诚，也将他们紧密地整合成军官团队。这种家长制的延伸效应，确保了工场成员在托马和他的校友们掌权期间的温和立场。但当托马被解雇、工场被关闭时，各班和各旅的军官也做好了必要时组织武装起义反抗的准备。矛盾的是，托马创立的保证工人政治温和的组织结构，在危机到来时反而起到了激化作用。简单来说，在政府关闭工场时，这种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结构改变了当时情境下的因果动力，有效扩大了反抗的规模、强度以及效应。

应该指出的是，特劳戈特论述中的时间性夹杂着偶连性。他像传统叙事史学家一样，强调了特定人物的重要意义。埃米尔·托马的个人决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立工场的组织方式，而他被解除领导职位则是工场行动转向激进的决定性因素。像托马这样强大又有吸引力的人，身处具重要战略意义的位置，能对历史进程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特劳戈特的论述中也强调了有意识的选择：托马有意从他的校友中挑

选军官以加强组织的团结性，而保守政府则有意通过废除工场来制造危机。基于以上原因，特劳戈特分析的事件进程是偶连而非必然的。假如政府保留工场并让托马继续担任指挥官，那么起义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假如是某个能力稍逊的人担任指挥官，那么起义的效应很可能会大打折扣，也可能会更早发生。

特劳戈特支持事件时间性，不意味着他在叙事史中放弃了社会学。他所用社会学方法的严密逻辑，将他引向了事件性的解释，而他则谨慎地强调了时机、个性、选择和偶连性的结构限制。尽管他在这个例子中支持事件性而不是归因性的解释（etiological explanation），但他实际是为了强调归因性因素的运作模式，而非置之不理。特劳戈特指出，阶级具有某种影响，但“行动者以阶级为基础的任何倾向，都受限于一系列偶连的组织性力量”（184）。他认为“干预性（我还要加上‘事件性的’）分析必须证明宏观社会结构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转变了意识的形式以及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否则历史只不过是一系列纯粹的偶连事件罢了（189）。特劳戈特的著作通过严谨的方法论，以及聚焦结构和事件间的关系，指出了一种事件性的社会学依然是事件性的社会学 。

## 基梅尔道夫的多元因果语域

基梅尔道夫的著作研究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间纽约市和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工会的不同的政治演化。和特劳戈特一样，基梅尔道夫运用配对比较的策略，将叙事史和结构分析相结合，对事件在形塑工人政治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述。基梅尔道夫试图解释，为什么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码头工人虽然在类似的技术和经济环境下从事类似的工作，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工会，即西海岸坚持社会主义的国际码头及仓储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nd Warehousemen’s Union，ILWU）和东海岸政治保守且长期讹诈不断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ILA）。

基梅尔道夫认为，纽约市和西海岸工会间的差异是复杂的多元因

果关系的结果，并有无法被简化的历史原因。他指出，这些差异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单一的潜在因素，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解释因素可分为几类。首先，劳动力的招募方式和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西海岸码头工人中有很大比例招募自伐木工人和海员，其工作结构使这两个群体高度团结并经常能发起阶级冲突，这些特点无疑也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西海岸表现了出来。由于过去的工作经验，西海岸的劳动力有斗争性，但只有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激进的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这一机构将他们短暂却广泛地组织在一起。及至20世纪30年代，受激进劳工文化的影响，西海岸码头工人已经做好了响应哈瑞·布里吉斯（Harry Bridges）号召的准备（Kimeldort，1988: 20—37）。纽约的码头工人则全然没有受到这些因素的熏陶。他们先后招募自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农民移民群体，这两个族群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码头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此外，他们的政治和工作文化也更为保守，爱尔兰人族群由天主教会控制，意大利人则由剥削性质（有时还有黑手党参与）的包工头（padrone）制度主导（37—50）。

航运业的生态（以及由此导致的航运资本家行业容量）的不同，强化了工人招募过程中的差异。在西海岸，三家美国公司控制了运输业，并得以对码头工人工会成功开展了异常凶狠且极端激烈的斗争。在纽约，运输业分散于大量欧美公司，还有一家政府持有的大型航运公司。这些分散的雇主阶层无法组成针对码头工人工会的联合阵线，因此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地方工会之间谈判达成了单独的交易（60—75）。这带来了人口、文化和经济性质上的一连串结构性因素，导致激进工会主义更容易产生于西海岸而不是纽约。

这些结构性因素可能在纽约码头上足以扼杀激进工会主义，但在西海岸却几乎不能保证激进工会主义必然存在。基梅尔道夫在题为《策略中枢》的章节中，从相对稳定的结构性条件转向了讨论更具偶连性的势态因素及意志因素。大萧条和新的政治氛围，以及由此造成的全国范围内的劳工斗争性，造成了东西海岸且大致相同的势态。但由于这一时期两地共产党的策略不一，导致西海岸而不是东海岸的工人成功转向激进。旧金山是当时激进码头工人工会主义的中心，当地

的共产党员无视全国总部支持分散的左翼工会的策略，而是在原本温和的工会中发展左派势力，结果使共产党人及其联合的左派分子（如布里吉斯）在1934年戏剧性的暴力罢工中得到领导地位，并使普通成员也明确倒向左派（81—92）。形成对比的是，纽约的共产党固守最终失败的分散的左派工会主义政策，因此在同年的纽约罢工运动中丧失了促使运动激进化的所有机会（92—97）。最终，“大罢工”和“血色星期四”（1934年7月5日）的文化汇编（codification）使西海岸工会戏剧化的激进行动持续了下去，这体现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团体“1934年的抗争者”（’34 men）。他们仍然忠实支持着左派的领导权，在普通工会成员中的声望很高，在码头上建立了广泛的左派工人斗争文化（100—110）。

在我看来，基梅尔道夫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可能在历史社会学中广泛适用的解释或阐释模型，尽管它仍然相当模糊，并没有被理论性地表达出来。这个模型不仅详细提出了多重原因，还整理了不同的因果关系语域（registers）的可能特征：早已存在结构性条件（文化、社会、人口及经济）、势态条件（如20世纪30年代普遍的劳工斗争性），以及偶连的策略性或意志性行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重述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根据持续时段区分的三种历史：结合了改变极其缓慢的地质、地理、社会和心理结构研究的结构史；结合了对长度虽不足百年，但仍持续了数十年的经济和人口周期的研究的势态史；以及结合那些通常被布罗代尔认为在政治中昙花一现，并贬为历史浪潮中的浮沫的事件史（Braudel，1958:1966）。尽管布罗代尔和基梅尔道夫研究的历史在时间尺度上大不相同，但两者的研究图式都有效地区分了时间节奏不同的社会进程范畴。不过，相比于布罗代尔的三种历史类型在各自的因果论宇宙中泾渭分明，基梅尔道夫的因果关系语域却在同一事件中同时出现，事件中人类主体的行动能够重整早已存在的结构和势态，例如为保持国际码头及仓储工人工会的左派主张的、影响力广泛的“1934年的抗争者”这一群体建立基础。同我在此处想要说明的一样，基梅尔道夫的论述也理论性地提出了在以影响人类主体为中心的同一个因果关系宇宙中，兼顾结构、势态和事件的方法。

基梅尔道夫有关大罢工和“1934年的抗争者”如何被抬到了神话的

地位的讨论，带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这个问题仍未被清晰地表达出来（Kimeldorf，1988:109—110）。大罢工的神话部分来自“1934年的抗争者”的行动，他们在工会中不断强调其道德统率地位。但对“1934年的抗争者”的狂热崇拜，也是被工会的一项政策所促进的，该政策规定每年的7月5日都举行停工来纪念那场影响深远的战斗。也就是说，大罢工不仅仅对激进工会的形成有着客观重要性，也在其后的岁月中被激进工会建构成具有主观重要性的事件。尽管基梅尔道夫几乎只是顺带提起这个问题，但他实际上指出了两个关于事件的重要理论观点。第一，基梅尔道夫的论述暗示了对历史社会学来说，事件是怎样被回顾性地挪用于结构的制度化和再生产这个问题，和势态和策略性行动如何从一开始就能引起促成转型的事件一样重要。[16] 第二，“1934年的抗争者”的案例显示出，事件通常是通过组成新的行动者群体并赋予其权力，或是以新的方式重新赋予已有的群体权力来改变结构。

## 事件性的社会学？

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都完成了典范式的事件性历史社会学著作，两者书中描绘的时间性都具有路径依赖、因果异质和偶连性，解释的模式也都以结构被社会行动重整为中心。对主流社会学和主流历史社会学来说，他们的论著都形成了挑战，但这种挑战仍过于含糊。尽管两本书在理论方面的节制是它们在修辞上最为吸引人的特质之一，却也使之被归类为社会学技艺中小小的闪光点而非改变学界的巨著，从而限制了两者的影响力。本章旨在指出两本著作中基本未言明的理论意涵，并展示为何对统治社会学的“科学”正统来说，相比于用目的论和实验性模式且更为自信的历史社会学家的研究，两书的论述能造成更大的冲击。

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创造的这一类事件性社会学，在好几个根本问题上质疑了“科学”的正统观念，隐晦地指出社会学对社会规律的艰苦卓绝的探索是虚幻的，不管探索的是关于所有社会的永恒真理，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必然趋势，还是从某些社会现象中归纳出的法则。

事件性社会学认为，社会进程本质上是偶连的、不连续的和开放的。要完全避免反复无常的地方性社会进程的细小改变对长时段的大型社会进程进行改变，是不可能的。“结构”是由人类行动建构的，而“社会”“社会形态”或“社会体系”则是由其人类创造者的创新和执着不断塑造和重塑而来。

这一切都表明，对社会进程的充分的事件性记述，看起来会更像是精心编造的故事或叙事，而不是物理定律。事件性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会越来越接近历史。出于这样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的著作读来都很像是社会史学家的作品。传统上来说，历史社会学家与其把历史学家看成是真正的学术合作对象，倒不如说是有用的懒汉。历史学家要做的是收集史料和构建叙事这样的烦冗工作；历史社会学家则将这些叙事作为原材料，进行更宏大、理论更复杂的分析。当前世代的历史社会学家已然跟随历史学家研究史料，假如他们要建立一种事件性社会学，必然要更多地从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叙事中得到理论上的启发。

但即便历史社会学应当和历史学进行更多更深入的对话，也要确保自己社会学的身份。应当指出的是，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的叙事和我对这些叙事的理论化，都保留了社会学一直以来对成因的关注，即便两人的研究将“科学的”社会学通常采用的、从极其抽象和普遍的概念化中找出成因和因果关系的做法，转变成日常用语中更独特、更偶连的用法，也就是说某事的因果记述通常意味着讲述某个故事怎样发生，社会学对成因的关注在其中也仍是如此。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的著作说明，被认为是社会学式的对因果规律的关注，对解释事件为何如是发生的可信叙事非常重要。要不是特劳戈特用细致的定量研究检验了他对国立工场和流动卫队差异的归因性解释，他根据组织的历史所作的事件性阐释就不会那么有说服力，而只是看似可信罢了。基梅尔道夫对东西海岸航运业的结构性差异和两地码头工人社会出身差异的分析，为分析组织者运作策略的差异奠定了基础。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两人的记述都结合了多元因果关系语域和不同的时间节奏。他们延续了传统的结构性或归因性的解释策略，且这些策略都被纳入了更大的事件性解释框架之中。

在我看来，选择性挪用社会学传统的论点和方法是恰当的。我认为历史社会学（或许是整个社会学）应该以事件性模式重建，而且这种重建应该坚决与现在的做法决裂。但我也相信，正如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挪用和借鉴了结构性和归因性因果关系那样，只有挪用和借鉴现有的社会学分析模式，才能成功重整社会学。秉持这种想法，我试图通过自己对沃勒斯坦、蒂利和斯考切波的批评表明，采取事件性的方法不需要抛弃所有运用目的论时间性或实验时间性的著作。相反，我尝试揭示出，我们应该怎样重新思考传统的目的论和实验性研究，以寻找目前仍被受曲解的科学性修辞掩盖的、有价值的事件性分析。我认为应该把《现代世界体系》《旺代之乱》以及《国家与社会革命》这些著作重新誉为修辞上有瑕疵的事件性社会学代表作。同样地，与其拒绝比较研究方法，我们应当去除那些不恰当的科学词汇，并重新将之视为是通过回归“发现的语境”，对因果叙事加以理论化的手段。建构事件性社会学需要许多学者对这个学科进行集体再思考。在我看来，此举要想成功，有待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参与同类再思考的学者开展更紧密的智识合作。

我本以为，至少古生物学这样一个当代自然科学分支，和本章所提倡的事件性社会学多少相似。我对此感到犹豫，是因为我认为社会科学自发展之初起，就一直受困于犹豫是否要尝试运用被当作更高等、更成熟的科学学科的方法和解释策略。但社会学与古生物学的相似性看起来尤其有说服力，特别是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在《精彩的生命》（*Wonderful Life*，1989）中所描述的古生物学。古尔德在此书中详细描绘的动物进化，全然是叙事性和偶连的。事实上，他奉偶连性为“一切历史的中心原则”，当然也包括自然史（283）。古尔德还说道，历史学的解释“不基于以自然规律为起点的直接推导，而是建立在一个先前状态不可预知的时间序列之上，其中任何一步发生的任意重要变化，都会改变最终结果。因此，这个最终结果对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即历史不可磨灭的决定性标记，都具有依赖性或偶连性”（283）。由于古尔德坚信科学家要把文学叙事和历史叙事当作自身研究进化生物学的范例，所以《精彩的生命》中所说的那些与自然史的类比才能吸引人。“科学中缺乏对偶连性的理解和探索，而这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的支柱”（285），古尔德如是说，并推

荐了芭芭拉·文（Barbara Vine，真名露丝·伦德尔[Ruth Rendell]）的《致命的倒置》（*A Fatal Inversion*，1987）和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1985）两本小说作为自然史的文本范例。

我在这里引用古生物学为事件性社会学的科学性担保，表明这样的著作仍在科学的神圣领域之内，这大概能有效地围困住主流学者。不管怎么说，用科学性来为某研究程序打掩护的战术或许不可避免，尤其此人只是暂时运用修辞来掩护。但指出事件性社会学和古生物学间相似性的妙处在于，如此 对科学的表面顺从，不仅向社会学，也向科学自身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这一门真实、精确、兴盛的自然科学，有着与历史和小说，而不是和物理学相似的解释模式。引用古生物学的模式，也就是宣扬认知方法的多样性，正如古尔德个人寻求“对科学进行一种新的多元化的分类学安排”所表明的那样。他认为，“除非粉碎从地位（物理位于顶端）得来的等级顺序的窠臼，并把不同形式的历史解释看成和任何物理或化学的一切研究有同等的价值，否则我们永远也不懂得理解科学的全部范围和意涵”（281）。古尔德坚信，严密的因果叙事和数学推导与统计运算一样，都有资格折下科学之桂，这点对社会学和生物学并无二致。

## 附言：宏观历史与事件时间性

我早已意识到本章所展开的论述存在逻辑上的缺陷，也就是我所使用的两个事件性社会学案例，都是对时空上相对局限的社会进程的研究。因此，这些例子不能证明事件性分析对理解大范围或“宏观历史”进程的必要性。那些为我称作目的论时间性或实验时间性辩护的人，或许会同意1848年巴黎的六月革命和20世纪30年代旧金山激进的码头工人工会这样的地方性历史片段，都天生地适用事件性分析，但原因只是这些事件在时空范围上都十分有限。当社会变迁只限于一时一地，研究会认为是当地的特殊性深深影响到变动的结果也并不奇怪。但假如本章所说的社会变迁规模更大、延续的时间更长，那么事件带来的干扰通常会被消去，而潜在或普遍的因果关系将自行表露出

来。我认为，此说的合理性由来似乎与常见的统计学方法论有着某种相似性。基于大量案例得出的统计结论比从少数案例得出的结论更可靠，因为案例中纯粹特异性的变化会得到平衡，让深层的统计学规律得以显现。相似地，某种程度上是由大量微观进程构成的宏观进程中，在具体情境中运作着的、更为根本的趋势也会凸显出来。假如要解释为何旧金山的码头产生了“左翼分子”而纽约的码头上出现的是敲诈犯，我们就得研究旧金山和纽约码头所发生事件的特殊性。但假如我们要解释为何20世纪30年代工会在美国普遍激增，或者是解释为何工会在工业国家中更为普遍地涌现，我们必须要寻找更为普遍的成因。与之类似的是，对六月革命或者旺代叛乱的社会学解释，或许也需要事件性分析，但用这种方法研究1786年到1815年间法国大革命全过程，或是1500年到1800年间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兴起是不可能的。此番推导的寓意在于，尽管事件性分析适用于历史学家尤为偏好的时空范围有限的问题，但面对自韦伯以后历史社会学家偏爱的宏观社会学议题，则需要意在建立普遍法则或可靠的普遍性的真正的社会学 分析。

要反驳上述观点，需要的是在宏观时间尺度上成功且持续地运用事件时间性假设的社会学研究。我想在这篇附言里指出，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令人印象深刻且敬畏的著作《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 of Social Power*，1986, 1993），探索了从史前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权力形式的不断变迁。曼的论述证明，即便在最为宏观的历史层面，即在长达数个世纪的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社会时间性也是事件性的。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一卷里尤为明显，它追溯了从史前时期到工业革命前夕的上千年间社会权力不同形式的发展。

曼的描述表明，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社会形式——包括城市、书写、国家、广泛的劳动分工和永存的社会分层在内的一系列发明——就是宏观时间尺度下事件时间性的力证。这些社会形式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也被普遍认为独立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晚期的埃及、公元前3000年的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的中国、公元第一个千年的墨西哥盆地、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安第斯山中

部，可能还有（此例的独立性仍有争议）公元前2000年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岛。在曼看来，文明的出现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定居农耕作为文明出现的先决技术条件，早在文明出现前数千年已经具备。考古遗迹证明，相对复杂、足以组织大量人力的社会单元（或许该称作原始国家）在史前时代反复出现，覆盖的地域相当广泛，但这样的发展极少突破成为文明。这类考古遗迹包括英格兰的巨石阵、复活节岛的巨大石像，或者是北美洲原住民进行的众多分散的大型土木工事，建造其中的任何一个都离不开大量和长期聚集的劳动力，这暗示了某种相对集中的权威结构的存在（1986:63—64）。但这种程度的社会合作在人类的整体经验中只有五六个事例，并被证明不可逆地引致历史上文明的诞生和发展。考古记录似乎暗示，人类社会曾经无数次推进到被今天的我们视为文明的边缘的位置，却没有跨出那关键一步。通向文明的缺口为何如此罕见呢？

曼的回答强调了文明诞生的偶连性。他认为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中，社会进化似乎有一种普遍的动力在运作，这种动力导致了从狩猎采集社会到农耕畜牧社会的发展，还频繁导致了他所谓萌芽国家和社会等级制度下分化的社会出现，就像早期的欧洲旅行家和晚近的人类学家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一些地方或波利尼西亚观察到的那样。但这些等级分化的社会并没有显示出进一步发展成文明的趋势，其中的大多数随着时间流逝由盛而衰，衰落成看似较为“低等”的、以亲属或村庄为中心的平等主义社会。它们的一般演变趋势是先出现复杂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然后是在城市、文字、国家、广泛的劳动分工和永存的社会分层几近诞生时停滞不前的循环模式。曼猜想，造成停滞的原因是这些社会秩序中的君主或首领缺乏权力资源，这使他们无法对他们的臣民施加持续的权威，也无法建立能永久性剥夺受压迫群体获得资源的权力的分层系统。这是因为被统治者通常可以选择逃离新生的权力关系，可以是自身逃到未来暴君控制范围以外，也可以转而支持可能会给他们更好待遇的另一位首领。除非臣民的肉体被禁锢，以防止他们在不满时逃走，否则不会发展出文明不可或缺的系统性压迫。

只有在极少数例子中，等级社会出现在人民可以被禁锢 的地域，

人们才能被引导或强迫顺从某个君主或贵族的长久权威。正是由此，大多数的原始文明都诞生在受河水泛滥灌溉的河谷：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国来说诚然如此。这些河谷相比其他地区能养活更密集的人口。而一旦引入灌溉，人口将变得十分稠密且依赖灌溉农业，这有效地消除了民众逃离的可能性。这尤其应验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它们周围未经灌溉的地区相当贫瘠，因而无法像河谷地区一样支撑密集的人口。所以当某些家族、部落或王朝成功夺取且维持了征收一部分农产盈余的权力，民众就这样受到禁锢，无法从中逃离。当统治群体的手中得以积累剩余产品，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建造更大的城市、宫宇、寺庙和防御工事，特殊阶层如工匠、僧侣和行政人员也将会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字被发明出来——它起初似乎是为了记录资源的繁杂流向。只有在能禁锢人口的、相当偶然的环境条件下才可能出现文明，而只有进一步加强对人的禁锢的文明，才可能出现集体权力和生产力的发展。但的确是最初的禁锢，让权力技术——如更精细的手工艺、更强大的军事组织、对体现权威结构的神性的认同、对余粮的储藏及再分配，以及通过书写来管理贡品与实施财产权——最终得以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便是在最初环境条件缺失的地区，它们也可以用于禁锢人口和增加集体权力资源。因此，文明最初作为一些河谷居民被偶然禁锢的结果，得以传播到安纳托利亚（Anatolia）、波斯、东地中海、印度次大陆、日本、北非、东南亚、欧洲，并最终遍布整个世界。

这种说法乍一看近似于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诞生的“大爆炸”理论，即最初的突破导致不可避免的进化发展。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大爆炸不止一次，而是五六次，不同原始文明的轨迹也相当多样，从看似屹立不倒数百年然后消失无踪的印度河谷文明，到在不同方面证实是极有活力和扩张性的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次，一个更根本的差异与空间观有关。沃勒斯坦写道，被多数社会科学家贴上了“社会”的标签并作为分析单元的民族国家，一直都是更复杂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单独演进的整体，由此促成了他“现代世界体系”的概念。他对此的解决方法，是分辨出这个更大的“世界体系”，而非指明作为演进中的、有界的“社会”的民族国家（1974:7）。沃勒斯坦否定社会学家默认的“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假设，但他也将许多

民族国家社会的特质，如有界性、单一性、合法性、进化趋势等，套用在地理范围更广的世界体系上。

曼也认识到社会科学家误将社会模糊地等同于民族国家，但他的姿态更为激进：单一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或只存在极限情况。他写道，社会“不是单一的，不是社会体系……不是总体……因为体系或总体并不存在，所以不可能有这个总体的‘次体系’‘维度’或者‘层面’……因为不存在有界的总体，将社会变迁划分为‘内生’变量或‘外生’变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社会体系，所以也无所谓其内部的‘进化’过程”。我们所说的社会，实际上是由“多个重叠和交叉的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构成的”（1986:1）。曼强调了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事四种不同形式的权力。这四种权力网络很少在空间上重合，而是任何时候都具有内在的异质性和空间上的不均衡性（22—28）。这些不同的权力的社会空间网络，只有在一些罕见的历史案例中才高度重合，造成了界限分明和相当单一的社会。现代的民族国家比大多数以前的社会形态更接近这种单一的社会，尽管它们的有界性一直都更多地是意识形态主张，而非组织上的现实。实际上，单一社会的最佳历史范例应该是早期文明之一，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无人居住的沙漠包围着来自尼罗河的狭窄灌溉渠，造成了四种社会权力网络碰巧在空间中重合，从而使一个单一、形式上专制和极为稳定的社会成为可能（108—115）。直到埃及受到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更具扩张性的文明，以及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崛起的航海文明的冲击，这种光辉的孤立才得到终结。所以，只有在文明的曙光照耀到了尼罗河谷这样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中，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同构的权力网络可以存在的有界的社会。而常态则相去甚远：社会并非单一制，而是“邦联制”，其中的权力网络是多样、重叠且异构的（16—17）。

社会是由重叠的组织网络串联而成，而非紧密整合的社会体系，这样的观点要成立，显然是建立在这些网络之间偶连的时间性势态可能存在的基础上，并相应地建立在历史转型可能存在的基础上。换言之，曼对社会关系的空间形态的概念化，与他对社会生活的时间性的思考密切相关。他对文明发展中历史演变的论述，一直紧密围绕着处于不同空间的权力网络之间的变化中的势态。在曼的解释中相当突出

的一种势态，就是不同文明的政治军事核心与通常在文明边缘崛起的“边地领主”（marcher lords）间的关系。这些边地领主们——无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中国文明的边界地区的牧民，还是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日耳曼部落——既是文明核心统治者的重要盟友，又在同时挪用了来自核心的权力技术，在政治不稳定时可能倒戈，成为统治者的危险对手。但边地领主战胜原有统治者的影响在实例中各有不同。在美索不达米亚，自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Sargon of Akkad）时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开始，至少贯穿着1000多年后的加喜特王朝（Kassite dynasty）[(3)]，一系列的帝国衰落、边地领主征服和帝国重建导致了权力发展逐渐的螺旋式上升（130—168）；在中国，大约在公元1000年后，获胜的边地领主迅速地被汉化，并被仪式性地赋予了“天命”（Mandate of Heaven），带来更趋向循环而不是上升的模式（501—502）；在罗马，至少在西罗马帝国，日耳曼蛮族部落的胜利导致帝国权力全面溃败和持续的经济社会权力下放（292—295）。尽管边地领主在哪都造成混乱，他们与文明核心间关系的影响在每个事例中都取决于其特定的生态、组织形式、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

第二种组织网络的历史势态被曼称为间隙性（interstitial）意识形态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出现所依靠的网络，既要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官方走向，又要与之不同。例如，由许多政治上独立但有商贸往来的城邦国家组成的希腊文明，普遍主义的科学和哲学思考的繁盛（206—207，211—216）；在逐渐分裂不同敌对王国的印度，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发展（348—363）；在贵族政治和专制的罗马帝国，基督教通过城市贸易网络这一媒介发展传播（301—335）。如果说文明核心和边地领主间的空间—时间动力学具有核心—边缘的形式，那么间隙性意识形态的兴起，就必然要解释有可能相互重叠却分别形成的权力网络如何同处一个文明空间。而这些间隙性意识形态的历史命运显然极为不同。根据曼的说法，印度教促成了高度静态的印度文明，基督教造成了罗马的衰亡并继而成为极具活力的欧洲文明的外衣，而希腊思想则陆续或同时成为了罗马精英意识形态的关键元素、基督教神学的哲学框架，以及阿拉伯思想及其后欧洲思想中活跃的科学发展的基础。

我列出的事例足以证明，曼的宏观历史与我所谓的事件时间性概念相一致。他的宏观历史无疑认同全局偶连性，且事实上展示了偶连性如何从发展不均衡、相互重叠的异构权力网络中不断涌现，混合了路径依赖与本质上受制于早前偶然事件发展的文明的后继历史。而且，他的因果性在时间上是异质的，例如，构成“文明”的权力网络一旦形成，在有效禁锢人口之前，本可以导致集中的权力资源的崩溃和消散的民众不满水平就达不到这种效果。或者当萨尔贡大帝证明正确部署5400人的正规军就可以征服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军事力量第一次位于文明发展的前沿，并在后来整整一千年中都保持了这种地位（133—155）。

从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曼有强烈的历史时间不可逆转的意识。这也的确使他有力地批评了许多同辈的历史社会学家，他认为后者把来自不同时代、具有不同权力发展水平和动力的政权一视同仁（167—174）。他明确指出，这些历史社会学家的问题在于不够历史学化。他说：“我对古代帝国的比较社会学方法论的批判，不是‘典型历史学家’式的、认为每个事例都是独一无二的反驳。尽管这一点是对的，但它不能阻止我们比较和概化。相反，比较分析应该也是历史学式 的。每个事例都随时间发展 ，其动力本身也是我们对其结构的解释的一部分。”（173—174）尽管在我看来曼在他的研究中极其熟练地运用了比较，他仍坚称自己首先是历史 社会学家，而非比较 社会学家。他运用比较，不是用来提出适用于一些被视为对等的事例的因果规律，而是借此寻找能帮助他更好地理论化和解释每个事例中历史变迁的相似性。因此，他通过研究罗马和马其顿军队的后勤来探讨早期阿卡德军队军事力量的能力和局限（139—140）。他还通过证明希腊重装步兵军事编队确实不同于所有之前或之后的军事创新——比如，曼提到萨尔贡大帝的物资供应所、战车、备有马鞍和马镫的骑兵、瑞士人的长矛方阵，还有火药——不可能被他们的对手（此例中是波斯人）利用，提出了这种军事编队对城邦政治社会团结的独特依赖性（202）。在我看来，曼以我所认同的方式运用了比较方法：提出命题，并由命题揭示已知事例中相似因果过程的势态性展开的能力来检验其潜在普遍性。

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圆满地证明了对宏观历史研究而言，事件时间性的概念和研究更为地方性的发展一样必要。但也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该书提出了特劳戈特和基梅尔道夫的著作中没有提到的一些问题和观点。首先，如我之前所言，曼的研究指出了不同时间和空间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使我相信，事件时间性的概念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概念是由多重的、不均衡且相互重叠的异构网络构成，而不是由社会体系构成。其次，通过极大地拓宽历史社会学的时间跨度，曼的研究提出了有关事件的关键范畴的疑问。他诚然认识到，一些会被历史学家立刻辨认作事件的日常发生具有宏观社会学意义，正如萨尔贡大帝征服苏美尔人的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是希腊人在温泉关击败波斯军队。但当有人探究的对象跨越上千年的时间，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眼中的一些渐进的过程或趋势，便看似事件。例如导致文明最先出现的最早的人口禁锢，或是冶铁技术在安纳托利亚、欧洲和地中海的发展，这些用了几个世纪才完成的进程，标志着与先前历史的决定性断裂，带来了偶连却影响深远又不可避免的结构转型。这说明“事件”这个理论范畴的时间性并非显而易见，而是必须考虑被研究之进程的时间规模来进行理论建构。

曼的著作所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历史变迁的方向性。历史学家对归结长时段的方向性尤其谨慎，因为这似乎带有19世纪思想中常见的进化目的论的味道，并且我认为这在当代历史社会学中也一样存在。曼彻底批判了历史进化论，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这些理论在定义上视有界的单一社会或社会体系为基本单元。但他对进化论的厌恶并不表示他回避方向性问题。实际上，他的主要疑问之一，就是在特定文明和全人类的整体历史中，权力资源如何发展 。他试图在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农业社会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中给出一个有效的答案（518—541）。首先，他观察到权力资源增加的整体趋势，至少从文明最初的突破时开始。自此以后的千年中，权力资源不仅倾向于扩散到更广泛的区域（因为复制到位于边缘的人们身上），也在广度和强度上有所提高。发展的趋势不是单调的，在世界上一些区域中无疑有着重大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倒退，但全球人口早在随工业革命出现爆发之前就普遍呈长期上升趋势，这证明总体来说人类力量倾向于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一旦被发明，主要的基础技术

（infrastructural techniques）似乎就不可能再从人类实践中消失”（534）。曼从中告诉我们，社会权力随时间而积累。

但在不同时空中，权力发展的模式在动力和节奏上大异其趣。“历史意外”使发展总是偏离着任何预定路径（531—532）。历史有着不同形态，“只是因为真实的男人和女人利用着 模式。他们试图通过建立有着不同但模式化的种类和强度的权力机构来掌控世界，并且增加自己在其中的酬劳。这些权力纷争就是历史的主要模式，但斗争的结果通常势均力敌”（532）。纷争造成的模式因循时空各异。最终，曼的著作像许多别的研究一样，旨在探究宏观历史社会学家苦苦追寻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在西方出现的理由。因此，他对不同文明中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发展动力极为敏感——如将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活力与早期埃及惊人的稳定性进行比较，或是将种姓支配下的印度社会的稳定性与封建欧洲长期的经济发展活力进行比较。他对各种文明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精彩、丰富且一向是事件性的分析。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解释欧洲力量的崛起的某些方面有所怀疑，但这将会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然而曼绝对说服了我的地方，是事件性的社会学不应、实际上也是不得 回避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我们必须从目的论中努力夺回这个极其重要的宏大问题，而且要像曼在这本大胆而有力的著作中尝试的那样，对它进行真正历史学的事件性分析。

注释：

本章的同名简短版本曾经发表于密歇根大学出版社的*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Terrence J.McDonald。Copyright©1996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获得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准许后再版。在此，我向尼克·德克斯（Nick Dirks）、拉里·格里芬（Larry Griffen）和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对本章较早版本提出的宝贵意见致谢。

1 ．自由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家的著作，如Reinhard Bendix（1956，1964）和Neil Smelser（1959），对目前世代的学者影响远不及摩尔、蒂利和沃勒斯坦，这证实了我的想法，即社会学的历史转向，根源在于国内外政局的某个特别时期。有关20世纪60年代

的政治对年轻社会学家影响的自传式表述，请见Theda Skocpol（1988—1989）。

2 ．“左派韦伯主义”（left Weberian）一词来自特里·博斯韦尔（Terry Boswell）。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成立伊始，在定位上就是明显的韦伯主义。从1983年开始，新一批学者渐渐掌控了这个分会，并将其引向民族国家的宏观政治社会学。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社会学学会余下的，尤其是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那些分会，都包括了许多从事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家。

3 ．少数涉足这一概念的社会学家包括Abbott（1988，1991，2001），Hall（1984），Aminzade（1992）和Griffin（1992，1993）。

4 ．“eventful”一词是法语中*événementiel* 的英语化。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片段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 ）的概念，尤其是布罗代尔，他对比了片段史、结构史（*histoire structurelle* ）和势态史（*histoire conjoncturelle* ）（1958，1966）。布罗代尔认为，片段史这个术语很大程度上被滥用了。我跟循马歇尔·萨林斯的著作（1991），尝试恢复这个词语的本义。但是萨林斯对同一词的英语改写与我不一致，他所用的evenemential在我看来显然不是英语词汇。[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1年出版的《否思社会科学》中，对于*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 和*l’histoire conjoncturelle* 两个词的英译进行了讨论，分别将其对应为episodic history和cyclical history，见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 ,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36。尽管本书通篇以事件史作为由年鉴学派提出的*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 的对应解释，但译者认为，沃勒斯坦的分析更能抓住这个词的本义。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一书中，也并未纠缠于特定事件，而是以事件组或者说是历史片断为研究的对象。“片段史”比“事件史”更能体现出传统史学研究侧重历史的特定“截面”而非“结构”，这与拘泥于“事件”并不等同。在后文涉及年鉴学派对*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 的讨论，本书将以片段史（episodic history）译出，但凡是休厄尔的解读，以事件史（history of event）译出。

——译者注]

5　．在保守/前瞻的二元对立中，“前瞻”意味着“进步”，就应该得到拥护，而“保守”代表着必然被舍弃，这种判断有时不仅是不合时宜的，还带有道德取向。最为少见的、但在我看来更容易接受的是两个词语的字面意义，即“保守”仅仅只是标志着那些运动在明确模仿着它们观念中过去的历史状态，而“前瞻”者也只是在跟从想象中的未来。但目的论严重损害了这种二分法，如被其认为是“前瞻”但实质上保守的运动如文艺复兴，或是被其视为“保守”实则前瞻的运动如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这样的目的论只会造成误解。

6　．Tilly（1964，1969，1972a，1972b，1977，1981，1986）；Tilly，Tilly，and Tilly（1975）。

7　．蒂利在他进行研究的近二十年间不止一次改动过术语，但关于暴力的范畴化仍然深藏其下，贯穿始终。有关更详细的讨论，请见Sewell（1990a）。

8　．受良心驱使，我要将这个恰如其分的说法归功于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读于伯克利分校时，他在一次有关欧洲思想史的讲座中如此形容不断发展的资产阶级。

9　．在她有关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巩固私人财产而俄国和中国革命完全相反的讨论中，对中介事件的回避意图更是让她陷入混乱（见Sewell 1985a，59）。

10　．比方说，假如在一片玉米地上进行施肥实验会提升泥土中有益细菌的浓度，第一次试验已经完成，且对土地有着正面影响，那么在同一片土地上进行的第二次实验结果不可能与第一次试验无关。

11　．布洛克的比较方法也曾支持这类我所批评的实验性逻辑。关于他这方面的观点，请见Sewell（1967）。

12　．我与Burawoy（1989:778）的结论几乎再次不谋而合，都认为斯考切波的研究越是偏离她所宣称的方法论，就越为有效。

13　．多元因果叙事的上一个范本可能来自Lefebvre（[1949] 1971），其中详细描述了四种不同的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

命、市政革命及农民革命——的总和即我们所说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或许有人会对列斐伏尔的著作如何影响了斯考切波感兴趣。

14 ．对传统比较方法的批评应该归功于我和丽贝卡·斯科特（Rebecca Scott）、佩姬·萨默斯（Peggy Somers）的对话。

15 ．我将在第七章中提到，Marshall Sahlins（1981，1985，1991）在理论上极其清晰，且最为生动地阐明了这一点。

16 ．关于政治和文化建构与重构事件的启发性研究，见Coronil and Skurski（1991）。

---

(1) 这对概念是滕尼斯提出的两种不同社会分类，首见于他在1887年发表的作品*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Leipzig: Fues's Verlag），亦可直译为“共同体”和“社会”。—— 译者注

(2) 这是指1793年9月5日到1794年7月27日期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统治者，对他们怀疑会对抗革命的人（主要是教士和贵族）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最终约有17000人被处死，超过30万人被捕。—— 译者注

(3) 亦有译作喀西特王朝。—— 译者注

# 第四章　一种结构的理论：二重性、能动性与转型

“结构”是当今社会科学的语汇中最重要、最难以解释的一个术语。它不仅是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类名目相似的学派的中心概念，也在社会科学的所有思潮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不过，哪怕社会学家认为它不可或缺，我们也会发现对它作出一个充分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中许多人都曾被“菜鸟”学生追问“到底什么是结构”，然后尴尬地发现，如果不采用结构这个词本身或者它本身定义中的变体，定义它相当之难。有时大家发现似有一差强人意的同义词——例如“模式”（pattern）——但这类替代品完全没有原装货的修辞力量。很明显，当需要指出某种重要有力的联系时，使用“结构的”（structural）显然比“模式化的”（patterning）更具说服力。

结构这一术语赋予了它的所指以权力。主格意义上的结构一直也包括其作为及物动词的意义。只要将社会生活的任一方面命名为“结构”，便是假定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正在被它“结构着”——无论是结构着不同政见的阶级，结构着工作机会的社会性别，还是结构着文本与言说的修辞习惯，抑或是结构着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结构作为社会科学的话语中的转喻利器，无论是用来识别复杂社会现实的某些部分还是解释其整体，全都无往不利。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这个词威力巨大。事实上，结构更像是社会科学（和科学）的话语中基础性或者认识论的隐喻，而非某一确切概念。[1] 故而，没有一个正式定义能够确定这个术语的含义：不管理论家如何尝试，结构的隐喻始终在社会科学知识的构成中发挥着重要而又神秘的作用。

然而，这个术语当前的用法中，似乎仍有三个问题有必要讨论，以对结构的含义进行自觉的理论化。第一，最基本的是，根据结构性或结构主义的论调，结构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太过严苛的因果决定论的假设。也就是说，被命名为结构的社会存在的特点往往被物化，成为基本的、坚固的、不可改变的支架，就好比房屋大梁，而它们所结构的事件或社会过程则往往被视为次要的和浅层的，如摩天大楼的“外

装修”一般，或者在“硬性”结构的约束下是可以改变的，就像房梁所界定的楼层中可变的办公室布局。而在结构的语言中容易被忽略的是人类行动的效力或“能动性”，后一种说法似乎在今天更受欢迎。在社会科学话语中，结构往往不受人类能动性影响，且往往独立于、又同时形塑了构成社会生活经验表面的种种斗争和动机驱动的交换（transactions）。陷进未经检视的结构隐喻里的社会科学，往往会把行动者简化为程序精巧的自动机器人。第二个与结构的概念紧密相连的问题是，它增加了处理有关变迁的问题的难度。结构的隐喻意味着稳定。因此，结构式语言只能解释社会生活怎样被形塑成始终如一的模式，至于这些模式如何随时间变迁则不予讨论。结构话语往往将变迁置于结构之外，例如历史的终结、衰落的观念或者来自系统外部的影响。由此，从有关稳定的问题转向有关变迁的问题，往往涉及棘手的认识论转向。

第三个问题则关乎不同秩序：在不同社会科学话语里，尤其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结构一词的意义正好相反。社会学家通常将“结构”与“文化”对立起来。社会学中的结构通常意指“硬性的”和“物质的”，从而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和决定性的，文化则被视为“软性的”和“精神的”，故而被视为次级的或衍生的。反之，倾向符号学的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将文化视为结构的所在。在人类学语境中，除非被“社会的”这个定语限制，结构这一术语通常指的就是文化领域。结果，如西达·斯考切波和马歇尔·萨林斯这样见解极为不同的学者，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都被称作“结构主义者”。一言以蔽之，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结构一词的定位和定性方式截然不同且无法相容。[2]

此三大问题甫一提出，似是要循循善诱说服大家放弃使用这一难缠的术语。然而我认为这绝无可能：结构的无处不在和修辞能量之大，让我们根本无法废除它。再者，无论面对多少争议，结构的概念还是指明了社会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便参与社会关系的行动者并未意识到社会关系模式的存在，或无欲再生产它们，这些关系模式依然有被再生产的趋势。我认为，我们不可能且不应该从社会科学话语中取消结构这一概念，但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反思。本章即意在发展一种结构的理论，以克服上文讨论的当结构被用到社会科学之后

通常会产生的三大弱点。这一理论试图：（1）重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2）将变迁的可能性融入结构的概念中；（3）克服符号学与唯物论对结构的两种视野之分歧。我打算对现存阐述中最可靠的两种（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the duality of structure]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的概念）的批判、重建与阐述开始，发展出一套更为完备的理论。[3]

## 结构二重性：吉登斯理论的批判和重建

安东尼·吉登斯为重建近来社会理论中的结构的概念而花费诸多努力。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他便强调结构必须被视为“二重的”（Giddens，1976，1979，1981，1984），意指“结构是构成社会系统之实践的媒介和结果”（Giddens，1981:27）。结构形塑了人的实践，但也正是人的实践构成（并再生产）了结构。由此看来，人类能动性与结构远非对立　，而是互为前提　。结构由那些吉登斯称为“有认知能力的”（knowledgeable）人类能动者（即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何去做的人）实行，而能动者亦通过实践那些必然被结构化的知识来行动。因此，“不应该简单认为，结构只是在人类能动性上施加约束，它也使人类的能动性得以可能”（Giddens，1976:161）。人类能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和“得以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创造性或创新性地运用由结构形成的能力。倘若有足够多的人甚至只需要有小部分力量强大的人以创新的方式行动，他们的行动就有可能改变赋予了自己行动能力的结构。如此，二重结构是潜在地可变的，故而吉登斯顺理成章地将他的理论称为“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通过这一新词强调应该把“结构”视为一个过程，而非稳定状态。

作为一名理论自觉的社会史学家，我对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心有戚戚焉。过去四十年来，许多优秀的社会史研究都隐晦地采用了类似吉登斯的理论，这些社会史学家也在这些实践中大大改变了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向社会学和人类学借鉴的关于结构的概念。哪怕他们在写作中的职业本能多于理论考量，这些社会史学家都证明了在极为

不同的时空中，结构都是二重性的：历史能动者的观念、动机和意图是如何由他们所在的文化和社会机制构成的，而这些文化和社会机制又是如何由被结构形塑和约束的能动者的行动再生产，以及在特定情况下，能动者如何能够（或被迫）以由结构形塑的方式进行即兴表演和创新，而这些方式又有力地重组了构成它们的结构。通过理论批判，他试图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同现象学、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调和起来，借此达到目的；不过，吉登斯本人对社会史学家的工作缺少兴趣。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概念为社会史学家（以及近年来那些历史社会学家和历史人类学家）的研究实践提供了理论保障。

## 结构是什么？

吉登斯的理论虽被广泛应用，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逻辑问题。其中，最惊人的缺陷是作为理论中心术语的“结构”远未被说透彻。不同于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吉登斯并未全无这个术语的定义却还要使用它，让它在读者的头脑中一如既往地发挥魔力。在《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一书里，他特别详细地讨论了“结构”。但是我并不认为他在这本书或者其他地方阐述的“结构”定义足够清晰有力到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吉登斯在好几部作品中为结构作了正式定义，比如在《社会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的术语表中，他写道：

> 结构：递归地（recursively）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结构只作为记忆的痕迹—— 人类认知能力的官能基础，以及行动中的实例化而存在。（1984:377）

吉登斯的定义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规则和资源”看似简单直白，实则相当晦涩，值得我们花一定篇幅讨论。让我们从定义里其他的部分开始吧，虽然它们看起来也挺难懂，不过含义上却直接多了。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系统”，是指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的、相互纠缠或者相对有边界的、超越时空连接不同个人的社会实践。社会系统

应当包含大部分社会科学家所说的“诸种社会”，当然也包含了比民族国家更大的（例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范围更小的（例如街区共同体）社会单元。吉登斯认为，社会系统无法脱离构成它们的实践而存在；而这些构成社会系统的实践也由结构“递归”（重复）的实行（enactment）再生产出来。结构不是构成社会系统的模式化的社会实践，而是模式化实践的准则 。故吉登斯在其他地方说，结构只具有“虚拟的”（virtual）存在（如1984:17），它不在时空中具体存在，而只能作为“记忆的痕迹——认知能力的官能基础”（即作为人类脑中的观念或图式）或是“行动中的实例化”（即付诸实践）而存在。

## 结构作为规则

这样一来，结构是“虚拟的”，也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中。不过这些结构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吉登斯在定义中指出，它们是由“规则与资源”构成的。吉登斯理论中规则的概念，很大一部分来自法国结构主义思想。这尤其体现在他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与《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当中。在这两本书中，他相当倚重与索绪尔的语言学进行典型的结构主义类比。吉登斯用索绪尔提出的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间的差异类比结构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据此，结构和实践的关系就像语言（生产符合语法的句子的抽象规则）和言语（口头表达或真实句子的生产;1976:118—122）。由此，结构确如语言，是“虚拟”存在的复杂规则，而实践则确如言语，是这些规则于时空中的实行。对法国结构主义学者来说，结构就是这种规则的综合。例如，结构可以意味着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能让二元对立构成神话（Lévi-Strauss, 1963a）。在《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中（1979:62—64），吉登斯表示他所说的结构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相近。但他也试图将自己与法国结构主义学者区别开来，强调结构必须“束集”（bind）时间和空间，因此结构不应该只被定义为规则，必须还包括“资源”（1979:63—64）。然而吉登斯还是没讨论清楚他所说的规则，也未能真正给出在实际社会实践中运作的规则实例。我们只知道他在这本书中告诉大家规则是虚拟的，并且以某种方式生成了社会

实践与社会系统。

在之后的另一部理论著作《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进一步远离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规则概念。这时，他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对规则下了一个虽然简单，但在我看来极富价值的定义："我们不妨将结构视为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实行／再生产的可概化的程序（generalizable procedures）"（1984:21）。规则作为可概化的程序，自然也就囊括了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转换的规则，也意味着规则可能包含大量不同类型。但吉登斯还是没有向我们说明可概化程序的例子并将之分类。这就导致相比《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一书，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的规则概念更为贫瘠，至少前者还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作了类比。不过，我认为他"可概化的程序"这一维特根斯坦式的规则定义，为一个更全面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贯穿其理论，吉登斯始终强调了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 。他假设有关规则的知识使人类得以行动。但吉登斯并没有用一个特别的术语来形容人类所知的内容物 。我想，这个词已经在吉登斯完全忽视的文化人类学领域里发展得相当成熟。社会科学领域常用"文化"这一术语来概括"人类所知"，而最致力于研究文化、并对其进行理论化的便是那些人类学家了。吉登斯认真对待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就是一员，但列维-斯特劳斯真正关心的是更为深层和普遍的结构，他试图通过连续抽象来最终抵达人类大脑自身的结构。反倒是那些被列维-斯特劳斯深深影响的结构人类学家（见如Sahlins，1976，1981，1985），更多地将其寻找反复出现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方法用于解释特定人群的假设、实践与信仰，而不是追溯"野性的思维"或"人类大脑"结构中的对立。

我们不应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深层结构就浅尝辄止。我和大部分人类学家一致，都认为规则存在于多种层面。接近表面的规则可以被定义为"浅层的"（superficial），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对社会生活不重要。"社会生活的规则"应该包括人类学家已在研究中揭示的各种文化图式，这不仅包括构成给定社会的基本思想工具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习俗、方法、剧本、行动的准则，以及由这些基本工具建立的言语和姿势的习惯。[4] 的确，"规则"并非特别合适的说

法，很像是某种被形式化声明的规定，类似于那些法规、格言、礼拜、章程或合约所言，但我觉得它更似形式化声明背后的、非形式化且往往是无意识的图式、隐喻和假设。[5] 我认为那些公共制定的规则的汇编实际上更应被视为“资源 ”，而非吉登斯所指的虚拟的“规则”。因为“规则”一词本身的歧义性，我觉得有必要改变术语。相较之下，“图式”（schemas）比“规则”更合我意，虽然它打破了吉登斯的“规则与资源”（rules and resources）这一押头韵的美妙搭配。

用吉登斯的话来说，组成结构的各种图式，“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实行／再生产的可概化的程序”。之所以是“可概化的”，是因为它们可以被应用或延伸至不同的互动语境之中。如此图式或者程序——比如礼仪规范、审美标准，抑或是王室巡行、粮食骚乱、民主选举等群体行动的套路，甚至是一组对应关系，如干燥和湿润、男性和女性、自然和文化、私人和公共，乃至作为等级隐喻的身体、人类由灵与肉构成的概念——这些都不该只用于初识或者常规运用的情境中。它们可以被概化，即被转置（transpose）或延展到机遇带来的新情境。我们必须认为图式是虚拟的，正是因为它的可概化性 与可转置性 。我们称其是虚拟的，即是说它们不可能被还原为任一特定实践或任一特定时空位置中的存在：它们可以在可能是广泛的、且不可预先决定的情境中现实化。

因此，我同意吉登斯的观点，即组成结构的规则或图式应当被定义为“虚拟”的存在，结构由主体间可及的、能被现实化或被实践于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程序或图式构成。我们应认为这些图式在极为不同的层面运作着，贯穿了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深层结构，以及相对浅层的礼仪规范。

## 结构作为资源

吉登斯小心地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概念保持距离，当然部分是因为后者对社会实践问题漠不关心，例如权力、支配和社会变迁之类的问题。极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吉登斯强调结构并非只是规则，而是资源和规则，或“规则—资源系列”（rule-resource sets）

（1984:377）。可是吉登斯对资源概念的理论说明比他对规则概念的论述更不完整。[6] 我同意他所说：如果忽略了权力的不对等性，那么任何结构的概念都是非常片面的。但是，由未经完善定义的资源概念转向本质上以规则为基础的结构概念，只会造成更多困惑与疑问。

在《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里，吉登斯（1979:92）如此定义资源："在社会互动的例行进程中，转换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成为权力所需的媒介。"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个晦涩的定义可以转换成较易理解的表达："资源是指社会互动中提供权力来源的一切事物。"这对我而言更平实而理论性不足，但更贴近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源。除了这个枯燥的定义，他对资源的论述只剩下资源可以被分成两种类型，即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该书中，他将"权威"（authorization）定义为"向人发号施令的能力"，而"配置"（allocation）则是"向物 或物质现象发号施令的能力"（1979:100）。如此，权威性资源即指人力资源，而配置性资源则是非人力资源——这看上去又朴实无华了不少。

我觉得吉登斯对资源的分类十分有用，不过还须我们用更平实的语言重新整理一遍。资源有两种类型，分别是人力资源与非人力资源。非人力资源一般是自然生成或者人造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人力资源则是指力气、机智、知识、情感承诺，也包括获取、保持、控制和传播人力或非人力资源的知识。这两种资源都能够被用来保持或增加权力，也都是权力的媒介，且分配不均。但无论分配如何不均，一定部分的人力与非人力资源是被所有社会成员掌控的，不论这一部分多么贫乏，受到多大的压迫。这样说来，假设人类作为能动者，实际上也就是假设他们被这样或者那样的资源的获取赋权 。

## 结构作为图式与资源

重整吉登斯的资源概念，并不能足够清楚地显示出资源和图式是如何结合形成结构的。在这里，最明显的问题是吉登斯将结构定义为"虚拟的"。诚如前文所言，这对被构想成是规则或图式的结构而言说得通，但资源 是否也是"虚拟的"呢？让人惊讶的是，吉登斯似乎并

没有考虑到这点。虚拟性资源的概念在涉及非人力资源时（也就是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格外让人困惑。非人力资源无疑包括了资本家拥有的工厂、国王或将军囤积的武器、农民租用的土地，或是夸扣特尔（Kwakiutl）酋长手头堆积如山的哈德逊湾公司的羊毛毯（Hudson Bay blankets）[(1)] 等物。这些工厂、武器、土地和羊毛毯在特殊的时间与场合，毋庸置疑是形塑和约束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某种方式将这些纳入结构的概念也算合适。但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些物质资源如何被定义为“虚拟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在时空中确实存在的。况且，只有在特殊的时间、场所与数量要求之下，这些实物才能够成为资源。

这在人力资源中也一样不够明确。从定义上说，和其他实物一样，人类身体不可能是虚拟的。不过，知识或者情感承诺，也就是人力资源的精神层面的情况又如何呢？例如罗马天主教的牧师祝圣饼酒和聆听告解的权力，子女对母亲的义务感，臣民对君王的恐惧与崇敬。不同于工厂或是哈德逊湾公司的毛毯，上述资源远非物质的，至少跟前者不是同种性质的东西。但我认为这些也是与虚拟相对的现实之物。它们也确实存在于吉登斯所说的“时空”中，是生活在特定时间、聚集在特定场所中的现实人群身上种种可被观察到的特性。正是它们在人们的心灵与身体上的现实化使之成为资源。赋予国王权力的并不是国王的权威这种非具身的概念，而是臣民真实的恐惧与崇敬。

如果资源如我所说那般真实而非虚拟，那么吉登斯的结构定义就自相矛盾了。倘若结构是虚拟的，它就不可能同时包含图式和资源；倘若结构真的同时包含了图式和资源，它便不可能是虚拟的。两者不可兼得。怎么解决这个结构概念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回到吉登斯结构主义的出发点，并主张结构只是指规则或图式而不包括资源，而将资源视作结构的效用（effect）。这样一来，结构的虚拟性得到了保持，具体的资源分配也不再属于结构的范畴，而是由结构也就是文化图式驱动与形塑的媒介。

我们有理由认为人力资源是图式的产物。一定数量的士兵生成的军事力量多寡和风格的决定因素，包括当下的战争传统（如骑士守则）、将领可以采用的战略战术，以及这支队伍所服从的训练体制。

牧师从图式中获得的祝圣饼酒的权力在两个不同的层面运作。首先，牧师受到的训练使他精通各种或隐晦或直白的知识以及自控的技术，以便成功扮演这一角色。其次，授圣职礼让其拥有神职人员的神圣性，通过大主教的覆手，仪式运用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的力量赋予他奇迹的能力——在祝圣时把面包和葡萄酒化作基督的体血。对君主的恐惧与崇敬是关于王权在宇宙中功能的基本概念的最好体现，这种概念从社会各层面的多种多样的话语与仪式便可窥见一斑。同样，子女对母亲的义务感则深植于自然纽带、养育和服从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家庭生活各种常规，或是布道、格言、小说乃至政治理论中都能体现。这些例子皆证明人力资源可以被视为文化图式实行的体现与产物。

当我们清楚说明人力资源是规则或图式所生成的产物时，会发现很难解释非人力资源也是被如此生成出来的。工厂、土地与羊毛毯的物质属性显然不是图式生成的产物。但实际上它们作为资源，能够生产或再生产相当大的社会权力差异，超出了它们固有的物质存在。它们作为资源，很大一部分是图式所指示的用途的结果。举个再明白不过的例子，如果单看大量囤积哈德逊湾公司的羊毛毯的做法，无非是出于为许多人冬日保暖的考虑，与构成夸扣特尔人夸富宴（potlatch）的文化图式并无关联。但如果结合相关图式就会发现，在夸富宴大量分发毛毯成为了一种对酋长权力及其带来的获得威信、联姻、军事力量和劳力的权力的展示（Boas, 1966; Sahlins，1989）。在这个案例中，图式构建的夸富宴决定了作为资源的哈德逊湾公司的羊毛毯所具有的特殊价值、范围与效用。但我认为非人力资源都是如此。比如，工厂生成的资源所涉的范围和种类，取决于工厂是个人资本所有还是工人合作社所有，换言之，取决于确定财产权和工作地点权威的性质的规则。农民从自己使用的土地上挣得的资源，是由土地占有制的惯例、习惯法法条、亲属间的义务和使用的农业技术决定的。这样的例子应有尽有。非人力资源的物质存在不能化约为规则或图式，但文化图式影响了非人力资源的社会用途，把物质活化为资源，决定它们的价值和社会权力。

由此可以清楚说明，资源可以被视为文化图式的效用。因此，我

们可将吉登斯的结构概念弃置一旁，相对地，应当把结构定义为纯粹虚拟存在的图式，并把资源定义为结构运作的媒介和结果，而不是结构概念中与图式同等的元素。不过应当注意，倘若我们使用如上定义，结构这一术语的修辞力量便仅指向因果关系。如是命名会赋予结构这个术语对不被称为结构之物的权力。大量的物质商品、人类知识与情感承诺都不发挥作用，仅仅是文化图式决定性运作的媒介和结果。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说结构是虚拟的，则会陷入一直困扰结构主义的事实上的唯心主义之中，不论列维-斯特劳斯（1966:130）等结构主义的拥趸如何宣称自己的唯物主义证据和意图。图式，亦即是心理结构，成为唯一能够赋予形式的实体，而能动者仅是这些心理结构的能动者，行动者只能背诵既有脚本。以这样的方式定义结构，有否定了它的二重性的危险，也就彻底丢却了吉登斯理论的核心前提。

## 图式与资源的二重性

如果要保留结构二重性——我相信这是吉登斯该理论中最具诱惑的一点——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认为结构具有一种（恰当的）二重性。也就是说，结构同时由虚拟的图式和实际存在的资源组成。

如果照此理解结构的二重性，那么图式必定是资源的效用，资源也一样必定是图式的效用。在我看来，这个立论是合理的，并且用一些例子就可以说明。一个工厂不应只是由砖块、木头与金属无生命地堆叠而成的，亦结合并现实化着图式，也就是说，通过工厂的具体物质形式即可推断出图式。工厂大门、打卡点、流水线设计等，所有这些工厂的特点都展示并实现了资本主义契约的规则。再拿牧师做弥撒的例子来看。牧师把饼和酒转化为基督的体血，兼送圣饼给领受者，领受者即充满了灵魂的安宁。由此，圣餐向领受者呈现了使牧师成为牧师的使徒统绪规则的现实与权力。简而言之，如果资源是图式的实例化和具身化，它们便也灌输（inculate）和确证了图式。我们要像解读　文本一样解读资源，从而让被资源实例化的图式得以呈现。的确，无论是小说、法典、民间故事还是合同，从这个理论角度看，这些文本皆为资源，也是图式在时空中的实例化，能被行动者用来生成权力。

如果资源是图式的效用，那么图式也是资源的效用。倘若图式在时间中被维持或再生产——倘若失去维持性再生产就不能被称为结构——它们必须通过其实行中出现的资源积累才能得到确证。如果图式不再经由资源赋权和再生，它们则有可能被最终抛却或遗忘；同理，如果资源不在文化图式的引导下使用，它们则会最终衰退消失。只有成系列的图式与资源相互需要并相互支持时，才能够说是由它们构成了结构 。

## 二重结构的转型：超越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

结构同时由图式与资源构成这一定义，能同时避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和传统法国结构主义的精神决定论，却无助于我们快速理解何谓结构转型。确实可以说，图式的实行通常创造了灌输图式的资源，资源与图式应永恒不变地相互再生产下去。二重性结构造成停滞（stasis）的论调早就不新鲜了，此说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1977）中有关“惯习”的流传甚广的讨论中得出，且辞藻华丽。乃至于每每要提出结构二重性其实也有助于理解社会转型的观点时，我们都必须挑战此论调。[7]

## 二重性与停滞

布尔迪厄虽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还是有力描绘出图式（他称其为“心智结构”[mental structures]）与资源（他称其为“物的世界”[the world of objects]）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例如，在有关卡拜尔（Kabyle）民宅的著名讨论中，他展示了房屋设计与内部物品摆设如何再生产了卡拜尔文化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如高和低、男和女、火和水、光和暗，以及这些对立如何对住宅中开展的一切活动加以模式化。布尔迪厄指出：“在以此方式构造的空间之中，所有的行动都会被立即赋予象征性，而对基本图式的实践性掌握赖以建立的大量结构性练习就是其功能。”（1977:91）

图式（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心智结构”）的应用赋予住宅的形

式，而住宅则反过来通过把任务、物品、人员和情感特质分配到编码不同的空间中，无时无刻地灌输着图式。正如布尔迪厄用他标志性的华丽而又自相矛盾的冗句所说：

> 心智结构建构了物的世界，而心智结构自身也是在物的世界的实践中、根据同样的结构被建构出来的。从物的世界中诞生的心智，并不是与客观性对峙的主观性：客观的世界由物所组成，但这些物则是客观化过程中根据心智所应用的结构构造而来的产物。心智是物的世界的隐喻，而物的世界本身不过是一个无尽的、相互反映的隐喻的循环。（Bourdieu，1977:91）

在许多方面，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与我在本章中谈到的结构二重性的概念完全相容。布尔迪厄承认图式与资源的相互再生产构成了时间上持久的结构，即他所说的“惯习”。他对惯习的论有力论述了相互强化的规则—资源系列是如何以特定种类的知识与特性构成了人类主体。另外，布尔迪厄所研究的卡拜尔人并非文化傀儡（cultural dopes）。他们生来具有高度自治、辨别力与策略性行动的能力（见布尔迪厄关于礼物交换与婚姻策略的论述：4—10，32—53）。卡拜尔的案例完全符合吉登斯理论中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概念。

然而，布尔迪厄的惯习仍然由能动者证成，这一点是结构二重性的概念需要克服的。惯习中，图式与资源对彼此的再生产如此强力，以至于能动者最狡黠、最即兴的行动也必然会再生产结构。“惯习是生成性图式在根据构成自身的特定条件作出客观调整中得到的一个系统，它所产生的一切思想、感知与行动也仅与这些特定条件保持一致，而非其他。”（95）尽管布尔迪厄极力避免传统法国结构主义者的精神决定论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论中的任何一者，但他仅仅提供了某种结合二者的决定论，使激烈的社会转型似乎成为不可能。

然而如此强有力的停滞真的是合理的吗？毕竟，布尔迪厄进行田野调查的卡拜尔社会，在他回到法国分析数据不久之后，就发生了重大的反殖民革命。这让我感觉到，虽然布尔迪厄强烈批判笛卡尔和列

维-斯特劳斯的"客观主义"（1—30），他本人的理论却也成为了一种不可能的客观化且过度整体化的社会概念的受害者。只有在社会科学观察者构建的理想社会中，惯习才能产生与现存社会的条件（"而非其他"）相符的"一切思想、感知与行动"。在人类斗争和策略的世界中，大量与现有社会模式的再生产相一致的思想、感知和行动并未出现，而不一致者则屡见不鲜。

## 为何结构变迁是可能的？

当然，布尔迪厄强调结构中强烈的再生产偏向是完全合理的，这是结构概念的中心点，也是这个概念对社会变迁进行理论化的前提。况且，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asaldo, 1980）和马歇尔·萨林斯（1981，1985）皆向我们清晰地证明，结构的再生产偏向可以解释社会关系强大的连续性，也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片段的后续路径。但布尔迪厄其实偏离了轨道，因为他采用的惯习概念在统一性与总体性上过分理想化，概念化出一套覆盖所有社会经验的、庞大且严格同源的结构。这套同时被很多偏好结构主义的理论家所持有的概念，实际上无法解释变迁如何在结构的运作中发轫。在用结构来解释社会转型时，不少讨论倾向于认为变迁起先源于系统之外，其后才讨论由结构形塑的后续变迁，而不去说明社会内部的结构的运作如何生成变迁。在该方面，马歇尔·萨林斯（1981）有关库克船长的航行如何对夏威夷人产生影响的分析极其代表性。在我看来，如果要在结构理论中加入有关变迁的理论，则需采用一种更多重的、更偶连的、更断裂的社会与结构的概念。我们也需要一套概念术语来告诉大家转型如何生成于结构的日常运作之中。在此我提供以下五条核心公设：结构的多重性、图式的可转置性、资源积累的不可预知性、资源的多义性，以及结构的交叉性。

结构的多重性 。社会建立在大量不同结构所衍生的实践上，这些结构处于不同层面，以不同模态运作，并且它们自身也是建立于形式与数量千差万别的资源之上的。尽管一定范围的结构具有同源性，就如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一书中的描绘，但并非所有的结构都是同源的。结构在不同制度场域中差别极大，例如亲属结构的逻辑和

动力学就与宗教结构、生产结构、美学结构、教育结构等等完全不同。更有甚者，在同一场域内亦存在着多样的结构。例如，基督教社会中形塑和约束了宗教的结构，就包含着威权、预言、仪式和神学四种模式。不同模式或许会和谐运作，但也会导致严重抵触的要求和赋权。结构的多重性意味着通过实践构成社会的有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远比布尔迪厄普遍同源的惯习概念所蕴涵的要能力全面。社会行动者有能力应用大量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图式，并且能够获取大量异质的资源。

图式的可转置性 。行动者还可以在广泛的环境之内应用获取到的图式。布尔迪厄实际上已认识到这点，但我觉得他没从自己的洞见里得到正确结论。前文中对图式的定义是指在社会生活的实行中可概化与可转置的程序，“可概化”一词来自吉登斯，但我更喜好来自布尔迪厄的“可转置”一词。[8] 据此，布尔迪厄将惯习定义为“一个持续的、可转置的倾向性的系统，它无时无刻地吸纳着过去的经验，发挥着感知、理解与行动的发源地 （matrix）的功能，并且在允许解决类似问题的图式的类比迁移的帮助下，它使无限多样化的任务的完成得以可能”（1977:83）。

引文中有一句话模棱两可，即“允许解决类似问题”。一个给定的问题是否被足够类似地形塑，使其能够恰好被图式的类比迁移所解决，是不能够被社会科学分析事先决定的，而是必须根据由行动者根据不同的个案来决定，也就是说，可转置性没有范围限制。的确，后一句“使无限多样化的任务的完成得以可能”也表明了这一点。图式是可转置的，换言之就是可以被应用在更广泛且不可预知的案例范围中，超出习得图式的初始语境。这和我们通常所谓的有关规则和其他已习得程序的知识相似。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不能仅因某人能在同一问题的重复案例中自动套用规则，就说此人真正了解 规则。要测试某种规则（如语法、数学、法律、礼节甚至木工）是否被真正了解，要看它是否能在陌生 案例里成功运用。关于某种规则或是图式的知识，指的是转置与延展它的能力，即创造性应用的能力。这样一来，我所谓的能动性 ，即将图式转置和延展到新语境中的能力，是关于文化图式的知识的内在成分，是能力最弱的社会成员都具有的基本能力。[9]

资源积累的不可预知性 。事实上，根据定义，图式具有转置和延展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文化图式的实行所形成的资源永远不可能被完全预知到。说给新观众听的笑话、对新市场的投资、组建新家庭的求婚、新领土上的一次骑兵冲锋，或在新整过的土地上播种，甚至是在新一年的老土地上播种——这些行动对行动者的资源造成的影响从来都不是确定的。对新市场的投资可能使企业家一文不名或家财万贯，组建新家庭的求婚可能导致家族地位的提升或因世仇而造成悲剧，老土地上种植的新作物可以带来维生、饥荒或丰收。再者，如果通过图式的实行创造的资源在数量与质量上都不确定，如果图式的再生产取决于资源持续的有效性，这就意味着图式在投入行动后有效性各有不同，并因此可能会有所改变。新领土上一次成功的骑兵冲锋，可能改变其后一系列战役的计划，甚至可能导致战术策略的变更；一个失败的笑话足可让预期中的哈哈大笑转为观众大丢番茄，以致喜剧演员不再表演同类的笑话；连年歉收也可能会改进例行的耕种方法。[10]

资源的多义性 。多义性（或意义的多重性）这个术语一般用于符号、语言或文本，用于资源会显得有些矛盾，但就我对资源的定义来说并非如此。我已经强调，资源是文化图式的具体表现。不过，和文本或是仪式性的表演一样，资源的意义也从来不是完全明确的，总有歧义存在。工厂的形式就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观念。不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厂的形式也向我们指出生产所固有的社会性与集体性，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观念。由骑兵冲锋胜利赢得的荣耀、财富与领土，有可能被分配给最骁勇守纪的军官，从而加强了贵族军官的权力，也有可能被赐予指挥官，使他在下属眼中更具领导魅力。任意一组资源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阐释，从而赋予不同行动者权力，展现出不同的图式。再强调一次，我认为能动性的定义之中本就包括将图式转置与延展入新语境的能力。换言之，能动性也就是行动者重新阐释和动员本身也随文化图式而变化的资源（而非原始资源）系列的能力。

结构的交叉性 。不同结构和结构复合体的交叉重叠，是我们能用不只一种方法解释各式各样资源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既包括建立在私有财产与利润之上的生产方式，也包括基于工作场所团

结的工会模式。工厂是这两个结构的决定性资源，并且，无论对于工人还是管理者，它的意义与重要性都是开放且有争议的。事实上，结构的交叉性也同时出现在图式和资源的维度上。嵌入不同结构复合体中的不同行动者能够拥有一套特定的资源，而嵌入不同结构复合体中的同一行动者也能拥有不同的资源。而且图式也能从一种结构复合体中被借用或挪用至另一种。于是，不只是工人与工厂主为了工厂控制权而斗争，马克思本人也挪用政治经济学来支持社会主义的发展。

所以说，结构是一套相互支持的图式和资源，它能赋权并约束社会行动，也往往被同一社会行动再生产出来。不过其再生产过程从来都不是自动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结构在所有自己形塑的社会日常接触中面临风险，原因在于结构是多种多样且互相交叉的，图式也是可以转置的，而资源是多义的且资源的积累是无法预知的。把资源与文化图式间关系放在结构这个概念的中心，就能使社会变迁与社会停滞一样，能够在社会生活的一系列结构展开中生成。

## 能动性

如此的结构实行蕴涵了一个关于能动性的独特概念，即认为能动性并非与结构对立，反而是结构的构成要素之一。成为能动者意味着有能力于自己所陷入的社会关系之上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这也意味着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使这些社会关系发生转变。就我看，能动者被结构赋权，得以协同或违抗他人进行行动，他们拥有关于影响社会生活的图式的知识，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人力与非人力资源。能动性源自行动者有关图式的知识，也就是在新语境中运用这些图式的能力。反过来说，能动性亦产生于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也就是行动者重新阐释或动员一系列根据图式而变化资源的能力，而非原始资源。能动性蕴含于结构的存在之中。

我想强调每个人都具有固有的能动性，例如提出要求、形成意图以及创造性行动。不过我还想说，人类与生俱来的只有一种高度概化的能动性的能力，就像他们使用语言的能力一样。正如语言能力可以使人掌握一种特定语言，如法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Swahili）

[2] 或是乌尔都语（Urdu）[3] ，能动性形成于一个人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可以得到的一系列特定的文化图式与资源。因此，能动性可采用的形式种类极为繁多，并且由文化和历史决定，但人所具有的能动性能力和呼吸的能力一样，是与生俱来的。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59，1967a）的著作令人满意地展现了所有人都在实践中实际运用能动性的事实。戈夫曼展示了所有社会成员都通过运用复杂的互动技巧剧目（repertoires），以控制或维持当下的社会关系。他也向我们呈现，那些小规模的转换行动——例如打断一位误会情况的互动者说话，以挽回他的颜面（face）[4] ——对维持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交际也十分必要（Goffman，1967b）。这再一次说明文化图式的知识（此例中的互动仪式）意味着创造性行动的能力。当然，行动者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不同，他们的转换能力的范围也不一致，但所有的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行为里都能运用某种程度的能动性。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强调不同的个人所能运用的能动性迥异，各种能动性在类型和范围上也都极为多样。人们拥有何种欲求，建立何种意图，或是实行何种创造性的转置，都因影响他们所在的不同社会世界的特殊结构的本质而大相径庭。倘若根本不存在天堂与地狱的观念，那一个人也不会争取进入天堂的许可；也正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才有可能试图在期货市场里大捞一笔；如果女性被禁止进入公共领域，那她们的野心会专注私人生活。能动性的范围在同种社会内或不同社会间也有分殊。如由性别、财富、社会声望、阶级、族群、职业、世代、性向或是教育决定的人的社会位置，都给人们不同文化图式的知识，让他们占有不同种类和数量的资源，从而有不同的机会进行转换行动。能动性的范围和程度也在不同社会体系间有所变化，哪怕是对在其中拥有相似社会位置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即便同为当地最大画廊的老板，圣路易斯（St.Louis）的那位对美国人艺术品位的影响力绝对无法与洛杉矶的比肩。在全球环境政策的问题上，乍得的总统定无俄罗斯总统那样的权力。总而言之，结构对不同的能动者进行了不同的赋权，使后者表现出不同的欲求、意图以及能动者的知识。结构及其所赋予的人类能动性充斥着各种不同的

权力。

最后，我必须强调能动性既是集体的也是个体的。我不同意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1986）的观点，他认为“能动者”这一术语对社会生活中以合作单元行动的集体——如政党、公司、家庭、国家、俱乐部或者工会——的意义必须等同于对个体的意义。但我认为能动性于更深层面具有的是社会性或集体性。构成了能动性的图式的转置和资源的重新动员，时刻处于与其他图式与资源的交流行动中。能动性关乎一个人协同或对抗他人行动的能力，关乎组建集体性项目，劝说、强制以及监视自己与他人活动的共同效用的能力。另外，个人运用能动性的范围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在集体性组织内的位置所决定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君主的一时之念或争执可能关乎上千性命（Sahlins，1991）。的确，父亲、行政人员或者教授的能动性由于他们在父权制家庭、公司和大学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行动带来的与集体性相关的权威而显著扩张。因此，能动性是所有个人的特性。个人运用的能动性在源头和运用模式上皆来自集体。故而，个人能动性充斥着集体创造出的权力差异，并在集体斗争与反抗中深具影响。

## 结构的多样性

本章中我所讨论的结构概念其实非常笼统，可以用于各种各样性质的结构——从全球军事力量发展，到周日钓鱼老友之间互相打趣，甚至是情侣之间的爱欲行为，皆有形塑和约束其本身的结构。本章讨论的结构如此范围广泛、性质各异，是建立在所有社会行动都由结构形塑这一前提下。不过这也使我们需要区分不同结构的特质以及其动力学。我并不打算详述它们的类型——既是由于篇幅问题，也是由于如果要分析类型，就必须结合对社会变迁和再生产的具体分析。相反，对于结构的多样性，我只想讨论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深度，指结构的图式维度；二是权力，即结构的资源维度。我将尝试表明，思考结构的纵深和权力，有助解释语言、国家和资本主义这三种重要的结构类型所具有的极为不同的动力学与持久性。

“深度”一词长久以来都是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话语的关键隐喻。认

为某个结构是深层的，也就是意味着它位于底层，生成着一系列特定的“表层”结构，就像作为底层基础的结构生成着实践。在结构主义话语中，深层结构是可以被用来展示普通或“表层”结构之下的图式，表层结构也由此成为深层结构的一系列转换。故而，生育仪式（fertility rituals）所表现的结构图式，能够向我们展现更为深层的一系列对立（干与湿，或是男与女）的特定转换，这些对立也蕴藏在影响其他不同制度的实践——从房屋建造、个人服饰到演说术——的深层结构中。所以，深层结构图式是无所不在的，它们体现于广泛的制度性场域、实践与话语中。人们往往察觉不到它们，因为它们常常是某种理所当然的心理预设，或者行动者通常无意识运用着的程序模式。

各种结构能动员的资源以及权力也差别万千。军事结构或形塑了国家财政的结构能形成大范围的权力集中，而形塑了小学生游戏的某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只能形成小范围的权力集中。结构也会根据自身动员的权力种类而变化。例如，使徒统绪创造的权力本来是建立在信仰上的（虽然远不止这一种基础），而占领军的军政府创造的权力则主要以胁迫为基础。

## 语言

我个人深信，从深度与权力的角度思考结构，有利于深入揭示其持久性与动力学。我们先来思考语言结构，它被许多学科的学者当作结构最基本的例子。语言结构显然具有相当强的持久性，其在权力与深度的维度上都处于极致。语言结构的深度是不同寻常的。每一个句子之下都隐藏着复杂的语音、形态（morphological）、句法和语义的结构。反过来，句子也被聚合成有意义的言说或文本，与各种修辞、叙述、隐喻和逻辑的话语结构协同运转着。而且，这些多层的结构是大量与言语与书写或多或少有关的结构的基础——亦即是说它是所有结构中绝大多数的基础。

然而语言结构的权力　却微小得不同寻常。在言语或书写中，语音、形态、句法以及语义结构的实行只有相对较小的资源效应。它只能确认说话者对某个语言共同体的参与，以及巩固使生成符合语法的

句子得以可能的图式。假设言说的对象只是此种语言的其他有能力的使用者，一句符合语法的句子并不造成明显的权力差异，相反，它在交流者之间建立了某种对等性。当然，语言在任何一种权力关系的实行中都扮演着媒介的角色，不过从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的层面说来，它是我们可用的最接近中立的交换媒介。正是这种权力的相对中立性，向我们解释了语言结构的另一特性：卓越的持久性。如果语言图式的实行仅仅是为了维持对言说者在语言上的赋权，而不是在不同言说者之间进行资源转移，那么它们就不存在太多诱因会参与语言结构的转型的创新。

假如语言结构真的几乎与权力关系无关，并且比大多数结构都更具深度与持久性，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把语言结构作为结构的一般范式的普遍趋势保持警惕。尽管如此精致的语言模式使人心生向往，但事实上，更接近社会生活的表层或更直接地运作于权力关系之中的结构可能有着与之不同的原则与动力学。如果不经批判地接受语言模式，我们很有可能错以为所有结构都是纯粹由图式构成的，从而忽视了资源的维度。在研究语言的文法结构时，图式的实行对权力的影响甚微，因此即便忽视其资源维度亦无足轻重。可是，如果我们要分析充斥着权力关系的生活诸领域，仅仅用语言结构进行类比，并且认为结构纯粹是图式，会导致彻头彻尾的缺陷。

## 国家

用语言结构类比国家或者政治结构尤其行不通，因为两者通常产生和利用着大型的权力集中，并相对更接近社会生活的表面。我们能意识到国家与政治的结构处于建立、维持、斗争以及争论之中，从未把它们理所当然地视为世界不变的特性。尽管人们最初会想象大规模的权力集中往往使得结构更为持久，但这并非事实。虽然说集权国家惊人的强制权力会让任何挑战它的人都付出惨痛代价，但并无证据可以证明集权与强制性的国家要比分权与非强制性的国家维持得更久。我们不妨比较1750年到1850年的英国与法国，对比1870年到1950年的美国与德国，或是对比“二战”以后的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或危地马拉，甚至是对比同一个时期的中国与印度。哪怕相对稳

定的国家都会有阶段性的结构转型。尽管美国自1789年以来仅有一部宪法，但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该宪法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政治危局，产生了至少五个尖锐对立的党派系统（Burnham，1967）。国家结构由于（在权力方面）太过广泛、具有的资源效应太过明显（缺乏深度）而成为公开斗争的天然目标，让有些人认为国家结构相对来说是易变的。

如若多数政治结构确有高权力与低深度的特性，那么权力与深度间的反比关系就绝非必要。有些政治结构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但也具有相对较深的深度，这种深度便演变为某种“第二天性”，被（几乎）所有政治行动者接受并看作是本质上属于权力中立且理所当然的达成政治目的的方法。这类政治结构似乎尤为持久。从美国宪法体系、法国公共官僚机构，到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1986）追溯的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叶都屹立不倒的英语共同体法律结构等政治结构都是如此。由此看来，相比于权力，持久性更多地取决于结构的深度。

## 资本主义

结构如何才能在拥有巨大权力效应的同时趋向或者保持深度？一般都会认为，权力效应的强大影响力能使社会行动者意识到并愿意参加这些结构的图式和资源的聚集。我打算由检视资本主义这一案例入手，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权力且持久存在的结构，当然也充满活力。资本主义在过去的250到300年间经久不衰（如果不是沃勒斯坦从16世纪即开始的那种算法[1974]），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时代；它也伴随着由一种持久的核心结构引导的资本积累的持续动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本人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凡动力以及可变迁的特性，但是他认为变迁只有单一形式：大规模的机械化工厂，它由越来越多同质化的无产阶级维持。晚近的发展则倾向于使资本主义的可变迁性愈发激进与持久。现今的世界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分包、血汗工厂、外包、“家庭手工业”，以及快速增加的服务业对制造业的

替代，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工厂的洪流。与此同时，学者们也陆续指出资本主义之下各种发展模式的不均衡性、偶连性以及开放性，无论是在过去（Samuel，1977; Sabel and Zeitlin，1985；亦见本书第十章），还是在当今和未来（Piore and Sabel，1984）。萨贝尔（Sabel, 1988）甚至认为，所谓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变化形式实在难以确定，因而资本主义概念和根本规律是误导性的，故应被抛弃。我非常同意萨贝尔的观点：一系列极为不同的制度性安排与财产关系或许与“资本主义”的概念相容，但是资本主义从未在历史中服从统一的“运动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混乱且不均衡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混乱一直位于次要的、表面的结构的层面上，而在表面的可变迁性之下蕴藏着一种更为稳定的深层图式结构，这种结构一直被资源的流动巩固，且在表面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巨变时亦然。

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图式不是那些定义了雇佣劳动关系的那些图式，而是支配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的图式。[11] 资本主义的核心程序——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换言之即物的商品化——具有极强的可转置性。这个过程几乎没有自然限制，不仅可以运用于衣物、烟草、锅具这些物品，也可以运用于土地、家务、生计、性、广告、情感或是知识，所有这些都能通过金钱相互转化。资本主义表面的不稳定性恰恰源自这种互变的特性，这种特性鼓励资源的所有者在相对价值发生变化时用自己的资源去和其他资源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总是使之前不被看成是商品的资源卷入了货币化的交换圈。换句话说，通过使几乎所有资源成为可交换的商品，商品形式构成了一个诸结构间真正普遍的交汇点，这意味着同一结构中的变化——资源积累的增加或减少，或是一种新的程序——能影响通过金钱这一媒介交汇的无数其他结构。交换圈中任一节点的变化，都会对别处造成资源效应和创新。只要变化是有利可图的，就无需受限于任一特定的制度模式。因此，汽车工业的崛起同时也促进了基于契约劳动或强制劳动的橡胶种植园的发展，而汽车装配的操作不仅基于赚取工资的无产阶级组成的大型工厂，也包括日益增多的小资产者自营的修车行。

然而资本主义的这种表面结构长期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却强

化了它的深层结构。庞大商品交换链上的任一改变都是新的投资刺激；商品形式的内在逻辑是给予任意一组新资源或新程序潜在的获利机会。当然任何新的投资都会导致未来的改变。即便投资不能产生新机会，紧随其后的资本投资与交换等常规程序也能把握到这些机会——公司破产后，外人就能用低价购入厂房和设备，公司原先的竞争对手能开拓其剩货市场，等等。所以，程序本身不受特定资本主义企业或者工业倒闭的影响，甚至还矛盾性地得到了强化。动力织机代替手摇织机，石油代替煤炭都造成了技能淘汰、公司倒闭或者一些地区的经济萎缩，但也同时证实，遵循商品化模式的逻辑就能够为遵循者创造财富，甚至能从长远角度为资本主义经济整体（一些重要的地区例外）创造财富。在一些情况下，结构确实能兼具深度与权力，并且由此形塑超越世代的、整个社会的经验。

## 结论

本章开始时，我们就假设结构是社会科学中绕不过去的认识论隐喻，而我在本章中试图阐明应如何理解这个隐喻。我在本章指出，结构由相互维持的文化图式以及一系列资源构成，这些图式和资源赋权并约束着社会行动，并往往会被同一社会行动再生产。能动者被结构赋权，这种赋权既通过使能动者得以动员资源的文化图式的知识，也通过使能动者得以实行图式的资源的获取。此说与社会学中“结构”一词的通常用法不同，反而认为结构是完全的文化现象；也有别于人类学中的通常用法，反而认为结构产生于日常生活世界中资源的特质以及分配。结构是变动而非停滞的，这是社会互动过程的持续演变的后果和源头。哪怕是几乎完美的结构再生产，也完全是一个时间性的过程，需要拥有资源与创新能力的人类引导。而同样拥有资源的能动性不仅让结构持续再生产，也让结构转型成为可能——也就是通过图式的转置和资源的重新动员，旧结构得以转型成为新的结构。我认为，结构并非我们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生活惯常形态的物化范畴。依照我对结构的定义，结构应当被用来批判性地分析各种辩证的互动，而正是通过这些互动，人类形塑了他们的历史。

注释：

本章原以同一标题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992）:1—29。在多次修改中，许多朋友和同事对本章反复阅读，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虽然我有时并未采纳他们的意见，但仍要感谢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罗纳德·阿明扎德（Ronald Aminzade）、勒妮·安斯帕克（Renee Anspach）、特里·博斯韦尔（Terry Boswell）、佩姬·埃文斯（Peggy Evans）、尼尔·弗莱格斯坦（Neil Fligstein）、斯芬·古德曼（Steven Gudeman）、罗纳德·赫林（Ronald Herring）、罗纳德·因登、戴维·莱廷（David Laitin）、芭芭拉·拉斯娅特（Barbara Laslett）、迈克尔·肯尼迪（Michael Kennedy）、谢里·奥特纳、西尔维娅·佩德拉萨（Sylvia Pedraza）、琼·斯科特、埃伦·休厄尔（Ellen Sewell）、西达·斯考切波、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约翰·厄里、华康德（Loïc Wacquant）以及数位匿名评阅人。

1 ．“结构”这一术语在自然科学中似扮演着本质上相同的角色。据我所知，它起源于17世纪到18世纪的植物学，并开始向其他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见Foucault，1971:132—138）。

2 ．有关结构意义的分歧尤其阻碍了两派社会科学家的交流，他们各自目前的研究计划看来颇有交集，却甚少相互关注：一派是逐渐壮大的社会学家团体，他们检视了社会生活的文化层面；另一派是人类学家，他们在理解文化时强调权力和实践的重要性。有关蓬勃发展中的文化社会学领域的评估，参见Lamont and Wuthnow（1990）。有关人类学近期的趋势，参见Ortner（1984:144—160）。

3 ．我并非要对吉登斯或布尔迪厄作出全面批评与分析。对二人著作的批判性文献仍然在快速增长中。Heldy and Thompson（1989）以及Bryant and Jary（1991）总结了大批杰出学者对吉登斯的各类批评，并提供了这些批评的翔实有用的书目清单。关于布尔迪厄，参见DiMaggio（1979），Brubaker（1985），Lamont and Lareau（1988），Wacquant（1989）以及Calhoun, LiPuma, and

Postone（1993）。Wacquant（1989）提供了有关布尔迪厄批评的大量参考资料。

4　．此处无法举出详细阐述各种“社会生活之规则”的人类学著作的典型例子。人类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概念或许仍是Geertz（1973）的构想。有关文化人类学潮流的极佳综述，参见Ortner（1984）。

5　．对“规则”这一概念的令人信服的批评，参见Bourdieu（1977:1—29）。

6　．吉登斯的规则概念时常遭到批评，最近的是Thompson（1989）。不过据我所知，关于资源的概念还未有系统的批评。

7　．布尔迪厄一些晚近的著作，尤其是研究了法国1968年事件中大学教师的《学术人》（*Homo Academicus*，1988），更直接地关注了变迁。然而，我并不认为布尔迪厄在考虑惯习本身是如何引发 变迁的。比如在《学术人》一书中，变迁来自于他所研究的惯习之外——根本上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大学生人数的激增。而惯习这一概念通常被用来论证教授们对于危机的反应完全取决于他们在“学术圈”的地位。《学术人》一书表明布尔迪厄似乎并未克服在《实践理论大纲》一书中提出的惯习概念内在缺乏能动性的问题。

8　．将某个规则概化意味着将其纳入更抽象的形式以应用于更多事例中。“转置”（transpose）这一动词意味着将某个规则具体使用于全新的情况，但是在每次新的应用中，规则的形式会产生细微差异。《牛津英语辞典》中的三条定义解释了这种情况：“从某处或某时间点转移至他处；转变，切换”；“在连续事物中更改次序或位置……互换”；以及音乐中的“变调”。法语transposer（也就是布尔迪厄原文中所使用的词汇）的含义更为恰当：“使某物进入另一领域中，从而改变其形式或内容。”可见*Le Petit Robert*（1984，词条transposer）。我所使用的*transpose* 应被理解为保留了一定法语意涵的词。

9　．此处我的思路受到Goran Therborn（1980：尤见15—20）的影响。

10 ．即使Marshall Sahlins（1981，1985）并未明确将资源纳入其对结构的定义中，我与他的观点仍十分相近。萨林斯论述道，“文化范畴在世界内的行动（严格来说是指涉行动）中获得了新的功能性价值”，因为范畴“背负着所在的世界”（1985:138——本段根据萨林斯原书译出。——译者注）。范畴背负着世界，是由于对维持图式的资源的行动的非预期效果改变了图式本身。参见本书第七章关于萨林斯的讨论。

11 ． John Roemer（1982）令人满意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剥削在没有雇佣劳动的情况下仍能进行。

---

(1) 这种毛毯产于英国，由纯羊毛织造，是18世纪至19世纪哈德逊湾公司的商人用来和北美原住民（尤其是加拿大）进行毛皮贸易（如海狸皮）的重要商品。款式为纯色底配红绿等色条纹，契合原住民的宇宙观和宗教观念。—— 译者注

(2) 该语言是班图语（Bantu）的一种，通行于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是非洲重要的交际语言，以吸收借鉴大量外语（尤其是阿拉伯语）著称。—— 译者注

(3) 该语言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穆斯林所使用的印度—雅利安语，与印地语有同样的语言基础，但吸收了大量波斯语词，是巴基斯坦的国语。—— 译者注

(4) 在戈夫曼的学术研究中，颜面的其指涉与中文语境中的“颜面”不完全等同。戈夫曼强调的是面对面（face-to-face）接触中，人作为社会行动者理想化的社会形象，一个人在日常交往中要同时维护自己和他人的颜面。一旦个人的面子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则需要面子功夫（facework）来使得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理想化的社会形象一致，本章中的挽回颜面即是此意。—— 译者注

# 第五章　文化的（诸种）概念

本章试图反思当代学术话语中文化这一概念（或更确切说是诸概念）。如今，澄清文化的意涵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却又不得不为之的事，因为有关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已爆炸式地蔓延至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尽管我会粗略提及该概念在不同人文学科中的各式用法，但本章中我的反思主要建立在近二十年人类学领域所展开的广泛争论上——其中一些恰恰就是追问文化概念的实际功用。[1] 我强烈感觉到“文化”一词的实用性和必要性一如既往。但鉴于当今有关文化的话语莫衷一是，我相信应该重新整理与厘清这个概念。

目前文化概念的多变性恰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情况截然相反。当时，我刚刚对用文化路径研究社会史感兴趣。那时候，如果你想要涉足文化，就得求助于人类学家。即使学者们各有意见，但大家对文化的含义与它在人类学领域的中心位置达成了广泛共识。我开始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洞见来研究19世纪的法国工人。我希望文化分析能让自己理解工人实践背后的意义，而这些恰恰是定量与实证方法——彼时我作为所谓“新社会史”研究者的基本工具——所无法得到的。[2] 在与文化人类学的接触中，我从一个死脑筋、功利主义且经验主义的唯物论者——兼有自由主义和更宽广的理解两张面孔——转向对过去与现在的人类可能性的偏好 。我坚信生活不只是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不懈追求，而文化人类学恰恰能告诉我们如何达到这个“不只”。

当时人类学确实垄断了文化的概念。彼时，在政治学与社会学中，文化通常与帕森斯(1)那套极为生硬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尚处萌芽期的“文化研究”运动也仅限于伯明翰的研究中心而已，而文学研究仍然集中在经典文学文本上——尽管在方法论层面借鉴了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而有所革新。相比而言，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黄金时期，可以说伴随着克利福德·格尔茨于1973年出版的影响巨大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而达到巅峰。不仅人类学在有关文化的研究领域中所

向披靡，文化人类学的创造力和声望也达到了最高点。

正如我在第二章所指出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文化的研究在众多学科和专业中大规模扩张，改变了有关文化的学术生态。哪怕它在各个领域中的发展进度和内容不尽相同，但累积之下的效应却不容小觑。文学研究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法国理论的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拓宽到准文本（quasi-texts）、类文本（para-texts）和文本类比物（text analogues）等范围。正如德里达（1976）宣称的"文本以外无一物"，文学批评家们将他们由理论驱动的凝视（gaze）投向各种各样的符号产物——法律文件、政治小册子、肥皂剧、历史故事、脱口秀、爱情小说——并寻找它们的互文性。结果，就像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ven Greenblatt）和路易·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为代表的一些"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文学研究已逐渐变为有关各种文化的研究。[3] 在历史学界，早期从人类学那里自觉借鉴的东西，快速发展成了理论上完全不同的有关文化的研究潮流，就像效仿人类学一般效仿起了文学研究和福柯的学术作品。

20世纪70年代晚期出现了所谓"文化社会学"，它以标准的社会学方法研究文化人造物——音乐、艺术、戏剧及文学——的生产与营销。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文化社会学著作已经冲破了对由文化生产的制度的研究，转向研究更普遍的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场所（place of meaning）。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关注记录女性的经验的女性主义，也逐渐转为分析性别差异的话语生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全新的准学科，在众多学术小生境（niches）中爆炸性增长——例如电影研究、文学、表演研究或传播学的各种研究项目和院系。对以追求时事性著称的政治学而言，其对文化问题的兴趣又因近年来惹人注目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和族群问题而复苏，上述问题皆被看作是当今世界政治冲突的最重要源头所在。有关文化的这股研究热潮影响到了各个领域，这或多或少起因于法国后结构主义三剑客，也就是拉康、德里达和福柯无处不在的跨学科影响。

悖论的是，文化的话语日渐流行且百花齐放，而人类学作为文化

这一概念的发明者——至少是其当前形态的塑造者——却十分暧昧地掩藏起很长一段时间中标榜文化为自身的关键词与核心象征的做法。过去二十年中，人类学为其严重的身份危机所撕扯，这具体表现为对学科的认识论、修辞及方法论的程序以及政治影响的焦虑。[4] 危机产生于多种因素：人类学与欧美殖民主义的息息相关所带来的自由而激进的罪责；所谓的“未受玷污的”或“原始的”民族的消失，而他们曾是传统民族志喜爱的研究主题；“土著”民族志学者对欧美学者有关他们民族的“真相”的讲述权的挑战；另外，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让人们日益失去了对客观性之可能性的信心。“文化”这一术语原本是人类学最中心、最独特的概念，但现在也遭到了批判性的人类学家的质疑。他们认为，一旦在学术领域与公众话语中谈及文化，我们就倾向于把被描述的多种生活方式本质化、异域情调化以及刻板印象化，并将它们与欧美白人中产阶级的差异视为自然。如果人类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口号是格尔茨所说的“文化的解释”，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到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氛围则被莱拉·阿布-拉赫德（Lila Abu-Lughod）概括为“反写文化”（Writing Against Culture, 1991）。

罗伯特·布赖特曼（Robert Brightman）在他对近年来有关人类学中的文化的争论的绝妙分析中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类学批评家普遍表现出了所谓的“词位回避行为”，即在使用文化这个术语时把它放在引号里，或是拒绝将其作为名词使用，却继续将其使用为形容词（如“文化人类学”），或以“惯习”“霸权”或“话语”等其他词位（lexemes）替代（1995：510）。人类学中出现的这种“文化”术语的使用禁忌，在我看来有两点不当。第一，它假定人类学对文化这个词位“拥有”支配权，故而必须对其任何滥用负责。第二，它错误地认为只要人类学不使用该词位，就能魔法一般地阻止上述滥用。其实“文化”一词早就逸出人类学家之手：不管他们怎样使用这个词位，它照样或滥用或合规地在其他许多学科和日常用语中炙手可热。布赖特曼又指出，即便是批判性的人类学家也发现无法将文化概念弃之一旁，这与文化词位的情形相反。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表示“文化是一个经过深刻妥协的概念，我无法对其置之不用”（1988a:10）。他的话体现了某种无法解决的暧昧情绪：文化概念具有妥协性，他希望将来可以不使用它，但是这个词仍在学术研究

中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完全抛弃该词显得遥遥无期。我认为正如克利福德所说，我们无法抛却文化的概念，所以更应当将其塑造成可堪一用的形态。我们必须修改和重新阐明这个概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它重获新生。

## 我们说的文化是指什么？

在1983年，雷蒙·威廉斯宣称，“文化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1983；亦见1958）。如今它的复杂性丝毫不减当年。我无能也无意一一细数它在当代学术话语里的所有意涵，但试着去整理它的不同用法是必要的。我们首先需要区分文化这个术语的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意涵。

其一，文化作为由理论定义的社会生活的一个范畴或者方面，必须从人类存在的复杂现实中抽象出来。从这个意涵出发，文化通常与社会生活中非文化的、同样抽象的范畴或者方面相反，例如经济、政治或生物。将某事物命名为文化（的），即是宣布它属于某一特定学科或分支学科，例如人类学或文化社会学；或是将它视为一种或多种特定的分析类型，例如结构主义、人种志、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解构或诠释学。文化作为一种抽象的分析范畴的意义之时，只取其单数形式。任何要说“诸文化”（cultures）的场合，都是指它的第二种基本意涵。

在第二种意涵之中，文化代表某个具体且有边界的实践与信仰的世界。从这个意涵出发，文化一般被认为属于某一“社会”或某一可清晰辨认的次社会群体，或者与它们是同构的。我们可以说“美国文化”或“萨摩亚（Samoan）文化”，可以说“中产阶级文化”或“隔都（ghetto）文化”。[5] 此中的差异并不是在文化与非文化之间，而是在诸文化之间，也就是在美国、萨摩亚、法国和博罗罗（Bororo）文化之间，抑或是在中产阶级文化与上流阶级文化之间，抑或是在隔都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

我发现，我们很少对作为理论范畴的文化与作为实在且有边界的信仰与实践之实体的文化进行区分。于我而言，这种区分是弄清文化

理论的关键所在。例如，我们必须区分，露丝·本尼迪克特高度独特性与整合性的诸文化的概念指的是上述的第二种文化，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的意义是由各种对立系统所结构的，这是上述的第一种文化。这两种“文化”理论，严格说来是不可通约的，各自指涉不同的概念领域。当下文化理论的严重问题，就是对这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意涵的混淆，当代人类学诸多理论话语的死胡同也是由此造成的。所以，在我看来，对“本尼迪克特式”民族志将诸文化统一视为界定分明且内部融贯的看法的不满，只沦为对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的诸种概念”的令人困惑的指责，这种指责全然把本尼迪克特将诸文化视为紧密整体（1934）的观点与列维-斯特劳斯将文化的符号融贯性视为意义系统的观点混为一谈（1963a， 1966）。然而，捍卫文化概念的人类学家往往也同样搞混它们，认为诸文化被撕开裂隙或其边界具有渗透性的观点意味着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全数抛弃。

在本章中，我首先处理文化的第一种意涵——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范畴。我们必须厘清这一抽象层面上的文化概念，以研究更具体的理论问题，即文化差异如何在时空中成型并形成边界的。在为抽象的文化理论描绘出合适的面貌之后，我将会回到本尼迪克特的诸文化的概念——文化作为一种信仰与实践的边界清晰的世界。

##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范畴

作为一个社会生活范畴，文化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被概念化。接下来我将按照实用性和正确性由低到高的顺序，对这些不同的概念进行详解。

文化作为后天习得的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一个包含着实践、信仰、制度、习俗、习惯、神话等方面的整体，由人类创造并世代相传。此种用法的文化是与自然天性相对立的，是否拥有文化成为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据。这种将文化视作后天习得行为的概念，曾经帮助人类学家推翻以生物学差异为基础的种族主义，并建立出一套新的区别不同社会的标准。但既然种族主义观点已彻底退出人类学话语，这种宽泛的文化定义就显得过于含混，再也无法为社会生活的研

究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有力的分析。

另一相对狭义而更有实用性的文化的概念，于1926年至1950年间出现于人类学话语中，且自“二战”起便统治了社会科学的领域。文化的这一定义并非全部的后天习得行为，而只涉及其中关于意义 的那部分后天习得行为的范畴或面向。但是文化作为意义的概念实则包含了一个由相关概念组成的概念群，这种意义至少可以通过四种不同的方式来确定文化的某个范畴或场域，每一种方式都与某种程度上含义不同的非文化的诸范畴或场域形成对照：

文化作为一种致力于意义生产的制度性场域 。该文化概念的基础在于假设社会的诸形态由专事某些特定活动的不同制度群构成。这些制度群可以分为不同的制度性场域：按照惯例，可以主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其中，文化是专事意义的生产、流动和使用的场域。此外，文化场域还可以被细分为诸多子场域，例如艺术、音乐、戏剧、时尚、文学、宗教、传媒和教育。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有关文化的研究，就是研究这些制度性场域中的活动，以及在活动过程中所生产的意义。

该概念主要出现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话语中，但人类学家甚少使用。该意涵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把文化视为“高等”或“上流”的艺术和思想领域的评价性看法，雷蒙·威廉斯认为，这种意涵是在19世纪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1983:90—91）。但在当前学术话语中，这种用法通常已不再具有这种评价性和等级性的含义。美国文化社会学的主流研究类型始终在进行去神秘化的工作，致力于揭示那些对著名博物馆、艺术风格、交响乐团或者哲学流派起到巩固作用的制度性动力，这些动力极具自我扩张性、阶级自利性、操纵性并且日渐专业化。此外，文化研究尽管采用了相同的文化定义，但其使命却在于理解那些被高级文化代言人所鄙视的文化形式——摇滚乐、街头时尚、异装癖、购物中心、迪士尼乐园和肥皂剧。因此，文化研究仅仅将注意力放置在前人所忽视的、被设定品位的精英阶层贬低的那些意义生产场域。

该概念的问题在于它仅仅聚焦于特定制度性场所生产的特定种类的意义，聚焦于自觉的“文化”制度以及富于表现的、艺术的和文学的

意义体系。这种用法与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观念有某种程度上的共谋性，即在政治或经济场域里，意义只是上层建筑的赘生物；换言之，意义在“非文化”的制度性场域中无足轻重。由于政治和经济场域中的制度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活动场域的概念，到头来只是确证了一条广为流传的社会科学的预设，即文化仅仅是社会浪潮的浮沫。文化社会学将自身的研究限定在“文化的”机构，这对文化社会学家非常不利，割裂了研究内容。事实上，只有在这种限制性的文化概念被取代之后，文化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才得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急剧发展。

文化作为创造性或能动性　　。文化的此种用法主要出现在强势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的传统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社会学。在过去约四十年中，秉承这类传统的学者认为经济或社会结构广泛决定了社会行动，而文化只是从这种决定中逃逸出来的一个创造性的领域。沿袭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E.P．汤普森最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能动性的领域，而正是以写作了《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r,* 1981）的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阐释了这个概念。但美国社会学的行话普遍将文化视作结构的对立面，这一对立关系表示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文化理解的分歧，在于文化和结构的对立在当代社会学话语中是一种常识，但到了人类学中却成了无稽之谈。

在我看来，将文化定义为能动性并与结构进行对比的做法，也仅仅是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延续，“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会反对这种做法。它同时夸大了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的残酷无情以及象征行动的随意性。其实，社会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同时包含着结构和能动性。恶作剧、写诗等文化行动必然受到既有语言习俗、视觉习俗或者游戏习俗等文化结构的制约，而创造力和能动性在诸如汽车制造或修理等经济行动中亦不可或缺。结构和能动性间关系的特殊性可能在不同文化和经济过程中各异，但是武断地将经济或文化过程分别归类为结构或能动性绝对是严重的分类错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两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概念。在我看来，两者都在竞逐当今的主流地位。一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统治学术界的

观点，它将文化视为象征和意义系统；另一个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益流行，它将文化视为实践。

文化作为象征和意义系统　。该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统治美国人类学界，而当克利福德·格尔茨在他最著名的几篇论文标题（1973e，1973h，1983b，1983c）中使用了“文化体系”这个术语之后，这一概念更是名声大噪。同时，戴维·施耐德（1968，1976）也对文化体系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他的尝试虽然缺少了格尔茨的跨学科吸引力，但也对人类学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格尔茨和施耐德的文化体系概念源自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文化系统”。根据他的理论，文化系统作为象征和意义的系统，是社会关系特定的“抽象层面”，它与关乎规范与制度的“社会系统”、关乎动机的“人格系统”形成对比（Parsons，1959）。[6] 格尔茨和施耐德两人希望将文化系统从社会系统中区别开来。对他们来说，文化分析就是从具体的互动流中抽象出人类行动的意义层面。把文化定义为象征和意义的系统，目的在于将符号对行动的影响从其他类型的影响（人口、地理、生物、科技、经济等）中分离出来，因为所有这些影响类型都不可避免地混合在行为的具体序列中。

格尔茨和施耐德的后帕森斯式文化体系理论绝非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象征人类学中的唯一模型。从受涂尔干影响颇深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学派走出的维克多·特纳的研究在当时也拥有庞大的影响力（1967，1969）。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作为象征和意义体系的模型，这源自索绪尔的理论，认为文化系统是由能指（signifiers）和所指（signifieds）组成的。此外，所有这些人类学学派都体现着更大范围的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它通过广泛而多样的努力来解释人类象征系统的结构，并揭示其对人类行为的深刻影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例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57]1972）、雅克·拉康（1977）或早期的米歇尔·福柯（1971）。他们都主张文化意义的系统性和象征系统的自主性，这两者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其他特征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化约性。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一个纯意义的领域，试图说明其内在的融贯性和深层逻辑，这种文化分析实践多少能体现出共

时性和形式主义的特点。

文化作为实践 。过去的十五年见证了发生在诸多学科领域和思想传统中的一次反击，其对象是文化作为象征和意义系统的概念。学者们打着诸如“实践”“反抗”“历史”“政治”或“文化作为工具箱”（culture as toolkit）的口号，反对将文化看作是有逻辑、融贯、可共享、统一而静态的。相反，他们坚持认为文化是充满了意愿行动（willful action）、权力关系、斗争、冲突和变迁的实践活动的场域。

在人类学领域，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er）在1984年强调了人类学中朝向政治、历史和能动性的转向，并建议以皮埃尔·布迪厄（1977）的关键概念“实践”作为这种正在兴起的感性的标签。两年后，詹姆斯·克利福德和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以论文集《写文化》（*Writing Culture*，1986）向公众宣告了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危机。从此，对文化作为象征和意义系统的概念的批评愈演愈烈。最著名的人类学研究纷纷关注起它们所研究的不同社会中生产的意义和人类学文本中表达出的意义，并支持这些意义所具有矛盾性、政治性、可变性以及碎片化的特质。人类学近期的研究将文化这一术语重铸成一个述行性（performative）术语。

对文化的述行性的强调无疑契合了大多数文化史学家的研究，他们普遍对共时性的概念感到不适，所以在着手研究文化时，他们通过强调文化意义的矛盾性和延展性以及找寻意义转化所依靠的机制，而又细致地修改了文化的概念。在本书第二章中详细讨论的历史学中的观念之争，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一方将历史变迁视作纯文化的或纯话语的进程，另一方则强调在历史变迁中经济和社会作为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性，或者强调具体“经验”在理解历史变迁时所占据的中心位置。[7]

社会学家对述行性的文化概念的支持则出于截然不同的考虑。鉴于因果论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在当代社会学中的霸权地位，文化社会学这个新兴的分支学科为了赢得认可，亟需证明文化在说明因果关系上的效用。这种需求导致大量的文化社会学家将文化概念化为影响行为的诸变量的集合，以此与社会学中的常规变量如阶级、族群、性别、教育程度、经济利益等进行比较。这导致了由早期韦伯、涂尔干、帕

森斯式的文化概念向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式的文化概念的迁移，前者笼统且模糊地将文化视作“价值导向”，后者则认为文化是由“行动策略”的“剧目”组成的“工具箱”（1984）。这样一来，对于许多文化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并非一个融贯的象征和意义体系，而是喻指可以用来理解行动表现的不同“工具”的集合。正因为这些零散、局部的工具作用于各种具体目标，它们才能以一种作为跨地区的、普遍的意义体系的文化所不具备的方式用作解释变量。

## 文化作为系统和实践

在过去二十年中，大量有关文化的理论都假设作为象征意义系统的文化与作为实践的文化是相左的观点。在我看来，两者无法相容的原因是文化作为意义系统的最著名的鼓吹者都极力排斥或边缘化文化作为实践的概念。

我们可以在克利福德·格尔茨和戴维·施耐德的著作中观察到这个现象。格尔茨的分析文章往往有着很好的开头，因为他经常将文化体系作为解决从具体实践中产生的难题的方法，例如国葬、恍惚（trance）、王室巡行和斗鸡。但从结果上来说，讨论实践首先是为了把论文导向以共时性的方式说明异域文化实践背后的融贯性的目标。如果格尔茨仅仅是将实践问题边缘化，那么施耐德则通过归谬法将其彻底驱逐，他认为人类学在学术劳动分工中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作为象征和意义系统的文化，这种象征和意义出自其自身的性质，且参照其自身的结构”，把社会行动如何被结构化的问题留给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1976:214）。对于施耐德来说，“文化说明”（cultural account）应当仅限于说明既定意义领域中诸符号之间的关系。他倾向于认为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无疑都理解和接受这些关系，并且这些关系有着极为确定的形式逻辑（见，如1968）。

格尔茨和施耐德对实践的排斥并非个别现象。詹姆斯·克利福德（1986）批评说，文化人类学传统的写作模式往往会将一些有待大量商榷的假设夹带到民族志表述中，例如假设文化的意义通常是共享

的、固定的、有界的并被深度感受的。在克利福德对民族志修辞的批评上，我想对民族志方法作进一步的补充批评。以文化作为系统的概念研究的人类学家多专注于研究可以体现高度融贯性和系统性的象征意义群，例如美国的亲属关系或者巴厘岛斗鸡，并将他们对这些象征意义群的解释表现成对普遍文化的阐释的实例。这导致了社会学家所谓的因变量抽样（sampling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这即是说，这个学派的人类学家往往选择整齐地聚集成融贯系统的象征和意义，而忽视相对碎片化和不融贯的那些，以此证实象征和意义确实构成了紧密融贯的系统。

考虑到文化以此系统所显现出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向文化作为实践的转向就显得顺理成章且颇具成效，后者指出了前者的诸多缺陷，并且弥补了其分析方式上最显著的一些弱点。然而，将文化作为象征和意义的系统的概念与作为实践的概念对立起来的做法，在我看来是牵强的。系统和实践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相互补充，且互为前提。参与文化实践本身意味着调用现存的文化象征来实现某种目的。之所以会认为使用一个象征能实现特定目标，正是因为象征或多或少有着确定的意义，这些意义是由与其他象征间系统性构建的关系而得到明确的。所以，实践意味着系统。同样地，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实践实例化、再生产或是转化了（这一点最有趣）系统，系统便不存在。故而，系统也意味着实践。[8] 系统和实践构成了一种不可分解的二重性和辩证关系。所以，文化理论的关键并不在于将文化概念化为象征和意义系统还是实践，而在于如何概念化系统和实践之间的衔接。

## 文化的自主性

为了说明文化的自主性，我首先要陈述一些有关实践的假设。我假设在一切社会语境或制度性场域下，人类实践同时由所在环境下的意义和其他方面共同结构化，例如权力关系、空间性和资源分配。文化既不是一种特定的实践类型，也不是发生在特定社会场所中的实践，而是普遍意义上人类社会实践中的符号学维度。我将进一步假设，这些实践的维度相互塑造、相互制约，但也在彼此间保持一定的

自主性。[9]

我们也可以通过将文化看作一个系统来理解实践的文化维度的自主性。实践的文化维度相对于其他维度的自主性体现在两层含义上。首先，文化的符号学结构化的准则与其他诸如政治、经济、地理的结构化准则不同，也能对实践造成影响。所以，即使某个行动几乎完全由经济资源悬殊所决定，根据某种符号学逻辑（即在语言或其他形式的符号中），这些不均衡在行动中依旧可以是有意义的。举例来说，某名穷困潦倒的工人只能接受当地唯一招人的制造商提供的工作，别无选择。然而对于该工人来说，接受这个工作不仅仅是服从雇主，同时也以一名雇佣工人的身份进入了一段由文化定义的关系。其次，文化维度的自主性还在于组成它的诸意义，除了受到其使用情境的影响之外，还被其他各种情境塑造和再塑造。一个象征的意义往往会超越自身所处的特定语境，因为同样的象征还会在其他不同的社会实践实例中被使用。所以，我们的这位工人进入的“雇佣工人”关系不仅承载着某些被公认的意义，如服从，也可能承载了他相对于雇主的独立性或者与其他劳工之间的团结。恰恰是这些从其他社会语境中援引的意义，决定了雇佣劳动的意义，这里的其他社会情境不单是指其他的雇佣关系的实例，还指法规、法律论证、罢工、社会主义小册子以及经济学专著。所有这些方面对影响地方性行动的的可能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这个例子来说，这段雇佣劳动关系赋予工人抵抗雇主的力量，大于地方环境所单独赋予的力量。

要完全理解文化维度的自主性的第二种含义，我们必须要注意，构成文化的符号学关系网络和构成我们所谓“社会”的经济、政治、地理、社会或者人口关系网络不是同构的。一个特定的象征，例如母亲、红色、聚酯、自由、雇佣劳动和污垢，不仅能够出现在特定制度性场域的不同地点，例如千万家庭中的母亲身份（motherhood），同时也能出现在不同的制度性场域里，作为强势政治象征的福利母亲（welfare mother）[(2)]、语言学争论中的母语，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圣母。所以文化可以被视作一张覆盖整个社会的符号关系之网，这张网拥有与制度、经济或政治网络不同的形状和空间性。[10] 既定制度性场所中某个象征的意义，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制度性场域和空间地点的

动力学进行再定义例如，由于20世纪50年代时“红色”这个象征的政治意义极具影响力，一支叫辛辛那提红人（Cincinnati Reds）的棒球队不得不改名为“红腿队”（Redlegs）。正是此类事实，让实践的文化维度有可能具有（实际上是确保了）相对于其他维度的某种自主性。

如果文化具有一种独特的符号学逻辑，这就表示文化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融贯性。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夸大或误解象征体系的融贯性。我认为文化体系的融贯性是在粗略的索绪尔式意义上具有符号性的，也就是说，某个符号或象征的意义，是其与系统内其他符号的对立或差异之网的功能。这意味着文化的使用者将组成一个符号共同体，其中所有人都认可同一套对立关系，从而有能力参与对彼此都有意义的象征行动。如果用常见的语言学术语来类比，他们能够使用一套符号系统的“语法”，以产生能被理解的“言说”。

然而要注意的是，实际上该概念仅仅涉及最低限度的文化融贯性，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弱（thin）融贯性。事实上，虽然一个符号共同体内的成员认可同一套象征对立关系，但是这无法决定他们将基于自己的符号学能力发表何种陈述或者采取什么行动，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共同体。他们并不需要对既定象征的道德或者情感评价达成共识，他们共享的符号场域也很有可能被处于激烈敌对而非团结状态的群体和个人认识和使用，或者被互不相关的个人认识和使用。所以，文化融贯性的假设并不能说明符号场域是大还是小、深还是浅、全面还是专门，它仅仅说明意义之所以能存在的前提是诸符号间存在着的各种系统性关系，并且这套关系被特定的群体所认识。

这种索绪尔式的概念表明，只有弱的文化融贯性看起来与某些解构主义的论断相一致。解构主义的全部要点是揭示语言意义的不稳定性，并将这种不稳定性归咎于语言本身的指涉机制，即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恰恰依靠于与其对立或相异的符号的对比。因此，语言不可避免地被它所排斥的术语的痕迹所纠缠。这使得文本或言说的意义从来都漂浮不定，拯救意义的努力只能无可奈何地臣服于大量替代性或对立的解释，而不是驱逐它们。

人们通常以为像我这样期望论证文化体系强大约束力的文化分析

者，会时常小心翼翼地与解构主义理论保持距离。然而这远非实情。事实上，我认为一种对意义的宽泛的解构主义理解，对任何尝试理论化文化变迁的学者都至关重要。解构并没有否认融贯性的可能，只是如我前文提到的那样假设象征系统内在的弱融贯性，并一再证明我们视为确定或真实的所有文本及话语实则十分可疑且不稳定。这似乎与文化的实践性观点完全契合。解构主义假设象征系统有其（索绪尔式的）逻辑，但此逻辑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他指出如果一个给定的象征系统在使用时清晰明确，这并非仅仅归功于该系统的符号学特征，而是取决于符号结构在实践中如何与其他结构相互连结，比如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等。[11]

至此，我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了作为系统的文化，不过这些内容对我们如何能够把文化概念化为实践也有所启发。首先，文化作为符号的概念意味着某种特殊的文化实践观念，即参与到文化实践中就意味着对符码的使用，以在世界中有所行动。一个符号共同体中的成员，不仅能够认识由这种符码所构成的陈述（见上文），同时也能在实践中使用这种符码。使用某个符码意味着将抽象意义上可获取的象征附加到具体的事物和环境上，并对它们提出假设。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说，能够使用某个符码（或图式）意味着有能力解释、修改、适应其规则来应对新的环境，而不只是机械式地将其套用在相似的情境中。

世间事物的存在 从未被我们抛出的象征之网所完全捕获，它们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预先存在的物理性质、所在的空间关系、投入的权力关系、拥有的经济价值，当然还有其他行动者赋予它们的象征意义。世界对我们所断言的意义桀骜不驯。因此，正如马歇尔·萨林斯所指出的，每一次象征性的归因行动都让象征面临风险，使象征的意义可能为不确定的实践结果所变形乃至彻底改变。虽然一般情况下这种变化是微小的，但是也会出现特别的例子，比如夏威夷酋长使用禁忌范畴强制性地垄断了与西方商旅之间的贸易权，在这种场合下，新的归因可能导致一个象征的意义在历史进程中的改变（Sahlins, 1981:67—72; 1985:136—156）。

行动者利用象征的不同意义并根据自身目标重新定义情境的能力

是文化实践得以产生影响的部分原因。创造性的文化行动往往涉及意义从某一社会场所或语境向另一社会场所或语境的目的性或自发性的输入。有关意义输入的问题，我早先曾研究过一个生动的案例。1789年7月占领巴士底狱的男男女女无疑被叫作“人民”（the people），此称与“暴民”或者“城市贫民”具有同样的含义。而巴黎市民中的激进派和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利用“人民”这个词的歧义性进行了一次概念游戏，他们把占领巴士底狱的人们塑造成激进政治理论中的主权化身——“人民”这种抽象范畴的具体实例。在城市群众暴力的语境中植入人民和主权相互联系的政治理论语境，对开创现代革命概念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见本书第八章）。

## 作为不同意义世界的诸文化

到这里，我讨论的仅是单数和抽象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并与其他非文化的领域截然不同。我的主要观点可总结如下：我们应当将文化理解为系统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体。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文化比之其他维度有着自主性的逻辑与空间构型；文化也的确具有融贯性，但是它的融贯性相当薄弱，很容易在实践中面临风险，并由此产生转型。我认为，此番理论化，使我们更能接受近来的中肯批判，同时也保留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导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那个可行而又强有力的文化概念。

不过我们可以说，最近关于文化的理论著作，实际上主要关注复数的、更为具体意义上的文化，即作为不同意义世界的诸文化。这点在人类学领域尤为显著。当今人类学普遍批判作为系统的文化，并坚信文化作为实践的首要地位；但在我看来，这些批评事实上并非针对我上文中指出的作为系统的文化——即象征的意义由它们与其他象征的关系网络所决定这一观念。相反，这些批评的真正目标是诸文化（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化，即复数意义的文化）构成了完美融贯的诸整体的观念，这些文化始终逻辑连贯、高度整合、代表共识、抵抗变化且界限分明，就像经典民族志中的诸文化所体现的那样，如米德[3]笔下的萨摩亚人、本尼迪克特笔下的祖尼人（Zuni）、马林诺夫斯基[4]

笔下的特洛布里恩人（Trobriands）、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5]笔下的努尔人（Nuer），或是格尔茨笔下的巴厘人。不过，近来有关文化实践的思考与研究，即使在处理相对“简单”的社会时，也不再盲目遵照这种老派模式了。今天，我们将文化视作不同的意义世界，它们通常是自相矛盾、松散整合、有争议、易变高度渗透性的。结果，视诸文化为融贯的不同实体的观点备受争议。

诸文化是自相矛盾的 。一些经典民族志的作者深知他们所研究的种种文化中出现的矛盾。例如维克多·特纳指出红色在恩登布人（Ndembu）仪式中同时象征着母亲生殖力与男性杀戮这样自相矛盾的原则。不过他随后强调了这些潜在相互冲突的意义是如何在仪式展演中被联系在一起并相互调和的（1967:41—43）。现今人类学的敏感性更关心这些矛盾的深层特性，而不只是它们在仪式中情境性的调和。强有力的文化象征通常既表现出融贯性，又表现出等量的矛盾性。拿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象征举例，三位一体试图将三种毫不相同且无法相容的宗教经验合而为一：权威与等级森严的正统信仰（圣父），慈爱的平等主义和恩泽（圣子），以及神魂超拔（ecstatic）的自发性（圣灵）。诸文化世界的内部通常布满矛盾。

诸文化是松散整合的 。经典民族志认为社会由不同的活动场域组成——例如亲属、农业、狩猎、战争和宗教——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其自己特定的文化形式。但是这些经典民族志的写作者通常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展现这些文化多样的组成部分是怎样被融入一个高度整合的文化整体之中的。当今多数研究文化的学者对此皆有异议，并更倾向于找出不同活动场域中产生的离心的文化趋势，发掘不同活动之间的不平等，认为任何“整合”都基于权力和支配，而非某种共同的精神气质。这种趋势还在日益增强，因为大部分的人类学家目前越来越致力于分析复杂、多层次和高度分化的各种社会，而不是大部分经典民族志所集中钻研的“简单”社会。

诸文化是有争议的 。经典民族志通常假设或暗示，一种文化中最重要的信念总是得到一致同意的，也就是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认可。现今学者对种族、阶级及性别更为重视，因此他们强调在特定社会秩序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们通常也抱有不同的文化信念，抑或对某些表

面上相同的信念具有不同理解。由此，当今学界争相描绘次级群体或个人的种种“反抗”。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1985）发现了当代马来西亚社会中构成农民顺从背后的深层内核的“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而马歇尔·萨林斯（1981:46）也指出，正是夏威夷的女性在库克船长乘船抵达后，最为积极地抵抗禁忌体系，因为该体系把她们归类为与神圣（禁忌[tabu]）对立的凡俗（noa）[6]，禁忌“不在她们身上，而只在男性身上展现力量”。文化的共识并非事物的常态，而是一项艰难达成的成果，一旦达成，它便要隐藏那些被压制的冲突与非议。

诸文化受制于持续变迁。研究不同社会的复杂性和动力学的文化史学家，普遍认为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那些研究相对“简单”社会的晚近的人类学著作，也发现这些社会有着明显的转变。举例来说，雷纳托·罗萨尔多（1980）关于吕宋地区北部伊朗革（Ilongot）这一偏远地区的猎头人（headhunters）的研究向我们展现，每一代的伊朗革人都建构出一套自己的关于定居模式、亲属联姻和世仇的逻辑——这些逻辑给数代伊朗革人多种多样的经验，其丰富性不亚于那些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晚期几代欧美人所拥有的经验。

诸文化的界限薄弱。很少有社会或它们自身的文化体系是被完全孤立或界限严格的。即使是被假定为最简单的社会，亦必须拥有贸易战争和征服的关系，也必须借用以下种种文化元素——技术、宗教观念、政治和艺术形式等等。除了这些元素相互间的影响，始终有一些重要的社会与文化进程能够跨越社会边界——殖民主义、传教、地区之间的贸易协会和经济依赖、移民流散，以及当下的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即使这些跨社会的进程在晚近的历史中比以前更为显著，但它们也不是全新的。试想所谓的“世界性宗教”，例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或者佛教在全球各地的广泛传播，或者古代帝国广阔疆域的发展。我想说的是，社会科学曾一度毫无疑问地将诸社会视为经历内生发展且界限分明的实体，这种模式不论对研究还是研究经济史或政治社会学来说都是不正常的。不同意义体系并不与国家或社会的边界整齐对应——即使这些边界也并非如我们时常想象的那样整齐。我们命名的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应当包含或者不包含大量互相

重叠和渗透的文化体系，其中多数是亚社会或跨社会的，或两种性质兼而有之。[12]

总而言之，经典民族志对诸文化这一模型的所有假设——如文化逻辑一致、高度整合、代表共识、抵抗变化且界限分明——看起来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融贯的文化概念是彻底虚幻的：特定社会中的文化实践是分散和去中心的；特定群体中的局部的意义体系本身不构成更高级别的、贯穿全社会的意义体系。在我看来，这个结论仍是仓促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仅将文化进程看作融贯的或整合的整体是错误的，但我们也不能先验地排除这种融贯性。

## 融贯如何可能？

近期关于文化实践的研究集中在文化反抗行动上，尤其是去中心的反抗，例如违反日常习俗、颠覆既定价值、表达被支配者对支配者仇恨的行动。[13] 但我们也要记得，大多数文化实践都集中于强大的机构节点上或周围，包括宗教、传媒、商业机构，还有最重要的国家。这些往往是相对大规模、集权而富裕的机构，都是文化行动者；这些机构的能动者持续利用大量资源，试图将意义秩序化。因此，研究文化必须对两者等量齐观，既要关注在文献中随处可见的分散的反抗行动，又不能无视这种集中的文化实践。[14]

即使在自称极权主义的强大国家机器中，占中心地位的文化行动者也无法实现文化的统一性。事实上，他们也不会这样做。对支配性的行动者和机构而言，通常选择的文化策略与其说是建立统一，不如说是组织差异；一方面积极对偏离了被约制理念的实践和民众进行规范化或同质化，一方面也对它们进行分层、归类、驱逐、定罪、霸权统治以及边缘化。通过这些方式，权威性行动者给文化实践的场域强行注入了某种融贯性，并或多或少取得成功。[15] 事实上，正是文化概念被强有力的机构行动者以以上所有方式使用，导致各种观点不同的人类学家对此概念产生不适感，不过讽刺的是，有时恰恰是人类学家自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这种组织差异的过程生产的融贯性，与传统民族志研究里描绘

的紧密的文化整合大为不同。但是，当权威性行动者区分高级与低级、多数与少数族群、合法与犯罪、正常与反常的文化实践时，他们将不同实践带入符号关系，也就是依据相互之间的对照来定义。权力中心实施的那些权威性文化行动，能够将此起彼伏的文化意见转化为建立起符号和政治秩序的差异场域。这些行动创造了一幅“文化”及其变体的地图，依此人们可以将自身以及自身的实践定位在官方的秩序图中。

当然，官方的文化地图总是受到边缘文化的批评和抵抗，但是实际上次级群体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的地方性意义体系向支配性文化靠拢，而对抗支配性意义的行动自身意味着对其中心性的承认。支配群体与反抗群体之间持续互动，时时在采取行动时相互算计。即便一方试图战胜或者削弱对方，双方都在辩证互动中相互形塑。斗争和抵抗这两种形式远不能说明诸文化之间缺乏融贯性，反倒是会自相矛盾地将文化场域简化并加以明确。

此外，持异议和反抗的群体也会采取分层、归类、驱逐等策略创造并保持其拥护者间的文化融贯性，而这些恰恰也是权威者的惯用手法。总之，持异议的群体也能像支配性机构那样政治性地使用文化的概念，这种使用也和国家一样产生了驱逐、规范化和边缘化的效果。举个典型的例子，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和族群主义的运动，总是试图将文化纯洁性的标准强加到被认为是群体成员的人身上，并以此来区分成员和非成员之间的差别。

当然，这些都还无法说明文化在任何场合都毫无疑问地具有融贯性。相反，它们表明融贯性是多样的、有争议的，持续变化的以及不完整的。文化融贯性就其存在来说，是权力和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符号学逻辑的产物。然而权力的运作，不论是中央机构的努力还是反抗这些机构的有组织的行动，都采用了相同的做法：让潜在杂乱的符号服从于特定秩序，即规定（有争议的）核心价值、规训异议者、绘制界限和规范——总而言之，都围绕着意义的生产和消费。作为文化分析者，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融贯性的存在，并且以解释融贯性的实现、维持和消解为己任。

世界再也无法被划分成诸多具体的、拥有各自相应且高度整合

的“文化”的“社会”。我深深以为，文化这个概念的价值应该是在非复数的意义上，应用复数形式更加要直面其术语合法性的问题。但是，复数形式的文化概念帮助我们回归到某些需要维持看法：不同时空下的诸意义世界具有各自的特殊形态和一致性，以及尽管存在着冲突和反抗，诸意义世界还是以某种方式相连在一起。不管我们称呼这些部分融贯的意义景观为“诸文化”或其他什么名称，如意义世界、族群景观或霸权，在我看来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它们的界限是相对且不断变化着的。作为文化分析者，我们的任务则是识别诸地方性意义的形态和一致性，确定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原因与范围。

注释：

本章原以相同标题发表于*Beyond the Cultural Ture: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ed. Victoria E.Bonnell, Lynn Hunt, Copyright©199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许可后再版。在此我要感谢安妮·凯恩（Anne Kane）、戴维·莱廷、克劳迪奥·龙尼茨（Claudio Lomnitz）、谢里·奥特纳、比尔·雷蒂（Bill Reddy）、马歇尔·萨林斯、保罗·西利（Paul Seeley）、安·斯威德勒以及莉萨·韦登（Lisa Wedeen）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评论。

1 ．关于本争论具有洞见的分析，见Brightman（1995）。

2 ．以此法研究的一个成果见Sewell（1980）。

3 ．有关此类研究趋势，Veeser（1989）做了很好的介绍。

4 ．对于这种焦虑最为著名的阐述，见Clifford and Marcus（1986）编辑的文集。

5 ．我在此处区分的两种类型的意义可以是重合的，以便将某类族群或社会群体之生活的文化方面与非文化方面进行区分。因此，“巴厘文化”可用来与“巴厘社会”或者“巴厘经济”形成对比。不过在人类学者的使用中，“文化”一般也用来指代特定民族的全部社会生活，所以“巴厘文化”成为“巴厘社会”的同义词，而非与其相对。

6　．格尔茨和施耐德都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塔尔科特·帕森斯和克莱德·克卢克洪（Clyde　Kluckhohn）的学生，并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此地正是当时文化人类学的中心。

7　．见本书第二章，尤其是注释29，以及Appleby，Hunt，and Jacob（1994:198—237）。

8　．读过Marshall Sahlins（尤见1985:136—156）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一构想十分熟悉。

9　．我提出“社会生活的诸维度 之间相对 自主”这个观点，并不是想说明这些维度在某种意义上优先 于文化，或者完全独立于文化而存在，人类学家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也在对本章首次发表的文集的评论中持相同的论断（2002:1516）。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全力说明我同意汉德勒关于一切社会行动都由文化构成的观点，但我不同意汉德勒认为文化可以用来充分解释社会生活这一隐含看法（这是在人类学家中非常普遍的一个观点）。虽然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行动仅仅由 意义形塑。其他约束和压力的秩序（例如资源的富足或缺乏，强制力的整体不一致，行动者和资源的空间位置和物理移动性）可能本身就是符号驱动的行动的结果，通过逃离行动者的意识的方式持续影响着社会行动，这不仅仅是通过符号学分析就能解释的。我认为一个利用经济学分析、地理学分析或者人口学分析的见解来进行的文化研究项目，要比一个忽视和摒弃除了符号学分析之外的一切其他分析传统的研究项目更为有力。对这一点的早期不同说明，请见Sewell（1993）。

10　．关于文化的空间方面，请见Lomnitz-Adler（1991）。

11　．当然，这并非解构主义者通常会得出的结论，这些人认为“其他结构”并不比符号结构具有更少的文本性，而理解它们的关键只不过是互文性的问题。我与解构主义立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区别，说明我只是从解构主义中挪用了特定几个观点，而非全盘继承。

12　．阿尔君·阿帕杜莱关于跨国文化种种形式之晚近形态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影响力（1991，1996）。

13　．相关批判性的讨论，请见Ortner（1995）。

14 ．关于国家文化实践的精妙研究，请见Wedeen（1999）。

15 ．这种描述在我看来与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观点大体一致（1971a）。关于政治的两个不同的葛兰西式文化分析，请见Stuart Hall（1988）和Laitin（1986）。

---

(1) 即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研究结构—功能主义著称。—— 译者注

(2) 亦称“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在美国指通过欺诈等手段滥用或收取过多福利金的妇女，往往是针对黑人、单身母亲的污名化标签。—— 译者注

(3) 即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米德（Margaret Mead）。—— 译者注

(4) 即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译者注

(5) 即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 埃文· 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t- chard）。—— 译者注

(6) 在毛利语中，noa指的是禁忌的缺位（without tabu/the lifting of tabu）、普通、非神圣、凡俗的情况。—— 译者注

# 第六章　历史、共时性和文化：反思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研究

克利福德·格尔茨无疑是他这一代美国人类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尽管有其他学者在人类学领域中与其针锋相对，比如马歇尔·萨林斯或是维克多·特纳，但没人能像格尔茨这样对自己所在学科之外的读者有如此重大的影响。[1] 诚如雷纳托·罗萨尔多所言，格尔茨已成为“人类学的代言人”。

格尔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人类学领域的超级明星以前，就已经获得了代言人的身份。这个位置之前是由露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所占据的。米德与格尔茨曾一度同为人类学的代言人。她拥有大批拥趸，定期为女性杂志《红皮书》（*Redbook*）撰写专栏，还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观点，涉及的话题包括核军备竞赛、青少年犯罪、全球饥荒以及性教育。而格尔茨的代言人角色似乎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更为接近。相比于讨论当前的社会问题，两人对人类学在社会和道德哲学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更感兴趣；本尼迪克特也和格尔茨一样，是位有天分的、文笔自成一格的作者，对民族志式的哲学故事（*contes philosophiques*）兴趣盎然，这可以从《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中有关祖尼人、多布人（Dobu）和夸扣特尔人的优秀文章里看出端倪，这些文章当然是格尔茨后来自创的流派中的经典之作。即便同为人类学的代言人，格尔茨和本尼迪克特面对的受众有殊。本尼迪克特的作品，如《文化模式》（1934）的目标与实际读者是接受过教育的公众（亦见Benedict, 1946）。格尔茨似乎也以受过教育的公众为目标读者，但实际上，受到他的作品影响的主要是社会科学、文学研究、哲学等学科的从业者与学生。[2]

格尔茨成为学科代言人后，在美国学术界获得了偶像级的地位。这也让他容易受到反偶像浪潮的影响，尤其在他所处的人类学领域，他成了被不同思想背景的同行批判最多的人类学家，抨击之声来自实证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等。[3] 实证主义者批评格尔茨放弃了“可预测性、可复制性、可检验性和生成规律的能力”等科学的

价值，转向更为“迷人”或“魅惑性”的阐释性方法。[4] 与之相反的是，后现代主义者责难他未将阐释性的方法充分展开，尤其是他的阐释性民族志实践未能得到批判性阐释（Crapanzano, 1986; Clifford, 1988b; Watson, 1989, 1991）。最后，唯物主义者批评他忽视了历史、权力和社会冲突（Roseberry, 1982; Asad, 1982 and 1993,尤见第1章）。

与格尔茨同他的人类学同行间这种相当紧张的关系相反，历史学家早就热情地接纳了他这位代言人。他们大多友好地直接引用他的研究，继而把他的方法和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5] 当然，比起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整体上对参与理论论战兴趣不大，格尔茨也确实没有在历史学家的代际争论中扮演标志性角色。而且，历史学这个专业中很少有人被认为是实证主义者，即便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但奇怪的是，历史学家在三思熟虑后也没有接纳唯物主义对格尔茨的批判。

威廉·罗斯伯里（William Roseberry）的《巴厘岛斗鸡与人类学的魅惑》（“Balinese Cockfights and the Seduction of Anthropology”, 1982）是个详细阐述了唯物主义批判的例子，它应该与多数社会史和文化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论承诺高度相符。罗斯伯里认为，格尔茨通过把文化概念化为文本，采用了一种事实上的唯心主义立场，把文化产物从它们的历史性生产和本质上所处的权力和支配关系中脱离出来。他指出，格尔茨无法说明性别关系、荷兰殖民者和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法律规定、巴厘岛地位形成中的政治变迁如何塑造了当代巴厘岛的斗鸡活动。格尔茨的文本中提到了这些因素，却没有真正地采纳它们。[6] 罗斯伯里坚称，斗鸡“经历了一个无法脱离巴厘岛历史的创造过程”，但格尔茨将之视为文本，使之实际上脱离了巴厘岛的历史（1022）。罗斯伯里认为，我们不该把文化概念化为文本，应把它看成是“一种物质性的社会进程”，看成是一种“生产”（production）而非“产物”（product），并且时常追问文化是被谁生产、如何生产、为何生产的（1023—1224）。罗斯伯里断言，如此能“把文化分析推向新的高度”，也能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古老的二律背反不复存在”（1026—1027）。

在罗斯伯里专门针对格尔茨的斗鸡研究的批评中，大部分与历史学家的偏好产生了共鸣。然而，他建议的用“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去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二律背反”（1024）的做法几无可行之处，因为人们通常无法通过仅仅支持其中一方的办法来克服二律背反。[7] 但要是近距离考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或许就偏离了罗斯伯里真正的主旨，也就是历时性和共时性之争。问题不在于格尔茨的形而上学承诺，而在于他的方法论实践（事实上，我将在后文中论及，格尔茨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凭据是无懈可击的）。罗斯伯里指出，把文化展演看成是文本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纳入、使它经受共时性的凝视，并搁置有关文化生产过程的问题，以便探寻其内部逻辑。

我认为，每一种文化分析，都必然 牵涉到一个像这样的共时性时刻；但我也认为，我们应将共时性时刻与同样必要的历时性时刻辩证联系起来。我同意罗斯伯里认为格尔茨进行文化阐释时往往会轻视历时性的看法；用我的话来说，格尔茨的研究对历时性和共时性之间必然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大幅的删节。格尔茨有不少论文（包括有关斗鸡的文章在内）都是在描绘真实历史时间中的某个事件，其中，处于特定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特殊个体，参与了相关的社会行动；在斗鸡一文中，这种社会行动指的是警方的一次突袭，驱散了村内观看斗鸡的观众。对如此时间性和社会性细节的介绍，是格尔茨指出论文真实目的的文学手段，即明确指出文化实践背后共时性的、美学上令人满意的融贯性。格尔茨通常不会从共时性中回过头来加深我们对生产了文化展演的偶连历史环境或结构性社会张力的理解。[8] 由此，尽管我认为罗斯伯里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问题的援引十分混乱，但他对格尔茨的批评要比实证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更令人不安。他恰恰指出了那些对社会史学家来说最为严重的弱点。

## 格尔茨和历史学家

迄今为止，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社会历史学家都对格尔茨的研究作出了大量回应。罗斯伯里的批判由此引出了一条悖论：为什么会有那

么多以研究历时性变迁为本职的历史学家，会深受致力于研究共时性的人类学家的影响？

盖尔·鲁宾在她的开创性研究《贩卖女性》（“The Traffic in Women”）中感谢她的本科老师马歇尔·萨林斯给了她所谓的“人类学的启示（revelation）”（1975:157）。此言不虚。我猜测，这里的“启示”是指我们的世界是偶然而非必然的，即便同为人类，我们现存的生活方式千差万别；因此，我们的未来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可能要开放得多。这是人类学经年累月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对于司理人类学代言人之职的本尼迪克特、米德和格尔茨而言，他们代代相传的核心义务就是传递这条信息。当然，他们切实地履行了职责。我甚至怀疑是否所有人类学家最初都是受到了“魅惑”或者“诱惑”而选择了这个学科，这些诱惑来自同时发现异域文化中截然不同的他者性和人类的可理解性时的喜悦。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接受专业训练的过程中，学会压制由认识异己带来的最初的战栗，代之以使用被认为是普世的、但事实上非常西方的学术符码，来努力涵盖异域的实情。格尔茨和前任代言人本尼迪克特一样，都致力于保持活跃，并向他们的读者传播人类学的启示。正是这让他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学科代言人。

如若历史学家确实被格尔茨的魅力所感染，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历史学基于相似的诱惑。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和我们的世界在结构上不同，那里人们的动机、荣誉感、日常工作和政治盘算，都基于我们不熟悉的对人类社会和宇宙秩序的假设。很多最伟大的历史学作品，比如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958）、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1954）、马克·布洛克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1964）、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还有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8），都向我们展现了和巴厘、祖尼或特罗布里恩群岛一样陌生的世界。历史学和人类学一样，擅长发现和呈现人类的多样性，只不过是基于时间而非空间维度的。它表明，即便是我们祖先的生活，也与我们的生活相去甚远。由此，格尔茨试图探究异域社会的文化逻辑的人类学，与

一种重要的历史学感性预先对接。

当20世纪70年代早期格尔茨发表《文化的解释》时，人类学实践对历史学还有另一重贡献。格尔茨成为学术超级明星时，正处于社会史在历史学专业中达到支配地位的时期。社会史的兴起给历史学领域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研究高层政治以及政治、文化精英的行动，转向研究社会结构和普通人的行动。在美国，社会史的第一波浪潮，以向社会学借用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定量方法）为开端；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第二代美国社会史学家（包括我本人）开始体会到单靠定量研究的路径根本无法完全把握普通人生活的肌理和意义（见本书第二章）。格尔茨所实践的人类学，似乎提供了一种深化研究的方法。和社会史一样，人类学专注于普通人的实践，而非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的实践；它主张在普通人的仪式、社会习俗和语言中，揭示那些有着复杂的象征主义、流溢着意义的生活。

人类学家比之历史学家，在研究极少被书面记录的人群的思想和行为时有显著的优势。他们可以和研究对象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介入他们的谈话、观察他们的仪式并参与他们的日常活动。历史学家对农民、工人、奴隶、女性或是殖民地人民的研究，都仅限于保存在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文字记录里；这些记录也往往不是普通人的原话，而是上层人士或统治者的语言。可恰恰是格尔茨的文化理论，给了历史学家希望和效仿的理由。格尔茨一直强调，意义不是闭锁在行动者的脑海之中的，而是具体体现在公开可及的象征里。他坚持认为，构成某种文化的象征系统“和婚姻一样公开，和农业一样可以观察”（1973h:91）。格尔茨告诉我们，优秀的民族志田野调查者，并不会对那些和自己短暂且不完整地分享生活的人产生某种移情的奇迹，也并不会习得“和土著一样思考、感受和感知的超自然能力”（1983e:56）。民族志学者无法“感知到他的信息提供者所感知到的东西。他极为不确定地感知到的，是‘用’‘凭借’‘通过’某人或某物的感知”。为此，民族志学者的做法是，“寻找和分析象征形式，包括文字、图像、制度和行为，因为所有地方的人们事实上都用这些形式向自己和他人再现了自身”（58）。

显然，这种对有关文化的研究的概念化，让社会史学家增强了认

识论意义上的力量。我们这些研究亡者的人，显然不能指望自己直接分享亡者的经验，否则就会像天真的民族志学者那样，假想自己可以直接分享“土著”的经验。但我们可以在现存的文献里获得一些象征形式，这些象征形式是亡者经验他们的世界所依靠的。诚然，这些象征形式多是残片和二手资料，但这绝不意味着无法修复它们。格尔茨这种将文化概念化为由公开可及的象征系统的做法，为社会史学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认识论保障，有力地认可了用人类学的手段研究以往的社会的可行性。

## 共时性的使用

格尔茨的方法向历史学家所展现的人类学启示的脉络，本质上是共时性的。格尔茨的分析中最大的亮点，或者说“深描”得最深的，是他常说的“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s）（1973e, 1973h, 1983b, 1983c）。要想描绘一个象征的集合以及将它们运用为文化体系的实践，就要探寻出这些象征及其实践是如何作为整合的整体相互维持的。比如，一种宗教的文化体系是由两种互补的象征秩序构成的，一种是精神气质（ethos），即一个民族的“道德和审美的风格及情绪”，另一种是世界观（worldview），即“他们对纯粹现实中的事物存在方式的描画”，两者互为必需（1973h:127）。因此，对纳瓦霍人（Navahos）来说，“一种崇尚冷静的审慎从容、不屈不挠的坚持、有尊严的谨慎的道德体系，与极为强大、严格有规律与极具威胁性的自然界的形象相辅相成”。而对印度人来说，“一种超验的道德决定论，即一个人来世的社会和灵魂地位是他在现世行为的性质自动产生的结果，由与种姓制度相联系的仪式性的责任伦理负责补充完成”（130）。简言之，宗教调和了一个民族对真实世界和对适宜的生活方式的两种概念。正是这种相互增援赋予了宗教系统性的特点。但这种相互影响的体系绝不局限于宗教的场域之内。格尔茨在《巴厘的人、时间和行为》（“Person, Time, and Conduct in Bali”）中，指出巴厘人命名的实践与当地人的历法模型紧密相连，两者都强化了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这三个象征领域由此“由一种可确定的逻辑联系在一起”（1973g:404）。无论研究的主题是宗教、人的概念、雌雄同体

（hermaphrodism）、美学实践、斗鸡、意识形态、国葬或王室巡行，格尔茨的文化分析频繁地回到把文化比喻成内部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意义体系上。

用这种方法分析文化，是一种共时性的智识运作。尽管共时性的描述或分析经常被注解为“冻结”时间的“快照”，或是时间的“切片”，但此说不尽准确。它毋宁说是一种悬停（suspended） 或取消（abolished） 了时间的分析方式，使得在时间流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被看作同一时刻或时代的一部分而得以共存。就像“概要”（synoptic）[(1)] 意味着一瞥可见所有观点，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里，圣人一生直到殉道的所有场景都被一幅画中的连续景观囊括那样，“共时性”指的就是一个连续的时刻中包含不同的时间。换言之，在共时性的书写中，有文化意义的行动，被看成是一个相互定义和支持的、意义不变的宇宙（至少在分析的咒语打破它之前暂时如此），而不是被当成陈述和反陈述的时间序列，也不是连接前因和后果的因果链。

从表面来看，悬停时间是非历史的（unhistorical）程序，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历史的”（historical）这个术语，在当代用语中其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种是由词根“历史”直接延伸出的形容词的含义，指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日常发生，比如“历史序列”“历史连续性”或“历史叙事”；另一种含义意指“存在于过去”，与当下世界保持距离，比如“历史小说”“历史服饰”或“历史意义”。我其实认为后者是这个术语在日常和学术语言中的主要含义，因为只有将之与诸如序列、连续性或叙事这样意味着时间流动的名词结合时，它才意味着时间持续流动。因此，当我们告诫别人要“历史地思考”时，给出的是一条含糊的信息。我们可能指的是“更加有意识且明确地承认你正在思考的是‘过去了的’过去”，也可能指的是“把你正在思考的日常发生放到蕴含转型的时间序列中去”，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历史的”和“历史”的这两种含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时间情境的历史”和“作为转型的历史”，正是历史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两张面孔。作为时间情境的历史是“历史的”，指的是它身处某个过去的时代，但不考虑那个时代的变迁过程，而是关注我们可以称之为时间段

块（block） 的特定属性和氛围。事实上，这种历史展现了在过去常见但令今人陌生的逻辑，如何联系起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信仰、实践、判断和行动的形式，从而让我们自己和读者确信，我们确实理解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的事实。

在专业历史学家的练习和训练中，作为转型和作为情境的历史都被认可。任何无法同时用两种模式进行讨论的历史学家，都会被我们看成是不合格的。但在日常语言中，事实上是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模式在历史判断中占据优势。历史研究只要清晰描绘某些过去的生活世界的情境，即便不去（至少不着力于）阐述或解释历史转型，也能被拥立为杰作。试想路易斯·纳米尔（Louis Namier）的《乔治三世时期的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1929）、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罗芒狂欢节》（*Carnival in Romans*，1979），以及前文提及的赫伊津哈（1954）、布克哈特（1958）的作品，又或是罗伯特·达恩顿深受格尔茨影响完成的《屠猫狂欢》（“The Great Cat Massacre”, 1983）。反之，叙述了一段时间内的一系列变化，却没能说清当下与被描述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差异的历史学作品，会因“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而被弃。时代错置之于历史学家，如同“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之于人类学家，可算作是历史学家的判语词库中最具毁灭性的。

重要的是，意指“处于错误的时间”的“时代错置”一词，在历史学家的词库里不可或缺，确是贬义；而明确意指“无涉时间”的“时间缺位”（achronism），则无贬义，甚至根本不在历史学家的判语词库之中。这里，正如任何一位优秀的格尔茨式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历史学家的用语告诉了我们关于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形态和意义。[9] 也许有些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的用语告诉了我们，于优秀的历史学分析而言，充分意识到共时性要比充分意识到历时性更为紧要。从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对历史学家来说，知道如何悬停时间要比知道如何叙述时间流逝更重要。所以，格尔茨的共时性研究方法恰恰为历史学家所需要。

但要说历史学家的用语表明了他们更看重充分的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话，他们中的多数也会关注作为转型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尽管

格尔茨的直接贡献很少，但他的共时性研究方法还是间接产生了极高的价值。[10] 我以为，研究作为转型的历史时，通常会被过多的历时性所萦绕。反叛性的社会史学家，像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学家”和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素来自称反对“叙事史”（见本书第二章），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即便是这些社会史学家（及其后继的文化史学家）赢得了这些战役，历史学家试图从概念的窠臼中自我挣脱的长期以来的叙事习惯则一直在他们身上存在。在我长期担任很多期刊的同行评阅人期间，曾建议期刊社不发表许多历史学论文，迄今为止这些论文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回到档案史料中，并勾连出关于“确切发生之事”的叙事，来试图解决或规避概念性问题。换言之，我在“历史之域”（historyland）的日常工作中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告诉我，从历史学分析中排除共时性元素（即在研究特定历史时刻的结构时没有过久停留）对历史学研究和写作来说，仍是极为常见的败笔。[11]

充分认识共时性，是写出精彩的历时性历史的秘诀。我认为，除非辩证地兼顾共时性和历时性思考，否则对历史转型的描述无法取信于人。为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关注“转型”一词的字面意思：它的两个词根“跨越”（trans）与“形态”（form）清楚表明了结合历时性和共时性是必要的。除非我们能向自己和读者再现特定历史时刻或时代中生活的形态 ，除非我们能系统描述出相互连结的意义和实践如何成为该生活形态的特点，不然，我们要如何解释转 型，又如何辨识出转型发生的时间和采取的方式？对历史变迁的典型描述要表明，在特定生活世界的某（几）处发生的最初变化如何对其他地方产生衍生效应，并最终把作为整体的生活世界浇铸成不同的形态。因此，只有对转型前各处的相互关系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类描述才能取信于人，否则最初的地方性变化发挥的衍生效应就会显得不切实际。唯有基于对共时性关系的事先分析，才能对变迁作出深入、令人满意、丰富且有说服力的评断。

简言之，格尔茨的研究所具有的极强的共时性，使之与历史学家密切相关。的确，他的研究对历史学家来说最显著的优点，可能就是能够培养他们对共时性的敏感度。如果文化体系的比喻、深层游戏的图景或深描的理念能让历史学家更有效地悬停时间，且在随后描绘过

去的生活世界及其转型时，更为清晰、复杂、一致和深入，那么他们关注格尔茨着力最多的共时性研究无疑是明智之举。

## 文化体系作为物质事实

格尔茨的文化体系概念，在公开可及的象征束和由这些象征形塑的情绪、动机、感受和活动之间建立了紧密完美的连接。正是这种格尔茨假定的紧密连接，使他对文化的理论化能够成为解释文化变迁时的问题意识。格尔茨从未明确提出为何文化体系紧密地决定了人类行为的问题。但我认为，我们能从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两篇文章里发现其基本假设。其中一篇是《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1973h），另一篇是《文化的解释》中最为杰出、也最被低估的文章之一，《文化的成长与心智的进化》（“The Growth of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Mind”, 1973d）。格尔茨在两篇文章中主张，文化模式必须被当成与基因编程（genetic programming）类似的存在来理解。

尽管我不赞同格尔茨结论中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压倒性的决定性，但我还是认为，他延伸了有关基因和象征关系的思考，使之成为任何文化理论的必然起点。而且，这种思考通过证明“心智”（mind）这个看似“唯心主义”的概念在人类进化中拥有真实的生物学基础，为我之前提到的、格尔茨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身份作了辩护。所以，我要在这部分先稍加说明格尔茨有关行为的象征模式化的基本理论，并在稍后进行批判和修正。格尔茨在《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中写道，“象征系统或象征复合体”，

> 是外在的信息源（extrinsic sources）。我所说的“外在”仅是指它们与基因之类的不同，位于生物个体的边界之外，即位于一个包含了人类共同理解的主体间世界。在这个主体间世界中，所有人类个体诞生、各司其业，并且在死后留下继续存在的东西。至于“信息源”，我仅是指它们像基因那样提供了蓝图或模板。据此，运作在它们本身之外的过程也能获得一个确定的形式。正如一条脱氧核糖核酸（DNA）链上的碱基顺序形成的一个编码程

> 序、一套指令或者一张配方，使有机体借以合成结构复杂的蛋白质，进而形塑器官的功能运作，文化模式为形塑公共行为的社会过程和心理过程的制度提供了类似的程序。（1973h:92）

这种将文化与基因进行的类比不仅是一种隐喻。格尔茨强调，这种类比有其人类进化生物学的依据：

> 将象征比作基因，不仅仅是我们常见的“社会遗传”（social heredity）这种牵强类比。这其实是一种实质性的类比关系。原因在于，较之比人类低等的动物，人类的遗传程控过程极为概括化，以至于文化程控过程也如此重要。恰是因为内在信息源只是对人类行为加以松散限定，外在信息源才会如此重要（92—93）。

人类文化，或者说诸多象征体系，补充了信息源，这不仅为人类带来便利，也是我们的生物学禀赋在生理层面的必然。

格尔茨追随着S.L．沃什伯恩（S.L.Washburn）和W.W．豪威尔斯（W.W.Howells）等人类学家的步伐，否定了在人类进化中巨大的大脑皮层发展成型之后，文化才得以出现的早期观点。他令人信服地提出，文化和人类大脑是同步进化的。在更新世，早期的原始人类（hominids）开始制造和使用原始工具，并开始参与象征性的交流。进化压力随后选择了令上述行为得以可能的神经结构种类，让更多复杂的文化模式得以发展，这也反过来增加了有利于大脑发展的选择性压力。最终，当前脑的发展让文化积累到“其作为适应性因素的作用超过了其作为选择性因素的作用”时，神经结构的器质变化便停止了。自此，智人（*Homo sapiens* ）获得了语言、宗教、道德规范和乱伦禁忌，在神经系统上多少稳定下来了。概而言之，文化的发展让人类有了大容量的前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也由此与最早的原始人类有所不同（1973d:69）。

文化和大容量的前脑不仅是同步进化的，时至今日仍有机地联系着。“人类的神经系统不仅仅让他有能力习得文化。假如它要发挥作用，它还会积极地要求他习得文化”（68）。文化，也就是在象征中

被编码的外在信息，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得以生存的条件。此言非虚，因为大容量的、惊人般复杂的人类大脑，不通过产生特定行为反应来回应刺激，而是通过高度普遍的感受来回应：

> 越是低等的生物，越是倾向于采用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活动来应对“威胁性”的刺激，这些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定型的反应……即“逃跑”或者“搏斗”。然而，人类对于这种刺激的内在反应（intrinsic response）[2] 往往由一种分散的、不同程度的、像是“恐惧”和“愤怒”这样的应激反应构成，几乎不伴随自动预设的、明确的行为序列。就像受惊的动物一样，受惊的人会逃跑、躲藏、咆哮、伪装、慰解，抑或因恐惧而绝望、攻击。但对这个人来说，这种公开行为的精确模式，是由他的文化模板而非遗传模板所主导的（75）。

对人类来说，要生产特定行为来适应由环境带来的挑战，唯一的方法是使用由他们特殊的神经结构产生的各种文化符码。由于人类遗传编程下的反应是高度概化的，他们需要由文化提供的外部信息来完成生活中的不同任务：可以是遇到威胁时的反应、建造居所、繁衍后代、寻找同伴、猎杀觅食，也可以是制定政治规定。人类能且只 能通过采集和处理信息（也包括关于如何采集信息的信息）来延续，这些信息不是存储于身体的生理结构中，而是存储于人类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的主体间空间，以及能给予其物质形式的书籍、地图、衣物、工具、圣物、图解等物之中，即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之中。

没有文化，人类在智识上不能独立生存，在情感上也是如此。格尔茨强调，“人类是最感性，也是最理性的动物”（80）。[12] 可能正是因为 人类是最理性的，他才补充了最感性一说。人类对于刺激的神经性回应，在感性上是分散且不确定的，而这是让我们有能力理性思考的复杂神经器官的另一面。对于刺激的反应可以 是分散的，这是因为我们理性的大脑会在考虑要如何解决问题时，提供了海量及合用的灵活性；而当我们要灵活地，而不是套用老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反应就必定 是分散的。但这也让人类这种“极易兴奋的动物”受制于各类

情绪刺激，又缺乏内置模式来引导对刺激的反应（80）。而对这种情感上令人不安的刺激的必要控制，正是由文化模式提供的。文化模式对“普遍、分散、流溢的身体感觉流，提供了特殊、清晰、确定的形式”，从而“对于我们内在服从的情感的不断转变，施以一种可辨识的、有意义的秩序；由此，我们不仅能感受，也能认识我们所感受的内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80）。

根据格尔茨的说法，宗教就是为分散且不稳定的人类情感提供的特定形式。宗教给予我们的概念和实践，让我们有能力与混乱所致的永存威胁共存。在《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中，格尔茨明确了三种威胁的来源，即看似超出我们解释能力的事件或问题、看似无法忍受的痛苦、看似无解的伦理悖论（ethical paradoxes）。宗教象征主义所做的，不是否认神秘、痛苦或罪恶的存在，而是提供使之能为人思考的概念（就像神之奥秘、效法基督或原罪），并且提供赋予其经验现实的仪式实践（如圣餐、病人傅油圣事或苦修忏悔）。仪式行动中被思考和体验的宗教教义，所做的不是让我们免于痛苦，而是教我们“如何承受痛苦，如何使生理痛苦、个人损失、世俗失败，或是面对他人痛楚时的无助冥思，成为可以被忍受、被耐受的事物，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成为可以被承受的痛苦”（1973h:104）。简言之，我们的神经组织不仅必然会用象征系统同时形塑我们的认知和情感生活，也令这种形塑作用成为可能。

这篇对人类文化的进化起源和生物学必然性的讨论，是唯物主义论证中的杰作。这种讨论并非借由口头套话（verbal formula）来超越物质/理念的二分法，而是对人的境况中不可逃避又相互补充的“物质”和“理念”这对概念进行了言之有物且有科学依据的讨论。这篇讨论让我们有能力去认识到文化（或“心智”）扎根于身体需要，同时又不可化约为身体需要，也让我们有能力追踪文化体系的自主逻辑，而不必担心自己会成为“唯心主义者”，从而失掉和“真实”世界的联系。如果格尔茨是对的（一如我所坚信的），那么符号系统就不是超越凡俗的、鬼魅般的或想象的，而是如呼吸、消化或生殖一样，是我们这个物种生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唯物主义者应停止担忧，转而接纳象征。

# 文化体系如何变迁

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建立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本体论基础上，它提供了极好的分析共时性文化关系的工具。但对解释文化变迁而言，他的理论可能十分笨拙。这意味着，历史学家既想要利用格尔茨的共时性洞见，又想研究文化转型的话，就需要在实践中修正格尔茨的概念。历史学家或有历史学倾向的人类学家无疑应预期到，我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会理论，终究没有一种是为解决历史变迁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多数社会理论给出的首要问题一向是对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的解释。不仅格尔茨的研究是如此，几乎所有20世纪80年代前的人类学研究都是如此，从整个涂尔干式的研究传统，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尔迪厄，再到塔尔科特·帕森斯、罗伯特·默顿和欧文·戈夫曼皆是如此。甚至那些把解释变迁作为核心问题意识的理论家，主要包括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以及他们的继任者路易·阿尔都塞、尤尔根·哈贝马斯或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使用时间性概念时都带着很强的目的论色彩。所以，对历史学家来说，要先对他们的概念进行广泛修正，之后才能使用。[13]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理论批判，这种批判要承认并接纳格尔茨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例如他民族志研究的认识论、对共时性关系的强烈意识以及文化概念在人类生物学上的本体论基础；但这种批判也要修正他的理论，这样才能让文化体系中变迁的可能性成为文化概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事后思考或外部效应。[14]

批判不妨从对格尔茨的一个著名论断开始，即认为象征既是“反映现实的模型”（“modes of” reality），也是“构建现实的模型”（“models for” reality）。从“构建现实的模型”的意义上说，象征是生产现实所用的模板，如指导房屋建造的建筑理念，以及指导了男女两性建构的公共行为的两性编码形式。但象征同时也是“反映现实的模型”。用来建造房子的建筑原则，也被用来解读和评价现有建筑；男女两性公共行为间的差异，也被当成是两性间差异的指标。格尔茨指出，象征的这种二重属性使之和基因有别，后者只是构建人类的模型，而非反映人类的模型（1973h:93）。

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观察，但在我看来，格尔茨尚未挖掘到其最有趣的含义。他总结说，象征具有同为“反映现实的模型”和“构建现实的模型”的二重性，这意味着其“对社会和心理现实赋予客观的文化形式，既按照现实来塑造自己，也按照自己来塑造现实”（93）。换言之，他假设反映社会世界的模型只是映射了现实，而这个现实是构建社会世界的模型所生产的；与之相关，构建社会世界的模型在世界中所生产的“现实”，只是由反映社会世界的模型所描述的“现实”。他假设的两种模型的关系，是镜像式或循环式的，也是相互补充和调整的。

格尔茨探索未及的是，象征符号的这种二重性也增加了“反映现实的模型”和“构建现实的模型”之间脱节 的可能性，这种脱节为行动者批判性地反思世界提供了空间。脱节可能在象征二重性的任意一边打开缺口。说象征是反映现实的模型，就意味着它们是人类试图理解或再现世界的产物。象征在这个维度里指的是人类活跃的思想或意识，即我们复杂的大脑及其对刺激作出的分散回应所导致和需要的智识思考过程。这种再现的过程无疑借用了文化提供的象征，但使用这些象征的方式可能是创造性的、开放性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使用现有建筑原则的知识储备来理解和评价建筑；但此举也会导致评价者在评价该建筑中发现迄今为止尚未被承认的原则，将其正式阐明并融入建筑理论中去，结果可能导致建筑原则的变化（见Venturi et al., 1977）。正因为世界总是比我们再现的表征要复杂得多，我们的表征总是会受到变迁的潜在影响。

脱节也可能发生在“构建现实的模型”这一边。正如格尔茨强调的，“社会现实”是由形塑性的人类行动根据文化模板在世界上生产出来的。但世界表现出来的可能和我们形塑时的尝试恰好相反。毕竟，应用一种模板的每一次尝试，都是发生在和建构模板的原始情境极为不同的新情境里的。因此，就算我们假设人类总想着要谨慎地对已知的知识进行再生产，但实际的产出仍会和预期不同，甚至相去甚远。在新的行业（诸如纺纱厂）向女性开放后，由于现有公共行为中的“女性”形式不再适合新情况，要想培养符合既有模式下公共行为形式的男女，就会遭遇失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打开了一个缺

口，要靠改变公共行为形式的性别编码来弥合（Dublin, 1979）。由于我们形塑世界的一次次尝试常常受到世界的抵制，作为“反映现实的模型”和“构建现实的模型”的文化象征，也容易再度受到变迁的影响。[15]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确定无疑地假设：象征或象征系统所具有的“反映现实的模型”和“构建现实的模型”的两个面向会自动成为彼此的镜像。两者可能常常映射对方，或者说人类一直努力让两者相互映射，但我和格尔茨一样认定，人类通常试图在他们的世界中强加融贯性。正如上文中设想的例子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强加融贯性的尝试，可能成为一种让文化体系转型 的驱动力，其效用不亚于其作为一种维持稳定的力量。象征的这种二重性特点，确保了任何已经实现的稳定都只能是暂时的，远远无法成为稳定的保证。

格尔茨对文化和人类神经结构关系的看法，也可以被解读成对文化体系潜在的不稳定性的暗示。这是因为对于特定的问题，不同个体给出的回应会存在相当大的不同。由于人类是分散或普遍地回应着环境中的刺激，而非遵循特定生物编程下的方式，所以人类必须寻求外在信息源来找出解决挑战之道。在某些情况下，文化符码高度定型，致使对面临相同刺激的人来说，他们对信息的寻求简洁、确定且统一。但这无疑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由于最初的神经反应是分散的，由于应用何种文化符码常常存在不确定性，也由于如何应用文化符码也存在相当强的灵活性，所以，任何刺激都可能遇到很多不同的回应，其中的一些还可能很有新意。要是一种新回应由于某种原因而鹤立鸡群，比如极为成功地解决了眼前的问题，抑或是新回应的提出者很有权力或影响力，那么，文化符码就有可能被永久改变。这种对格尔茨含蓄地假设为规范（norm）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行动进行的再生产性映射，有可能会真的变成了规范。但格尔茨给人类认知行为设定的明确的本体论模型，似乎暗示了再生产性映射中必然会出现明显的偏离。

我们可以在格尔茨模式下人类情感的意蕴中指出相似的观点。他强调，人类是极其紧张不安的，要是没有文化模式从旁协助，一个人“在功能上是不完整的……就像一头形状不定的怪兽，没有方向

感，没有自控能力，只有间歇性的冲动和模糊的情感带来的混乱”（1973h:99）。接着，格尔茨的洞见从情绪不稳定这一基本的人类境况，转向讨论文化是如何向身体提供其所匮缺的控制。我认为，他机敏地指出，文化的控制不常（甚至极少）采用抑制的方式，而是将情感引流到可被认知的形式上，比如北美平原印第安人的过人勇气、马努斯人（Manus）由负罪感导致的内疚，或是爪哇人的寂静主义（quietism）。

但如果器质性的人类情感对于环境的回应如此分散和不稳定，那么格尔茨在他很多文章里所分析的情感自我表达模式，即便有文化厚度、有美学吸引力、极具情感，能持续产生真正不因时而易的行为模式这一点似乎很难言之成理。[16] 相反，有人可能预想，人类情感在本质上是漂泊不定的，所以它会导致新形式的情感模式的偶发试验、对现有道德和宗教体系的周期性不满，以及强烈的政治、宗教和艺术活动的间歇性迸发。在这里，就像格尔茨自己经常做的那样，我们也许要转向马克斯·韦伯的理论遗产。韦伯强调了领袖魅力（charisma）在某些深刻的历史变迁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先知、英雄、门徒会众或革命者同党的涌现，能驾驭分散的情感能量，将之转化成特定的、在某个历史时期发挥效用的社会力量。[17] 格尔茨的心智理论涉及的情感和认知维度，都说明了文化体系不是被自动再生产出来的。人类这种情感高度紧张、自身又天赋异禀的动物，势必能谱写出文化转型的关键篇章。

格尔茨的文化体系似乎不受变迁的影响，原因之一是他的研究很少考察社会中不同群体采用的信仰、价值观或习语间的差异或多样性。关于这个问题，文化人类学家过去二十年来的实践与格尔茨大相径庭：考察文化差异成为他们的首要关注之一。女性主义人类学似乎对差异的兴趣最大，它通过陈述女性和男性的视角在认识文化的问题上的巨大差异，对看似统一的文化体系提出质疑。[18] 对差异的兴趣也是“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核心，它提倡用民族志的手段再现不同声音。此外，这也是殖民人类学的核心，它关注欧洲统治者和他们的殖民地臣民之间的文化协商（negotiations）。[19] 当然还有社会史学家，他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差异问题表现

出了兴趣。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社会史学家实践着“自下而上的历史”的研究，专门致力于抢救穷人和社会边缘人的声音，并把他们的文化经验和统治阶级的经验联系起来。[20] 事实上，晚近的对多义性（multivocality）的人类学实践，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社会史这一榜样的影响。[21]

正如这篇人类学和历史学文章所论述的那样，文化变迁往往产生于有着不同文化模式和社会关系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交流、对抗或者交换。群体差异意味着对可能被自动再生产的实践和价值采取有意识的挑战是可能的，对意义进行持续协商和斗争也是可能的。而且，内部的社会分化也让新的文化复合体在特定社会小生境中的发展成为可能。文化创新通常不是在整个社会中同时发生的，而是集中或发源于特殊的社会和地理位置。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政治中频繁发生的工人起义，最初源自1831年里昂织工和丝绸商人之间那场特定的争端；我们视为文艺复兴的文化创新，明显集中于佛罗伦萨的市镇；夏尔巴（Sherpa）佛教在20世纪早期的转型，也是由一小批富有的商人和僧侣发起的。[22]

格尔茨当然没有否认内部差异的存在及重要性，但在他的文字里，这些差异只是附属，并不明显。他所强调的差异处于诸社会或诸民族之间，在“北美平原印第安人的勇气、印度人的执念、法国人的理性主义、柏柏尔人（Berber）的无政府主义和美国人的乐观主义”（1973f:53）里。格尔茨在极为频繁地提及“巴厘人”“爪哇人”“柏柏尔人”“法国人”“印度人”“马努斯人”或者“祖尼人”的时候，显然不考虑这些分类内部可能存在的重大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涉及观念、信仰和举止，抑或涉及财富、性别、权力和地位。

格尔茨的研究还对社会内（intra-society）和社会间（inter-society）文化差异的概念化提供了理论素材。比如，格尔茨认为，平原印第安人、印度教徒、马努斯人和法国人的生活世界得以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是人类无法逃脱对外部文化符码的依赖的结果。尽管世界各地的人所拥有的神经器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所用的为心智提供具体内容的文化符码是截然不同的。格尔茨说道：“成为人类，并不意味着成为普通人（Everyman），而是成为一种特定的人，并且人

与人之间显然是不同的，比如爪哇人唤‘别处’为‘其他蝗虫’。”根据格尔茨的说法，研究成为人的不同形式，是人类学家的特殊使命。也只有理解了这些生活形式的特殊性，“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又如何成为”人类（53）。

至此，我还要再补充三点。首先，不同生活形式的文化生产发生在很多层次，并不局限于“社会”或“民族”的层面。农民和地主、工人和学生、男人和女人、僧侣和贵族，或者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生活形式的差异，和那些“社会”间的差异一样，都是人类学审视的正当对象。其次，考察各类人群之间的关系，包括冲突、支配、交换、竞争或者自觉的分化，对文化分析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再次，研究各类人群之间的关系的价值，和我们常标签化为“不同社会”的阶级、性别或者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等维度一样重要。“不同社会”自身贯穿并且共同构成了社会类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构成其自身的阶级、性别或地位群体是相似的。这些社会也被冲突、支配、交换、竞争和自觉的分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激发出活力。

对我在这里提倡的动态的、关系性的且差异性的文化分析，格尔茨其实提供了一个很恰当的隐喻。在《深描：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里，他详细阐述了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扑朔迷离的故事，主角是犹太小贩科恩（Cohen）、一个柏柏尔贩马人部落和一个法国殖民地官员，并从中汲取教训。格尔茨把故事里的“语言混乱”（confusion of tongues），作为写作民族志的阐释者所面临情境的范例（1973j:9）。在这个例子里，语言的混乱是在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三个不同“民族”——犹太人、柏柏尔人和法国人相遇后引发的。但这个隐喻也很容易被引申出去。使用同一种语言、信奉同一种宗教、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或拥有相同族群身份认同的人，因为地位、性别、阶级、年龄、权力、种姓或者职业不同而一直出现与上述故事相似的文化上的误解、冲突和协商。正是在各种语言混乱的生活片段里，社会日常接触引发文化意义的争论或动摇文化意义的确定性，并由此导致文化体系的转型。一旦我们承认了社会的多样性，便不再能把文化体系看成是不断自我强化的了，而是必须把它看成是冲突、对话和变

迁的所在。

这样一来，要理解历史转型的意义，我们必须采纳一种不同于格尔茨的文化理论。但与罗斯伯里还有其他很多批判格尔茨的人类学家不同，我认为，要是完全拒绝他的理论，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觉得，我们应该挪用 他的理论范畴，与之对话、权衡其短长、从内部进行修正，且在必要的时候用外来移植物进行补充。格尔茨的研究尚存未被挖掘的深意洞见和分析力量，这使之于历史学研究而言仍是不竭的灵感之源。

注释：

本章最初以“格尔茨、文化体系和历史：从共时性到转型”之名发表于《表征》（*Representations* 59:35—55, Copyright © 1997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允许后再版。

1 ．比如，浏览1995年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1996）可以发现，在人类学期刊中，马歇尔·萨林斯被引用的次数比格尔茨略高，但从总引用数量来说，格尔茨被引用的次数是萨林斯的两倍（大约是350对150），涉及农业、护理、环境研究、商业、社会工作、信息科学、老年学和公共关系等诸多学科。

2 ．本尼迪克特和格尔茨的读者的差异，似乎更多地反映了变化中的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轮廓，而非读者自身特点的差异。本尼迪克特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时，面向的是非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这群人现在几乎不存在了——他们要么是在媒体过分商业化的过程中被扼杀，要么是被圈在大学里。

3 ．和马歇尔·萨林斯进行比较也能说明问题。人类学者引用萨林斯的作品的频率和引用格尔茨的相当，而萨林斯的研究也是极具争议性的，尤见于奥贝赛克拉（Obeyesekere, 1992）和萨林斯（1995）的观点交锋。但是，自1984年至1994年间出版的11卷《人类学文献》（*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里，批判格尔茨的作品有24篇，但批判萨林斯的只有10篇。

4 ．这段引文来自山克曼（Shankman，1984:264，270），这是从实证主义角度展开的最为系统性的批判。按照期刊的惯例，这篇文章后面附上了几篇来自其他学者的评论，并附有作者的回应。发表出来的15篇评论中，有5篇（分别来自埃丽卡·布吉尼翁[Erika Bourguignon]、琳达·康纳[Linda Connor]、约翰·R．科尔[John R.Cole]、费希尔[A.D.Fisher]和罗宾·李丁顿[Robin Riddington]）认为，山克曼对格尔茨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怀疑在人类学学者中并不罕见。山克曼详尽的参考书目，很好地梳理了至1984年对格尔茨的批判性文献。

5 ．沃尔特斯（Walters，1980）谈到了历史学者们很早以前对格尔茨的接纳。

6 ．罗斯伯里的批判（1982:1020—1023）针对的是格尔茨的文章《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对格尔茨的许多批判论文都选择这篇文章作为唯一或主要的例子，包括前文提到的克利福德和克拉潘扎诺（Crapanzano）的讨论。尽管讨论更多的是针对格尔茨，而不是斗鸡这篇文章，但就像某种诗意的正义（poetic justice）一般，这些批判文章也把格尔茨的这篇声称斗鸡借代性地（synechdochically）再现了巴厘岛文化的文章，视为对格尔茨本人思想的借代性再现。

7 ．Dirks（1996）能说明罗斯伯里和我观点一致。

8 ．我能想到的唯一例外是格尔茨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写的一篇文章，讨论的是一场充溢着政治的葬礼，见《仪式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Ritual and Social Change: A Javanese Example”，1973i）。这篇文章写作于1959年，此时格尔茨还没有把自己从帕森斯的思想遗产中解放出来，还被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占据了头脑。把现代化理论等同于非反思性目的论（unreflexive teleology）是现在一个时兴的做法，而格尔茨早在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就采用此法，来考察正经历着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阵痛的爪哇社会中的矛盾。参见如Geertz（1963a，1963b，1965）。在一篇对格尔茨的工作尤为微妙的批判性评估中，黛安娜·J．奥斯汀-布鲁斯（Diane J.Austin-Broos）指出了其早期和晚期研究

中的矛盾。在格尔茨早年对爪哇的研究中，采用了一种现代化的视角，但把文化看成是模糊且可操纵的。在他后来对巴厘岛和摩洛哥的研究中，文化的特点被解读成根源于“把生活变成美学”的“新的寂静”（new stillness）（Austin-Broos, 1987:156）。

9　．有关学术评价语言的用法来理解不同学科的关注点，见Geertz（1983f:157—158）。

10　．事实上，他早期关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专著（见注释8）应该会有直接帮助。但从研究方式来说，这些研究与其他社会史学者之前的研究非常接近，以至于很少受到关注。正是格尔茨之后发表的更显共时性的作品，抓住了历史学家的想象力。

11　．“历史之域”显然是引自伯纳德·科恩的杰作《历史学与人类学：走向和解》（“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 1980）。

12　．格尔茨这个说法引自Hebb and Thompson（1954）。

13　．我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试图进行过一些修正。马歇尔·萨林斯（如1981，　1985）也进行过类似的努力。经典社会理论著作中，最充分地表现了我所说的历史学家对偶连性的理解的作品，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58）。但即便是在这部作品中，偶连的可能性也让位给了目的论，用韦伯的名言来说，一旦资本主义建立了，其自身便成为“铁笼”（181）。

14　．格尔茨的最新著作《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者》（*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1995），比之《文化的解释》和《地方性知识》，更多地考虑到了多样性、权力、斗争和社会转型的问题。对于格尔茨职业生涯中人类学和世界经历的变迁，这本充满诗意的自传式沉思的作品，倾向于在叙事的过程中间接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直接进行表述。我读过之后，觉得这本书实际上和我在这里谈到的对他早期理论的批判和修正相当一致。

15　．我的这个论点和马歇尔·萨林斯的很接近，并且也很大程度地受到了他的影响。他认为“人类行动的物质世界环境，和特定人所

感知到的范畴并不是必然相同的。在那些无法感知的事件里，在实践过程中接受潜在评估和功能上的重新定义的范畴才能被接受”（1981, 67）。见下文第七章。

16 ．相关研究参见Geertz（1960, 1968, 1973b, 1973c, 1973g, 1973j, 1983c, 1983d, 1983e）。

17 ．见Weber（1958和1978,尤见1:241—254, 2:1111—1156）。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912] 1965）也用很有趣的例子说明了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本书第八章将会试图使用一些涂尔干的洞见来分析文化转型。有关对情感在历史中位置的后续讨论，见Reddy（2001）。

18 ．这些研究包括Wiener（1976），Abu-Lughod（1986），Martin（1987）和Ortner（1996）。

19 ．最著名的反思人类学宣言是Clifford and Marcus（1986），以及Marcus and Fischer（1986）。殖民人类学的前沿研究有Cohn（1987, 1996）。

20 ．或许最有名的例子就是Thompson（1963）和Genovese（1974）。

21 ．关于自下而上的历史和人类学的讨论，见Rosaldo（1990）。

22 ．对于里昂在工人起义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讨论，见Sewell（1980:206—207）。关于夏尔巴人的宗教，见Ortner（1989）。

---

(1) 从词源学上说，synoptic一词即是由“syn”（共同）与“optic”（视觉的）组成，其原意即是“一瞥可见全物”。—— 译者注

(2) 尽管在纳日碧力戈和韩莉的译本中，intrinsic response都被译成“本能反应”，而本能反应似乎更接近instinctive response，非文中与前文内在信息源对应的内在反应，为了与前文的语境呼应，此处译作“内在反应”。—— 译者注

# 第七章　一种事件的理论：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的可能理论”

在人文科学的日常用语中，“事件的理论”这一表述是个矛盾语（oxymoron）。从定义来说，事件是唯一、偶连的日常发生，它受制于人类意志反复无常的特点。由此，对以发现普遍社会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来说，事件基本不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对象。在人类科学的传统分工里，事件是被放在历史学里研究的，因为历史学恰好专注于讲述唯一和偶然。即便社会史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成为历史学研究几乎无处不在的主流之后，也未曾发展出一条系统性研究事件的理论路径。在定义自身的时候，社会史学家首先站到了曾占据主流的叙事性政治史的对立面上，紧接着鄙弃了对事件的研究。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传统分野，即结构—事件之间的对立，也被应用到了历史学学科的内部，用以区分社会史和叙事史。在极负盛名的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学者中，身为旗手的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片段史（*l'histoire evenementielle*）仅仅是历史奔流中的泡沫。真正重要的，是研究地理、生态和心态之“长时段结构”（*structures de longue durée*）的结构史（*l'histoire structurelle*），以及研究经济和人口转变中某个势态（conjunctures）的势态史（*l'histoire conjoncturelle*）（Braudel, 1958, 1966）。

的确，历史学家中，已经罕有人仍死忠于布罗代尔强势的反事件主义（anti-evenementalism）。早在1974年，就已经有人宣告“事件的回归”（Nora, 1974），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一批平素与布罗代尔立场相仿的历史学家，或是极为详尽地探讨特定事件，或是宣称他们对重叙事轻结构的历史书写形式感兴趣（如Duby, 1973; Le Roy Ladurie, 1975, 1979; Stone, 1979）。但直到不久之前，对书写事件的回归才令历史学家把事件当成是一种理论范畴来反思（如Suter, 1997）。

迄今为止，对事件的理论探讨中，令人印象最深且最具系统性的，反而出现在一个极为不同，甚至有些令人意外的学科内，那就是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研究。萨林斯的理论尚未获得历史学家的广泛认可，这反映了历史学从业者的大国沙文主义，此乃该职业最不合宜且最为顽固的特点之一。萨林斯的这套理论，是在他撰述波利尼西亚的民族志式历史（ethnographic history）时提出的。波利尼西亚这个地方，无疑在欧美的历史学家视界之外，也在绝大多数研究亚洲和中东等伟大的非西方文明的历史学家的视界之外。[1] 在我看来，萨林斯的理论卓越、优美、具备普遍适用性，且对历史学家来说极为有用。我认为，萨林斯的理论是对事件进行理论化的必然起点。在本章中，我将首先说明自己所理解的萨林斯的理论，随后提出详细阐述、批判和修正。

乍一看，以结构人类学作为事件理论的来源，叫人有些意外。事实上，结构主义的认识论传统中，似乎确实不涉及对快速且纷乱的历史变迁的研究。正如我在本书第四章中强调的，在人文科学中，结构是一种有力、弥漫且构成性（constitutive）的隐喻，它意指持久、秩序和稳固。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对结构的不同用法，大多是指在看似多样的现象之下埋藏的秩序的稳定原则。这代表了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即将世界表面的混乱化约为相对简单且能被人理解的模型或规则。纷乱无序的事件，素来和结构相对，且往往会在与结构比较中处于弱势。萨林斯注意到：

> 和历史学一样，在人类学的研究里，“事件”和“结构”似乎无法存在于同一个认识论空间。事件被认定是反结构的，而结构也会抵消事件。……事实上，年鉴学派研究的文本中辑出的对立词表，和某些亚马逊部落的宇宙二元论（cosmological dualism）几乎雷同。结构与事件的关系，就像社会与个体，本质与偶然、反复与个殊、可见与无形、合法与即兴、日常与超常、缄默与可闻、匿名与署名、正常与创伤、可比与独一之间的关系（1991:38—40）。

值得称道的是，萨林斯并不是简单地放弃了结构和事件之间的对立。毕竟，正是因为社会拥有极强的周期性或结构性的特点，正是因为社会关系极有可能被再生产，事件才首先成为了一种有趣且难解的

范畴。但萨林斯重新界定了这种对立的含义，试图将导致结构和事件之间互相敌对且无法相互理解的、不平等而根本的对立，转变为一种更加平衡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每个范畴都互相解释且互为条件。我们或许可以把萨林斯定性为列维-斯特劳斯学派的结构主义者，因为他试图在不放弃结构主义的情况下，创造一种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他尝试通过给予结构主义一种美式实用主义的变调，去关注以结构范畴行事的社会行动者，来修正结构主义者的常识。萨林斯的再造，让事件变成结构的转型，而结构则是过去的事件累积而成的结果。

萨林斯指出，只有在由某一文化结构提供的条件里，才能辨识出事件。事件和非事件性的日常发生的差别，在于前者冲破了由文化结构产生的预期。由此，要认定事件为事件，必须以结构为前提。而且，事件将导致怎样的结果，取决于事件是如何被阐释的，而这种阐释只能在现有文化结构的条件下作出。事件未来的形态与走向，取决于其如何与结构互相牵绊。萨林斯称这些为“文化结构对历史事件的构成”（1991:42）。但如果结构定义且形塑了事件，那么事件同样也会（重新）定义和（重新）形塑结构。一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也是其历经的事件的产物。

## 萨林斯的“历史的可能理论”

萨林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发表的不少作品，都主要关注了结构和事件之间的关系（Sahlins, 1981, 1985, 1989, 1990, 1991, 1994, and 1995; Kirch and Sahlins, 1992）。在《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的结语中，萨林斯阐述了他所称的“一种历史的可能理论，一种关于结构和事件关系的可能理论”（1985:138）。这种“可能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文化的转型乃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模式”（1985:138）。萨林斯用这个自相矛盾的短语，表明意料之外的和意料之中的日常发生一样，能且仅能被人们依据其现有文化范畴挪用和行动。萨林斯通过考察一个尤为独特的案例，也就是库克船长抵达夏威夷一事，来详细阐述这一观念。他的论点的要旨在于，库克和英国人是在夏威夷神话历史的范畴中被接纳的。他们被

当成是从卡希基（Kahiki）这个“地平线外不可见的异域”来的，因而具有神圣性。在夏威夷文化中，神灵亲莅的情况极为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根据神话的说法，当朝的王族世系和被他们废黜的国王，都是从遥远土地经由海路抵达的神圣存在。[2]

视库克为神祇的猜测被另一个巧合强化：1779年1月，库克第二次到达夏威夷海岸的时候，恰逢长达4个月的玛卡希基庆典（Makahiki festival）。在夏威夷飘雨的冬天，主神罗诺（Lono）从海上来到这里，收回他 的土地并恢复其肥力，中断了与其敌对的库神（Ku）的崇拜，其中还包括触目惊心的人祭。库是战神，与夏威夷酋长的统治世系紧密相连，因此为期4个月的玛卡希基庆典周期，代表的是战争的艺术暂时让位给和平的艺术。在玛卡希基庆典的尾声，罗诺的勇士和国王的勇士要参加一场模拟战斗，战斗之后，罗诺的肖像瓦解，祭祀库神的活动得以重开，而国王好战的统治也重新开始（Sahlins, 1981:17—20; 1985:116—120）。

1779年1月，当库克和他的船队到达凯阿拉凯夸湾（Kealakekua Bay）后，受到了盛大而喜庆的仪式欢迎。在萨林斯的解说中，库克被带进了繁复的仪式，并在仪式中被认定为罗诺神。过了几天，玛卡希基庆典进入尾声，库克无意中顺应了夏威夷人对罗诺神离开的预期，在国王就要重开祭祀库神的活动、并用仪式的手段重新执掌自己的王国时离开此地。但很快，一个不合时宜的巧合出现了。库克的船断了桅杆，他和水手们在几天后回到了夏威夷寻找补给。他这次在海岸边出现，不再意味着夏威夷人预期中的、掌管和平的罗诺神回归，而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威胁：作为罗诺神化身的库克是否和国王的那些有神话色彩的先人一样，有意废黜国王，夺下王位？在这种相互怀疑和充满敌意的氛围里，情况急转直下。夏威夷人对库克犯下一系列偷盗案，库克则带了一队水手上岸，想虏获夏威夷王作为人质进行报复。此举引发了在沙滩上的激烈冲突，库克寡不敌众的船员被赶到一艘等候中的小船上，而身为船长的库克被一把匕首刺中，接着被超过一百名夏威夷人击倒。

但库克之死并不是整件事的终结。要如何处置他的尸首尚无法确定。库克死后两天，两位罗诺神的祭司悄悄登上了一艘船，带着库克

的尸块到英国人面前问道，罗诺神“何时复归”？（Sahlins, 1981:24）。又过了几天，似乎库克尸骨的其他部分也被归还了，英国人便仪式性地将骨骸投入海湾。但在19世纪早期，每年举行玛卡希基庆典的期间，罗诺神的祭司会带着他们声称是库克的骨骸进行环岛巡游。骨骸被放在用椰壳纤维做成的篮子里（sennit casket）[(1)]，这个篮子也被用于放置被神化的酋长的遗骸。库克死去后，就被夏威夷统治者神化为先灵，其中，卡美哈梅哈（Kamehameha）对库克的神化最为引人注目，他在库克遇刺之后不久就继承了夏威夷岛的王位。根据萨林斯的说法，作为库克之死的继承者，卡美哈梅哈的玛那（mana）[(2)]“有了英国性”（1981:26）。无论是从仪式还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说，这个说法都是成立的。卡美哈梅哈尊崇库克的记忆及其遗骸，并对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采取了友善的政策，确保他们的安全，促进他们和夏威夷诸岛的贸易。由于推动了对欧贸易，他获得了足够的枪支、舰船及来自欧洲的顾问，从而成功征服了整个夏威夷群岛，使之全部归顺他的统治。

在夏威夷的历史上，欧洲人的闯入无疑是个转型性事件。但这次闯入是如何影响了夏威夷，其特定的历史结果又是如何，并不单纯取决于欧洲人在武力或技术上的优势。欧洲人、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物质商品，被挪用到夏威夷的文化背景中，从而被吸纳到了夏威夷的神话与实践的图式之中。就像萨林斯说的，“文化的转型乃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模式”（1985:138）。

这为我们带来了萨林斯“可能理论”的第二个命题，也就是“文化范畴在世界内的行动（严格来说是指涉[reference]行动）中获得了新的功能性价值”（1985:138）。这是从萨林斯的第一个命题（“文化的转型乃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模式”）阐发的。因为在世界中行动时，演绎的总是一种指涉行动，即“人类的社会经验是借助一般概念对特定知觉的挪用”。此例中就是把夏威夷人的神灵观念挪用到一名英国海船船长身上（1985:145）。但将知觉和行动的客体进行必要的实践上的区分，并归入我们现有的范畴之中，则会让这些范畴面临风险。如果一名已故的英国船长被当成是某位夏威夷国王信奉的神，就会改变国王们可用的玛那种类。把库克奉入夏威夷人的神殿的做法，以一

些非常重要的方式驯化了库克。这不仅使带着舰船、金属工具和火炮出现的白人可能会被看成潜在的威胁，也让这些新近的日常发生易受到夏威夷人逻辑下的处理和盘算。借库克船长之身驯化来自欧洲的玛那之后，卡美哈梅哈得以充分信任欧洲商人，避免他们遇上偷盗和诈骗，也能禁止其他人获得包括火炮和战舰在内的交易的好处。这些关键的欧洲商品，使玛那在卡美哈梅哈个人身上显著积累，而他也在征服夏威夷诸岛的过程中完成了空前壮举。用萨林斯第二个命题的话来说，卡美哈梅哈所采用的"指涉行动"（把库克当成人格化的神），给了夏威夷人的玛那概念以新的指涉，并由此变更其意。用他的话来说，"文化范畴……获得了新的功能性价值。文化的意义因其所背负的世界而改变"（1985:138）。

显然，要看出特殊的事件（比如欧洲人第一次出现在夏威夷）如何导致了文化结构转型并非难事。但任何一类存在所采取的非预期性行动（存在可以归类为女人、男人、酋长、鱼、雨、犁、梦、民主、动词或者死亡等），都与文化转型有着相同的逻辑。诚如萨林斯所强调的，毕竟"世界没有义务去适应某些人所设想的逻辑"，这话大致不假（1985:138）。世界中有意义的行动，总是会包括或含蓄或明确的指涉行动，而这让文化范畴面临风险，原因在于世界有能力推翻和否定那些擅自对其进行描述的意义。这就是萨林斯所谓的范畴在行动中所面临的客观风险。

范畴同样还面临着一种主观风险，因为范畴是"行动主体在个人的计划中"所用的（1985:149—150）。萨林斯发展了一种关于重点（interest）的符号理论，来详细阐述这种主观风险。他说，"重点"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inter est*，意思是"造成不同"[(3)]（1985:150）。在索绪尔的语言学里，如果一种文化符号的意义是由其与集体象征图式中其他符号的不同关系所决定的，那么，决定了一个符号的重点的，是其在特定主体的生活图式中造成的差异。这里的生活图式有两层含义，分别指个人经验及其当前计划和意图的独特序列（1981:69—69; 1985:150）。采取行动时，行动者所用的符号或文化范畴总会受其计划或意图的影响。可见，行动是有指涉的，也是由某个人 所指涉的，这意味着行动会根据行动者的重点来调整符号的意义变化。当夏威夷

的统治者扩展了“禁忌”的概念，让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得以垄断欧洲贸易商品，这种成功的转变导致范畴的意义和与该范畴相关的所有范畴的意义都发生了相应转变（1981:71）。事件转变了文化范畴的意义和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世界无法符合所有范畴的预期，也因为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目的修改了范畴。

以上便是对萨林斯提出的“可能理论”的简单剖析。在我看来，萨林斯的理论清楚说明了理论研究的正确对象：结构 ，它用其形象形塑世界；事件 ，尽管被结构形塑，但也转变了形塑自己的结构；一个停滞不变的世界 ，它没有义务以我们的范畴告诉我们的方式来行事；主体 ，其重点和创造性行动是事件的人类素材。我相信，萨林斯的理论是极具成果的，对思考世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类型的事件，都能有很好的说明。一个如此简明、精致和普遍的理论，本应早就走出“历史之岛”，并被研究大陆、宗主国和帝国的历史学家所广泛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我之前强调过的，这部分是因为对由大国沙文主义主导的历史学来说，前殖民地时期的夏威夷无疑处于边缘。但我也认为，萨林斯的理论存在某些内在的特点，它们可能减少了其对历史学家的吸引力。较之其他讨论，我在本章中的解释和修正，旨在让这套理论对主流的（或本土的）历史学家来说更有吸引力一些。我还想顺带指出，这套理论需要解释和修正，似乎是由于萨林斯提出理论时一反常态的犹豫造成的，这种犹豫就表现在“可能理论”这个表述里。

## 何为结构？

我想，讨论最好从结构这个概念开始。萨林斯自己的概念无疑是结构主义的，坚持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传统。这清楚表现为他在使用结构概念时的两个特点。首先，在使用结构这个术语时，萨林斯用的是单数形式而不是复数形式，意味着在一个给定的社会里，只有一种全面的意义体系，一个强势意义上的文化体系。根据这一观念，一个社会各处的所有文化意义，都被紧密捆绑在一个相互定义的网络里。其次，结构指的是文化结构或象征结构。尽

管萨林斯敏锐地意识到，包括物质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是如何限定或形塑了社会行动，但他没有像通常的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那样，指明物质环境是一种结构，或是结构的一部分。萨林斯确实偏离了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观念，并强调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结构“二重性”。萨林斯和吉登斯一样，不把结构看成是将社会行为强加给不幸的行动者的超过人或超越人的能动性，而是清楚表明结构是社会行动的结果和来源，有促动力也有约束力，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被人类的社会实践所改变（Giddens, 1976, 1979, 1984）。

我诚心支持萨林斯对于结构二重性的认可，但同时反对他用法中表现出来的传统的结构主义特点。我将试图证明，他认为结构是单数的、完全象征性的观点造成了理论和阐释上的难题；但这种难题是可以被解决，起码是可以被改善的。我在第四章中提出了一种相当不同的结构的概念，它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难题。这种概念将结构看成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它也将结构视为不仅由文化图式构成，而是由一系列互相强化的文化图式和物质资源构成。事实上，我将指出，要完成萨林斯所假想的那种对结构主义的实用主义转向，需要对结构这个概念进行他未能实现的、更为深入的修正。这种修正会让结构在物质实践的世界中获得更加强势的地位。

## 单数的结构？

我确信，一种复数而不是单数的结构概念，对一个合理的事件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把整个社会的结构看成是单数的，会留下很多问题，而这远不只是如何确定不同社会及其文化结构间的边界这样的问题。在研究小规模、相对未分化、位于孤立群岛的社会的时候，这个问题不会太显著。但对于当代世界以及多数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记录而知悉的世界来说，组成它们的社会形式存在族群差异、宗教多元、空间广阔、流动性和高度分化，要划分这类世界的边界，远非易事。

设想一下，有位来自孟加拉的移民化学工程师，在休斯敦居住并工作，这在当代世界里再常见不过了。这样一个人，同时参与到了美国文化、孟加拉文化，以及一种国际性的科学工程文化之中，每种文

化结构或体系都有自己的语言、成套的象征差异、等级评价方案、权威模式等等。但这些结构无一拥有地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明确边界。这很显然是因为一些人同时栖息在所有这些文化之中，并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混杂或混合了它们。在此情况下，试图保持一种单数的结构概念，会需要尴尬而独断的选择。我们也许可以把庞大的、全球范围的、具有地方文化差异的文化结构进行编码，使之成为嵌入等级制的各种次级结构，但这样的结构概念要么太过模糊和宽泛，以至于无法在所有的意义层面都被看成是结构，要么太过复杂，充满了本轮（epicycles）[(4)]，以至于无法应用到实践中。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认为美国文化、孟加拉文化以及工程文化都是只在外部存在联系的单独实体。于是，这位来自休斯敦的孟加拉工程师身上，恰好可以分离出三个独立且互不交流的意识，它们在他的身体里偶然相遇。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复数形式的文化结构。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宣称主体已死的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他们明确指出，人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幻象，主体只是决定其言说或活动的诸结构的载体和场所。但此说可能会让美国的实用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失掉萨林斯式的主旨，也就是通过涵盖能以有效行动改变结构的、聪明而又受苦的人类个体，来修正结构主义。

我认为，要让萨林斯的理论不仅能应用于“历史之岛”，也能应用于大陆、宗主国和帝国的历史中，就必须把结构概念化为复数的形式。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把诸文化结构对应到不同的“诸社会”，因为要想确定不同社会或文化的边界，几乎是不可能的。诸文化结构要对应的，应该是不同范围的社会实践所在的不同场域和地域，它们在时空中相互交缠、重叠和渗透。这意味着，对任一给定的地理或社会单元而言，与之相关的结构总是复数而非单数的。

单数的结构概念不仅对解释复杂、流动且地理上与其他社会接壤的社会而言十分困窘，对解释边界清晰且对外孤立的社会（如库克到达之前的夏威夷群岛）也同样困窘。这部分是因为单数的结构概念很难解释清楚事件从何而来。但只要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萨林斯的案例（即库克船长到达夏威夷一事）并没有被这个问题困扰，原因是冲突的双方在彼时属于两种相互孤立的文化。当英国人和夏威夷人相遇

时，双方文化结构之间的喧闹冲突引发了一系列惹眼的事件。但如果跨社会接触中的天降神兵（*deus ex machina* ）缺席（显然是从夏威夷人的视角出发的），人们会很难看清一个单数的总体文化结构如何生成了差异、冲击和指涉的创新，从而引发转型性的事件。

萨林斯的重点理论或许能为这种质疑提供一个解答。这种理论强调，占据同一体系中不同位置的人，能以不同方式理解结构，并以不同方式被结构驱使。在讨论夏威夷的例子时，萨林斯指出女性在冲破禁忌的行动中相当引人瞩目，并最终导致了禁忌体系的瓦解。如在库克逗留夏威夷期间和后来的欧洲人造访时，平民女性屡次无视船上场合的禁忌，她们在夜间游向海船，和水手发生性关系。在船上，她们不仅和水手情夫们一同用餐（夏威夷女性是被禁止在男性面前进食的），还吃了很多禁忌的食物，比如香蕉和猪肉。从欧洲人写作的编年史来看，她们吃得相当尽兴（Sahlins, 1981:47—49）。事实上，正是卡美哈梅哈强势的遗孀加休曼努（Ka‘ahumanu）[5] 这位女酋长统领了对抗公共和仪式性禁忌的行动，并于1819年一鼓作气消灭了禁忌体系（63）。萨林斯强调，夏威夷女性冲破禁忌的强烈意愿，源自这样的事实：

> 在夏威夷女性中，禁忌没有像在男性中那样有效地推行……禁忌对女性的影响，实为男性与诸神之神圣地位的负面形象，旨在保护神圣的生命与物的存在，而非为女性自身提供正面的环境、状态或特性（46—47）。

女性在个人和情感上对禁忌体系的承诺远比男性少，她们也因此比男性更愿意参与冲破禁忌的行动。这种对某一文化结构的特点的看法，赋予女性以与男性不同的重点。类推可知，社会位置中任何由文化所标示的差异，会导致重点的不同，并由此对文化范畴的意义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

然而，有人可能会好奇，对重点的不同视角的差异是否足以解释夏威夷女性采取的新行动呢？如果萨林斯指出的，禁忌体系是夏威夷文化结构的主要符码，这种符码只对女性进行负面定义，那么女性是

从何处获得了自我意识和社会行动的计划，让她们能参与到具有破坏性和潜在危险的冲破禁忌的历史片段中？一种可靠的回应是保留萨林斯这种单数的用法，但也得描绘出一种更为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形象，即强调结构具有的不稳定性、矛盾、鸿沟和裂缝。具体来说，有人也许会认为，在夏威夷女性的案例中，由于禁忌体系只对女性作负面定义，女性和被正面定义的男性、酋长和神祇的关系也被定义为负面的。有人也许会说，在解构主义的模式里，对于女性的负面定义无疑包含了微量被排除在外的、被正面定义的范畴，这些与男性、酋长和神祇的微量的同一性，可能让女性得到了被明确否认拥有的能力。因此，当日常和预期的社会关系过程中出现冲突时，这些微量的同一性会以强有力且颠覆性的方式激活。

但无论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会有多大益处，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意义相当不同的复数的结构视为多元的。也就是说，在不同社会和地理尺度上运作的不同制度性领域，会以不同的象征或文化逻辑来运作。[3] 尽管对夏威夷的历史和民族志而言，我是个门外汉，所知都来自萨林斯的研究，但我认为，在禁忌关系的体系中，夏威夷女性仅有的社会性定义均隶属负面范畴的看法一定是不可信的。无疑，在其他完全不同的制度性领域中，像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家庭或居所，以及与其他女性的关系里，女性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定义。当然这些定义她们的制度性领域和文化结构只具有相对的自主性。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不论是公开仪式情境中的范畴，还是作为家庭中夫妻或兄弟姐妹的范畴，都被禁忌的定义有力地置入结构之中，这些禁忌的定义将女性之于男性等同于平民之于酋长、人之于神。但的确，禁忌关系不等同于夏威夷家庭的全部文化范畴。我设想，夏威夷家庭或居所大体都有些和禁忌体系大不相同的模式，包括合作、游戏、权威和分工等模式。相似地，被定义为凡俗（noa）而非禁忌的夏威夷普通女性间的互动，应该主要是由禁忌体系之外的规则构造的。

社会应当被概念化成大量相互重叠和连锁的诸文化结构之所在，这些结构只是相对自主，也就是和其他结构共享一些意义和象征，比如，附属于家庭关系和公共仪式关系的诸文化结构，都包含禁忌的概念。但自主性同样真切存在，尽管它只是相对的：比如家庭关系的文

化结构，无论如何都不能化约为禁忌关系的文化结构。形塑某一社会的不同结构，事实上是以不止一种方式相互重叠或者连锁的：比如，包含相同的象征、指涉，或宣称拥有相同的客体，以及在相同个人的主体性中共存，并因此影响了他们的主体性。结构也可能存在于相当不同的层面和尺度里。禁忌体系包含了所有夏威夷人的（确切说是整个夏威夷的）宇宙（cosmos）。库克到达之后，资本主义交换的世界体系影响了夏威夷的社会关系，这个体系和夏威夷的体系相当不同，跨越了全球范围中广大的地理区域；但在世界上多数地方，它只支配着小规模的人类。其他结构，比如家庭、祭司权术（priestcraft）、酋长世系、战争或者生产，都对应着广阔的制度性场域。但结构也存在于更加微观的层面，像是特定的工作班组（work gangs）、一家三口，乃至二人之间的友谊。这些微观的文化结构各有不同，并不能化约为社会关系中在更具包容性的层面上运作的文化结构。

有两个理由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多元的结构概念是重要的。首先，如果我们假设主体是由结构所组成，那么多元的结构概念就能解释存在着广泛不同的重点、能力、倾向和知识的人。所以，虽然禁忌体系负面定义了夏威夷女性，或是把她们放在被禁忌体系排除的微量范畴中，她们参与其他社会和文化关系场域时，就能获得不同标准下的正面定义，包括与兄弟调笑的关系、和其他女性在工作上的关系、母女关系等等。其次，一旦结构之间能够相互重叠，那么源自一种结构或制度性场域的文化意义和认同就能被转置至其他。再回到夏威夷女性的例子，我们很难想象，由欧洲人的到来引发的冲破禁忌，没有受到女性间的日常关系，以及女性和家中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认同、团结和意义的部分影响。在论及女性与兄弟之间的关系时，萨林斯强调，有很多案例表明，夏威夷女性和欧洲水手发生性关系一事是和她们的男性近亲共谋的，必须有一个相对自主于禁忌体系的社会关系场域，才会发生这种共谋（1981:41—42）。

在一篇讨论斐济战事的论文中，萨林斯在某个脚注里承认，要想解释差异的运作以及事件所特有的相互再定义的过程，就有必要采用某种将结构复数化的方法。他强调，“‘结构’一词，明显是一种过分简化的描述。我们应该明白，事件的特性，或者说作为事件的意外

（incident）的特性，就是联系起特定社会的文化中不同结构的秩序”（1991:86）。在后文里，他相当频繁地用到了“结构的秩序”一词。然而，我认为，比起“结构的秩序”一词所表现出的半推半就的妥协，我提出的说法要好很多，也就是把结构视作多元、重叠、相对自主和可转置的。应该说，之所以我敢主张更彻底地抛弃结构主义的单数的结构概念，是因为上面一段引文中省略了一段萨林斯的表述，他强调“要么，也可以追随休厄尔所说的不同的诸结构”，并引用了某篇论文的出版前版本，这篇论文在后来成为了本书的第四章。我前两页讨论的重点，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追随休厄尔”。

采用多元而非单数的结构概念，也有助于解决萨林斯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出现在讨论斐济战事的论文的脚注中，即何时可以把日常发生界定为事件，而不仅仅界定为再生产了结构的意外：

> 我想宽松地将转变结构而非仅仅实行结构的行动和意外定义为事件……在区别不同行动时，还有个操作上的难题，也就是如何区分再生产现有文化秩序的行动和改变现有文化秩序的行动，因为每个可认知的行动对秩序而言都是新的和延续性的……文化秩序是事件构成的体系……这些都提出了哪种类型、多大规模的变迁足以成为“事件”的问题。我只是很具体地处理过这些问题……至于对抽象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留待下次再说（1991:86）。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留待每个接受结构二重性的人去思考。结构是被人类行动（而不是神或自然）所制造和再生产的。正因为结构是经由实行再生产的，正因为由结构形塑出的实行所在的情境与过去的情境不同，再生产的行动和事件之间的差别在于程度，而非种类。将结构的日常实行和转型性事件进行区分，对实际判断来说很重要。

如果将结构定义为多元的而不是单数的，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日常发生可以被看成是事件的难题就能迎刃而解。如果结构是单数的，可能有人会接着问，切实改变了位于社会关系某个角落的诸范畴的意义和关系的意外，是否足以被整体的文化结构认定为事件。这个问题通

常很棘手，因为被毫无争议地定性为地方性的结构转型，也可能事实上有能力对更高层次的结构进行再生产。一次离婚或再婚，既深刻地改变了某个家庭的文化，也导致了美国婚姻系统之范畴的再生产。用单数的结构来解释上述意外或许力有不逮。但如果结构是多元的，那么上述日常发生可以同时被看成是地方性家庭文化中的事件，和广义上对结构的实行。

视结构为多元、重叠且可转置的观念，也能阐明有关行动主体的生产的问题，对此，萨林斯谈的相对较少。我在此采用萨林斯对人类主体提出的几个假设，即主体是有意图的、多样的，且被其文化所深刻形塑。但萨林斯在证明这些假设或探索假设之间的关系上着力不多。尤其，他没有反思人类是由文化生产的和人类是多样的这两条假设间的潜在矛盾。由于任何社会的文化结构都是基于差异形成的，由文化定义的人的不同范畴也因此各不相同，像是成人和儿童、男人和女人、酋长和平民、祭司和官员，等等。但萨林斯似乎也假设，依据文化确定的范畴内部也存在多样性。我坚持认为，这种范畴内的多样性和另外一个假设一致，即只有影响主体性的文化结构被定义为多元的，主体才能进行文化生产。因此，特定的酋长、女性和祭司，既被社会范围内三者和其他范畴的关系的定义所形塑，也被三者在其他制度和社会关系束中不同的参与所形塑。多元结构假设不同个人的经验、能力和知识必然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历史是不同视野下不同文化结构混合后的独特呈现。多元结构意味着多样的主体性，也因此多样的重点在萨林斯对事件的讨论中如此重要。

而且，虽然萨林斯清楚地假设了行动者有意图、多样，且被其文化所深刻形塑，但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认为行动者拥有创新行动的能力。确实，行动者有能力理解新现象，但似乎必须先把他们归入已有范畴里。萨林斯记述的夏威夷的行动者，有时对自身的指涉行动似乎相当熟稔，尤其是在他们身处史无前例又令人极为不安的情境时。在罗诺神本应到达的时间，一艘欧洲来的船出现在了海平面上，库克也就立刻被归为罗诺。库克一上岸，祭司们就毫不犹豫地通过仪式把他奉为神。的确，我们的资料都是由英国的水手写的，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夏威夷人试图理解库克到达现场时出现了怎样的困惑、怀疑、争

论、计划和反计划。但我认为，萨林斯的叙述似乎使夏威夷人重要且风险性的指涉行动由当地结构过于轻而易举和自动地生成，也使夏威夷的行动者看似严重缺乏风险意识，并对其他指涉行动缺乏反思。事实上，指涉这个术语似乎在解说事件中发生的各种文化行动时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可以把这个术语解读为人们和自己的各种文化结构间没有距离感，而唯一的问题是新现象如何被归入合适的结构性范畴里。

然而不难想象，一个反常现象的出现（库克出现在夏威夷无疑可以被看成是反常的）对符号性行动的影响，远比把现象归入一个范畴中要复杂。人们可能也会对现有范畴进行反思，对各类范畴进行重新定义，比如，拼接过去分开的范畴、把一种范畴从一个结构中挪到另一个结构中、瓦解分类层次或者增加、发展分类的替代方案等等。而且，当人们需要采取行动时，可能会模棱两可，会同时尝试不止一种语义指涉的形式，并希望能由反常现象本身的后续行为来进一步指导自己。虽然我们不应该指责萨林斯没有找到夏威夷人的行动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复杂性（可惜的是，记录确实没有谈到这些），但这些复杂性很可能就埋藏在记录中提到的指涉行动的背后。

我认为，多元的结构概念能更容易地解释主体的文化创造性。如果形成主体性的诸文化结构是多元的，那么主体性也是多元的。任何单独的个人，一旦将自己在不同情境中的多元主体性，同与各种主体性相联系的动机、行动计划和思考模式在自己身上组合到一起，他就再也无法被任何特定的情境所严格限制。由于个体、象征和文化指涉的客体在结构性领域间相互重叠，由结构生成的规则、情感、范畴和自我意识都有可能从一个情境转置到另一个情境。事实上，如果行动者在协商和再协商不协调的文化结构的关系上有些经验，行动者也就会对结构性范畴本身保持思想上的距离，也就能运用和自己构造不同的他者视角来看待一整套文化范畴，有能力比较和批判各种范畴及其逻辑，为不同结构性方案看似冲突的需求找出相互协调或建立秩序的方法。由此，多元的结构概念让人类的创造性和反思成为历史理论中一个必需的元素，而不是哲学上先验的形而上学假设。

## 结构仅仅是一种文化范畴吗？

我所认定的结构的多元属性，指的是不同文化意义束或文化意义体系影响了制度性实践的不同领域。事实上，这一断言在两个意义上与传统结构主义分道扬镳。首先，这挑战了结构主义对总体性的理解，把构成了人类实践的象征和意义，分割成相对自主且相互之间不等同的地方性集合。其次，这也表明，象征和意义既受到它们与物质世界实践的地方性关系的影响，也受到相似与差异间的总体符号学关系的影响。这种理解为“结构”和“世界”提供了比传统结构主义所能提供的更为实质性的联系。在我看来，这一点可以通过将结构概念化为由文化图式和物质资源（而非仅仅是文化图式）共同组成得到清楚说明。

尽管萨林斯没有把资源看成是结构的一部分，但在他“结构史”的几个片段里，资源还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只需回顾他对库克船长死后夏威夷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的思考，就能最为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对资源的讨论可以从船长骨骸的问题开始，因为这是夏威夷人和英国人争论的焦点。英国人想拿到库克的骨骸，因为这样一来，尽管库克死于野蛮人之手，但起码他在人世间的遗骸能在基督教葬礼中得到安息；而他们也确实把某个人的骨骸掷入了海湾，至于骨骸究竟属于何人，我们只能猜想。夏威夷人视库克的骨骸为圣物，但他们对骨骸的用法更为世俗。和对待已故酋长的尸骨一样，他们把库克的骨骸用到了仪式里，王室由此获得了库克的玛那，从而增加了国王在俗世的权力。在库克死后很快继位的国王卡美哈梅哈，积极参与了对这位不列颠的罗诺-库克神的崇拜。1793年，一位祭司在旅程中对彼得·皮热中尉（Lieutenant Peter Puget）说，“骨骸总是伴随着国王”出行（Sahlins, 1981:26）。王室采纳祭祀库克的活动，以及由此取得的不列颠的玛那，对卡美哈梅哈来说有重要的实际后果。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此，卡美哈梅哈才有能力征服其他夏威夷岛屿，使其完全统一，归顺他的统治。作为欧洲玛那的特权拥有者，卡美哈梅哈化身为外国船只的保护者，并在所有对欧洲人的贸易中设置王室禁忌。这确保了他可以获得来自欧洲的顾问，并对军火和船只实现有效垄断，从而满足他制服敌人的需要。到了1812年，卡美哈梅哈已经将这些优势发展为对整个群岛的宗主权。

成功使用禁忌来独占贸易的做法，对夏威夷的历史产生了持续性、但最终是毁灭性的影响。在19世纪早期，当夏威夷的檀香木忽然成为欧洲对中国贸易的重要商品时，贸易禁忌的价值骤增。不仅是卡美哈梅哈，还有很多治理王国并（或）拥有土地且控制平民劳动力的酋长，都通过强迫平民进驻森林、砍伐檀香木的手段获得巨额财富。拥有土地的酋长对平民的剥削使后者陷入贫困和疲惫，这可能也导致了天花等“文明”病的传播，导致随后触目惊心的人口锐减。同时，酋长在和欧洲人的贸易中积累了新形式的玛那。他们购买了大量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奢侈品，建造了仅供仪式用的欧式房屋，里面放满了钟表、菜肴、盘子和小雕像。他们在库房里堆积了质量最好的中国丝制品，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格子棉布、亚麻布和羊毛制品，任其腐烂。也是在这个时候，夏威夷酋长开始用欧洲人的名字来称呼自己，诸如比利·皮特（Billy Pitt）、考克斯（Cox）、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查理·福克斯（Charley Fox）、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等。萨林斯把这些看似奇异的行为，看成是既有的夏威夷观念在逻辑上完全延伸的结果。一直以来，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是外来征服者的后人，并使用不同的方法，象征性地强调他们和平民的差异。采用比利·皮特这个名字的做法，清楚表明了一种把自己和普通夏威夷人区分开的异域的身份认同（此处是欧洲）。在檀香林被耗尽（约1830年）的前几年，各种层面的对欧贸易的大量涌现，使得以前所未闻的比例积累异域玛那的符号成为可能。其结果是在夏威夷的“高贵的政治经济学”中，出现了一种狂热的夸耀性消费，耗尽各行各业平民的气力，并最终损害了酋长的利益，在繁荣的时期过后，他们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其最终结果是19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完全剥夺了夏威夷人的土地，将之转移到美国传教士和商人手里（Sahlins, 1990; Kirch and Sahlins, 1992）。

萨林斯用这个故事，又一次展现出新的日常发生是如何被既有符号学图式的应用所驯化的。库克的骨骸经受的仪典，同其他在战争中战败和死去的国王或酋长是一样的，目的在于把已故伟人的玛那占为己有。与欧洲人的贸易被编码为王室事务，部分是因为国王是库克的欧洲玛那的特权拥有者，王室禁忌也因此被延伸，覆盖了贸易领域。欧洲人带来的奢侈品，被当成是酋长的玛那的符号，并在随后不断积

累。夏威夷的文化范畴再度挪用和形塑了欧洲的新奇事物，与此同时，夏威夷文化范畴的意义也被其所指涉的新现实所转变。

但文化范畴是如何同时挪用和转变的？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萨林斯的故事中，图式和资源之间动态且辩证的关系，扮演了极为重要但在理论上未被注意的角色。这种辩证法可以通过三个节点或时刻来纳入图式。

1．资源由文化图式生产。　这里我指的不是文化图式创造物质或人类，而它们又成为了给定社会情境中的资源，而是指人类或者物质的特殊价值源于它们在现存文化图式所在的范畴。库克的骨骸之所以成为玛那的强大来源，是因为它是根据处理伟大酋长的骨骸的图式来处理的。欧洲贸易之所以被归入王室事务，并隶属于禁忌体系，是因为国王和罗诺-库克神的联系已经让他成为“欧洲人”，也就是说获得了欧洲的玛那还因为贸易和王权一样，都经由水路而来。世界中的行动表明，物质和人都是拥有社会权力的特定价值和潜力的资源。行动不但把物质（或个人）置入了和其他范畴存在特殊符号关系的抽象范畴里，也赋予其现实世界中的权力，这种权力也有着属于这个范畴中其他物质（或个人）的特点。库克的骨骸显示出了一种和其他被神化的酋长类似的神性，欧洲火器或新奇的织物和特定禁忌食物一样都内在固有着玛那。一次成功的范畴化行动（且范畴化往往是有争议的），让事物成为了特定种类的资源，也由此使之受到该种类所特有的社会动力学的影响。

2．然而，资源也受其他动力学支配，这些动力学不是其在该范畴化过程中获得的。 这些补充性的动力学通常分为自然的与社会文化的这两种类型。所有资源都受制于某些生物或物质上的局限和倾向。萨林斯故事中的两个典型的案例能说明这种动力学。在文化上，檀香木被定义成具有特殊价值的贸易商品，是酋长或国王的财产，但如此定义并不能改变这种树再生速度慢的事实。因此，它们会最终因为滥砍滥伐而耗尽。与之相似的是作为采伐者的夏威夷平民，他们之所以能被如此强力地驱使到森林中砍伐树木，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死亡率升高和肥力下降的影响。除了这些自然的动力学，社会文化的动力学也会影响由文化定义的资源，而这些动力学超出了将资源归类为某一

特定范畴的动力学。夏威夷人能把库克当作神和玛那的来源，但产生于罗诺-库克神的欧洲玛那和之前夏威夷玛那的形式不同，因为它依靠的是生产方式和贸易流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欧洲和美洲对中国的贸易，其范围远远超出夏威夷群岛。那些被归类为玛那之度量的欧洲商品（比如舰船、枪支、盘子、水晶、丝绸、格子棉布、钟表），不但具有特定的物质属性（枪支是杀伤力极大的武器），还牵涉到兴起中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具有的文化图式和社会动力学。因为资源牵涉到其他文化宇宙，不可能仅仅被夏威夷的玛那和禁忌图式支配。

3．文化图式的转型是由资源非预期性的流向所导致的。 这一点可以通过评述萨林斯“历史的可能理论”的第二个命题来解释，即“文化范畴在世界内的行动（严格来说是指涉行动）中获得了新的功能性价值。文化的意义因其所背负的世界而改变”（Sahlins, 1985:138）。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理解文化范畴背负着世界。对萨林斯的构想，我想进行两点解释或者说是修正。其一，理解世界中的行动总是指涉行动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对这种行动的片面描述。参与一种行动当然是在语言学的意义上行动，即认定事物隶属于一个语义范畴，例如“树”“神”或“禁忌”。但同样的行动也将世界中的某一事物标识为行动的潜在资源，并容易受到该类事物所特有的社会用途类别的影响。由此，有意义的行动应被同时理解成是语言中的指涉和将世间事物标识为行动的潜在资源。其二，萨林斯的构想过于强调共时性。诚然，指涉行为本身可以被视为对指涉某一事物的范畴之意义的改变。任何指涉行动都会改变范畴所指涉的经验内容，从而影响其本身可能包含的一系列特性。但文化范畴转型的风险首先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被最初的行动用作资源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受制于其他自然或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的影响，使其在内容、数量、价值和关系的层面上发生显著的转变。如果在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期间，夏威夷的玛那和禁忌范畴发生转变的话，最有可能是因为，那些基于其与这些范畴的关系而被当成是资源的事物（如武器和欧洲的贸易、奢侈品和檀香木），受到了新的节奏和价值变化的影响，而18世纪90年代的夏威夷酋长和祭司，并未预料到这些节奏和价值变化的出现。给范畴造成如此重大转型的，并不是指涉行动本身，而是指涉行动所标示的资源发生的不可预期的流动或波动。

根据我对萨林斯的解读，结构性变迁并不仅仅在文化层面运作。资源的标示、使用及动力学都与结构性变迁息息相关。故此，对萨林斯所认为的范畴“背负着世界”的说法，我们要进一步从字面上去理解：文化范畴是物质世界的事实。每当行动者把事物用作资源来标示事物时，它们就使世界背负了供人类使用的潜力。同时，文化范畴也背负着它们所标示的事物，在行动走向预期之外的过程中，文化范畴也被拖曳到新的意义群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范畴不受到其在符号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影响，这种网络的触角可及之处，远远超越了文化范畴所背负的特定世间指涉对象的所在。事实上，正是这种对宽广的符号含义网络和世间实践的地方性联系的同时参与，使新的指涉行为面临风险。将欧洲的贸易商品认定为是禁忌，意味着源自贸易关系的怨恨可能会反作用于区分男人和女人、平民和酋长的饮食禁忌，甚至是整个禁忌体系。在我看来，萨林斯的讨论的力量，源自结构同时包含图式和资源这一隐晦的想法。只有这样定义结构，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清楚世间的文化范畴和人类行动的辩证关系。

## 结构和事件

尽管我已经在本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批判萨林斯对结构的理论化中涉及的几个方面，但承认我们都认可某些基本假设同样重要。在此我将逐一道来。

首先，历史事件应该被理解为转变结构的日常发生。事件构成了历史学家所谓“转折点”的原因，在于其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支配人类行为的结构。因此，要理解和解释一个事件，就要明确它带来了何种结构性变迁，以及确定结构性变迁是如何实现的。

其次，要形成有效的关于事件的理论，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全的关于结构的理论。这点看似自相矛盾，因为“结构”已被理解成一种本质上是共时性的概念，而“事件”常常被看作是极具历时性的，只有及时对日常发生加以详细叙事才能被及时把握。而萨林斯对库克船长到达夏威夷一事的思考表现出，历史学家如果要叙述一个事件的意义，既要及时叙述日常发生，也要脱离叙事或者说暂时悬停时间，用共时性

的话语模式来分析所说的故事里定义了物和人所具有的性质与潜力的一系列关系。如果没有充分理解到事件所转变的结构具有的共时性，那就无法对事件进行充分的、历时性的叙事。

最后，我认为萨林斯已经揭露了结构性转迁的根本机制，即把现有文化范畴应用到新的环境中既是必要的，也是有风险的，起码在某些情况下，对世间的事物进行文化标识的行动，会改变文化标识的意义，进而重新调整人类社会行动的可能性。这种在抽象的意义层面上是明确且直观的机制，无疑很难说明并服从于历史变迁真实细节中无穷的复杂性。但萨林斯已经为我们要捕获的猎物完成了至关重要的命名工作，且在对夏威夷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中，提供了一个如何成功捕获猎物的生动示范。

## 势态的结构与结构的势态

萨林斯的历史民族志有一种历史学家尤为看重的优点，即是对历史细节的重要性的敏锐把握。他的理论的整个主旨，促使我们去识别生成新的指涉行动（以及对世间的标示）的特定情境。即便事件（无疑时常）在某种程度上引发和实例化了更强大的历史力量带来的更为渐进的改变，由事件实现的社会转型依然取决于具体时间、地点和情境中的具体细节。所以，细节是重要的，情境虽有偶连、短暂且看似微不足道的特点，但会对后来的历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欧洲人频繁的海上航行扩张到太平洋地区，势必引发欧洲人与夏威夷人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又势必对夏威夷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具体特性和形式又取决于双方初次相遇时的细节。要是库克的船是在7月而非12月到达凯阿拉凯夸湾，那么罗诺神对英国船长决定性的同化就永远不会出现，因为对罗诺来说，正常到达夏威夷的时间是在玛卡希基庆典期间，但在仲夏到达的情况极为罕见；要是库克没有被夏威夷文化认定为神，其后半个世纪的夏威夷历史就会截然不同，一如萨林斯所有的历史民族志研究所阐明的那样。

萨林斯把这种微观条件对宏观问题产生影响的趋势视为事件所特有的标志。他在《历史隐喻与神话现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1981）里提出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警句——“势态的结构”（structure of the conjuncture）——来说明事件的一个特点。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相当随意，只在上下文中顺带进行了定义，见下文举例：

> 没有谁能够保证，在实践中遇到的情境，会刻板地产生于能阐释环境、并作为其行动依据的文化范畴。相反，实践拥有自己的动力学，也就是“势态的结构”，它至关重要地定义了参与实践的人和物（35）。

> 语用学（pragmatics）拥有自己的动力学：关系可以同时战胜意图与惯例。交换的复合体，即“势态的结构”，在夏威夷人和欧洲人之间发展出来，把前者带入内部冲突与矛盾的异常状况（50）。

> 实践环境的特殊性、人和环境的不同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套特别安排（势态的结构），会在旧的范畴上沉淀出新的功能性价值（68）。

> 我们必须考虑到实践本身的关系，即“势态的结构”。我一直认为存在一种自成一格的文化关系的发展，即由重点引导且适应语境的人与物的范畴的应对之道。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运作中的分歧”，可能需要对相互冲突的意图和阐释进行某种安排，即便在如是建立的有意义的关系与已建立的关系相冲突时也是如此（72）。

十年后，他又一次定义了势态的结构，写法只是稍微正式了点：

> 在其他研究里，我确实已经把事件性过程（evenemential process）明确地描述为“势态的结构”，意指文化范畴通过历史能动者有重点的行动和他们间互动的语用学而在具体语境中现实化的方式（1991:80—81）。

这个术语需要一些拆解。萨林斯援引“势态的结构”，是想解释为什么在事件里，“在实践中遇到的情境”无法避免“刻板地产生于阐释环境、并作为它的行动依据的文化范畴”（1981:35）。由此，势态的结构不是指最通常意义上的结构，即持久的、例行再生产的关系；相反，它是一种“语用学”或“动力学”，虽然它是由行动者的“重点”所驱动的，但它能“同时战胜意图与惯例”。但如果势态的结构指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结构，这个术语就成了有些自相矛盾的挪用。萨林斯认为，事件的动力学并不是全然混乱的，它们能展现出重要的规律性，尽管这些规律是行动者未曾预期到的。“势态的结构”这个术语试图表明，我们称之为事件的“势态”是以新生的规律或逻辑为特征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是“被结构的”，尽管它是新生的。

但“势态的结构”这个新词是可以被反转的。而且我相信，反转之后，它的含义会更加丰富。萨林斯所概念化的“势态的结构”，可以被认为是从“结构的势态”（conjuncture of structures）而来。要让作为事件特征的特定动力成为可能，就要让之前完全脱节或以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连接的结构在给定情境中接合在一起。当人在一种既有结构被重新接合的情境中行动时，他们特定行动的结果会偏离自己的意图。因此，情境能同时压制特定行动和提出新的可能性来解释其他行动。要注意的是，这种新生的抑与扬的组合会同时影响到以先前相互脱节的各个结构为基础的行动。于是，所有参与者都会被假定于不稳定且互动性的动力中，参与由结构形塑的行动图式的实验性转置。在这种不确定性必然会很高的情境下，出现显著重构实践的、相互重新定义的情境是很有可能的。而且，情境中看似微小或偶连的细节，显然也能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后果。

这点似乎又在萨林斯的夏威夷研究上得到了说明。我们强调过，在玛卡希基庆典开始的时候，库克的船极为偶然地到达了凯阿拉凯夸湾。这种预料之外的出现被解读为罗诺神的降临，并致使夏威夷负责罗诺神仪典的祭司把他奉为神，为他举办了通常是为神举办的个人仪式。根据萨林斯的说法，在罗诺-库克神逗留夏威夷期间，祭司们对他尤为热心，因为他们能利用罗诺神的血肉之身造访的契机，改善他们与地方酋长持续对抗的处境。英国人需要的补给，由罗诺神祭司以礼

物的形式送达，他们也因此很愿意合作。相反，酋长对库克的态度很矛盾，心绪会在“贵族义务与偷窃”之间“机会主义”地游移（Sahlins, 1995:70），结果导致了特定的“势态的结构”的出现。诚如萨林斯所说：

> 酋长、祭司和英国人，都顺应了他们既有的意愿和重点。其结果是，同盟与对抗一道，形成了小规模的社会体系与特定的动力。不列颠人被卷入了“神俗人员之间”的分裂性（schismogenic）关系。在现有仪式性暨政治性的环境中，这不必然对他们有利，因为祭司们越是把自己客体化为罗诺神的支持者，就越是暗示了库克成为国王的牺牲的命运（1995:71）。

这种势态的结构为何把库克标示为潜在的牺牲对象？因为传统上国王结束玛卡希基庆典的方式，是从临近罗诺神神庙的海边登陆，并在神庙里与罗诺神信徒上演一场仪式性的战斗。接着，罗诺神的肖像被摧毁，换言之就是被仪式性地杀死，并由一艘独木舟满载着献给罗诺神的祭品，向卡希基漂去。同时，国王重开献祭战神库的仪典。这种仪式性对抗的语境，传统上出现在玛卡希基庆典的尾声，于是，酋长、祭司和英国人的三方互动，把库克标示成了与夏威夷国王和酋长有潜在对立关系的神。当玛卡希基庆典进入尾声，库克和他的船员的船只巧合地驶入了远洋，这种潜在的对立也恰巧被搁置起来；但对夏威夷人来说，他们理当如此。而当另一个历史巧合出现时，潜在的对立被强有力地现实化：在库克隆重离开夏威夷的海边后没几天，他的船被狂风吹断桅杆，导致船队不合时宜地回到了夏威夷。结果显然是有着血肉之身的罗诺-库克神遇害，和罗诺神的神像一样被肢解，而库克的玛那也归夏威夷王室所有。

此处，势态的结构是由三方的结构的势态构成的。罗诺神祭司和酋长之间早已存在的结构性张力，被库克的意外到来所恶化和扭转。库克自身的重点无意将他卷入到玛卡希基的仪式性戏剧之中，并站在了祭司这一边。库克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角色的重要性，但是身为不列颠海军船长的他，拥有高度仪式性和绝对的权力，这使他特别适合这个角色。在这个复杂势态里产生的结构性即兴表演中，库克得到了神

性，也失掉了性命。而夏威夷人则把随海船而来的欧洲人，吸纳到自己的社会世界中，这注定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改变夏威夷的社会世界。

当然，势态的结构的特殊性质在每个事件中都会有所不同。如果萨林斯关于事件的理论是对的，那就意味着势态的结构总会卷入新的结构的势态。所以，我们无法事先预知哪种势态的结构能形塑构成某一特定事件核心的指涉行动。但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寻找一种结构的势态，它在试图从结构角度理解高度不稳定的情境的行动者之间引起一种协同性的互动。

## 一种历史的可能理论

萨林斯的事件理论，有着适当的开放性。这是一种历史的“可能”理论，这不仅是说其有可能运作，也是指它所指出的不是关于历史发展的一系列铁律，而是历史普遍固有的一系列可能性。这为历史性地分析事件提供了一套词汇和范式逻辑。我已试图阐释萨林斯的范式，彰显其力与美，并表现出该范式如何引发了详细阐述和修正。他采用的基本术语都是抽象的，如结构、事件、行动者、重点、指涉、势态的结构。此外，我想要加上图式、资源和结构的势态。我们想要获得一个比萨林斯所提供的更为详尽丰富的事件理论，但这还得靠我们历史专业的学者来提出。以我们感兴趣的事件，在行动者、地理位置和历史位置、政治和文化动力学和时间性方面千姿百态的事件为基础，通过进一步反思，我们应该有能力进一步讨论结构的势态产生势态的结构、重塑结构的不同种类的符号学指涉行动、受事件影响的诸结构的类型和关系等等的不同方式。我个人认为，萨林斯已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后续反思的基本框架。简言之，我认为他的历史理论远不仅仅是可能 的，还是有力、可概化、有成效和开放的历史变迁理论。这一种对历史研究而言缺之不可的理论——不仅是可能的 历史理论，亦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理论。

注释：

本章最初以德语的形式发表于“Eine Theorie des Ereignisses. Überlegungen sur’Möglichen Theorie der Geschichte’von Marshall Sahlins,” in *Struktur und Ereignis* , ed. Andreas Suter and Manfred Hettling, Sonderheft 19 of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 Copyright © 2000 by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Göttingen;获得Vandenhoeck and Ruprecht许可后再版。

1 ．有两位欧洲历史学家曾对萨林斯的研究表示过认可，他们是彼得·伯克（Peter Burk, 1987, 1992）和安德里亚斯·苏特（Andreas Suter, 1997）。

2 ．值得留意的是，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 1992）尖锐地挑战了萨林斯对于库克与夏威夷人之相遇的阐释。根据奥贝赛克拉的研究，夏威夷人把库克当作神祇的想法，完全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立足于欧洲探险家和不谙航海之人长期存有的、认为野蛮人劣等和容易哄骗的神话。奥贝赛克拉认为，夏威夷人应对欧洲人的方式很实际，并不存在神话性，而萨林斯阐释的神化库克的仪式，事实上是一种试图任命他为夏威夷人体系中的酋长的仪式。奥贝赛克拉假设道，这可能是夏威夷国王想要与库克在对抗毛伊（Maui）人的战斗中结盟的意图所致。库克最终以神的身份融入了夏威夷人的体系，但这只是在他死后，这与夏威夷王室的其他成员一样。令我满意的是，萨林斯有效地反驳了奥贝赛克拉的主要论点（Sahlins, 1995）。尽管二人所争论的问题十分重要，但我不认为他们学术上的分歧对我这篇文章的论点有什么影响。与萨林斯类似，奥贝赛克拉也认为夏威夷人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范畴来理解欧洲人并与他们互动。双方的不同点在于，奥贝赛克拉认为库克被夏威夷人视为酋长而不是神祇。而且，和萨林斯不同的是，奥贝赛克拉几乎没有谈到事件所具有的长期的、转型性的效果，而这是我在库克和夏威夷人的问题上最关心的一点。

3 ．对这一点的极好拓展，见Swidler（2001）。

---

(1) 在中译本《“土著”如何思考》（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35页）中，这种盒子被译成柳藤篮子，尽管sennit可以用柳藤编织而成，但在夏威夷，这种篮子是用椰子外壳的纤维制作的，此处以椰子壳的意思译出。—— 译者注

(2) 当地人所信仰的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为人、神灵或无生命的个体所拥有，而拥有玛那的人可以对其他人施加强大的影响。—— 译者注

(3) 在《历史之岛》第192页，萨林斯的interest被翻译成了“利益”，译者觉得不妥，代之以“重点”。interest这个词在拉丁文（inter est）中，对应的现在时原形是interesse，由inter（两者之间，between）和esse（将要，to be）两个词连缀组成，interest是其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的形式，字面意思即为两者之间的存在，引申为差异性。换言之，一个词的重点和差异即是不同词之间的一种存在。—— 译者注

(4) 这个术语来自托勒密的地心说，其中围绕地球公转的行星轨迹为均轮，而行星自转的轨迹为本轮。休厄尔在此处要表达的是结构之间相互套叠、又自成一格的复杂关系。—— 译者注

(5) 本书中将此人名拼写作Kaahahumanu，萨林斯原文为Ka‘ahumanu，此处根据萨林斯原作译出。—— 译者注

# 第八章　作为结构转型的历史事件：为巴士底狱发明革命

自希罗多德以降，历史学家就开始写作事件。所有重大事件，包括战斗、结盟、丑闻、征服、阴谋、叛乱、王位继承、改革、选举、宗教复兴、暗杀、发现，都对叙事史而言至关重要。事件虽在历史叙事中地位突出，但极少被当成一个理论范畴来审视。传统的叙事史学家沉溺于事件的偶连性和特殊性，故而通常在原则上拒绝参与对事件的明确理论化。同时，历史社会学家与少数试图逃脱政治叙事的霸权而转向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一道，蔑视单纯对事件的研究，代之以寻求藏于历史变迁中的普遍因果模式。回顾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来的研究，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繁盛起来的“新社会史”，此话不假。时至20世纪80年代，叙事史和历史社会学之间长久的对抗已然淡化，但将历史事件进行理论化的工作依然止步不前。[1]　我将以勾勒历史事件的理论概念开篇，尔后将这套理论用于分析法国在1789年之夏的日常发生，以完善这套理论。我深信，只有在对理论范畴和真实历史序列的相互审视中，我们才能完成对事件充分的理论化。

## 作为理论范畴的事件

依据标准词典的定义，事件这个术语可以指称任何一种日常发生或偶然事件，但它更常用来指涉在某些方面重要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被同代人广泛关注和谈论的事。规模盛大的公共仪式（如国王的迎驾仪式[royal entrances] [(1)] 或阅兵式）可能会被认定为事件，然而这些事件对历史变迁的影响甚微。当历史学家论及事件的重要性时，他们在脑海中浮现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产生重大后果的偶然事件。我想在本章中讨论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事件。

传统叙事史学者认为事件在历史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看法与他们相去甚远。正如我

在本书第四章中清楚说明的那样，我要强调的是深藏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深刻支配了社会关系，而要恰当理解事件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必须以结构的概念为基础。我认为社会生活显著而普遍的特点，正是结构视野下对社会行动的思考：多数社会实践（无论是国际外交、小生意抑或大众娱乐），往往会在相对长的时期里按照相当强的一致性被再生产。诚然，在再生产的过程中，所有社会实践都经历了不断的修正。细小的修正经过积累，最终可能导致重大的转型。但即便这种细小的、非戏剧性的变迁日积月累，社会关系整体的结构框架也往往维持不变。这些变迁发生时，很少是平稳的或线性的；相反，它们往往蜂拥而至，突然爆发。甚至是渐进式变迁的积累，也常对现有实践造成压力和戏剧性危机，而非逐渐推动事态转变。历史时间性的正常肌理是粗粝而非平滑的。我认为，这些加速变迁的时刻，被历史事件激发和推动。尽管事件有时是漫长过程中的高潮，但我要说的是，事件通常不只是对渐进、累积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实践的必要重整。历史事件往往还会转变社会关系，其方式往往无法从让事件得以实现的渐进式变迁里预测。就像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将历史事件加以理论化的重要性在于，事件重塑了历史，赋予社会发展一个未曾预料到的方向，改变了发生社会互动的因果关系的本质。鉴于此，对任何一个充分的社会变迁理论来说，一个理论上强有力的事件概念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

我认为，应该把事件设想为导致结构转型的偶然事件序列。这种偶然事件序列以例行实践被意外打破的断裂（rupture）为起点。这样的断裂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可能是由外部因素、结构间的冲突、人类纯粹的创造力或反常，抑或是例行程序中的细小错误导致的结果。但诸如武力镇压、刻意忽略或干脆被解释成例外的方法，会以不同方式把大多数断裂中和或重新吸纳到既有结构里。[2] 但无论最初的断裂性质如何，只有触发了一系列持久地转变了以往结构和实践的偶然事件，才是我所定义的历史事件。

这种偶然事件首先出现在特定结构和空间位置中的断裂同时强化了其他位置的断裂之时。社区酒吧里打破了日常社交惯例的打架斗殴便是一例。如果斗殴可以被酒馆社交的常态政治（normal politics）

化解，比如让门卫逐出闹事者，或把闹事者赶到后巷暴打一顿，那么斗殴就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要是闹事者中又有黑人又有白人，最初的断裂就会被同样构造酒吧互动的种族关系体系中的断裂放大。由此会造成更大范围的种族争斗，招来可能会实施种族暴力的警察，或是引发遍及全市的骚乱，而这又会反过来导致种族关系持久恶化、市长和警官威信扫地、私人投资闻声而逃，当然还会转变酒吧中社交的模式。由于结构之间相互衔接，最初的地方性断裂总是有潜力引发一连串后续断裂，并最终导致结构转型，例如文化图式的变迁、资源的转移和新的权力模式的出现。由于标准的程序和制约通常能修复社会实践中被撕裂的肌理，所以单一的、孤立的断裂极少会带来结构转型；而当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断裂拆解了既有的结构网络，使其无法修复、令再衔接（rearticulation）成为可能时，断裂就会上升为转型性的历史事件。

所以，一个历史事件，（1）是偶然事件中的一组分支序列，（2）被时人认为是重要的，（3）由此导致了持久的结构转型。如此定义历史事件，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仍有显著歧义。本章后文都倾向于用经验的细节来包覆我对事件的定义，到文末再回到对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而非用抽象的语词来解释这样的难题。1789年夏天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偶然事件，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攻占巴士底狱，将是我要用的经验例据。之所以选取此例，并非因为我认为它提供了一般历史事件的理念型，而是因为我深信此事提出了具有广泛意义的分析问题。而且，我对该事件发生的情境足够熟悉，从而对自己的经验性和理论性判断有充足的信心。但显然，不同个案会导致极为不同的理论化过程。因此，这个研究的目的不是明确阐述事件理论，而是抛砖引玉，征求比较、阐述和批判。

## 法国大革命与正常生活的失位

法国大革命肇始于地方性的断裂，但其结构位置早已同其他结构紧密衔接。早在1786年，主稽核（comptroller general）就已经把国家濒临破产一事告知了国王。时至1789年初夏，这场国家财政机构的

危机已然变成社会分层体系的危机（因为财政改革要做的，就是剥夺教士和贵族无需缴税这项重要特权）。由此，作为旧制度法国社会秩序的外皮的特权公司机构也面临危机（因为其特权是和特定财政安排联系在一起的），进而演变为深层的宪政危机（因为当时无法明确政府机构是否有权改变税收体系），并最终成为社会和政治秩序之根本原则的危机（自然权利、国民主权和公民平等的支持者们已成功主导政治话语，并在三级会议的代表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

我无意在此细述危机是如何扩大的，但分析性地思考最初的危机扩大的过程，无疑能获得些许理论上的启迪。我聚焦的是事件所特有的结构性关系的不确定性，如何引发了集体文化创造力的爆发。这对法国大革命和一般而言的历史事件来说，是一个不同的分析方面。在此，肯认事件的内部时间性 非常重要。虽然时间性这个术语有点守时主义的意涵，但历史事件从来都不是转瞬即逝的日常发生：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也就是从最初的断裂到后续的结构转型所经历的这段时期。在此期间，不同结构间通常的衔接会深刻失位（dislocated）。结果，行动者被不安全感所围困，不确定要如何继续生活。这样不安全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在同一个人身上有时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焦虑、恐惧或欣喜，又或是接连行动、不作为、极度戒备或决然放弃。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至少那些与失位的结构休戚相关的人会在生活中提高情绪强度。正如法国在1789年夏天所表现的那样，当结构发生普遍而深入的失位，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如履薄冰。借由关注从7月12日到7月23日的12天内，我考察了这种极为普遍的不安全感的效应。这段充满恐惧、欣喜、暴力和文化创造力的非常时期，改变了世界历史。

为什么法国的男女在1789年的夏天生活在极为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我已对此有所解释。此时的政治局势尤为失位和紧张。国王路易十六在之前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采用的方案均告失败，被迫在1788年召开三级会议，也就是王国内三个等级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此前的175年里，三级会议都没有召开过。但根据传统的宪政理论，这是唯一有权批准课收新税的机构。（三个等级分别是教士、贵族和平民，最后一个也就被称为第三等级。）国王召开三级会议，事实上宣

告了君主专制已经到头，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已不可避免；众人都明白，三级会议的召开将导致一种新的宪政体制。在三级会议的选举活动中，王室书刊审查制度被取消，形形色色的政治宣传手册在全国随处可见。政治斗争起始于国王和整个政治国民（political nation）间的较量，而贵族和平民之间很快暴发了争端。于是，到了1789年，斗争在三个方向上展开了。国王试图尽量挽回王权，贵族试图在国家中获得独立的角色（或多或少效仿英国上议院），而占据了超过95%的法国人口的第三等级，也想要为自己争取优势地位（Lefebvre，[1949] 1971; Egret, 1977）。

时至5月，三级会议最终召开，在这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立法机构里，第三等级的代表拒不接受自己是最低的等级。而他们拒绝妥协的做法让会议陷入停滞。最终，在6月1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手段，宣称自己是“国民议会”，这个称呼清楚表明他们是法国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他们邀请教士和贵族的代表参加议会，继续振兴国家的工作。起初，国王和多数贵族抵制这一举措，但在后一周发生过几次紧张的对抗后，国王事实上承认了国民议会，并要求贵族参加。但国王似乎只想借此为自己争取时间，又或许是他改变了主意。无论是哪种情况，路易十六在7月11日驱逐了一位与国民议会关系良好的瑞士银行家，也就是他的自由派财政总监内克尔（Necker），并开始在巴黎和凡尔赛宫周围派驻王室军队。看来，国王准备解散国民议会，镇压巴黎的群众运动，回归法令统治（rule by decree）。简言之，这就是导致了攻占巴士底狱的政治局势。

在1789年7月初，法国在国家层面上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失位。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932）后来说的“二元权力结构”（dual power），即君主制和国民议会这两个冲突的政治机器都宣称拥有合法权力，已在此时发展成形。[3] 由此，对通常是谨慎的个体（an ordinarily prudent individual）来说，很难知道应去服从于哪一方。而且，支撑两种权力声明的意识形态截然对立。君主称，统治来自上帝的恩典，通过父系继承降临到他身上，并经由加冕这一宗教仪式得到确认。国民议会称，自己的权威来自人民主权，即国民选择自己的政体的自然权利。两种意识形态不仅设想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还基于

不同的宇宙观，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形式。君主制的宇宙观内蕴深厚的等级制度观念，它从上帝开始，沿神灵、国王、教士、贵族逐级往下，直到平民，再到动物、植物和没有生命的物质。用旧制度的语言来说，秩序与等级制度没有区别（Mousnier, 1972; Sewell, 1974a; Loyseau, 1666, 1994）。国民议会内含的宇宙观则截然不同，其秩序源于自然而非精神王国，自然创造了人人拥有的平等权利。政治制度源于社会契约，产生于人民对适宜形式的政府的理性共识。人民没有义务服从任何权威，只需服从他们为自己选出的权威，无论是通过直选还是通过他们合法选出的代表。

法国国内两种冲突的权力的合法性源自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意味着普通人面对的不确定性超出了应服从哪种权威这一未定的难题。认可国民议会的权威就意味着必须认可新的社会秩序的语言，这种语言会对社会关系的几乎所有场域产生影响。在旧制度王权的等级制语言已为所有社会关系编码，如教士和教区居民、封建领主和农民、市镇官员和市民、师傅和学徒工、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认可国民议会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以所谓人生而平等和社会契约的说法重新定义和协商上述关系。这可能会对日常生活中的无数场域带来不确定的变化。但当时，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国民议会代表，都不清楚国民议会的意识形态的含义和范围。只要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僵局无法破解，当时的人都将完全无法区分安全与危险、道德与邪恶、有利与愚蠢、理性与非理性的行动。

在1789年夏天的特殊环境下，这些不安全感的同时出现让人们苦思着如何活命的难题。1788年的收成极不理想，导致面包价格连续数月居高不下，并使贫穷的城镇居民和农民长期饥馑。尽管今年的收成看来不错，但到7月中旬时，距离收获还有好几个星期，前一年的存粮又已基本见底。不合时宜的冰雹和持续降水一直在毁坏谷物，把国民拖入又一年的饥荒和绝望里。因此，政治危机在7月中旬达到顶点之际，人们对生存的焦虑非常普遍。政治僵局和经济危机的有力结合，使一种道德和实践上的不确定性深深渗入日常生活。

## 攻占巴士底狱

到了7月11日，关键时刻近在咫尺，路易十六罢免了内克尔，并在巴黎和凡尔赛宫周围驻扎王室军队。 [4] 国民议会依然态度强硬，但开会的地点是凡尔赛宫，那里可能有大批王军。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与会者就会被王军轻易制服。绝大多数在巴黎的民众支持国民议会，政治动员空前高涨。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报纸和小册子淹没了城市，政治俱乐部纷纷涌现。城市各处的咖啡馆、俱乐部、广场和酒铺中，人们都在讨论国民议会的辩论。7月12日下午，内克尔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巴黎，人群被很快动员起来，“爱国者”在皇家宫殿（Palais Royal，这并不是一座王室的宫殿，而是一个封闭式的公园）聚集。他们在那里听到了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的宣告：“公民们，你们都知道，国民早已要求内克尔留任，可他被驱逐了！你们能接受比这更无理的嘲弄么？如此一来，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说不定，他们正在谋划呢。对，就在今晚，在爱国者身上重演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Saint-Bartholomew）！”（Godechot, 1970:187—188）德穆兰的这段话，说明当时巴黎正在蔓延的两点焦虑。其一，演说家在用人民主权和国民意志的语言谈论危机（正是国民[Nation]要求内克尔留任，被藐视的也是国民的意志）。其二，提及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表达并宣传了时人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感觉一直都贯穿在几乎所有对这些事件的讨论中。

人群从皇家宫殿出发，涌向城市，关闭了歌剧院和剧场，从蜡像馆里夺取了一尊内克尔的胸像，接着队伍行进到了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和路易十五广场（place Louis XV，也就是今天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在那里，他们和德意志人雇佣军的一支小分队产生争执，但很快就获得增援，增援者是很早就强烈支持巴黎市民和国民议会的法国卫队（French Guards）。当天傍晚，民众闯入军火店夺取枪械，冲入并焚毁了海关邮政，那里存有正要发往城市的货物，都已缴税。次日清早，他们洗劫了圣拉扎尔修道院（Saint-Lazare monastery），想要找出存粮。他们也强行打开了几座监狱的大门，用《巴黎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这份报纸的话来说，他们在那里“释放了无罪的囚徒”。此举似乎宣告了国王法律的失效（*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1, July 17, 1798:8）。为了回应12日起各处出现的骚乱，在13日，一群“选举人”（electors，即在巴黎选举

权相对受限的情况下有权选举巴黎的三级会议代表的人）开会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成为该城事实上的市政当局。新的市政当局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建立民兵队，意图抵抗王军、保卫巴黎，并维持社会秩序。及至13日傍晚，民兵队已经在巡逻街道，但是市政当局拥有的枪支有限，远远无法给予民兵队足够的武器。正是对更多武器的需求，引发了攻占巴士底狱一事。

因为听闻城市西南角的荣军院（Hôtel des Invalides）有武器，到了14日早晨，一群示威者跟一队紧急市政当局的代表一同前往此处，要求获得武器。人群不顾荣军院院长的劝阻闯入其中，基本没遇到守卫抵抗，获得了约三到四万支滑膛枪。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巴黎人民武装了自己。可荣军院里没有弹药，方才获得枪械的民兵仍面临严重的弹药短缺。知悉城市正东面的巴士底狱藏有大量火药后，人群便穿过城市，到达巴士底。

比起荣军院一役，攻占巴士底狱是一场更让人望而生畏的军事行动，因为那是座有厚墙、深壕和吊桥的古代军事要塞。关于围攻者的军事行动，以及最终夺取要塞的故事，想必读者耳熟能详，此处无需赘述。[5] 简言之，随着法国卫队的加入为进攻者增援了火炮后，一群半退休的老兵组成的守军，无法承受坚决的进攻，放下了吊桥。在近一百名进攻者丧生后，这次行动最终获得了胜利。人群进入巴士底狱后，立刻释放了拘役在那里的几个囚犯，包括四个造假者和三个疯子，接着去搬运火药桶，以完成此行的最初目标。在要塞里采取过抵抗的士兵被沿街带到了市政厅。在市政厅的台阶上，他们的指挥官洛奈侯爵（the marquis de Launay）被射杀、枪刺，接着被几名群众砍下了头颅，他的头还被支在长矛上游街。旧市政当局的官员弗莱塞勒（Flesselles）因为曾在武装民兵队上十分敷衍，由此被怀疑为通敌，也被人群杀死。他的头颅也同样被砍下，支在长矛上游街。

7月14日发生的偶然事件效果轰动。国王不放心让王军对抗巴黎人民，所以把他们从巴黎撤走，派往市郊，从而放弃了之前对国民议会的威胁。国民议会能逐步胜出，看似完全是仰仗国王的仁慈，实则靠的是巴黎人民的行动。到了7月16日，国王认定已经不可能征服巴黎，但逃出首都不仅没有意义也有失体面，尤其是王国中很多城市都

已支持国民议会。最终，他由一名国民议会的代表陪同，在17日耻辱地造访巴黎。在这次访问中，他正式同意建立新的巴黎市政当局和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这个仪式事实上标志着国王向巴黎人民和国民议会投降。7月14日的事件因此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 巴士底狱和革命的概念

跨越了7月12日到7月17日的这一周、肇始于巴黎和凡尔赛宫的一系列事件，为何会被当时的人与后来的历史学家喻称为“攻占巴士底狱”？为何攻取这座要塞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同义词？攻占巴士底狱本身在军事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这次袭击的学术研究，最好的是由雅克·戈德绍（Jacques Godechot）写的。他认为，早先未流血就占领荣军院之举，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行动，它表明王军不再被指望能抵抗巴黎人民的袭击（1970:217）。同样，从很多角度来看，攻占巴士底狱带来的断裂，的确都算不上是查尔斯·蒂利所谓的18世纪城市居民的“斗争剧目”（repertoire of contention）（Tilly, 1986）。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群众暴力，甚至向军队开战，都不是稀罕事。但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立刻获得了重大的象征意义，并很快被看成是法国大革命的创始性行动（Lusebrink and Reichard, 1983, 1990）。对攻占巴士底狱的这种看似夸张的评价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现在熟悉的革命概念，指的就是由人民的暴力起义导致的政治体系的剧烈转型。由此，我们会认为攻占巴士底狱是一次革命行动的说法无甚新意。1789年夏天之前，革命一词未曾被用来指称由群众暴力实现的政权变迁。1789年春夏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有时会被称为革命，但彼时此说只意味着国家事务的巨大转变。正如革命一词可以用于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前那样，它既可以用于称呼路易十六在7月11日之后几天试图发动的政变，也可以用于称呼7月14日的巴黎人民起义（Baker, 1990）。[6] 当时还有一套相当丰富的现成词汇，能用来描述袭击巴士底狱和发生在巴黎的相关动乱。日常用语里可以拿来称呼这类事的术语有：起义、激情、叛乱、暴乱、哗变、暴动、反叛，或

者是骚动（Tilly， 1986； Sewell， 1990a）。7月14日的“起义”或“暴动”，也能被时人定义为“革命”，但理由只是这一事件以战胜国王和增强国民议会的力量告终，而不是把它视为人民通过武力强加其主权意志的自觉尝试。

但在随后的几天里，攻占巴士底狱被解释成一次人民主权意志的行动，一次支配国家政治命运的正当起义。这种解释需要把先前不被认为存在相互联系的两种行动模式，用戏剧性的、全然未曾预见的方式衔接起来：一种是关于人民主权的政治和哲学诉求，这和第三等级的代表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时所说的主权来源一样；另一种是巴黎人民在7月14日保卫自己和国民议会、对抗王军时采取的那种群体暴力行动。演说家、记者和群众自己都抓住了人民主权这个政治理论，来解释和辩护充满兴奋、恐怖和兴高采烈的群众暴力——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划时代的文化创造行动，出现在一个令人狂喜的发现时刻：攻占巴士底狱始于抵抗国王侵犯的行动，其意义是在之后几天慢慢浮现的，变成了人民在其中表达主权意志的一个具体、直接且崇高的例子，变成了一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 的建立行动（establishing act）。通过在巴士底狱的行动，人民被视为推翻了暴政、建立了自由。要解释为什么攻占巴士底狱是一桩历史事件，我们就要确定在1789年7月14日的日常发生，何时、如何以及为何被理解成了人民起义、表达了主权意志、转变了国家政治体系的革命。换言之，这些日常发生何时、如何以及为何在新的革命范畴下，造成了群众暴力和人民主权间的持久衔接。

## 巴士底狱的时间性：发明革命

我已经强调过，事件从来不是倏忽而过的日常发生，从最初的断裂到后续的结构转型要经历一段时间。要理解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需要我们重构把断裂（瓦解现有权力模式，对现有的政治主权宣言提出新挑战的攻占巴士底狱一事）引向新衔接（对新的革命定义进行编码，持久地转变了人民主权的实际意义）的一系列行动和阐释。虽然这个进程早在7月14日就在巴士底狱及周边街道开始了，但正式

完成是在几天之后，在凡尔赛宫中的国民议会的议事厅里。

群众暴力和人民主权的衔接肇始于巴黎，不是在攻占巴士底狱过程中，就是在紧随其后的行动和报道里。事件中特定仪式性行动本身似乎表明，群众宣称自己代表国民行动。所以，大众报刊《巴黎革命》写道，最早攻占巴士底狱的其中一人，“向鼓着掌和喜不自禁的庞大人群”握紧并挥舞了“祖国神圣的旗帜”（*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1，July 17，1789:17）。事实上，他们没有亵渎旗帜，而是说旗帜是属于自己的，这表明他们视自己（而不是被击溃的王军）为国民的合法武装力量。举着支了洛奈和弗莱塞勒头颅的长矛游街，似乎是要模仿国家公开处决（state executions）[(2)] 的仪式（Foucault，1977），这可以被解读为对主权的宣示。当时讨论7月14日的事件所用的语言，也倾向于认为群众暴力是主权人民的行动。《巴黎革命》用了极具争议的术语“公民”来称呼发动袭击的人，把仓促成军的临时城市民兵叫作“国民的战士”，并把这些事件定性为一场自由对抗专制的起义。[7] 所有这些都表明，巴黎人借用了人民主权的概念，来宣称攻占巴士底狱的正当性。

可是单纯认定攻占巴士底狱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并不等于发明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革命不仅是表达人民意志的武力行动，也是产生新的政权的行动。只有当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逼迫国王把实权让给国民议会的结果明朗时，巴黎人民的行动才能被视为是这种新意义上的革命。因而，划时代的文化转变（如一种新的、持久的政治范畴的发明），只能出现在制度和军事的权力关系发生实际变化时。正是在国民议会里，新的革命概念得到了明确且权威的阐述。当国民议会的成员开始意识到巴黎人民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胜利时，他们不仅开始响应巴黎人民的观点，认为起义吹响了自由对抗专制的号角，并表达了人民的正当愿望，也开始将之视为人民主权的决定性行动，正当地决定了国家的命运。这个转变的发生，尚耗费了几天的政治斡旋和议会辩论。

攻占巴士底狱之前的政治话语里，即便是“爱国者”也认为群众暴力是非理性、盲目和有传染性的，是一种只能用镇压平息的自然灾害。这使之从根本上无法与被视为理性、庄严和宽宏大量的国家的主

权意志并存。14日傍晚，国民议会获悉攻占巴士底狱一事后，代表们对人民起义打击了王室军队的消息并未感到高兴。根据会议记录，攻占巴士底狱最早被当成一条“灾难性的新闻，在议会里引发悲恸。所有讨论都停止了”（*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158）。次日早晨，议会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讨论，但对于可能的后果，议会成员仍表示担忧和悲观。西耶里侯爵（marquis de Sillery）提出了一则体现时人常识的动议，“昨日的屠杀、攻占巴士底狱和血腥处决，让人民产生了过多难以抑制的愤怒”。他接着指控当时掌握政府的恶吏，认为是他们有意煽动了暴力行为，从而让国王确信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武装镇压。他和整个议会都很担心，7月14日的事件可能会让国王更趋强硬，暗暗动摇议会的地位（155）。

然而，情势渐趋明朗，攻占巴士底狱的后果与他们预料的刚好相反。国王于16日要求驻军远离首都，遣散官员，召回内克尔。这个出人意料的转向，无疑减少了国民议会之前对巴黎人民的暴力和骚乱的哀叹。同时，一支议会的代表团于15日下午前往巴黎，发现首都并未沸腾着强烈的仇恨情绪，而是沐浴在喜悦且浓烈的爱国主义光辉下。16日早晨，穆尼耶（Mounier）报告了这次访问的情形，用狂喜的口吻诉说着代表团在巴黎受到的接待。巴黎人民“试图用最鲜活的情感符号表达他们此刻的心绪。他们非常高兴能和国民议会的代表握手……公民们互相道喜和拥抱。所有眼睛都被泪水润湿，陶醉之情无处不在”（163）。在同一篇演说里，穆尼耶开始重新思考14日的暴力行动。“对首都所经历的所有动乱，感到遗憾是肯定的。她也许不会再看到法律失掉其帝国的可怕时刻，但她也不会再感受到专制的套扼！她理当自由，这是以她自己的勇气和活力赢得的”（164）。穆尼耶没有用“让人民产生了过多难以抑制的愤怒”的“屠杀”和“血腥处决”这类说法，转而委婉地称暴力为“首都所经历的动乱”和“法律失掉其帝国的可怕时刻”。事实上，他也委婉地为行动喝彩，认为正是“勇气和活力”让巴黎“理当自由”。

穆尼耶的描述也不认为巴黎人正当与无畏的暴力行动预示着持续的骚乱。“动乱将息，宪政将立；这将安慰我们，也将安慰经历了过去所有不幸的巴黎人民。”的确，虽然攻占巴士底狱过程惨烈，但其

必将成为真正爱国之士的骄傲之源：

> 在人民绝望时的行动中，甚至在为几名故去的公民哭泣时，他们依然很难抑制亲见巴士底狱被毁的喜悦。在那座骇人监狱的废墟上，依照巴黎公民的意愿，很快就会矗立起明君的塑像，明君将给法国带回自由和幸福（164）。

穆尼耶充满希冀地暗示着，攻占巴士底狱后，会建立一个充满自由和幸福的新时代，由明君和新宪政统辖。因此，早在7月16日国民议会论及攻占巴士底狱一事时，认为这不仅是人民对专制压迫的正当回应，也是走向新的政治秩序的关键一步。在穆尼耶的演说里，我们不仅能察觉到其对7月14日群众暴力的新态度，也能注意到他把巴黎人民的起义认可为自由对抗专制的正当反抗。

7月16日到17日间，攻占巴士底狱的效果日益明朗，它大大提升了国民议会的地位。这些事态的发展显然说服了不少议会成员赞成穆尼耶的看法，对14日的群众暴力表现出有些暧昧的认可。到了16日，穆尼耶的演讲刚刚结束，就有相当数量的贵族代表改口，从完全在议会辩论和投票中弃权，转向宣布此后要全面参与议会活动（166）。巴黎人民的胜利和国王调走军队的决定就这样说服了最后的顽固派，使之放弃消极抵抗，和议会共进退。当天下午，传来一条喜讯：国王已经同意遣散官员，召回内克尔，并于次日造访巴黎，来宣布他对新的市政当局和民兵队的认可。国王在17日的巴黎之行，通常被解释成是投降仪式。由巴黎市政当局选出并得到国民议会和国王认可的新市长巴伊（Bailly）在凡尔赛宫门口向君主致以如下问候："陛下，我要把您美丽的巴黎城的钥匙交给您，这些钥匙和呈给亨利四世的是一样的。他重新征服了自己的人民；此刻，正是这些人民，重新征服了他们的国王。"（173）接着，国王接受了一个欢快的欢迎仪式，并在君主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时到达顶点。国王在自己的帽子上放了蓝、白、红三色缎带，这种特殊的帽饰一直是巴黎的爱国者的标志。

7月18日早晨，攻占巴士底狱的惊人后果已然明朗。王军已被撤回到各省的兵营，内克尔被召回，国王确实已经向巴黎和国民议会屈

服，巴黎有了令人敬畏的城市自卫队和新的充满活力的爱国市政当局。最后几个贵族结束了他们的抵制行动，参与议会的工作。同时，支持议会的致辞从各省涌来，这表明新的政治权威不仅属于巴黎，也属于全国国民。至此，国民议会给自己设定的、为法国带来新的宪政体制的使命所面临的障碍已一扫而空。巴黎人的起义以国民议会取得惊人的胜利，并从此成为国民命运的主裁判告终。

但这些进展并不足以让议会为7月14日的暴力行动立即平反。直到7月20日，议会才进一步明确地把攻占巴士底狱提升到正当的群众革命的位置。议会如此解释并非出于单纯的感激，而是出于区分主权人民的正当暴力和危险的群氓采取的不可接受的暴力行动的实际需要。7月17日，巴黎附近的普瓦西市（Poissy）的市长要求议会协助平定当地和附近的圣日耳曼昂莱市（Saint-Germain-en-Laye）的骚乱。他宣称，在圣日耳曼昂莱，有“一群土匪”杀死了被控私藏谷物的磨坊主。次日，议会获悉这伙土匪又抓了一个人，性命危殆，于是便派出由12人组成的代表团营救被劫持者（174）。20日，代表团叙述了他们如何英勇对抗了嚣张的土匪，并在最后关头从绞刑架上救下这名不幸男子的惊险故事（175—176）。

这次意外让保守派代表拉利-托勒达勒（Lally-Tolendal）在当晚起意，提出谴责政治暴力的动议（181）。拉利的提议立即引发了几名议员的严辞声讨，他们认为这毫不掩饰地攻击了巴黎人民在巴士底狱所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愤怒也成功使拉利的动议被搁置起来。比起穆尼耶，他们更明确地认定攻占巴士底狱是正当行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抱怨道，拉利的动议“意图对抗保卫自由的人。但是，面对可能摧毁国民的恐怖阴谋，还有比起义更正当的做法么？”（181—182）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不出名的代表德布莱索（De Blesau）说，要反对“把为了捣乱而武装起来的煽动分子和为了自由而武装起来的公民并列，这样会混淆群众骚乱和正当且必要的革命”（182）。比佐（Buzot）紧随其后，宣称拉利的动议

> 意图把所有武装人员不加区分地称为坏公民和叛乱分子。我们怎能忘记，具有高尚勇气的巴黎人民在夺取武器后，带来了我

们的自由、遣散了官员、平息了阴谋，还把国王带到了议会？……还不只这些，要不是他们，谁能告诉我们专制不能在我们中间重生呢？谁来做专制彻底毁灭的担保人呢？如果有一天，专制集结了自己的力量来击败我们，又有哪些公民们能及时武装自己、拯救祖国呢？（183）

比佐的话尤为重要。正如他强调的，是巴黎人民的暴力行动造成了过去几天里所有的积极变化，是巴黎人民争取到了议会的自由、驱逐了背信弃义的官员、平息了阴谋并强迫国王屈从于议会。而且，比佐还暗示，未来可能需要采取类似的行动，将祖国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这表明对比佐来说，巴士底狱的群众暴力不仅成为正当的偶然事件，同时也是这一类正当偶然事件的典型，也就是以摧毁专制、建立自由为目的的、由人民发起的必要暴力行动。简言之，正是在这场7月20日的辩论中，议会成员明确陈述了革命的概念，将之定义为主权人民发起的、转变国家政治体系的正当起义。

7月20日的辩论里，爱国者不得不捍卫攻占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以免他们被暗讽成骚乱中抢夺粮食的人的同类。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把攻占巴士底狱定义为正当革命，坚称武装群众参与对抗专制是正当的。三天后的7月23日，议会重申了这个定义，但是是为了更谨慎地限定在哪些情况下民众参与是合理的。此举是为了回应在首都出现的新的“群众正义”行动，其与7月14日的行动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7月23日，曾因食物短缺问题而广受指责的前巴黎行政长官贝尔捷（Bertier）[(3)] 和他的岳父富隆（Foullon，即被认定是取代了内克尔的人）[(4)] 二人在巴黎郊区被捕，后被带到市政厅。愤怒的人群抓住了他们，用近似7月14日处置洛奈和弗莱塞勒的方式对付他们：杀死他们，砍下他们的头颅，还取出了贝尔捷的心脏，再把这些都支在长矛上游街。这次模仿群众暴力的行动震惊了议会，但议会成员并没有笼统地谴责所有政治暴力，而是试图区分7月14日的正当暴力和7月23日的不正当暴力。

7月16日和20日发表的抽象演说都只谈到了自行武装、起义对抗专制的巴黎人民所具有的活力和勇气，从而为攻占巴士底狱赋予以正

当性，但对7月14日这天巴黎人民的行动中显然最具争议的处决洛奈和弗莱塞勒避而不谈。可既然已经把7月14日的事件合法化成“必要且正当的革命”，那些想要谴责谋杀贝尔捷和富隆的代表们实际上不得不为14日的谋杀辩护。古伊·达西（Gouy d’Arcy）[5]宣称：

> 人民采取的第一轮打击，是由推翻专制、创造自由必然激发的欢腾所致。对人民来说，在刚刚打破长久囚禁自己的压迫后，几乎不可能不把愤怒转嫁到最早那几名受害者上献祭……在曾是自由的深渊的要塞被攻陷后，曾想用自由捍卫者以及广大人民来献祭专制的要塞主管，如今却落入后者之手，自食其果。（192）

但是，在巴黎人民的壮举为国家带来和平与和谐之后，“没有什么能为刚刚发泄在两个人身上的愤怒辩护”。这种“血腥和暴乱的场面”必须中止，否则“人民可能会逐渐习惯这些血腥的场面，玩起嗜血的游戏。野蛮可能会成为习惯”（192）。因此，通过对7月14日谋杀的辩护，议会成员完成了对7月23日谋杀的谴责。即便是保守派议员马鲁哀（Malouet），也通过歌颂7月14日的暴力行动来指责眼下的暴行：

> 反抗压迫是正当的，能荣耀国家，但放纵会使之失色。对抗专制的国民起义，具有超越法律的力量，也不会亵渎法律的尊严。但即便巨大的利益引发了一场伟大的起义，最轻微的托辞也足以再度唤醒人们的焦虑并使之激化……现在必须避免的，正是这种不幸。（197）

国民议会在7月23日极为彻底地认定攻占巴士底狱为正当革命，以至于即便是最想终结群众暴力的保守派代表提及7月14日的行动时，也称之为“对抗专制的国民起义”，并强调如此的起义“具有超越法律的力量”。可以说，在7月23日，攻占巴士底狱的重要性已经在法国政治文化中完全立足。攻占这座要塞自此被奉为定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 的事件，即拥有正当暴力的主权人民起义，在国内施用新的政治体

系。

如果说攻占巴士底狱的意义从那时开始就相对固定了的话，那么新的革命概念的确切边界仍具有很大争议。事实上，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当国民议会被迫更严格地界定何为合法的政治暴力形式之前，需要先清楚阐释新的革命概念，及其与攻占巴士底狱的明确联系。一旦群众的暴力行动被认定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我们就必须要区分超越性的创始时刻和其他表面看来相似的暴力行动。否则，国家将永远容易受到任何心血来潮地宣称代表群众采取行动的人群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正如比佐在7月20日的演讲里所言，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未来可能会出现正当革命的行动。没人能保证专制不会复苏，再有一场消灭专制的革命可能也是必要的。所以，革命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要面临如何使它结束的问题。在革命概念所创造的语义学和政治学领域，正当与不正当的群众暴力的边界、革命与叛乱的边界，永远都无法被明确地镌刻出来。[8]

由此，攻占巴士底狱的事件具有极为持久的强大效应，甚至还有许多效应延续至今。但我们可以说，从断裂发生到再衔接大约12天的时间（7月12日到7月23日），就是事件持续的时间。巨大的断裂发生在7月14日的戏剧性行动中。之后的几天（7月14日到7月17日），行动对政治势态的影响渐趋明朗：王军从巴黎地区撤出、内克尔被召回、国王实际上投降、新的巴黎市政当局和民兵队的正式组建，以及国民议会成为最高权力。国民议会取得的这些看似奇迹般的胜利，让议会的演说家们反思了自己早先的看法，不再认为攻占巴士底狱是一次可悲的骚乱。他们转而接受巴黎人民的界定，认可这是一次对抗专制的正当行动，也是对国民意志的有效表达。7月16日他们模棱两可地说出了这一想法，而到了7月20日和23日，表达就肯定得多。时至20日，政治力量间博弈的进展，不仅让国民议会中的大多数不再批评7月14日的暴力行动，还驱使他们必须承认暴力是自身权威的基础。正是在此过程中，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最终进入了法国的政治文化。一种此前从未梦想过的群众暴力和人民主权的衔接，自此延续。

## 攻占巴士底狱和历史事件的理论

前文我对攻占巴士底狱的讨论主要采取叙事的形式。我认为，对任何关于事件的严肃分析来说，对叙事的谨慎重构都有智识上的必要性。但同样必要的，是在叙事与理论反思间来回穿梭。故此，我要阐述一下前文讨论的理论性意义。

历史事件再衔接了结构。　　在本章中，我试图从特殊的方面来概念化历史事件，即将其作为结构的失位和转型性再衔接。在我看来，正因为攻占巴士底狱发生在政治结构大规模失位的情况下，它才得以成为法国大革命和广义的现代革命概念的创始性行动。正因为国民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胜负未决，国民议会才宣布以人民意志为主权来源，却没有明确宣称自己代表人民意志。由于主权归属未定，攻占巴士底狱才能被阐释成国民意志直接而崇高的表现，也就是一种能被直接衔接到主权上，并为革命形成新的政治范畴的群众暴力行动。

历史事件是文化转型。　　新衔接是有重要意义的行动，让这一日常发生得以成为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诸如“巴士底狱”和“革命”，还有“人民”“自由”“专制”之类的术语，在此之后获得了新的权威意义，并一同重新形塑了政治世界。这意味着事件在字面意义上确实是重要（significant）的，因为它标志（sign）着令人惊奇的新事物。事件为何为实际存在之物引入了新概念（暴力群众是人民意志），为何为良善引入了新概念（欣喜若狂的联合的人民），以及为何为可能引入了新概念（国家和国民的一种新的重生，即革命）。所以攻占巴士底狱最深层的后果，就是重构法国政治文化和政治行动的范畴。

这意味着象征性的阐释对历史事件而言相当重要。如果只把攻打巴士底狱概念化为粗暴的物理性偶然事件，一结束就面临仔细的考量和阐释，那将是虚假和具有误导性的。之所以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丢了性命）去攻占要塞，是因为他们把这座堡垒看成是不可容忍的壁垒，它会阻挠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希望。换言之，他们的行动是被象征性地激发的。一旦要塞被攻陷，胜利者就开始把他们的胜利阐释为人民对专制的打击。从12日晚上的小规模冲突，到处决贝尔捷和富隆，再到7月23日国民议会谴责此次处决，在一系列非比寻常的行动中，对正在发生之事的阐释，是已发生之事以及事件的纯粹真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说攻占巴士底狱这一事件是一场文化转型，而且是源自阐释性或象征性的行动，并不意味着7月14日发生的事件不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后果。实际上，要是这些行动没有导致王军撤离巴黎，没有导致国民议会战胜国王，那攻占巴士底狱时群众的愉悦也不会催生革命这个概念，甚至攻占巴士底狱的人也不会自觉认识到自己成了国民意志的具身化。和所有文化转型一样，资源（如对所有枪支弹药的控制从王军转移到巴黎民兵队手中）和权力模式（如新的巴黎民兵队的组建，使人民获得了对抗国王的新手段，而新的巴黎市政当局的成立，为它和城市居民之间带来了新的关系）的同时转变，激发和锁定了这个事件造成的文化转型。

历史事件由特定条件形塑。　新的革命概念不会因为一座城市要塞被攻占就被自动发明出来。而1789年的夏天出现这个结果，是由于当时环境存在的特殊条件，而不仅仅是由于我在上文中讨论的、与结构性失位有关的广泛而一般的条件。一些非常地方性或特定的条件同样能使发生的结果成为可能。马歇尔·萨林斯用“势态的结构”这个术语指涉形塑了事件的特定意义、意外和因果力量的条件。这些覆盖面小、但在地方上有决定性影响的条件在特定时空中的互动，有可能会决定整个社会的命运（Sahlins, 1981）。在1789年7月的巴黎，有三个特定条件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让攻占巴士底狱成为了形塑全世界的事件。

（1）首先，我们可以明确一个语义条件：人民（le peuple）这个术语长久以来的歧义性，使得群众暴力和人民主权之间可以产生新的衔接。一方面，人民可以指法国全部人口。正是在这种高度概化又有些许神秘色彩的意义上，人民被认定为国民议会所采纳的政治理论中主权的来源。另一方面，人民可以指普通人，如与贵族和教士相对的平民，或与有文化的人和富人相对的粗人与穷人。显然，后一种意义上的人民，才被看成是有能力采取群众暴力行动的人。“人民”的两种意义在语义上的滑移，让起义并攻占巴士底狱的人民（第二种意义）和选择了最适宜的政府形式的主权人民（第一种意义）有可能被等同起来。

（2）让巴士底狱的群众暴力和人民意志的行使相互等同的第二

个特定条件，是这座要塞既有的意涵，即作为政治不公的象征。18世纪早期以降，时事评论员和记者就已经把巴士底狱打造成一座专制的邪恶监狱。政权在那里秘密囚禁了无辜的受害者和爱国烈士（Lusebrink and Reichardt, 1983, 1990）。尽管7月14日的袭击事实上由民兵发起，有着极为实际的目标（为滑膛枪填充弹药），但巴士底狱的邪恶光环意味着此次袭击很容易被视为是针对专制本身的。

对7月14日的偶然事件的最早描述，显然已经把巴士底狱和专制等同起来了。所以《巴黎革命》在报道关于本次袭击的故事时，穿插了一段描绘，把巴士底狱说成是专制的监狱。“单人牢房的门被打开了，无辜的人终于得到了自由，可敬的长者们惊异于能再次见到光明。”说到这里，有个脚注补充道：

> 一位可敬的长者已经在这里被羁押了30年。我们无需赘述在巴士底狱究竟发现了多少难以计数的宣传手册、书籍、监狱登记簿和历史资料。简言之，在众多武器和旗帜中，他们也在那里发现了不为人知的杀人机器。

正文随后总结道：“令人敬畏而神圣的自由，终于被首次带到了这个充满恐怖的地方，带到了这个充满专制、怪物和犯罪的可怕之地”（18）。这段描述深受有关巴士底狱的传统黑暗传奇（black legend）[(6)] 的影响，认为监狱拘役无辜的人，将他们与光明隔绝数十载，封存和储藏了大量批判政权的宣传手册和书籍，还用“不为人知的杀人机器”秘密处决囚犯，犯下骇人酷刑。在后一页，《巴黎革命》再度言及巴士底狱的传奇：

> 1369年动工，1383年完工的这座非比寻常的要塞，在查理五世治下建造，被路易十四和蒂雷纳（Turenne）[(7)] 称为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但只消4个小时就被攻克了。攻克它的是一群军纪松散、缺乏指挥的民兵，是没有战争经验的城市人，当然还有一些国民的军人的支持。最终，它被几个自由人攻下。哦，神圣的自由！你的力量是什么呢？（19—20）

如果人民打算起义对抗专制和建立自由，他们很难想到比巴士底狱更适合的地方。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入侵荣军院的行动，可能在军事上有更重要的意义，但荣军院未曾背负和巴士底狱一样的恶名。由此，在关于7月14日的神话中，人们几乎听不到有关那场军事行动的内容。没人说“人民在荣军院起义并获得了自由”。但相同的辞藻成了描述巴士底狱的陈词滥调。

（3）另一个地方性条件则更为普遍：和攻占荣军院不同，攻占巴士底狱是一个英雄主义、背叛和流血的剧场。攻占对象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人们认为其指挥官曾把袭击者诱入外围的庭院，从而更有效地射杀他们。战斗持续了数小时，为在战火下表现出勇气创造了大量机会，但也吞噬了将近百名进攻者的生命，另有数十人重伤。如果想要理解事件在随后几个小时和几天中的进展，认识流血杀戮的情感意义是非常关键的。进攻者之死，让他们得以被理解成自由的殉道者，他们洒下的鲜血成为变革性的献祭，成为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在《暴力和神圣》（*Violence and the Sacred,* 1977）中研究的那种神圣的创始性暴力的行动。在对洛奈和弗莱塞勒的仪式性杀戮中，殉道者之死得以双倍血偿。人民自己和此后的象征性意义，都宣判两人为国民的叛徒。把他们的头颅切下来，支在长矛上游街的恐怖细节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就像福柯（1977， ch.2）的读者会发现的那样，此举模拟了公开处决这种王室仪式，其通常涉及对身体某些部分的展示；而主权人民采用的方式，和作为主权象征的国王所采取的惊人一致，他们对胆敢违抗其法度的人的身体施行了公开可见的复仇。

这些地方性条件构成了攻占巴士底狱的“势态的结构”。“人民”这个术语在语义上的歧义性、巴士底狱业已存在的政治含义，以及行动本身戏剧性和流血的特点，让攻占巴士底狱的神话有可能演变为主权人民的革命，成为1789年7月14日的意外事件的政治真理。

历史事件具有情绪高昂的特点。　多数社会科学家对情绪的问题唯恐避之不及。他们似乎担心，一旦严肃地把情绪作为研究对象，就会被这个术语所带来的非理性、不稳定、主观和不可言说的特点败坏名声，他们自身的洞见和科学的客观性就会被质疑。但我还是坚持，如果高昂的兴奋情绪是很多转型性行动的构成要素，那我们很难继续

维持这种保护性的科学距离。要解释攻占巴士底狱的后果中出现的转型，很难不去考虑事件中的情绪基调。

首先，行动的情绪基调可能是结构失位和再衔接的重要标志。结构中或多或少的失位，既是事件时间性的特点，也令人深感不安。1789年春夏出现的无法解决的失位就部分导致了7月中旬时巴黎人民严重的精神紧张。之后，当国王试图对国民议会发动政变，有可能威胁到所有改革的希望时，这种情绪升温并达到最高点。7月14日人们采取的激昂的英雄主义和屠杀行动，就是7月12日和13日遍布巴黎的暴力突发事件造成的紧张和恐惧的后果。而解决结构性失位的办法，无论是为断裂重建衔接还是形成新的衔接，都会导致有力的情感释放，从而巩固了这种再衔接。我们已经讨论过，7月15日国民议会代表团在巴黎受到了满目喜悦的接待，充满着吵嚷的欢呼和难以自抑的哭泣。正是代表们直面狂喜的经验，促使他们把7月14日的事件重新定位为正当革命。

情感不仅是失位和重新衔接的重要标志，也形塑了事件的具体进程。7月14日下午的情况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大量人群在有限的空间内密切互动，经历了埃米尔·涂尔干称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具有传染性的情绪激动，它把人们从日常的压抑和限制中脱离出来。就像涂尔干说的，“在一场由共同激情激发的集会中，我们变得易受到行动和情绪的影响，而这些是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无法实现的”（[1912]1965:240）。

由集体欢腾带来的强烈情绪，让事件开始变得明显不稳定。欢愉与愤怒交织，使仁慈或凶残的行动得以可能。《巴黎革命》对从巴士底狱到市政厅的胜利游行的描述，漂亮地抓住了这种极端而危险的欣喜。当胜利者押送俘虏，从要塞走来时，

> 他们站成一列，在庞大的人群中离场。鼓掌、极度兴奋、侮辱和诅咒混在一起，掷向那些背信弃义的战争罪犯，每颗心都发出了仇恨和喜悦的呐喊。身披荣耀的胜利者，带着武器和战败者的尸身，带着胜利者的旗帜。民兵与祖国的士兵站在一起，桂冠从四面八方抛向他们。一切都提供了一种可怖又极佳的场面。

（19）

这只是屠杀洛奈的序曲。当列队到达了市政厅，

> 无法克制报复心情的群众，不会允许洛奈或其他官员登上城市法院的高座。胜利者用双手撕碎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用双脚踩过他们。洛奈被千刀万剐，他的头颅被割下，支在长矛顶端，鲜血从四面八方流淌下来。（19）

这种屠杀似乎无法平息群体的渴望，胜利的景象快要堕落成血祭。当剩下那些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到达时，同样地，"人们要求处决他们"。可随后，群众的情绪突然转向了仁慈。押送这些罪犯的法国卫队，"请求他们的宽恕，而面对这一请求，所有人都一致提出赦免"（19）。这个例子表明，事件普遍具有的情绪不稳定的特点，有时是由情感上内在无法预知的转变所致，并可能对未来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要是处决洛奈演变成处决所有保卫巴士底狱的士兵，那么国民议会就可能永远不会把巴黎人民的行动看成是人民意志的崇高表现，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范畴可能也不会产生。追踪政治事件中结构转型的原因和特点，可能需要我们对行动的情绪基调尤为敏感。

历史事件是集体创造的行动。　我已试图说明，结构的失位让行动者处于强烈的不安全感中，这是一种对如何继续生活的真切的不确定性。我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所具有的集体创造特征的必要条件。结构失位时，社会生活的常规受到质疑，对现有权力关系的约束变得不确定或被悬空，而新的可能性变得可行。在平常情况下，文化图式、资源系列和权力模式，都被束缚在结构性社会行动自我再生产的流动中。但在失位的情况下，比如1789年春夏，资源在等待争夺，文化逻辑被更自由地阐释并被应用到新的环境，权力模式被延伸到不可预见的社会领域中。1789年，人们提出了新的看法，发明了新的组织形式，报纸、手册、政治俱乐部、酒馆、公共集会、政党地方委员会、国民议会辩论以及街角谈话这些新旧媒体和机构，都传播着新的理念。即便在这个结合了高度自由和超常的实际紧迫感的非常时刻，思想和实践在结构上的可用形式依然形塑和限制着创造

性。但就在这样的限制下，1789年在法国出现的喧嚷的、多地点的公共领域，无疑都是进行集体创造的地点。

如果1789年结构性失位的延伸导致了创造性试验的广泛出现，那么结构的再衔接首先是在非常特殊的时空中完成的：7月14日的巴士底狱和市政厅；7月15日接待国民议会代表团的仪式；7月17日接待国王的仪式；7月16日、20日和23日国民议会的会议厅。在这些迅速展开的行动形成压力、大量人集中在同一空间里的时刻，让充满了情绪的文化即兴创作决定了未来历史的形态。这些即兴创作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创造。比如，人们自发起义并战胜了巴士底狱的专制的观念，并不是某位演说家或记者的发明，而是一群盛怒的行动者带来的启示。7月15日和17日接待仪式的路线和姿态，都是在现场形成的。把7月14日的事件正式确定为正当革命的演讲，也不是在前一天晚上写好的，而是演说家在一连串辩论的高潮中即兴创作出来的。7月20日代表们狂热反驳拉利对政治暴力的全面谴责，和7月23日对令人震惊的谋杀贝尔捷和富隆一事的回应也是如此。

历史事件是被仪式穿插的。　　我们通常认为，仪式（ritual）是正式化的典礼（ceremony），其姿态和程序是事先确定的，并模式化地在很多场合中重演。事件与之恰恰相反，它是唯一且无法预期的日常发生的序列，从定义来说，它必须是在现场被即兴创作的。也就是说，仪式和事件应属对立范畴。而在被换喻为“攻占巴士底狱”的一系列偶然事件中，某些最重要的片段有着明显的仪式性。其中，又有四个关键片段在形式上尤其具仪式性：其一，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从要塞游行到市政厅；其二，谋杀洛奈和弗莱塞勒；其三，7月15日国民议会的代表团拜访巴黎；其四，7月17日国王在巴黎接受欢迎仪式。可以看出，在把攻占巴士底狱转变为主权人民革命的过程中，这四个片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发明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这些片段的仪式性特征与对发明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性有什么关系？推而广之，我们要如何理解仪式这一静态范畴穿插到事件这一典型的动态范畴中呢？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我指出的这些片段在怎样的意义上具有仪式的特征。研究仪式的学者可能对如何精确定义仪式有不同的意见。

学者们提出的区别仪式与其他类型的社会行动的特征，包括正式化和重复的姿态，行动的戏剧性，利用超自然的力量，通过姿态区分出神圣与凡俗的人、地点和活动，以及对“仪式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划分（参见如Leach， 1968； Turner， 1969）。我自己则遵循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的定义，她认为，能用来广泛区分仪式和非仪式性行动的特点清单并不存在。在她的用法里，仪式是一种“将自己和其他行动区分开”的行动模式，它借此“将某人与权力的终极来源……结合了起来”（Bell， 1992:140—141）。我上文引用的那些片段的仪式性特征在于：（1）构成片段的行动被行动者定性为仪式；（2）这些片段把每一位在场者与新出现的权力终极来源——作为国民的人民（people-as-nation）相结合。引用贝尔的话来说，在这些片段里，“权宜性方案的战略性生产……结构了环境，而环境似乎是这些方案及其价值的来源”（140）。让我说得更具体些。

巴士底狱刚被攻克时，兴高采烈的胜利者们就自发组织了胜利游行，庆祝他们的壮举。他们沿着街道行进，一路走到市政厅，向聚集的人群展示了战利品，例如缴获的武器、被释放的囚犯、旗帜和战败的士兵。庆祝胜利的游行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军事仪典，但之前是用来展示王军的武装强权，比如庆祝这支军队战胜外敌，也同样是一种震慑臣民的手段。然而在此例中，已有的仪式形式被用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情境，即庆祝武装人民战胜了 国王的士兵。而且，在游行中，他们把自己表现成人民/国民的一分子，在人民环绕下行进，接受人民的赞誉。他们策略性地制定了一条权宜之计（胜利游行），从而构建了环境（街道被普通民众所包围）而参与和围观游行的人群，似乎成为了权宜方案及其价值（正是人民的主权力量，让胜利和庆祝得以成为可能）的来源。游行以高度戏剧性且情感上极富力量的方式，确立了人民和攻占巴士底狱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同一性。

对洛奈和弗莱塞勒的处决也以类似的方式被仪式化了，但手段要恐怖得多——他们的头颅被砍下来后，支在长矛上，绕着人群聚集的市政厅前的广场游街。在旧制度时期，地方执法官会展示被处决的犯人的部分肢体；而屠杀借由模仿这种仪式而被庄严化，并被定义为是主权（如今的主权人民）的行动。广场上的人群中响起了支持的呐

喊，戏剧性且公开地认定人民采取的复仇行动是正当的。其余仪式化的片段，也用到了业已存在的仪式性姿态，来建立人民／国民的主权。15日对国民议会的代表团和17日对国王的热情欢迎仪式，用的都是国王迎驾仪式的仪仗。在迎驾仪式中，血统尊贵的国王或王子，会在城门口接受致意，并在人群的欢呼下，由市政厅官员或城市中不同行会和企业的要员护送入城，后者以严谨的位阶高低列队。但是，在1789年7月自发地发明出来的仪式与先例不同，象征性地将拥挤的人群认定为产生权力的主权。7月15日，群众与他们的代表欣喜若狂地结为一体，收效极佳，以至于穆尼耶回到凡尔赛宫，就褒扬了巴黎人民的起义是正当的，是自由在对抗专制。及至17日，巴伊参与了一次完美的象征性逆转活动，他依据传统礼节在城门口迎接国王，但也明确提醒国王，这次是人民战胜了国王，而非国王战胜了人民。在市政厅这一与起义密不可分的场所迎来高潮后，这场特殊仪式的高潮，只能发生在国王步入阳台，当众在帽子上放上代表起义者的三色缎带之时。所有这些仪式性片段，都把不同的参与者放到了和新的终极权力来源同样的位置上，不论这些参与者是主权人民中的成员、军人、议员还是其怨恨的对象。我认为，这些仪式让人们能够感知到，人民／国民事实上拥有主权，其意志是国家事务的终极裁决者。这些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仪式性行动，就这样将此前十分抽象的人民主权的意志同7月14日的暴力起义具体地衔接在一起。

这样一来，攻占巴士底狱被塑造成正当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自发仪式的展演。多数对仪式的学术研究，关注的都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仪式。在多数宗教仪式中，参与者被聚集到了一处被标示为是神圣的场所中，接着参与一系列活动，从而达到一种特定的情绪状态，例如宁静的敬畏、全神贯注、恐惧、高度愉悦或极度热情。在多数情况下，参与者进入了维克多·特纳所谓的阈限（liminality），一种非此非彼（betwixt and between）的状态，在此状态下，社会约束和等级制度瞬间蒸发，参与庆祝的人能在彼此之间、自己与一位神或一群神之间，体验到一种深刻的共同体（communitas）感觉。正是这种共同体感觉的出现，赋予了仪式以心理和社会力量（Turner, 1969）。那些围绕着攻占巴士底狱展开的片段里，通常的过程反转了：是情绪激动和共同体感觉（也就是涂尔

干所谓的集体欢腾）让参与者表达和具象化他们在仪式中的感受，而不是仪式引发了情绪激动和共同体感觉。参加这些事件的巴黎人民聚集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们的情绪由拥挤的人群和关于战斗和胜利的记忆触发，这些关于7月14日的片段的记忆，到了7月15日和17日则略显遥远。参与者还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重大事件中，事件的结果将决定他们身为个体和国民的命运。最后，在事件的进程中，他们发现自己是主权人民的一分子，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一种神圣的集体意志，这种意志有权决定国家的命运。他们只有通过自发挪用已知的仪式形式，来创造出新的、强有力的主权的仪式，才能把这种阈限和共同体的状态体现出来。经由这些仪式，巴黎人参与了发明现代革命。

历史事件生产着更多的事件。　　事件是引发结构转型的一系列断裂。如果结构是多元和重叠的，那么任何结构转型都有可能触发相互重叠或临近的结构的失位和再衔接。事件这种相互串联的特点，可以在我视为整体事件的攻占巴士底狱的一系列片段中看到。7月14日的事件导致国王策略性的撤兵，这让国民议会的代表团在巴黎受到了狂热的接待，让国民议会首次为14日暴力行动寻求正当性，也让巴黎人民在17日仪式性地重新征服了国王。但这也导致各省出现越发严重的不确定性和焦虑，引发了诸如17日和18日发生在普瓦西和圣日耳曼莱昂的骚乱，这又反过来使得议会需要进一步将攻占巴士底狱辩称为正当革命。巴黎人民起义的成功以及议会辩论中的清晰辩护，鼓励了巴黎的暴徒在23日重演“群众正义”的行动，谋杀了贝尔捷和富隆而此举又自相矛盾地导致了巴士底狱神话被进一步阐述为正当革命，而23日的私刑被谴责为非正当之举。

我是从一个特殊视角来对攻占巴士底狱一事进行概念化的：我视之为把群众暴力同新的革命概念中的国民主权意志衔接起来的历史事件。因此对我而言，认定事件于7月23日结束是合理的。但显然，7月14日的行动引发的一连串后果并未到此结束。对主权深远的重新定义、国王的建立、国民议会的胜利、新形式的城市民兵队的建立，以及作为一种政治行动范畴的革命的出现，既唤起了希望，也加剧了法国各地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实际失位。因此，它增强了已到处弥漫的不安全感。我将在下文勾勒两桩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最引人注目、最重要

的事件，即历史学家称为“大恐慌”的农村恐慌，以及8月4日夜废止了封建制和特权、建立了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新社会秩序的著名立法会议。

大恐慌或许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为惊人的群众恐慌。巴黎人民起义的消息到达各省时，恰逢1789年谷物就要成熟、即将丰收的关键几天。由于上一年灾难性的歉收，贫困的乡村满目疮痍，被乞丐和流民占据。在7月20日之后的那个星期，也就是巴黎令人震惊的消息刚刚到达之后的那几天，恐慌开始独立地出现于法国不同的地方。每个出现恐慌的地区，都有人说看见几伙土匪冲入田野，砍下即将成熟的谷物。到了8月初，恐慌蔓延到了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教堂尖塔的钟被敲响，村民们持械聚集，列队出发，追查假想的土匪，还常常派信使向毗邻的村子报告可怕的消息，致使一座接一座村子动员，又向下一座村子派出信使。于是，方才几天的工夫，恐慌可能就已经被传播到100英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

在少数例子中，农民一经动员，便去袭击领主的城堡，焚烧记录了他们税费的名册。乔治·列斐伏尔在他有关大恐慌的经典历史著作中认为，该事件让数量庞大的农民确信自己受到了全国范围的贵族密谋的威胁（Lefebvre，[1932]1973）。但列斐伏尔所用的证据似乎与克莱·拉姆齐（Clay Ramsay）的发现更为一致，后者在近期对苏瓦松地区的（Soissonais）大恐慌的研究中总结道，迄今为止，大恐慌最常见的结果是象征性地重申了旧制度下乡村共同体的等级社会秩序。当村民拿起武器对抗“土匪”时，通常要去请求当地领主或长官来组建和领导他们的民兵部队。神秘的外来者莫名其妙地破坏了收成，这在农民看来是世界末日，于是他们就转向他们一直以来的上级来反败为胜（Ramsay，1992）。因此大恐慌可能更适合被理解为乡村旧制度的最后狂欢，而不是农民革命的最终胜利。

但出现大恐慌的村庄大多远离巴黎，信息传播不稳定也不规律。从巴黎或凡尔赛的角度来看，这些消息着实骇人听闻：浴火的城堡、土匪摧毁了庄稼、满目是武装分子。而正是巴黎和凡尔赛的记者和立法官员（而非村庄里的农民）暗中把社会失序归咎为贵族阴谋。立法官员担心会出现对抗封建体系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种起义不仅会威

胁到领主的领主权，还会威胁到所有农村财产。8月4日晚著名的立法会议事实上正立足于这种对农村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错误解读。

8月4日讨论出的法案，部分是一个立法的阴谋所致。相当数量的爱国代表有意废除封建体系来安抚农民，以换取农民的补偿金。为此，他们拉拢了诺瓦耶子爵（vicomte de Noailles）和艾吉永公爵（duc d'Aiguillon）这两名大贵族，他们宣布放弃他们的封建特权。两人的演讲震动了议会，很快，即便是此前敌视改革的贵族和教士，也在国民的圣坛上争先恐后地宣布放弃自己的特权。议会掌声雷动，他们沐浴在欢乐的泪水里。这场立法会议几乎持续到次日黎明，摧毁了构成旧制度下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全部特权肌理，代之以基于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新的社会秩序。如果说，攻占巴士底狱确实建立了人民/国民的主权，那么在8月4日晚上，法国社会组织的原则最终与涉及人生而平等、国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的新的基本意识形态实现了步调一致。这场会议导致了国家新的形而上学原则与社会生活的司法组织最终再次衔接。代表们在6月17日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时所含蓄采用的意识形态最终在8月4日晚的讨论中体现了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Kessel, 1969; Fitzsimmons, 2003）。

大恐慌和8月4日之夜与攻占巴士底狱一样，都具有上文罗列的所有历史事件的特点：它们都再衔接了结构，转变了文化，被地区性条件极大地形塑，沐浴在强烈的情绪中，是集体创造的行动，穿插即兴仪式，并仍在生产更多的事件。在上述所有方面，这两个事件能和攻占巴士底狱一样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这些特点构成了贯穿1789年夏天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分，转变了欧洲世界中人口最为稠密、最强大和最具声望的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体系，并永远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

结构的再衔接要获得权威的核准后，方能成为决定性的。　在攻占巴士底狱的例子里，断裂的行动发生在巴黎而非凡尔赛宫，且涉及到一场由紧急市政当局临时组织的持械公民与一小队保卫城市堡垒的老兵的冲突。同样是在巴黎，在自发仪式及口头和书面的话语里，人们首次引入了主权人民起义对抗专制这个比喻。但要把这个比喻转变为攻占巴士底狱的公认真相，尚需国民议会和国王这样的中央统治权

威的认可，而他们只是7月14日行动的旁观者。在他们于7月15日和17日仪式性地介入后，巴黎人民和国民议会才被捆绑到了一起，并得到了国王的默许，国民议会中的辩论也才会如马鲁哀所说，认为7月14日的暴力行动是“对抗专制的国民起义”，具有“超越法律力量的特点”，而攻占巴士底狱才成为一场正当的、创始性的革命。只有获得了国家最高权威的认可，结构的再衔接才会成为决定性的。

在大恐慌和8月4日之夜两个例子中，国家中央权威的行动扮演着更为明显的重要角色。大恐慌可以被描述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分散的地方性事件。尽管这些事件在每个地方都造成了强烈的情绪和政治影响，但它们在各地造成的结构转型（多是重建一种参与式的旧制度等级制）都极为短暂，而大恐慌在地方上最重要的长期影响是由中央的行动带来的，这是因为大恐慌唤醒了国民议会的成员，导致他们在8月4日晚废止封建体系。此举不仅对法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地方史也同样如此。8月4日晚的辩论，废止了农奴、封建课税（feudal exactions）、省市级的特权、狩猎特权、职务腐败、什一税，还充公和出售了大量教会地产。正是这些改革的效果，而非大恐慌的直接结果（短暂复苏的旧制度等级关系），转变了法国乡村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特点。因此，尽管事件的推动力来自边缘地区，但正是国家中央对该事件的决议，决定了这些事件的结构性影响。

由于攻占巴士底狱和大恐慌首先是政治上的断裂，所以对这两个例子来说，通过国家中央实现权威性的再衔接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我们也应该能料到，由于事件的场景和范围不同，再衔接的行动发生的位置亦有不同。一个宗教事件的权威决议需要发生在一个宗教性的制度场景下，例如在长老会和主教会议上。亲属关系的断裂，可能是由宗族中的长者核准，也可能是由部分相关亲属之间的默示同意核准。权威性的再衔接实现于何处，取决于是哪种权力模式被事件激活和挑战，也取决于受影响的权力集中于哪些特定的制度节点。不过，在控制了相当大的地理和制度范围的权力节点上，似乎更容易发生权威性的再衔接。鉴于事件所具有的制度和地理上的串联性，这意味着即便是主要发生在国家活动场域之外的断裂，也常常只能靠国家的行动来解决。

历史事件是时间过程，也是空间过程。　　我们通常认为事件是一个时间范畴。但想剥离空间过程来研究事件是不可能的。 [9] 这对研究攻占巴士底狱、大恐慌和8月4日晚的会议来说都是如此。让我来指出攻占巴士底狱中一些关键的空间维度，这些维度似乎也是所有历史事件的特点。

（1）决定了结构如何被转变的行动在空间上是高度集中的。“集体欢腾”的片段出现的前提也正是空间上的集中。7月14日、15日、17日和23日的偶然事件都具有的想象力的高涨、集体创造、过热的情绪和自发的仪式，都依赖于大量人涌入特定空间：如巴士底狱周边、市政厅广场（place de l’Hôtel de Ville） [(8)] 、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国王进入巴黎时的路线。在特定时刻下，这些特定的空间构成了被称为攻占巴士底狱的转型性事件的重要节点，其重要性在于彼时彼地的行动决定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大一部分地区中后续行动的进程。国民议会在凡尔赛宫集会辩论也在空间上十分集中；辩论决定性的成果，即将攻占巴士底狱核准为人民主权的正当革命，取决于辩论中特定的对抗、联盟和辩论自身的流向，也无疑导致特定时间和特定建筑中的集体欢腾。

（2）导致一系列转型性行动的结构交叉点既是制度性的，又是空间性的。以不均衡的方式衔接成了网络的结构，具有互不相同且大小不一的空间范围。一些断裂之所以导致了其他一系列断裂出现，和空间范围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断裂的结果出现在其发生的地点以外，它就比空间受限的断裂更有可能导致一系列转型性事件。像是大恐慌这样通过模仿传播的事件，或是像攻占巴士底狱这样对极大范围内的结构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事件，又或是像8月4日晚的辩论这样最初发生的社会—空间地点有着极大的空间覆盖域的事件，历史事件的定义至少包含最初的地方性现象的结果在空间上的惊人延伸。

（3）从定义来说，所有行动都发生在特定空间位置。但发生在某些地点的行动只涉及一个地方性的范围，而其他行动的范围可能要广阔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某些地点是广泛的社会实践的中心节点。发生在国民议会或国王的议事厅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全幅领土上散布的人民。此外，由于巴黎是法国的准首都，位于法国文化和政治

生活的中心，与位于凡尔赛宫的王室政府的距离较近，发生在那里的一场骚乱会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回响。相反地，如果类似暴力事件发生在偏远村庄，除非被巴黎的报社宣扬到全国，或者导致国民议会或国王为此采取行动，不然就只会有地方性的影响。诸如攻占巴士底狱和大恐慌等事件在特定形式和动力上的不同，在根本上取决于构成它的行动的空间范围的变化。

定义历史事件的边界需要判定行动。　　历史事件具有所谓分形（fractal）的特点。像是攻占巴士底狱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如攻占荣军院、屠杀洛奈和弗莱塞勒、国王进入巴黎，还有7月23日晚国民议会的辩论。而每一个次级事件（sub-event）本身又是由一系列更小但重要的断裂构成的。攻占巴士底狱本身只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片段，而法国大革命又只是1789年至1815年间发生的政府形式、国家边界和战争模式的重大转型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来称攻占巴士底狱为一个事件，也没有理由否认国王在7月17日进入巴黎或是他当天下午在市政厅阳台上的作为，又或是整个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事件。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有效概念化为使结构失位和再衔接的一系列断裂，以及有其特定规模的历史事件。

但事件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分形这个特点。事件也是相互重叠和渗透的。如果结构确实构成了一个松散衔接的网络，如果我们把事件定义成一系列改变结构的偶然事件，那么，诸如攻占巴士底狱这样的偶然事件，就会牵涉到大量不同结构的转型，而每个转型都会有不同的时空跨度。因此，如何去划定一个事件，本质上又是一个判定的问题。有一条经验法则是，研究者如何划分事件取决于需要解释怎样的结构转型。例如，我把7月12日驱逐内克尔引发的民众抵抗作为攻占巴士底狱事件的开篇，把7月23日的国民议会辩论权威地把攻占解释为正当革命作为结束。这么做是因为我关注一个特定的结构转型，即对人民主权和群众暴力的衔接，其结果是形成了革命这一范畴。但是，正因为这绝不是攻占巴士底狱带来的唯一的重要转型，所以上述划分也不是该事件唯一适用的边界。如果研究者关注的是作为新权力模式的城市民兵队的出现（这也是攻占巴士底狱的重要后果），需要

选择的可能就是不同的起止日期。这些选择必须是在事后作出的：在处理发生在两百年前的事件时会比较有把握，因为事件的结果已经整体确定下来一段时间了，但处理新近发生的断裂的后果就会比较困难，因为或许还有惊人的结果尚未涌现。

就像攻占巴士底狱引领了一系列的后续事件一样，我对该事件的分析引发的理论反思也导致了一系列后续反响。正如研究者必须划一个专断的边界框定所研究的事件那样，我也必须给这篇似乎完全开放且尚未完成的论文收笔。我认为，上述讨论已经用了足够的笔墨建立了对历史事件的思考，视之为导致持久结构转型的一系列偶然事件，这可能已经成果丰硕。至于成果究竟几何，只待未来对其他历史事件的研究了。

# 后记

## 盘算、指号过程（**semiosis**）[9] 和领袖魅力

我已在本章的结语中说过，本章于我而言仍是开放且未完成的。本篇后记就是对这一看法的实际证明。本章初次发表后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为期数天的有关革命的会议，会上有学者使用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开展研究。[10] 这次相遇使我得以更加明确地阐述论点中的策略性维度。会议一结束，我就在备忘录上写下了草稿，并修订作为本篇后记。本文试图说明，作为自利的策略性行动后果的“为巴士底狱发明革命”这种解释，有哪些价值和局限性。

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的视角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认为只有把社会行动还原为个体行动的总效应时，才能得到有效解释。该理论进一步认为，个体是“理性最大化”的，也就是说他们为了最大化个体利益而采取有策略的行动。此说试图整体从博弈论中发展出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来解释人为何如此行动。这种明确借用自经济学的视角在当代社会学中已极为常见并茁壮成长，是当代政治学主流方法论地位强有力但日益受争议的竞逐者。鉴于理性选择理论日益增长的制度性力量（尤其是在政

治学中），它似乎值得作为一种评估一个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日常发生（1789年7月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的策略性研究路径。

理性选择理论已被有效应用在某些涉及革命的研究问题上。如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1988）勾勒出一个参与还是回避革命示威的清晰的个人选择模型，从而明确阐明了从小规模的地方性行动滚雪球式发展成革命起义的过程。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1990，1994）展现出理性选择分析能为他对革命动力的宏观历史性解释提供可信的微观转译。但我猜想很多研究革命的专家和我一样，认为即便是如此有说服力的分析，也无法捕获革命现象的某些本质。泰勒和戈德斯通所关注的问题是，当一场明确的革命性运动开始后，人民要如何选边站。他们不得不假定相互竞争的各种力量的目标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否则行动者就无法知道革命胜利能带来怎样的好处和代价，也就不能作出理性的盘算。但这类分析的问题在于，对多数名副其实的革命来说，革命的目标以及行动者的身份都会在革命过程中发生重大转变。被我们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具有革命性，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转变了对政治实体成员而言可用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替代方案的本质，而它们通过详细解释新的和令人惊奇的政治与道德选项来做到这一点。就我所知，理性选择路径并没有成功构建出文化意义的革命性变化这一重要的问题，更别提解决问题了。我研究攻占巴士底狱的本章的其中一条优点，是试图解释现代“革命”概念出现所引发的转型。尽管本章没有使用与理性选择相关的比喻，但就像多数文化和历史分析一样，本章包含了对基于利益的计算的讨论，大体上也算有关理性选择的思考。我要在这篇后记里更系统地深入这一论点，既明晰我自己的解释，也评估理性选择在解释革命性的文化转型方面的潜在贡献。

我所组织的对攻占巴士底狱的叙述，是站在国民议会的角度来写的一部策略性行动的故事。[11] 故事是这样展开的：国民议会被卷入了一场孤注一掷的政治博弈，对手是国王，赌注是实际主权。攻占巴士底狱给博弈引入了反叛的巴黎人民这一新元素。最初，国民议会对是否要支持巴黎人民很是犹豫。这种犹豫是源自以下五点盘算：（1）已发生的暴力行为很可能具有传染性；（2）群众暴力的传染性扩张

很可能让国王趋于强硬，因为国王有镇压暴力的武装力量；（3）一旦国王转向强硬，他就能够支配或解散议会；（4）如议会选择支持而非反对反叛的巴黎人民，国王将更有可能会武力攻打议会；（5）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必须权衡支持巴黎人民后能获得多少军事力量和群众支持。我确信，擅长建立形式模型的学者可以将国民议会面临的策略情境用一个或几个效用函数来呈现。

攻占巴士底狱的新闻在刚刚到达国民议会时，面临的是悲伤的沉默，表明国民议会发现自己身处进退两难中。议会相信，通过认可攻占巴士底狱来支持巴黎人民会产生负面效果，但支持国王而反对巴黎人民也同样会产生负面效果。在两种选择都看起来前途渺茫的情况下，国民议会的做法和任何理性行动者一样，与其立刻选边站，不如在采取拖延策略的同时收集更多信息。其具体做法是，派一队代表去巴黎，同时派数队代表去国王那里。这使新获得的信息从两个方面转变了“预期效果”。其一，前往巴黎的代表团发现城市处于和平有序的状态，而非暴力和混乱。之前对暴力可能会传染的担心由此减弱，因此愈发支持巴黎人民对抗国王能切实增强议会的力量。其二，代表们到了国王那里后，发现国王并不认为自己处于更强势的地位。他先从巴黎撤走王军，又确实放弃了用武力对抗巴黎人民。前往巴黎的代表传递出的信息改变了议会的盘算，原因是那些信息表明了暴力并没有传染；而前往王宫的代表指出，在巴黎人民暴动后，国王认为自己是虚弱而非强大的。这两点大大降低了之前所预计的和巴黎人民结盟的代价。故此，议会选择支持巴黎人民，通过追溯起义拥有权威的正当性，认可其为主权人民的行动，来巩固与巴黎人民的联盟。

这种策略性盘算的观点无疑是有力的解释，但这尚未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解释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概念是如何被发明并确立地位。此说解释了为何作为理性行动者的国民议会，最初会同巴黎人民保持距离，又紧接着和巴黎人民结盟对抗国王，但无法解释为何议会选择把群众暴力正当化为“对抗专制的国民起义，具有超越法律的力量”，并以此与巴黎人民结盟。宣布这一宗旨后，国民议会不仅巩固了与巴黎人民的联盟，还建立了新的合法性原则，这种原则从根本上来说能同等对抗其自身和国王的权力。如果我们把议会的目标看成是

使其权力和安全最大化，那么议会认可巴黎人民的行动的做法，似乎和理性选择背道而驰，因为此举损害了其自身对主权的合法代表权的垄断。简言之，基于理性盘算的论点，无法解释为何群体暴力和人民主权是用这种特殊的、历史性、决定性的方式衔接起来的。若想解释这个衔接，我们需要跳出纯粹的理性选择解释框架，转而解释为什么国民议会最初把攻占巴士底狱当成是潜在具有传染性的放纵和失序的行动，尔后又将其重新阐释为人民对抗专制的起义和人民主权的行使。原有的理性选择的解释，在此需要和一种符号学解释相连，后者基于不同的前提，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符号学路径在解释7月14日至7月23日发生在国民议会的事件时，将之视为新的符码转换（code switch），还要对新采纳符码作进一步解释。国民议会最初的回应，与解释群众暴力的既定符码一致。这个符码建立在广大精英对人民的普遍理解上，他们认为人民是非理性、不受拘束和天性暴力的。因此，当巴黎的平民袭击巴士底狱且残暴杀戮了其指挥官后，对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自动的回应必然是谴责暴力，并担心暴力会传染性地扩散。但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另一种使用“人民”这个术语、但又截然不同的话语成长起来，这就是国民或人民主权的话语。这种话语在三级会议召开后成长速度加快，且已在1789年的6月和7月自封的国民议会中成为了主要的合法性话语。在该话语中，人民和人民意志是用完全正面但又完全抽象的方式来表现的，它既是作为合法国家基础的主权的原则，又是由国民议会或合法政府代表的实体。正是在这种多少有些神秘的意义上，“人民”非但不是秩序和道德的威胁，还是两者的根本来源。

早在7月15日，国民议会的演说家就开始认为攻占巴士底狱的人民拥有活力和勇气，把他们的行动看成是自由对抗专制的打击，而他们是在利用人民这个术语的内在歧义性。他们把人民在巴士底狱的行动从人民固有的暴力和非理性的话语语境转换到人民主权的话语语境。转换一旦完成，人民行动的形象就系统性地从消极转为积极。随后几天里，将攻占巴士底狱植入人民主权话语的逻辑意涵得到了清楚解释，它把7月14日的暴力行动定义为对抗专制的英雄式袭击，也是对抗专制所必需的、高于法律的国民起义。理性盘算的论点也许能解

释为何国民议会选择了第二种话语而不是第一种，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两种话语都是可行的选项，也无法解释为何选择了人民主权的话语引发了对人民革命概念的详细解释，这种解释还在事实上让国民议会无法自称是国民意志的唯一合法阐释者。除非把理性选择与符号学分析结合起来，否则结论将依然费解。

但是，把理性选择和符号学分析相结合后，仍然遗留了一道难以解释的问题。理性选择能解释为何国民议会决定与巴黎人民联合对抗国王，符号学分析能建立一种可以评估攻占巴士底狱一事的替代性话语场域，还能在进入一个给定的话语场域后，明确其中的符号学解释的逻辑。但这两种解释策略都无法清楚说明，为何国民议会似乎忽然有可能（甚至是自然而然地）用人民主权的话语范畴来讨论群众暴力的行动。在这里承认国民议会给出的阐释所具有的新意是很重要的。对1789年的政治行动者来说，把革命作为激进的政治制度变迁的想法已然存在，这个想法主要来自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1776年到1783年的美国革命。由革命建立的政权应以国民或人民主权为基础的观念也是如此。但认可群众暴力的行动是人民意志的权威性表达，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前是不能想象的。

要理解为什么国民议会在7月14日后的几天里把上述想法视为是不证自明的，我们有必要转向第三个解释框架，这个框架基于马克斯·韦伯（1978, 1:241—254）[10]的领袖魅力和涂尔干（[1912]1965）的集体欢腾的概念。理性选择和符号学的解释框架都无法解释攻占巴士底狱等重要革命事件所具有的情绪极度高昂的特点。尽管这两种框架对理性的定义不同，采用的形式化方法也不同，但两者确实都是形式化的和理性主义的。韦伯和涂尔干却恰恰相反，给情绪的力量赋予了一个靠近他们理论方案中心的位置。

一队议会代表在7月15日到达巴黎后，他们的经验最早影响了议会成员，引发他们重新思考攻占巴士底狱的意义。其中，穆尼耶对这次访问的描述，主要针对的是这一片段的情绪基调，而不是巴黎市政当局为确保法律和秩序所作出的新安排，也不是民兵队的模范纪律。他说，巴黎人民“试图用最鲜活的情感符号，表达他们此刻的心绪。他们非常高兴能和国民议会的代表握手……公民们互相道喜和拥抱。

所有眼睛都被泪水润湿，陶醉之情无处不在”（*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tieur*，163）。穆尼耶在这里指出了议会代表和簇拥他们入城的巴黎人民之间建立的情感联系。正如涂尔干所言，代表团和巴黎人民同时体验到的激动情绪，部分是“集体欢腾”，即一大群人涌入有限空间时显著增强的情绪的结果。代表团身后的游行队伍尤为如此，这种情绪在其中被仪式性地划分为非凡和神圣之物。这种激动不是人群聚集的机械效应，毕竟在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高峰时段聚集的人潮里，就不会喷薄出激动的泪水。这种人群聚集场景中的情感力量，来自韦伯所谓的领袖魅力特质，它指的是所发生之事或多或少触及了秩序的终极来源。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巴黎普通人感受到了彼此身上流淌的喜悦，这是主权人民及其代表彼此联结的化身，是位于人民主权理论核心的神秘性的具体实行。这一欣喜若狂的联结，显然是攻占巴士底狱的结果，也和过去几个月里四处弥漫的冲突和紧张形成鲜明对比。我确信，正是7月15日深刻的情感经验，让议会想到采取新的手段，也就是把流血攻占要塞的事件编码为主权人民的崇高行动，并由此为世界引入了一个可能破坏其自身权威性的人民革命的概念。而同样的经验后来也在国王7月17日访问巴黎时重演了。

## 方法论的教训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采用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者对文化转型的问题兴趣不大。问题不在于他们完全忽略了文化，而是文化在他们的描述中出现的方式相当局限：通常来说，文化要么是在理性选择已经被推到极限但还有些问题解释不了的时候，被作为剩余物引用，要么是作为盘算发生的框架，但这也是鉴于当前的解释目的。而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外部，其论点会被用来解释在已有替代性框架中的选择，或是用来解释让理性盘算得以成为可能的某些规范的出现。但就我所知，理性选择理论尚未涉及转型性事件中出现的新的、从结构角度来说极为重要的文化框架，而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问题。

这篇后记的目的是论证理性选择分析（至少是对行动者所面对的策略选项的严肃审视）能对探讨这个问题提供帮助，但它本身不足以

给出充分的回答。在攻占巴士底狱的例子里，我认为应更广泛地将对优势的理性盘算与符号结构及其转型和社会生产的情感经验（能激发新的文化意义的发明和阐述）的论点结合在一起。要想解释现代意义的革命概念或是更笼统的文化意义的根本转型的出现，都需要考虑符号结构和社会—情感的动力学，以及认识盘算、符号结构和社会情感的动力学之间的协同互动。从某种角度来说，理性选择视角的最大失败，在于它是为人类行动者建立的单向度模型。采用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者对这种总结早有耳闻，而且无疑听腻了。但我要说的是，因为在攻占巴士底狱这一片段里，人们的行动有着至关重要的符号和情感的维度，所以，仅基于利益的理性盘算无法生成一个充分的解释。我对纯粹的理性选择解释的反对，和其他对理性选择的批评的最大差别是，我的反对基于经验，而非先验的理论术语；它想要提供的不仅仅是哲学上的反对，而是更具体的解释性挑战。

要问有何前车之鉴，那就是采用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者可能会选择忽视另一个领域的挑战。在我反对理性选择，认为其在试图解释一些重要的社会转型时严重不足时，通常得到的回应是要退回相当抽象的科学模式。但我们的目标不是完全解释每一个历史个案。在研究任一给定的案例时，总有一些因素需要别的理论来解释。事实上，理性选择的解释永远无法预言某个案的后果的全部细节，这是（只能）由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完成的工作。科学的进步不是通过如此表意层面的细节研究，而是通过构筑一个普遍的理论，以使我们能在各种各样的个案中进行预测。我们必须限制自己去关注一个单独的因素集，该因素集会出现在最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并能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最严格的比较，如此就能获得最好的研究效果。我们无法充分解释国民议会对攻占巴士底狱的回应（或任何其他个案），和我们整个科学的前进道路并无关联。

不过，我给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普适的。我在前文中用攻占巴士底狱的例子，来说明现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缺乏概念性和方法论的工具，这些工具对解释盘算得以发生的文化框架的出现和转型来说是必要的。进而，我认为，理性选择似乎不可能从自身的知识宝库里发展出这样的工具，除非它比现在更深地融入已有的文化分析传统中。对

一条自以为提供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理论的基础”（Coleman, 1990）的研究路径来说，这应该是一条棘手而充满挑战的评断。

注释：

《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25* [1996]:841—882）已发表了本章的同名简略版。Copyright © b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感谢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授权让本文得以发表。罗纳德·阿明扎德（Ronald Aminzade）、劳拉·唐斯、米盖·格切克（Muge Goçek）、戴维·莱廷、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谢里·奥特纳、沙伦·赖特曼（Sharon Reitman）、悉尼·塔罗（Sidney Tarrow）、查尔斯·蒂利及《理论与社会》的编辑们，他们都对本章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1．斯通（Stone, 1979）的研究恰当地表述了社会史和叙事史之间的和解。Abrams（1982:190—226），Nora（1974），Molino（1986），Abbott（1992），Aminzade（1992）以及Griffen（1992, 1993）都对理论化地解读事件有所贡献。

2．戈夫曼（Goffman, 1967a）对如何处理面对面互动中的潜在的断裂，作出了引人入胜的讨论。

3．查尔斯·蒂利（1993）将这些情形称为“多元主权”（multiple sovereignty）。

4．我对围绕攻占巴士底狱的一系列事件的探讨，基本上建立在戈德绍（Godechot, 1970）的基础上，这是相关学术专著中最好的一本。

5．最好的讨论，同见Godechot（1970）。

6．贝克《发明法国大革命》（“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文，罗列了革命这个术语在18世纪的众多转变，甚至包括攻占巴士底狱发生后几周的情况，但他没有专门讨论，革命是在什么时候和群众暴力的行动联系起来的。

7．“公民”（citoyen）这个术语在整个描述里频繁出现。“祖国

的军人”出现在第7页。第18—19页出现了讨论自由和专制的关键字句。

8　　　　．关于区分正当和不正当暴力的革命难题，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 1988, 1991）写下了极具穿透力的见解。

9　．赵鼎新（Zhao,　2001,尤见第八章）和休厄尔（2001）对此有详尽解释。

10　　　　．会议主题是社会理论与革命，由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和比约恩·维特罗克（Björn　Wittrock）组织，于1995年在乌普萨拉（Uppsala）举办。

11　　．此说实际上把国民议会看成是一个单独的行动者，尽管就像我的讨论里已经说明的，它显然是由大量意见不同的个体行动者构成的。但因为议会没有投票的记名表决资料（roll-call　data），我便无法拆解他们的行动，也无法借此对1789年7月12日至23日确实发生的个体政治盘算的真实情况进行更为细腻的阐释。伊万·埃尔马科夫（Ivan　Ermakoff,　2000）对1940年法国被德国击败后立法会如何决定支持政权更迭进行了研究，这是一种更为个人层面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不亚于准革命的进程。

---

(1) 迎驾仪式指的是当国王搭乘座驾回到自己的宫殿时，卫兵和平民的大规模致意、庆祝仪式。—— 译者注

(2)　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休厄尔所说的这种公开处决对应的是法语exécutions　publiques。两者的差别在于，休厄尔所用的state强调是国家确定了处置的行为，public则更强调了处决是公开举行的，这或许显示出他对这种处决的解读。—— 译者注

(3) 全名为路易· 贝尔捷· 德索维尼（Louis Bertier de Sauvigny）。在现有研究中，贝尔捷的名字有两种拼写，Bertier（如《法国大革命史词典》），或Berthier（如商务印书馆《法国大革命史》），前一种拼写多见于英语著作，而后一种多见于法语著作，两者均系其名，可参阅Alphonse de Lamartine, *Histoire des Girondins, Collection Les Mémorables*, tome 1,（Plon, 1984）, p.328之说明。—— 译者注

(4) 全名为约瑟夫· 弗朗索瓦· 富隆（Joseph François Foullon），也被叫作富

隆· 德杜维（Foulon de Doué），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他的两个名字中，富隆的拼写略有差异，但读音一样。亦可参阅Alphonse de Lamartine, *Histoire des Girondins, Collection Les Mémorables*，tome 1,（Plon, 1984）, p.328之说明。—— 译者注

(5) 全名为路易· 德· 古伊· 达西（Louis de Gouy d'Arcy，亦作Arsy），法国官员，克莱蒙（Clermont）地区总督（Lieutenant general）。—— 译者注

(6) 黑暗传奇原指对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行动的妖魔化的历史叙述，引起了殖民地对西班牙帝国统治的反抗。这里休厄尔指的是对巴士底狱的妖魔化，引起了巴黎人民对专制的反抗。—— 译者注

(7) 亦有译作杜伦尼，系活跃于17世纪的法国元帅，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战功显赫，和路易十四共同缔造了多次对普鲁士战争的胜利，于1675年战死疆场。—— 译者注

(8) 此地在1802年之前名为格列夫广场（Place de Grève），设有绞刑架，为执行死刑之地点，1803年起更名为市政厅广场。—— 译者注

(9) 语言学和逻辑学术语，意为与符号指涉有关的过程。—— 译者注

(10) 原文夹注为241—25，根据原著页码应为241—254。—— 译者注

# 第九章　延续的历史和复杂的时间性:1814—1870年马赛码头工人的奇特职业生涯

前两章已经讨论了事件，也就是对社会关系的后续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短促而充满张力的社会互动序列。本章要接着探索的内容，是我称之为事件时间性的肌理。这一问题看似与上一章对立：社会关系的结构模式一旦建立，如何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在历史转型相当剧烈的时代基本不变地继续再生产下去。我选取的个案是19世纪马赛码头工人的经济特权，它正因其延续性才尤为有趣。与同时代法国劳资关系的整体模式相比，这种延续性是个极好的例外，且在一段经济增速异常快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城市中最具活力的产业的中心。要理解这一个案，我们需要理清几个非共时性但相互重叠且牵连的时间性过程之间的关系：从滨海区日常生活的节奏，到19世纪资本主义复杂而矛盾的动力，到码头工人行业组织的机构史，再到法国国家制度变迁的不连续的序列。

马赛码头工人（portefaix）无疑是19世纪法国工人阶级历史中的例外。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立法，尤其是1791年3月的《阿拉德法令》（D’Allarde law）和1791年6月的《勒沙普利耶法》（Le Chapelier law）[1]，废止了18世纪管理劳资关系的社团（corporate）或行会这类组织，而拿破仑《刑法典》（the Napoleonic penal code）[2]还认定劳工组织非法。我已在别处（Sewell, 1980）详细阐述过，19世纪上半叶时，法国工人会建立非法组织的情况并不罕见，其中有些是在合法的互济会（benefit society）的制度性庇护下才成立的。只要这些组织没有偏离互助的功能，还能得到拿破仑时期和复辟王朝时期的政权支持。和很多其他工人阶级的行业一样，马赛港的码头工人也形成了一个互济会，甚至不隐瞒其作为“工会”的功能，并作为其旧制度时期行会的继承者公开进行组织。社团公开的注册章程严格限制新人入会，事无巨细地控制码头上所有的工作，确保工人工资不但优于其他非技术工人，还高于几乎所有技术型手工业者。在工人阶级的世界里，不见天日、支离破碎和充满斗争的劳工组织时常受到官方镇压，

但马赛码头工人的社团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公开而自信地开展活动，获得了地方政治当局和雇用了这些工人的商人的包容。

## 劳工史的时间性

很显然，任何相当独特的现象的出现，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性的特定原因来解释。本章中的大部分内容，关注的就是马赛历史的独特性。但我想以一种解决一系列普遍得多的问题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无疑很独特的例子。最普遍的就是社会再生产的问题。本章开篇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讨论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如何能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在社会变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持续再生产。对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而言，再生产（历史学家习惯称之为"延续性"）几乎不需要解释，因为我们倾向于为社会生活设置一种普遍的惯性。这种对惯性的认定，有时不仅是不成文的假设。安东尼·吉登斯在综合了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欧文·戈夫曼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的论点后，认为对活动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能提供他所谓的"本体论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建立一个理所当然的背景，使稳定的认同和自觉的社会行动成为可能（Giddens，1984:60—92）。但就算认定了这种常规化的普遍趋势，也不能解释在面临周围事物不断变动时，某些模式如何以及为何保持不变。要解释这类差别，我们必须同时识别出加强再生产行动的制度性结构，以及使这些制度免受侵蚀、腐朽或解体的潜在威胁的特定生态环境。研究社会再生产，和研究事件性社会转型一样，必须考察地方上的偶连性、路径依赖和势态的诸结构。用来解释转型性事件的概念工具，对解释为什么转型没有发生也同样必要。

任何真实历史序列的时间性必然是复杂的，因为它是拥有不同时间性的不同社会过程的特定组合。为便于讨论，我姑且把多样的时间性分成趋势（trends）、常规（routines）和事件这三类。趋势 是指具有方向性的社会关系的变迁，历史学家通常会用如"兴起""衰落""减退""停滞""增长"等词来标示这类时间性。任何特定情境中可能存在几个节奏不同的、有因果联系的趋势（如19世纪马赛的经济增长、城市

扩张、海洋贸易和移民移入），或是相互独立的趋势（如保王情绪的起落、旧港的日渐拥挤和民众读写能力的提升）。常规 是或多或少有些理所当然的活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倾向于以固定的方式不断重复。办公室工作、对话、码头劳动、宗教活动、休闲、餐饮或者政治都存在常规。用第四章引介的语言来说，常规是对结构进行再生产的实践图式。制度通常会被定义成生产和维持常规的机器。至于事件 ，前两章已清晰指出，它是转变了结构的、在时间上集中的一系列行动，它有可能建立新的常规来转变旧的常规，从而加快、倒转或重新定位趋势。

任何特定的历史序列都可能综合了过量的趋势、常规和事件。历史学家或是采用了历史学思维方式的社会科学家，以指出不同的时间性过程如何在真实的历史序列中相互联系为己任。这些联系的走向从理论上来说是任意的。常规可能会服从于趋势（码头工人的常规可能由于港口日益拥挤而得到强化），或被事件改变（由不停变化的投资人组织的帆船运输被大型蒸汽船航线取代后，办公室的工作变得更为官僚化）。在特定情况下，常规的运作还可能会产生趋势（细致核算一门生意的盈亏或许能增加财富；在技术革新的时期，过分严格地遵循现有的生产常规，可能会导致公司或产业的衰落）。事件也可以建立或复兴常规（如建立码头工人的社团），也可能逆转趋势（就像第二共和国不稳定的政治改变了码头工人在政治上的右倾趋势）。本章将试图重构趋势、常规和事件的合流，来解释马赛码头工人的“奇特职业生涯”。

本章也有意对另一个问题有所建树。除了切实思考这个于我而言很特殊的工人群体的奇异经历，我还想用码头工人的例子，反思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19世纪劳工史的时间性。长期以来，劳工史学家都假定，他们探讨的历史在本质上具有渐进式的目的论的情节。就像多数政治史被写成是国家兴起的历史（Duara, 1995），包括我写作的劳工史（Sewell, 1980）在内的多数劳工史，最后都倾向于关注劳工运动的兴起。[1] 这些广泛的目的论思考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多数作品是在相当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或可称之为原马克思主义[paleomarxism]）的模型下写作。其中，资本主义的

兴起意味着工厂生产体系的成长，工厂的增多意味着工厂无产阶级的扩大，进而催生了激进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尽管工人运动的历史有相当明显的周期性，甚至是准时性特点（主要由商业周期和复杂的政治势态造成），但工人运动的长期上升路径被认为是由工厂体系不可避免的兴起所决定的。作为该解释范式基础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尽管有着失败与挫折，工人运动“总是重新兴起，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定，更有力”（Marx and Engle, [1848]1948:18）。

直到1963年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这种以工厂为中心的劳工史动力学的解释范式才最终被请出这个领域。汤普森和他的任何一位前辈一样，深信有阶级意识的工人运动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但他展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效果的图景，都比前辈们的更为细致和复杂。汤普森的故事的核心是手工业者，包括城市工匠和乡村“外包工”（outworkers）。他不仅对纷乱多样的手工业者的经验加以分类，还证明了在19世纪早期，这些行业即便尚未经历工厂化生产的转型，也同样频繁受到密集的资本主义剥削。他也详细叙述了手工业者如何以不同形式的劳工和政治的斗争性来回应这类剥削。欧美各地继之而起的研究，倾向于证实汤普森上述两方面的发现。手工业者成为了19世纪几乎所有地方工人运动的先锋，且由于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渗透，例如日益增加的劳动分工、在特定生产环节里非技术工人取代了技术工人、血汗工厂或城市发行网络的发展，以及各种剥削性的分包等，都导致手工业者的工作处境恶化。[2]

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劳工史学家大多不再研究“黑暗与地狱般的工厂”，转而关注手工业者的作坊。[3] 然而，他们潜在的时间性假设几乎与在汤普森的巨作出版之前就已盛行的还原论和目的论的模型惊人相似。尽管我们已无法再把工人运动的兴起看成是工厂化工业的自动产物，但新的讨论沿用了对时间性的陈旧认识。正如我在别处（Sewell, 1993:17—19）指出的，这种转移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这个棘手的术语完成的，它概括了所有减少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的变化。劳工史学家倾向于把无产阶级化看成是资本主义不断增加的、无处不在的主导过程，以及各类劳工激

进主义高涨的原因。由于这个概念的定义非常宽泛，以至于在19世纪的历史中随处可见，像是此处的工厂和彼处的血汗工厂的数量增长，另一行业里的剥削性分包，再一个行业里的劳动分工强化，抑或是某个行业里机器对技术工作的取代。因为无产阶级化不同的指标如此广泛，所以得出这一过程有能力解释每个地方出现的劳工激进主义的结论似乎也是合理的。

但若细致洞察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便会发现，这一过程远非普遍性的。之所以看似如此，部分是由劳工史学家的研究过程造成的，这种研究过程本质上过度反映了工人积极抵抗资本主义压榨的情境。我们倾向于通过观察冲突来了解某行业的劳资关系，这当中首先要观察的是吸引了当时档案部门与报社之兴趣的罢工或其他形式的劳工骚乱。我们由此就有了工人收入和工作环境总是受到威胁的印象。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于各行业中劳工平稳工作的时期，即便有的延续很久，我们也几乎没有什么文献证据。

对某一行业的个案研究，如克里斯托弗·约翰逊（Christopher Johnson）关于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裁缝的开创性论文（1975），展现出手工业者经历的零碎的无产阶级化可能在经济上有毁灭性，并可能导致极为激进的后果。但对单一行业的研究无法普遍概括无产阶级化的重要性。假若源自资本主义渗透的无产阶级化确实是手工业者斗争性的主要原因，那么激进分子理当首先来自因资本主义渗透而衰落的行业。可就我所知，这层关系从未得到系统证明。事实上，在1848年革命之时与之后，马赛的情形与之恰好相反。那里，政治立场激进的工人，有些来自衰落的行业，有些来自本质上未受资本主义渗透影响的行业，甚至来自从资本主义发展中获得特权的行业。在19世纪上半叶的马赛，资本主义渗透最深的行业是裁缝和鞋匠。这两个行业参与革命运动的比例只比马赛其他技术工人的平均值略高一点，但他们的激进程度明显不及面包师、房屋油漆工和石匠三个似乎基本不受资本主义渗透影响的行业，也不及掌握了稀缺且极为抢手的技术、并得以在城市工人中最具特权的机械工人[4]。马赛的例子说明，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效果可能非常多样，以至于它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经济经验的路径不足以充分说明当时广泛出现的手工业者的骚乱。

尽管我含蓄批判了无产阶级化的观点之下蕴含的原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性假设，但我自己对于资本主义时间性的理解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5]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根本动力，我将这种根本动力定义为以获得利润为目的、以追求利润为手段的残酷的资本积累。但资本积累的动力引发的不是流畅或平稳的“渐进式”历史变迁，而是催生出具有矛盾、冲突、周期性和长期易陷危机（crisis-prone）等特点的时间性模式。确切来说，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时间性具有不均衡发展的特点。列宁和托洛茨基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来理解为何落后的俄国会偏离西欧发展的有序序列。托洛茨基（1932）强调，俄国同时经历了不均衡和混合 的发展：俄国现代的、技术上领先的大规模工业，是和完全过时的农业经济并行的。事实上，托洛茨基认为，俄国所具有的发生爆炸性革命的潜力正是源自这种特定的混合发展。不均衡发展的概念广泛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里，尤其是在讨论到经济发达和欠发达的国家模式时。但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国家内部行业或地区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同一产业的不同流程之间的差异。[6] 我相信，恰当地使用这种概念，有助于阐明19世纪劳工史的时间性。

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的抽象逻辑总是相同的，但在不同时空里，追求利润的机会极为多样，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演化而历史性地演化。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并不是通过所有经济行业或产业里同时出现统一的增量增长和创新，而是通过特定行业的突飞猛进，如棉纺业、运输业、铁路发展业、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业和金融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即便是在蓬勃发展中的行业，创新和活力也很少同步影响所有过程，比如棉纺业和棉织业的创新有着不同的时间点，制造机车和卧铺车厢的创新的时间点也不一样。这种不均衡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劳动力的混合发展。活跃行业的成长，常常创造了新的、高度机械化的、典型的“无产阶级”的工业新行业，但也必然刺激了技术上相对落后的、或新或旧的辅助性行业的就业。工厂纺纱的兴起，让手织机织工和田奴（field slaves）的数量成倍增加；而机车制造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成群的挖土工人的出现；汽车厂使修理店、出租车司机和加油站兴起；电脑也创造了键控穿孔机操作员（keypunch operators）(3) 和程序员的就业。在19世纪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工厂工业的建立，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技术滞后于革新的手工业者的成倍增

加，包括参与工厂建设的泥瓦匠、石匠、木匠和细木工，也包括给工人以居所、衣装及食物的建筑工人、裁缝、鞋匠、屠夫和面包师。最先进的技术的发展，是和最古老的行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的。

当我在运用不均衡发展和混合发展的概念来回答19世纪劳工史的问题时，我是在跟随拉斐尔·塞缪尔的脚步，他在那篇著名的《世界工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蒸汽动力和手工技术》（“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1977）中使用了这些术语。塞缪尔极为详尽地记载了新的机械技术、旧的手工技术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亲密共生，但他没有发挥隐含在他的术语中的重新思考劳工史之时间性的可能性。他首先论证的是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虽然有先进的机器，但工人的体力劳动也随之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塞缪尔的文章在他新的知识基础上再生产了为人熟知的、线性的、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时间性。塞缪尔对机械化会增加体力劳动的断言虽然片面，但没有完全错误，只是没有认识到不均衡发展也在工人阶级中创造（并且持续创造）了重要的特权区域。著名的“手织机织工的黄金时代”就是早期的直白例子。从开始使用机器纺纱发展到大规模采用动力织机的大约二十年时间里，织工们有着高工资和令人羡慕的工作环境。廉价机纺纱线的泛滥导致了成品布价格骤跌，引发对布匹需求的惊人扩张，而这又反过来导致了尚未被完全取代的织工劳动力的稀缺。直到动力织机摧毁了他们短暂的优势之前，织工的收入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手织机织工的例子反复重现，从19世纪中期兰开夏郡的骡机工人，到19世纪机器工业中的技术工程师，再到硅谷的计算机程序员都是如此，不胜枚举。这样的特权区域并不长久，可能维持数年或数十年，但资本主义发展无法预知的波动会最终把它们扫出历史舞台。然而，摧毁了特权所在行业的力量会产生新的优势行业。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像塞缪尔的讨论想暗示的那样，导致体力劳动无休止的增加，反而让劳动力变成一种广泛不同、持续变迁和千变万化的剥削与特权的混合。

19世纪马赛码头工人的历史，尤为清晰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均衡发展的特点如何能创造并适时摧毁一类享有特权的工人。从

1815年到19世纪50年代，兴盛的海上资本主义，连同码头上不变的技术和组织环境，把马赛甚至全法国的默默无名的码头工人提升到一个独特的地位。之后几年，资本主义又重组了滨海区的工作，摧毁了码头工人的小生境，把他们降格到和非技术工人几无分别的地位。尽管马赛码头工人是非同寻常的，但他们的故事勾勒出一个在资本主义历史中被反复重演的广泛出现的模式。可就算这类模式多次重现，每个具体的模式又是独一无二、令人惊讶和无法预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波动与由此带来的特权或毁灭的模式也应得到历史性的解释。易言之，我们必须使用历史分析的工具重构趋势、常规和事件之间的复杂衔接，这些衔接在我们考察的每个案例里都各不相同，可能导致收益不变或逐渐减损、建构或多或少有持久性的小生境、给予某种资本或劳动行业以超过另一行业的优势、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创造新机会、为特定企业提供政治保护，或以其他方式形塑或重塑生产和交换的领域。我发现，不均衡发展的概念确实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因为它说明了决定性、偶连性、复杂性、事件性和因果异质这几个我称为历史的逻辑的问题，确实能以不亚于其他类型的历史的方式，应用在劳工史、经济史、资本主义史里。

我对本章有两个目标设定：其一，发掘变迁环境中的社会再生产；其二，对在劳工史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时间性概念作出经验性批判。这两个目标在学术意义上有所不同，但都基于对码头工人的历史中编织在一起的、同样复杂的时间性的分析。码头工人维持特权地位的能力，只有作为特定趋势、事件和常规的共同后果才能被理解，这种后果让他们在马赛商人和市政当局可接受的程度上，巨细无遗地控制码头上的工作。但换个角度来说，同样是这种趋势、事件和常规的结合，使它们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关系有悖常制，这令马赛的滨海区成为法国和欧洲的经济情境下一个不均衡的所在。要实现这两个各有特点的学术目标，我们只能仔细分析偶连而又模式化的马赛码头工人的历史。我们即将开始的就是这样的分析。

## 码头工人的黄金时代

对地方官员和其他观察者来说，马赛的码头工人是一个足够特别的个案，尤其是在他们的“黄金时代”（19世纪四五十年代）。[7] 正因如此，写作他们的历史，要比写作多数19世纪工人阶级行业的历史容易。然而，总有一些研究目的的相关史料要比其他研究目的稀缺得多。和多数“自下而上的历史”一样，本章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假设性重构，基于分散、多样和零碎的证据。我需要指出，在几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论点完全基于对马赛婚姻登记处中的史料进行广泛分析而得出的定量数据。因此，本章还附带说明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史学家发展出的定量研究方法的价值，但这种研究方法被更晚近的文化史所普遍舍弃，他们的论证整体风格更具阐释性而非实证性。由于论据极不完整，也许最好在开头描绘一下有相对完整的文献支持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码头工人的概况，并回溯更不明朗的前几十年的情况。

19世纪中期码头工人的工资水平，是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最好证明。19世纪40年代码头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天4到5.5法郎不等。但由于码头工人拿的实际上是计件工资，所以实际收入可能和上述数据出入很大，再加上码头工作受季节性失业制约（如贸易不景气，或风向导致帆船无法入港），所以不能简单把这些数字乘以标准的每周六个工作日来得出平均周薪。但就算将失业计入考量，码头工人也是城市里收入最好的工人之一。码头工人的收入至少是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如挖沟工或泥瓦匠）的两倍，也远远高过多数手工业者（通常每天赚3到3.5法郎）。事实上，只有高技术工人（如玻璃吹制工、造船工、机械师、钟表匠和印刷工人）的工资才能和码头工人相比拟。[8] 之所以码头工人能维持高工资，部分是因为对从业资格的严苛限制。除非一名工人的父亲是码头工人，不然他很难入行。在1846年或1851年结婚的码头工人里，有不下70%的人是码头工人的儿子。这兴许是迄今为止城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继承率最高的行业了。排名紧随其后的五种职业是渔夫（58%）、制绳工（47%）、制瓦工（46%）、制革工（43%）和批发商（négociants，资产阶级中比例最高的职业，为42%）。所有职业的平均继承率只有23%。[9] 这些数字清楚说明了，码头工人这种赚钱的职业为其家庭所世袭享有。

码头工人的高收入和高职业继承率，离不开强大的劳工组织。正

如我已谈到的，码头工人的组织公开自若。在拿破仑战败、波旁王朝复辟后不久的1817年，地方官员批准了他们的“圣彼得、圣保罗以及我们的仁慈圣母会”（Society of Saint Peter and Saint Paul and of Our Lady of Mercy）。这个官方认可的互济会实际上重建了旧制度时期的码头工人行会。这种行会的出现不晚于14世纪末，但其成文规章第一次出现要到1704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将要爆发前，这些规章进行了修订，而1814年的规章又是1789年的修订版。[10] 1814年，旧行会的成员和他们的儿子只要象征性地支付8法郎，就能获得互济会的会籍；而所有其他申请者则要支付80法郎，这超过了多数手工业者一个月的薪酬（AVM: 1 I 1/35，1370）。这种入会费用和旧制度时期的同业公会（corporations）收取的一样。1841年再度修订社团章程时，非码头工人之子的入会费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000法郎[11]。除了设立高额的入会费用门槛，码头工人社团还可以直接拒绝成员资格的申请，即便对方有能力支付入会费用。

对准入码头工人社团的限制，也意味着对进入这种行业的限制，因为该社团垄断了马赛港的船舶装卸业务。在旧制度时期，只有行会成员才有权携带特殊的工作用麻袋，在码头上工作的人要是没有这种成员资格标志，就会被处以100里弗尔[(4)]的罚款。这种做法在大革命后失去了法律地位，但依然被严格遵守。实际上，1817年的码头工人社团章程中，有一条就是“只允许加入社团的码头工人有权携带麻袋”（AVM: 1 I 1/35, 1370）。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如果没有码头工人社团的成员资格且身背标示身份的麻袋，是不可能在马赛的码头工作的（Laurent, 1865:2, 548—549）。

比之多数19世纪的互助社团，“圣彼得、圣保罗以及我们的仁慈圣母会”有着更细致的正规组织，事实上也比很多18世纪的行会组织严密。社团拥有一个60人的大议事会（Grand Conseil）来制定整体政策，还有一个12人的小议事会（Petit Conseil）来处理日常事务，例如负责组织圣彼得和圣保罗纪念日的庆祝，包括弥撒、游行和慈善活动，由6名“访病者”（visitors of the sick）和6名“管事人”（prieurs）组成。访病者这种行政工作专事管理社团的优厚福利，包括给病人6法郎周薪、诊费和医药费；对已在码头工作了30年

及以上的工人，每周有5法郎的退休金。这些福利来自成员缴纳的税金，占他们收入的3%。[12] 时至1852年，社团拥有232666法郎的资产，存于不同银行和市政债券里（Nguyen, 1961:14—15）。

管事人负责和码头工作有关的所有社团事务，包括调解不同小组的码头工人间的争执或工人和商人的矛盾，确保各组工人之间不会相互竞争而导致工资降低。最重要的是，他们要确保只有社团成员才能受雇在码头工作。[13] 管事人也要负责一个名为“缪斯”（La Muse）的机构。如有不属于正规小组中的码头工人出现，或某小组在某天没有工作，这些情况就会被报告到“缪斯”，等到有工作的时候再按登记先后上岗。任何不是由正规小组处理的工作都会交由“缪斯”安排。像是卸载谷物等特定类型的工作，所雇用工人的一半都来自“缪斯”（Gontier, 1988:30）。码头工人社团利用“缪斯”来平均分配需要完成的工作，保护成员免遭失业。[14] 此外，管事人们还要负责监管工作的情况和所用的技术。社团坚决反对任何技术创新，甚至在1853年规定正式禁止在所有码头使用轮式运输工具，要求所有负重都必须背在码头工人的背上（ADBdR: XIV M25/1）。通过管事人的管理，社团非但垄断了码头的工作，还决定了完成工作的方式，并执行其自身规范。社团绝对控制了码头上的作业。

由此，码头工人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不但有极高的薪酬，还有其他工人无法媲美的工作保障和运作良好的退休金方案，失业时还有公正的工作分配系统。当局也容许这种精心组织的社团存在。也是经由社团，码头工人自己控制了工作的性质和节奏，确保没有其他人介入他们的工作，以保持高薪酬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们也知道自己拥有的这些优势都能传给自己的儿子。较之其他在马赛或法国的几乎所有的工人，码头工人的环境都相当优越。

## 特权的建立和再生产

在复辟初期，码头工人社团的特权得到了稳固的制度化，转变为可再生产的常规所构成的网络。但特权的再生产并不保证工人能立刻变得富裕。要到1826年到1850年长期的资本主义繁荣出现，加速了

马赛港的运作之后，他们方才真正有利可图。也就是说，码头工人的“黄金时代”源于长期趋势与一系列制度化的常规的特定结合。而正是波旁王朝复辟这一事件，开启了最初的制度化过程。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仅仅几个月后，罗讷河口省省长阿尔贝塔斯侯爵（Marquis d’Albertas）颁布临时法令建立码头工人社团。1817年，马赛市长蒙格朗侯爵（Marquis de Montgrand）正式批准了社团的章程。可惜上述创始性事件的确切动力学仍无法确认，现有史料不能清楚解释阿尔贝塔斯和蒙格朗支持码头工人的原因。当然，对复辟王朝的官员来说，同情旧制度时期的行会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在很多保守派看来，这就是保持下层阶级顺从和规训的方式。但复辟政府的政策旨在保持为经济自由而生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立法，并未大规模重建行会。事实上，马赛的其他行业都没有受到像码头工人那样的待遇，就算在法国其他地方真的有行会，待遇也很少能比得上马赛。无论从国家还是地方的层面来看，码头工人的社团都是一种反常事物。若非当局把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协会当成是某种例外的话，它也不可能认可其章程。

事实上，当1817年蒙格朗侯爵提议官方批准码头工人章程时，接任了阿尔贝塔斯侯爵担任省长的维尔纳夫·巴尔热蒙伯爵（Comte de Villeneuve-Bargement）曾对其合法性发难。蒙格朗侯爵从1814年开始到1830年七月革命后辞去公职之前，一直是码头工人重要的保护人，他这次也消除了省长的疑虑。在1817年9月29日的一封信中，他用相当惊人的措辞强调，即便是在旧制度时期，码头工人社团也不是“有特权的同业公会”，其章程则“单纯是公共利益措施的结果……旨在保持该行业从业人员间必要的秩序”。1817年提出的这些理由所具有的效力与法国大革命之前无异，社团章程依旧是为了保持“对稳定、公共秩序以及商业利益中不可或缺的诚实和真实的原则来说极为有利的纪律。”蒙格朗侯爵还认为，正在草拟的马赛码头工人的章程，与其他现存的、遍布法国城市的“港口和码头”所采用的规则相似。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还设法弄到了一份近期生效的南特地区码头工人章程。可事实上，南特的章程远不具可比性。当地没有建立一个有权限制新人入行或维持码头治安的码头工人社团。而且，南特市长在管理码头工作的章程的前言中说：“据现行法律原则，不可能

给予（码头工人）专属的工作特权。”南特的章程实际上说明了马赛码头工人的社团是何等特殊，即便近期的研究似乎说明港口城市的市政府为码头工作建立规制的做法并不罕见。[15] 最后，蒙格朗侯爵提到，批准这部章程还能额外有利于保持码头工人对新的君主政权的忠诚度。“伯爵先生，此举对当局的好处毋庸多言。从政治上说，这可以保证他们的顺从。毕竟，这个数量极为庞大的人群的一些小过失或小动作，都能在很多情况下引起人的焦虑，那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协会负责人对他们直接采取行动。”（AVM: 1 I 1/35）

但是，这种政治优势实际上是根本问题的附带产物。蒙格朗侯爵暗示，码头工作有着有别于其他行业的特殊的公共性，所以市政当局能接受并认可其章程，以确保其自身运作有序。蒙格朗侯爵从未说清码头工人和其他工人的不同到底在哪里，也许是他们在市政当局控制的户外公共空间工作，而不是在封闭、遵循经营者或企业家的私人规训的私人空间工作。这么看来，码头规章只是简单地扮演了市政当局的监管角色。[16] 但在19世纪，将这种监管权力下放到码头工人组织，使其成为类似旧制度时期行会的半公共机构的做法是很少见的。新旧制度下的码头工人社团，都被期望要承担市政当局的特定公共职能。根据1789年和1817年的章程要求，社团要建立一支由市政当局指挥的紧急消防队（ADBdR: XIV M25/1; AVM: 1 I 1/35）。在18世纪，码头工人同业公会常在市政当局召唤下帮助维持秩序，如1777年路易十六的弟弟的官方访问活动，1781年庆祝王太子（Dauphin）[(5)] 出生的弥撒进行时保卫大教堂门口的活动，1784年热气球升天活动，以及1789年一名包税商（tax farmer）的居所被抢掠之后的安保活动（Zanzi, 1969:30—40）。

在任何情况下，码头工人社团和由其他工人群体的组织，无论是在马赛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有不同的待遇。其他组织即便为入行设限、控制工作的性质和节奏、保持工资水平，都是暗中进行的。蒙格朗侯爵批准了码头工人社团的章程，在省长面前为其辩护，且深入参与其日常行政事务中（包括介入有关工作、罚款和驱逐的纠纷）。[17] 蒙格朗侯爵在任期间，似乎把码头工人社团基本等同于市政府的辅助性分支机构，并将其置于持续且仁慈的监督下。就像维尔纳夫·巴尔热蒙伯

爵所怀疑的那样，蒙格朗侯爵的行动无疑违反了法律的精神和条款，可最终我们也无法得知他为何对码头工人抱有如此好感，但码头工人确实在他的保护下获益颇丰。

市政当局的一贯支持，促使码头工人社团稳固（也基本上是合法地）了自己在滨海区的地位。码头工人社团的机构运作在19世纪20年代似乎非常有效，这似乎可与其黄金时代（19世纪四五十年代）相提并论。尽管在19世纪一二十年代，码头工人和其他运输工人的纠纷看似比后来几十年要多，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应对了所有挑战，并保持了垄断。虽说无法查到有关前几十年的工资的可信数据，但现有史料表明，码头工人的计件工资在19世纪头10年和19世纪中期的实际差别不大。[18] 19世纪20年代初的婚姻登记处数据显示，从当时到19世纪中期，码头工人这一职业的子承父业率几乎维持在同样的高数字。在1821年或1822年结婚的码头工人里，有73%子承父业；到了19世纪中期，这种继承率仍是城市中所有职业里最高的。综上，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码头工人对自己行业控制的稳固程度几无变化。

但即便有了所有这些优势，19世纪头10年晚期到20年代码头工人取得的成功，似乎还是远远无法与其后几十年相比。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由于海上战争和封锁，港口货运量所剩无几，码头工人数量也随之骤减。即便海洋贸易在19世纪20年代复苏，他们的情况也基本没有好转。直到1826年至1850年期间，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同时经历了较长的资本主义上升期，才使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繁荣成为可能。1821年至1851年间，马赛的人口几乎翻番，但港口货运量超过之前的两倍，当然由于估算方法的不同，精确数据有所差异。[19] 从图9.1我们能看到港口货运量的惊人增长。19世纪40年代晚期的危机到来前，这种引人瞩目的增长源自多个因素，包括没有出现大范围欧洲战争、全球贸易扩张，马赛、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工业的发展，以及马赛到法国内陆的交通的改善。[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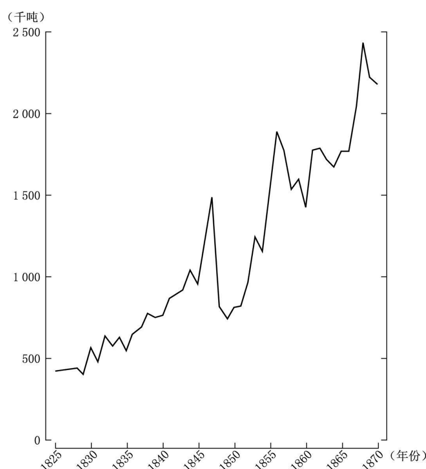



图9.1　进入马赛港的船只的载货量（1825—1870年）

图片来自William H.Sewell, Jr., *Structure and Mobility: The Men and Women of Marseille, 182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有人可能会猜测，港口活动的快速增长，会带来码头工人规模的对等增长。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虽说没有19世纪中期之前马赛雇用的码头工人数量的可信数据，但能从码头工人某一年结婚的人数中粗略估计出劳动力规模的变化。 [21] 1821年和1822年的结婚人数平均数是每年39名，1846年和1851年平均数是每年37名，基本保持不变。所以，在一个需要完成的劳动量大约翻倍的情况下，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码头工人的数量似乎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些数据表明了码头工人劳动力市场变化剧烈。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这一变化应该导致其工资率的急剧提高。然而，公认是单薄的证据说明了这一时期码头工人的计件工资并未出现骤增的情况。现有的证据表明了一种相当不同的发展，它实际上对码头工人同样是有利的。

所有报告都表明，在19世纪40年代，马赛码头工人在严守社团准入标准、严控码头工作的情况下，也能够应付进入港口的货物总量。这意味着，在之前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定有不少怠工的情况，因为一样的人手在当时只要处理一半的工作量。如果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都属普遍现象，那么持续商业扩张对马赛码头工人的主要影响，就不是提高工资率，而是提高就业水平，

包括增加劳动时间或强度，或者两种手段并行。因为码头工人的计件工资是不变的，上述就业水平中的任一增长本应都能造成他们收入的相应上涨。尽管能解答这个问题的史料极为稀缺和间接，但多数证据都与同样规模的劳动力在这一时期就业水平大幅增高的假设相符。

第一条看起来不够决定性的史料具有文学性质。它来自一名1806年出生在马赛平民区的、普罗旺斯歌谣（Provençal songs）的作家和演唱家维克托·热吕（Victor Gelu）的回忆。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还是个年轻人的热吕和很多年轻的工人朋友共度了不少闲暇时光。码头工人在他的酒友里数量较大。热吕会漫步到他自己社区的理发店找乐子，这家理发店后室聚集了很多谈天、饮酒和赌博的年轻人。不出意外，他总能在这里碰到不少暂时没工作的码头工人。拿热吕的话来说，这家理发店里的码头工人太多，使之“几乎要成为‘缪斯’的一个分支机构”（Gelu, 1971:143）。热吕的描述似乎说明，失业对码头工人来说，起码对19世纪20年代年轻的码头工人来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第二条史料是关于处理码头上的纷争的方式。它有一定的暗示性，但并不比第一条更有决定性。码头似乎在19世纪头10年晚期和20年代早期出现了最多的纠纷。依据我们对这些纠纷极为有限的了解，它们常常以某种方式与失业问题相关。1819年和1821年，码头工人对水手卸货一事提出抗议，以为这剥夺了他们的工作机会。1824年，在“缪斯”注册过的码头工人向管事人抱怨，认为有些工头绕过了“缪斯”，擅自找了新人上工。码头工人和街边临时工（robeirols）在那段时间里也有纠纷。所谓临时工，就是在街角候着活儿的人，随时准备接手被分配到的运送任务（Nguyen, 1961:19—22; AVM: 1 I 1/36）。要区分街边临时工和码头工人很容易，因为前者是用背上的篮子装货的。[22] 这种19世纪20年代常有的关于就业的纠纷模式，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没有发生过。这和早先失业率高、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步充分就业的假设吻合。有人也许会设想另一种模式：对码头工人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主要由工资率的变化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失业率较高时，工人在劳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并因此相对沉默；而随着工人的稀缺性日益增加，他们在越来越多涉及收入水

平的争端中取得优势。

在我看来，第三条史料多少要比前两条更有决定性。它关注的是在其他重型运输业中受雇的工人人数变化。尽管在婚姻登记处的数据中的码头工人数量保持稳定，但自称是“货夫”（carters）或“装货工人”（loaders）的男性的数量增加极为显著，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大约每年15人，发展到19世纪中期的每年53人。要是把这两个货夫和装货工人的数字，分别与19世纪20年代早期的每年39个与19世纪中期的每年37个码头工人的数字相加，运输工人整体的结婚人数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的每年54人，增加到50年代的每年90人。这虽然和港口运输的骤增量比起来略少，但相差不算太远（见表9.1）。这些数字似乎说明，有特权的码头工人和明显没有特权的货夫和装货工人间的劳动分工发生了重要变化。[23]

表9.1　运输工结婚的人数

| | 1821 1822年 | 1846 1851年 | 1869年 | 1821 1822年到1846 1851年的增幅 | 1846 1851年到1869年的增幅 |
|---|---|---|---|---|---|
| 每年结婚的码头工人人数 | 39 | 37 | 49 | −6% | +32% |
| 每年结婚的其他运输工人数 | 15 | 53 | 78 | +253% | +47% |
| 总计 | 54 | 90 | 127 | +67% | +41% |

我无法找到运输行业中劳动分工的直接证据，但有两个假设对此有所说明：一个是关于码头工人工作的变化，一个是货夫和装货工人工作的变化。根据第一个假设，码头工人可能在19世纪20年代时，就已经通过参与其他按日计算的拖运和搬运工作，得到了装卸船舶货物之外的收入。所以，当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港口运输日益繁荣时，他们就能专注于高收入的装卸货物的工作，把获利较少的搬运工作留给货夫和装货工人。第二个假设则指出，即便是在19世纪20年代，码头工人也没有参与其他运输工作，但随着卸载货物的数量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增加，他们想到了雇用货夫和装货工人作为辅助性工人的办法。在码头工人社团严密监管和控制下，他们想方设法雇用他们作为码头上的辅助性工人，在货物刚刚被码头工人从船上卸载下来

后，让他们把货物运输到仓库或码头上的不同位置，或是城市中其他地方的仓库。[24] 这种安排可以在不放弃码头工人对货物装卸的垄断的前提下，利用货夫和装货工人这两类廉价劳动力。1853年，码头工人社团禁止在码头使用轮式运输工具，这意味着类似的试验正在进行。不论是两种变化中的任意一个，还是两种变化的结合，都会与定量数据相一致。由此表明，随着港口运输量增加，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码头工人都会在关乎装卸船只的实际工作上确立更为明确的活动边界，把自己的工作和其他运输工人的工作区分开来。[25]

从这些现有的史料来看，在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尽管制度延续不变，但码头工人的真实境况有了显著改善。19世纪20年代时码头工人社团的管理细致程度和50年代相当，对码头工作的垄断也有同样的强制力，而且码头工人也一样有能力把自己的职业传给他们的儿子。但是，19世纪20年代的这些特权对应的经济利益远少于19世纪40年代。在19世纪20年代，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是流行现象。只要有工开，他们的工资都很高，但没工可开的情况也很常见。所以，码头工人在地方小酒馆和咖啡馆里靠喝酒打牌耗费着大量的白日光阴，也可能从事一些低收入的工作，如被分配到拖运和搬运的活计，勉强糊口。当码头上的工作紧俏时，码头工人之间、码头工人和水手之间、码头工人和街边临时工之间，都存在着分配工作的冲突。在19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的早期，码头工人的良好收入绝不会让他们感到绝望或陷入贫困，他们还能通过临时的日工增收；但他们绝没有19世纪中期那样富裕。

## 码头工人特权的生态

19世纪40年代，有些著名的马赛人开始谴责码头工人社团限制性的做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朱尔·朱利昂（Jules Julliany），他是七月王朝时市长的首席助理（premier adjoint），也是一本关于城市商业的大型概要的作者。他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文章中建议城市的商人行动起来，直接无视码头工人社团的章程，自行选择雇用其他工人，从而摆脱“这种拖累马赛商业活动的垄断”。朱利昂说，此举可能会遇到

码头工人社团的暴力抵制，但商人选择的工人要是“遇到了麻烦或威胁，司法机关一定能拘捕或惩处让他们自己发动袭击或威胁的罪魁祸首，必要时军方也会予以协助”（1842:3， 455）。朱利昂所言不假，如果要求国家出面，那么它必然是支持商人的，并会用武力打破码头工人的垄断，因为码头工人社团的限制性做法，是对刑法和《勒沙普利耶法》明目张胆的寻衅。而且，码头工作并不需要长期培训，城市里总有不少收入低下和不充分就业的人，尤其是意大利移民，这些人都能被雇来装货，报酬能比码头工人社团所保持的工资率低得多。可商人们并未理会朱利昂的建议，继续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社团的严苛章程，并向他们支付高额工资。素以精明著称的马赛商人，何故屈服于这种看似破费的垄断，似乎让人有些费解。尤其，当长期保护码头工人的市长在19世纪30年代辞了职，七月王朝的官员们又大声疾呼自由放任的好处时，他们仍不为所动。

我们当然有理由确信，商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要解释他们对码头工人社团的容忍，我们得更近距离地观察这种组织的生态和码头工作的每日常规。装载货物由码头工人的小组来完成，每个小组通常由十到二十人组成，归一个工头领导（见图9.2）。工头不是由码头工人社团指定的，而是由将要装载的货物的物主，即商人选的。[26] 工头就是商人在码头的代表。他雇用、组织和监督整个工人的团队，给他们发工资，还要处理有时甚为复杂繁琐的清关手续。[27] 传统上，包括工头在内，每个码头工人都会在工作完成时获得等额的劳务分配。然而，工头可以同时为不止一个商人打工，可能同时管理多个团队，也能从商人那里拿到各种奖金和打赏（Nguyen， 1961:38）。不少码头工人的工头确实成了有钱人，一百人中约有二十人的资产达到了成为1844年七月王朝选民所需的标准（Nguyen， 1961:40）。但码头工人社团对工头和专事劳作的工人一视同仁，他们的岗位并不与特权挂钩，在会员的税金、会费、义务和优待上完全一样。工头在社团官员中的占比较高，但他们从不垄断官职，并且只有极少普通工人投诉过他们有过不公正处置的情况。很可惜，有关工头和工人之间关系的资料很少，但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码头工人的团队似乎在工作中确实非常和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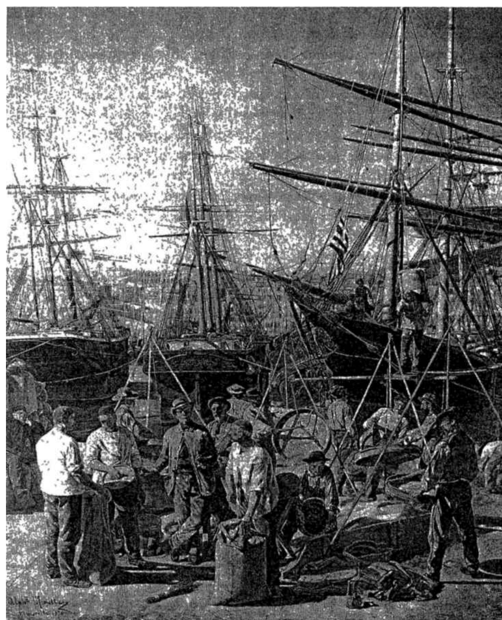


图9.2　1876年，一队码头工人正在旧港口卸载谷物

工头交叉着腿，站在人群中间，叼着烟斗。在旧港口卸载谷物的工作继续由以传统方式组织的码头工人队伍完成，这种传统的运作方式甚至保持到了码头工人社团的整体垄断被打破了的19世纪70年代。阿方斯·穆特（Alfonse Moutte）《纽敷河岸边卸小麦》（“Débarquement de blé sure le quai de Rive-Neuve”），收藏于旧马赛博物馆（Musée de Vieux-Marseille）。

工头及其团队由要处理货物的商人直接雇用。19世纪中期马赛商人的生意方式和在17世纪或18世纪并无二致。在通常情况下，一艘商船的每一次航行都是由不同商人群体资助的。合伙人包括商船的船长、持有货物的商人，可能还包括一位银行家和独立资本家。等商船回来，各方损益分摊，尔后拆伙，并在未来成立新的、通常也是不同的合作关系。某个商人可能会同时参与几单不同的投资，可能在两周的时间里有三到四艘船到港，而在之后的一个月全无生意。[28] 所以，商人对劳工的需求极为零散。有需要的时候，他得能雇到一队工人，还得确保工人在最少监管的情况下高效又可靠地工作。商人并没有选择雇用助手来监督装卸货物的操作，而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依靠码头工人的工头及其团队掌管整个作业。码头工人社团要确保码头上的工作负责且有序，要调停任何可能的冲突，有需要的时候从“缪斯”那里

调用额外的工人，并整体监督船舶的货物装卸。由此看来，付给码头工人更高的工资似乎是值得的。当商人雇用一队码头工人时，他获得的远不止是强壮的劳力；实际上，他也确实把一部分码头上的管理工作外包或转包给工头及码头工人社团。

由此，支付给码头工人的高工资，不仅能买到体力劳动力和管理服务，还能买到另一件东西：货物的安全。码头工人社团能保证工人诚信，并能有效管理码头。对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的码头来说，偷盗都是一种长期隐患。19世纪马赛港的天然情况，为预防偷盗提出了格外多的难题。马赛港池有一个长方形的入口，被南北两边陡峭的山坡包围。马赛老城直接建在港口北部的山坡上。至17世纪末，城市从各个方向包围了港口。老城的居民区到港口的北部之间的地区人口稠密、错综复杂、贫穷危险，并和码头连接在一起（见图9.3）。[29] 即便在18世纪，狭窄的码头都显得逼仄，到了19世纪海洋贸易爆炸性增长的时候，更是显得十分碍事。在上述条件下，一名不诚实的码头工人可以夹带着昂贵的货物，瞬间在老城里消失无踪。[30] 由被转运的货物需要被送往城市各处的仓库，这种危险就成倍增加了。所以，对商人来说，码头工人的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商业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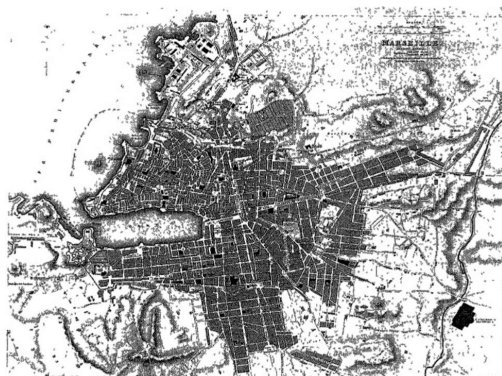


图9.3　1837年的马赛

由扩展有用知识社团出版（Society of Diffusion Useful Knowledge）。

码头工人社团则确保了成员的诚信，这不仅是因为其讲究纪律和秩序的总基调，也是因为其特殊的规章制度。码头工人社团的章程规

定，被法院判定犯有偷窃罪的码头工人会被逐出社团，并由此被逐出码头。此外，社团还建立了自己的诉讼程序，在管事人指控工人“允许自己卑劣地挪用、隐藏或持有部分商品”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信任”时予以处理。如果受到指控的码头工人被社团大议事会判定有罪，他就会被逐出社团，大议事会的审议结果将被送到市政厅（Hôtel de Ville），此人被开除的事情“就人尽皆知了”。此举让社团确保自身和码头都能远离不诚实的码头工人，被偷走货物的商人也就不必向法院提交诉状。[31] 极为敏锐的商人为了对抗潜在又无法控制的盗窃，选择支付由码头工人社团所指定的高工资来寻求保护。

由此，码头工人社团成了19世纪中期马赛海洋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社团与马赛的商人共同体协同成长，只要马赛的整个商业组织结构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双方的关系就能构成一种互惠的生态。即便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商业繁荣大幅增加了对码头工人劳动力的需求，码头工人和商人间的已有关系也未受影响。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与消除码头工人不规律就业、将其他装货和运输的工作转给非技术性的货夫、装货工人和街边临时工相结合，共同致使码头工人计件工资的价位并未遇到上涨的推力。码头工人的收入确实大大增加了，但是对商人来说，他们雇用一队码头工人干一天的活，所需的开支在19世纪20年代、40年代或50年代基本一致。因此，码头工人得以在海洋贸易兴盛之时获利颇丰，且不会减少他们的雇主和商人的收益。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码头和海洋贸易开始出现重大转型之前，不管是商人还是市政当局，都毫无理由去挑战码头工人社团的权力。社团减轻了商人对装卸操作的监管责任，让货物免受可能在滨海区出现的猖獗偷盗的威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团成员财富的增加也并未提高商人的开支。于是，在那段时间里，码头工人在一个受保护的小生境里稳定而富庶地存在着。

## 码头转型

商业扩张即便没有对马赛码头传统的运作方式造成直接挑战，也还是很快就让旧港口的空间容量捉襟见肘。港口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

过分拥挤，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就更趋严峻。为此，港口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如铲平沿着港口北缘的建筑以扩大码头的占地面积，以及疏浚港口的东南角，另增二三十个货船的泊位。但即便有了这些改进，码头还是只有3200米宽，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也只有7000到8000艘船的年吞吐量。反观马赛港在法国主要的竞争对手勒阿佛尔，它有长达5920米的码头，但年吞吐量不足5000艘船（Masson, 1922:429—433，437）。小规模改善显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码头货运量的增速远远高于可用空间扩大的速度。蒸汽船在19世纪30年代的出现后，进一步恶化了码头拥挤的情况，这是因为蒸汽船体量远远大于帆船，旧港口的尺寸难以容纳。

对马赛而言，港口泊位的日益紧张无疑是个问题，但这不仅仅是马赛的问题。马赛是法国最忙碌的港口，也由此成为全法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据点。马赛海洋货运吞吐量的增长放缓，会反作用于法国很多的贸易和产业，这让资本家和国家都始料未及。在这一点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性向马赛的码头施加了清楚而直接的影响。马赛港显然迫切需要一个规模不小于旧港口的新港池。但马赛既有的地理条件，意味着这将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建造项目，大卫·哈维（1982）称之为“空间修复”（spatial fix）。其所需的固定资本投资，远超马赛市政当局或商人共同所能提供的资源数量。旧港口是马赛海岸线上唯一有着抵御风暴的天然屏障、良好的海岸通道和足够的水深的地方，这些对良港而言都是必要的。旧港口北部和西南部的海岸线都是陡峭的、参差不齐的岩石，这让重建的难度和开支都面临严峻处境（见图9.3）。

新港池的建造有赖于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复杂合作。1835年，马赛的商会（商人共同体的机关）开始考虑扩建港口，草拟了一系列不同的计划。次年，作为国家土木工程机构的路桥团（Corps des Ponts-et-Chaussées）在马赛的主管正式接手了这个项目。但直到1844年，总部在巴黎的路桥总议事会才正式批准了在旧港口北面建设新港池的计划。在众院立即通过了一部法律为其提供资金后，项目便在同年晚些时候开始了。1847年，新港池就已经可以交付部分使用了。当时，它被装载着小麦的船只塞满，这些小麦要被运往法国各地的谷仓，后

者因为前一年粮食歉收早就空空如也。但港池完全建成则要到1853年。早在1848年，路桥团在马赛的主管就已认定进一步向北部扩建码头的必要性（Masson，1922:441—447）。但因为1848年革命及其带来的金融破产和港口货运量的减少，扩建计划又被中断。不过，至1852年，海上贸易恢复到了1848年之前的增长速度，这种贸易扩张还持续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见图9.1）。1856年，三个连成串的新港池开始建设，沿着海岸线向北延伸（新旧港池可以在图9.4的1874年马赛平面图中清楚看到）。这些新港池的建设计划雄心勃勃，由公共和私人渠道联合提供经费支持。法国政府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了必要的突堤（jetty）和防波堤（breakwater）的建设。但为了给码头建设注资，国家将土地划拨给城市，城市又转手把土地卖给了由两名巴黎大银行家建立的两家合股公司，即马赛码头仓库公司（the Compagnie des Docks et Entrepôts de Marseille）和马赛港口公司（the Société des Ports de Marseille）。[32] 正是这两家合股公司承担了码头、必需的铁路网络、储存待运货物的仓库新码头综合区的管理办公室的建设，以及附近不动产的开发和销售（Masson，1922:452—453; Girard, 1961）。




图9.4　1874年的马赛

获得马赛商业和工业部档案馆（the Archives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e Marseille）许可。

1853年建成的港池并没有对码头工作的组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在旧港口施用的系统被简单地照搬到了新港口。但从1856年起新建设的港池的情况有所不同。建立和管理的码头的马赛码头仓库公司，彻底改革了处置货物的方法（Masson, 1922, 9:450—452; Girard, 1961; Nguyen, 1961:79; Gontier, 1988）。第一，新码头被叫作英国码头（dock à l'anglais），这意味着它引入了英国码头所使用的节省劳力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是蒸汽驱动的水力起重机和升降机；第二，码头与老城的工人阶级社区在空间上被隔开；第三，所有需要转运的货物都被集中到新港池的仓库，而不是散存于城市的各个角落；第四，码头工人不再以小组的形式为有卸货需要的商人工作，而是必须成为马赛码头仓库公司的雇员。工作不再由工头和码头工人社团组织和监管，而是由公司雇员来完成。很明显，这种对码头工作的空间和组织的重新安排，会彻底地破坏令码头工人社团的特权得以存续的生态和制度条件。

码头工人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在1858年得知，一旦尚未完工的码头开始试运行，所有蒸汽船就都会被要求停泊于此。由于这条规定会让快速增长的蒸汽船贸易游离于码头工人社团的控制之外，社团便派代表前往公司、市长和省长那里进行抗议。1859年1月，码头工人社团甚至谒见了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对他们的诉求予以含糊的允诺，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但最终食言）："诸位先生，你们来找我是做对了。我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你们的利益做一切事情。"（ADBdR: XIV M25/1）当码头在1859年夏天开始试运行时，有些码头工人转而为公司工作了。社团禁止其成员这样做，并把所有为公司工作的工人都除名。换言之，社团此举是为了避免劳动力流向公司，要求码头工人和过去一样只为雇用他们的商人处理货物，而非成为公司雇员。当时，公司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经济地位，便协商出一个妥协方案，允许社团成员在不必成为公司雇员的情况下接手一些工作（Nguyen, 1961:81）。但双方都知道，这只是长期斗争中的短暂止戈，等到新码头在1864年完全投入使用后，才是真正一决雌雄的时刻。

码头工人社团在和公司的长期对峙中尽力培植舆论。在一份送往工业和商业部的请愿中，社团得到850名商人的签名，获得了是马赛

商人共同体的堡垒——商会的支持（Nguyen，1961:83）。当码头公司提供的报价远低于码头工人社团时，社团还是令人惊讶地成功获得了商人共同体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支持来源于商人和码头工人之间、尤其是和工头之间的长期联系。比如，在一份1859年写给马赛商人的备忘录里，码头工人社团大肆宣扬商人和“他们的”码头工人间存在的“信任”和“忠诚”之类的父子关系（ADBdR：XIV M25/1）。可商人也有怨言。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赛的海洋商业被彻底重建（Sewell，1985b:38—43；Cornu，1974，1999），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蒸汽航船和合股蒸汽船公司的兴起。在1840年，蒸汽船载货量只占进入马赛港货物总量的10%，1850年达到了14%，1860年达到了32%，1870年则达到了44%（Masson，1922:56，74）。早些时候，蒸汽船多为个体或一群合伙人所有，但小型运营商很快被大型合股蒸汽船公司推到一边。1852年到1865年间，四家公司逐渐主导了马赛港的蒸汽船运输，分别是帝国运输（the Messageries Impériales）、蒸汽船海运总公司（the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Transports Maritimes à Vapeur）、马赛蒸汽船航运公司（the Compagnie Marseillaise de Navigation à Vapeur）和联合航运公司（the Compagnie de Navigation Mixte）。时至1869年，四家公司控制了马赛将近90%的蒸汽船运输量。这四家公司中，只有马赛蒸汽船航运公司是由本地资本控制的，另外三家公司的资本主要来自巴黎和里昂（Masson，1922:67—76）。蒸汽船公司的兴起扰乱了传统的商业组织方式。商人们不再为单次航行形成短期的合作关系，而是越来越多地与官僚化的大型航运公司打交道。此外，这些蒸汽船公司和码头公司还一起与传统商人共同体及其机构（即商会）的力量展开竞争。长久以来，马赛的商人都是主宰城市里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力量，但他们的角色很快被“外来”资本取代。1863年，一位知名的旧式商业家族的继承者说道，“马赛似乎不再属于她自己”（Guiral，1957:174）。在如此环境下，码头工人与码头公司的斗争可以被看成是一场对抗外资主导的战役。就这一点而言，这获得了商人和商会的支持。

码头工人与公司的斗争，既强化了商人和码头工人之间的联系，也逐渐打开了工头和普通码头工人之间的裂口。在新码头启用后，工头的处境受到了最大的威胁。普通码头工人面对的是集体自治程度的

日渐降低和收入的缩水，但码头工人的工头面临的则是他们特定功能和地位将要消失的危险。由此，工头愿意采取激烈的姿态，以获得商人的支持。1859年，他们提出了降低10%的计件工资的方案，而这减少的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收益，并不减少支付给码头工人的工资（ADBdR: XIV M25/1）。可早在1859年，有些普通的码头工人就认为公司必将胜利，并希望和公司谈判，而非完全拒绝在码头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1859年8月最早签署协议在码头工作的37名工人就是很有意思的群体。此前，雇用他们的不是商人，而是“帝国运输”这家蒸汽船公司。换言之，他们早已和新的官僚资本主义秩序和平共处。不久后，另外290名工人与码头签署了协议，而他们也都被码头工人社团驱逐（ADBdR: XIV M25/1）。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坚持拒绝与公司合作的一直都是工头；相反，在条款足够有利的情况下，的确会有工人愿意接受在码头工作。

1864年夏天起，码头开始全面运作。码头公司此时再度强调，只有码头的雇员才能参与装卸工作，码头工人社团也同时再度拒绝在公司提出的条件下工作。这一次，公司已准备就绪，只用非技术劳工来完成码头上的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意大利移民，并向商人提出了更低的报价，这个低价是码头工人社团所无法提供的。又一次，一批工人违抗了社团的规定，接手公司的工作，并毫无悬念地被社团驱逐。他们提起诉讼，指控社团无权因行使在任何他们想要工作的地方工作的自由而驱逐他们。一如大约二十年前朱利昂的预言，法院站在被驱逐工人的立场上作出裁决，对社团的权力施以毁灭性打击。在这个决定下达后不久，法国皇帝途经马赛，受到大约5000名码头工人及其支持者的游行欢迎。一名社团中的管事人向皇帝致辞，提醒他在1859年给出过的承诺，并在他演讲的最后大喊“吾皇万岁”。路易·波拿巴再度允诺跟进此事。又过了几个月，同一名管事人前往巴黎协商，寻求解决办法，但社团完全无法接受他带回马赛的提案，并导致双方最终反目（Nguyen, 1961:363—369）。

码头工人的斗争以码头公司的胜利告终。多数社团成员最终选择为公司工作，社团则被剥夺了垄断权，逐渐转变为普通的互济会，专事病患和退休福利事宜。商人们虽然更偏向码头工人社团，但也很快

选择了向公司示好。最终，公司提供了社团在过去所能提供的一切：配备工人，有组织和监督码头工作、确保仓库安全高效，保护商人的货物免遭偷盗损失。当然，最后的这项工作已经变得极为简单了，因为这时新港口和旧城市的社区已在空间上相互隔绝。此外，公司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价格，远远低于旧的码头工人的劳务价格表。商人也逐渐抛弃与信任的码头工头的父子式的关系，被迫适应新公司的官僚主义。不过，商人在海洋贸易中的特权和有利可图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这点和码头工人不同。马赛的码头出现了一个新型资本主义组织，意味着商人的工作会有新的基调和特点，也意味着他们在城市海洋经济中无可非议的最高地位也从此消解。而这对码头工人来说意味着更多改变，他们永远失去了曾珍视的社团特权，其成员沦为普通的雇佣劳工。

不均衡的资本主义发展，让码头工人得以在19世纪上半叶造设和保卫一个有特权的小生境，又在19世纪60年代将之瓦解。法国、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导致马赛的海洋贸易在19世纪剧烈扩张。在这几十年里，这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进步，并没有让码头工作的方式随之进步。相反，它实际上强化了一种古老的劳工组织形式——码头工人社团，也就是旧制度时期行会系统的实际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所有资本主义发展特点的不均衡性，也引发了一种混合发展，也就是古老形式在与一个先进行业的共生关系里得到强化。然而，持续资本主义发展的迫切需要，即对港口空间越来越大的需求，最终破坏了这一古老的形式，终结了码头工人的短暂的优势地位。马赛码头工人是一个特例，但它符合一个非常普遍的模式：资本主义发展内在且无法避免的不均衡性，为在特定发展阶段中处于有利位置的工人恣意创造了特权的小生境，但它也同样恣意摧毁了其在早期阶段创造出的同一个特权小生境。

## 码头工人的政治

乍一看，码头工人的经济荣衰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在19世纪三次重大的革命性危机中（1830年至1834年，1848年至1851年，以

及1870年至1871年），码头工人的角色似乎都似乎与自身经济环境的演进惊人一致。在19世纪中期以前第一次危机发生时，码头工人的强势和富裕尚未到来，他们似乎是激进的，起码在政治上是难以驾驭的。至19世纪中期，他们的特权达到至高点，但却是声名狼藉的反动派。到了马赛公社时期，他们的社团已被粉碎，彻底沦为无产阶级，这时的他们似乎是热心革命的。

从1830年的七月革命引发危机开始，一直到1834年4月里昂和巴黎的工人起义被镇压为止，马赛一直都不是一个主要的激进运动中心。实际上，七月王朝新上任的地方官员，起初并不关注骚动的共和情绪，而是担心支持被废黜的波旁王朝的群众起义。到了1833年，革命性的人权社（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的分会在马赛建立，导致警方在其中安插线人。1834年4月，里昂和巴黎发生叛乱时，马赛的社团考虑发动一场自己的起义。据线人情报，对暴力行动最热心的倡导者中，有三名码头工人，他们声称自己在叛乱中能“随意领导起码200名同行”。这种声称或许言过其实，不过由于人权社最终决定按兵不动，我们也无从得知实情了。但这说明，码头工人中已经有一小批人受到当时激进情绪的影响（ADBdR: M6/334）。

其后15年间，码头工人日益增加的财富似乎扫走了他们所有的激进主义残余。1848年2月，当共和国推翻七月王朝后，所有码头工人将参加激进叛乱的说法都会被当成无稽之谈，所有的政治派别都认为码头工人是无可动摇的保守派。这种假设能解释前王朝的市长在任期末对待他们的特定方式。2月24日，巴黎起义的新闻到达马赛，但巴黎临时政府派来的专员要到3月1日才抵达马赛并建立共和政权。在此期间，市长做了一切他认为能强化保守派力量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召集已瓦解政权的支持者，并把他们组建成国民卫队的连队，并把城市里所有可用的枪支分给了他们。由这场动员建立的连队几乎都以商人、专业人士、店主和职员为主体，码头工人也被武装到个人，并获许建立由他们组成的特殊连队。这同其他工人的境况对比极为鲜明。可当他们到达市政厅加入国民卫队时，获知已经没有可用的武器了。诚如一位共和激进分子的记述：“（当局）甚至无意掩饰一个想法，认为作为由商人庇护的封臣的、来自人民的码头工人，一旦得到允

许，就会为国服役，打击另一群人民，也就是名号令人闻之丧胆的工人。”（Dubosc，1848:5）[33] 1848年，保守派和革命派一致认为码头工人可以用来充当一种对抗革命的力量。

但码头工人的保守主义没熬过19世纪60年代的打击。在从特权精英沦落为普通无产阶级的过程，致使他们严重抵触取代了第二共和国的帝国政权，尤其是皇帝，他在他们和码头公司的对抗中失信了两次，只给予了他们含糊而空洞的愿意提供帮助的允诺。故此，1870年7月，即帝国被推翻、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两个月，码头工人醒目地出现在马赛共和派的游行队伍中就丝毫不让人奇怪了。1871年马赛公社中有几个很活跃的码头工人也同样不足为奇。其中有个老艾蒂安（Etienne père）是马赛公社的二号人物，在马赛公社被镇压后被判处死刑，尽管随后又被减刑（Nguyen，1962:376—380）。[34] 码头工人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由此变得直接：如果说码头工人从崛起到繁荣的过程让他们在1848年变得保守，那么在马赛公社时期，他们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程使他们转向政治激进主义。

然而，更进一步观察会发现，这种在经济趋势和政治行为间建立紧密联系的做法是有严重瑕疵的。码头工人的确在1848年2月是坚定的保守派，并到了1871年成为革命者的典范。但是，他们政治上的左转，似乎是从第二共和国时期开始的，这比他们失去经济优势要早几年。关于这种转向的论据分散且不完整，也非全然有决定性，但貌似都指向了一种整体左转的趋势：1848年春天时犹豫不决地出现，1849年开始加速，维持到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并在此后延续。这种趋势出现的第一个标志是1848年6月，激进的马赛工人与极为著名的巴黎六月事件（June Days）同时发生叛乱。就像我们看到的，码头工人最初成为国民卫队的连队时，将之作为反动的堡垒，但在发现自己可能被迫向自己的工人同胞们开枪时，码头工人拒绝了指令（Dubosc，1848:48）。一年后，有迹象显示码头工人转向了一种更严重的反叛立场。1849年6月，大约五百名码头工人组织了一场宴会，以纪念码头工人路易·阿斯图安（Louis Astouin），他写过一本广受赞誉的诗集，并刚刚在竞选国民议会民主派议员时落败。宴会在人群“民主社会共和国万岁！”（Vil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的高呼声中结束。活动筹集了大约一百十四法郎，分给在六月事件中牵头的、尚被拘役的起义者的家庭。[35] 我们很难想象上述任一行动会在第二共和国早期出现。

码头工人在1848年革命后十年参与革命活动的数据虽不多，但十分有趣。这些数据似乎说明，出现在1848年和1849年的左转趋势，没有因为第二共和国最后几年施行的镇压而放缓，也没有被路易·波拿巴建立的警察国家的萌芽影响（见表9.2）。在因参与1848年6月马赛起义而被定罪的270人里，只有3人是码头工人。所以，码头工人占叛乱者的1.1%，占男性成年人口的2.9%。或许码头工人不愿向其他工人开火，但其中也不乏愿意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在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围捕的297名激进分子中，有6名码头工人，占比2%。这个数字还是低于码头工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但比1848年的比例翻了一倍。当警察在1853年、1855年和1858年开始制定“危险分子”名单（也就是发生叛乱时会被围捕的人员名单）时，总共346个名字中有18个是码头工人，占比5.2%，远高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同期更显著的变化可以从被判犯有政治罪行的人的身份中看出。这些罪行相当广泛，最常见的是对警察或其他权威采取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动、参与秘密革命团体、演唱颠覆性歌曲，或在街上发出“煽动性的叫喊”。在1848年和1849年，有20人被判犯下此类罪行，其中没有一个是码头工人。在1850年和1851年，有51人被判定有罪，其中有2个码头工人，这一比例已经略高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在第二帝国的头八年，有85人被判定有政治罪行，其中8个是码头工人，这个比例大约是他们在人口中比例的三倍。这些数字显然不足以衡量码头工人整体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但它们基本证实了码头工人在1848年后的几年中转向了左倾。

表9.2　激进政治事件中码头工人的参与率

| | 1<br>码头工人参与者/全部参与者 | 2<br>码头工人占参与者的比例(%) | 3<br>码头工人在所有劳动力中的比例(%) | 4<br>码头工人参与率(2/3) |
|---|---|---|---|---|
| 1848 年起义 | 3/270 | 1.1 | 2.9 | 0.4 |
| 1851 年政变 | 6/297 | 2.0 | 2.9 | 0.7 |
| 1853　1859 年“危险分子” | 18/346 | 5.2 | 2.9 | 1.8 |
| 各种政治犯罪(1848　1849 年) | 0/20 | 0.0 | 2.9 | 0.0 |
| 各种政治犯罪(1850　1851 年) | 2/51 | 3.9 | 2.9 | 1.3 |
| 各种政治犯罪(1852　1859 年) | 8/85 | 9.4 | 2.9 | 3.2 |

最后还有一条证据能表明码头工人在1848年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转向左派，尽管它同样算不上决定性的史料。这条证据来自杰出的巴黎社会调查员阿尔芒·奥迪冈（Armand Audiganne）于1855年发表的不朽巨作《法国的劳动人民和工业》（*Les populations ouvrières et les industries de la France*）中的一句话。他说，1848年发生在马赛的革命运动，“首先得到了码头工人社团的支持，他们以性情暴烈闻名”（Audiganne 1860:2, 154）。他之所以会得出这个显然不正确的结论，似乎可以解释为他在1852年或1853年访问了马赛，并将当时码头工人表露无遗的激进主义，投射到先前民主派和反动派都认为码头工人是现行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坚定支持者的时代。

所有这些证据指出，码头工人的政治理念和行为在1848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出现了重大的激进转向，这在时间上早于使码头工人沦为无产阶级的工作的激烈重构。因此，这似乎表明，我们不能单纯把码头工人的政治变迁解释成是无产阶级化的简单反映。恰恰相反，在1848年革命后的十年中，码头工人激进主义看似悖谬的崛起，需要一个复杂的解释，这种解释需要认识到经济和政治的时间性同时出现的自主性和相互关系。

首先来看经济。尽管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码头工人在海洋经济中的优势结构地位未受挑战，但他们的经济福祉依然受到短期波动的剧烈影响。1848年，马赛港的吞吐量陡然下跌，且在其后三年都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见图9.1）。而1848年法国和欧洲的革命动荡导致有产阶级普遍恐慌，信贷枯竭，投资缩水，工业和贸易陷

入萧条。直到路易·波拿巴政变在1852年结束了对政治不稳定的恐慌后，港口的吞吐量才回升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水平（Guiral, 1956:200—225）。商业长期萧条，无疑增加了失业，并急剧减少了码头的收入，把码头工人所处的经济环境或多或少地降格到了相当于19世纪30年代的水平，一个在我们看来他们同样参与革命骚动的时代。萧条并未让码头工人陷入令人绝望的贫困，“缪斯”平均分配了可以获得的工作机会。实际上，“缪斯”似乎让码头工人受萧条的影响远低于城市中的大多数工人。但持续四年的较低收入和高失业水平，也多少让码头工人比起在就业水平较高的年份更容易接受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要解释码头工人在1848年到1851年间最初的左转，这种经济导致的接受度变化无疑是有力的。

这些经济变迁与法国政治体系转向自主性同步发生（某种程度上前者也是后者所导致的）。有关政治的自主性（或相对自主性）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国家的自主性上。这类文献认为，国家有自己的利益、结构和发展趋向，它们不能被化约为一个或多个主导阶级或团体的利益。因此，要解释历史性变迁，既要关注构成了社会的阶级和阶级部分所在环境的变化，也要关注国家的形式和功能的变化（如Skocpol, 1979; 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 1985）。在革命动荡之中，政治结构变迁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1848年革命彻底改变了法国国家的结构。二月革命突如其来的胜利推翻了旧王朝，瓦解了立法机关，并打乱了现有的国家制度。随之而至的新的临时政府并不稳定，它推行了男性普选制，取消了出版审查制度，解除了对政治结社和工会的限制。迫于巴黎工人的压力，新政府还宣布了工作权这一新的基本权利，并建立了由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Louis Blanc）牵头的卢森堡委员会（Luxembourg Commission），旨在为国家筹备新的“工人组织”。二月革命方才结束不久，这种新兴的、相当混乱的法国国家结构大大增加了工人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在获得投票权、获许组织政治俱乐部和工会，并获得彻底重组经济的允诺后，法国各城市中的工人以爆发式的政治活动来回应。这种国家结构的变化，是法国工人整体转向激进的根本原因，并无疑影响到了马赛的码头工人。

二月革命也带来了另一种和政治性质有关的变化，即政治话语的转型。[36] 如果说是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困难让码头工人增加了对批判现状的信息的接受度，那么是革命政治改变了这类信息的特性，并增加了它们的数量。[37] 1848年革命让“工人”（ouvrier或travailleur）成为一个在政治意义上有效的术语，令属于体力劳动者这一社会经济范畴的个体与政治之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联。一如1848年春天法国其他地方，彼时马赛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官员、温和派，甚至是最为反动的保皇派，都在如雪片般四散的手册、报纸文章、演讲、传单和声明中写着“致工人”。用路易·阿尔都塞的术语（1971）来讲，可以说在1848年2月后，“工人”这种说法不断强调或称颂工人为由意识形态定义的政治主体。受到这种倾泻而至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轰炸，即便在1848年以前一直被认定为是保皇派或是非政治性的码头工人，也无疑都意识到革命很有可能把体力工人抬高成国家新的尊贵阶层，并开始反思自己毫无疑问的工人身份所暗示的政治角色。

1848年春天出现的专门针对马赛的码头工人的话语，多半来自保守派，褒扬了他们的“温和”。例如，在2月26日码头工人被编入国民卫队时，保守派报纸《报信人》（*Le Nouvelliste*）写道，码头工人断然拒绝了“惊扰城市的纷乱游行”，并“给予了我们城市的劳动人口以最高程度的敬重”：

> 是夜，预计有超过2000名可敬的工人会被武装并加入国民卫队，高效站岗，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我们坚信，码头工人社团这一崇高的榜样会得到所有马赛劳动人民的效仿，因为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只有我们这里的劳工阶级（classes laborieuses）和我们一样有如此高的道德水准，为家庭的神圣纽带奉献，而这实质上是所有秩序和合法性的本能的来源。（*Le Nouvelliste*, February 26, 1848）

该社论不仅试图强化码头工人的保守主义，还把码头工人作为所有马赛工人的榜样；有趣的是，这群人受到褒扬的原因并不主要来自他们的政治保守主义，而是来自他们对家庭纽带的非政治性的依恋，而这被看成是良好政治行为的保证。然而，即便是这些文本也自相矛

盾地把码头工人的身份等同于工人，并以反动的意图让这种身份拥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革命肇始之时，马赛的保守派就通过招摇地把码头工人作为非政治性的好工人（sage ouvrier）的典范，不知不觉间促成了他们的政治化。一旦码头工人受到鼓励，开始自视为所有工人的某种典范，他们便不能不认识到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将所有工人拥立为一个新的、更好的国家和社会的成员的想法。在这种“民主社会共和国”中，劳工将会被适当地“组织”起来，作为所有财富的基础而获得恰当的奖励。1848年6月，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成功把码头工人变成革命者。但事实是，国民卫队里码头工人的连队在六月骚乱时，由于不愿意对“工人同事”开火而拒绝履行义务，这说明他们开始把“工人”当成是一种政治身份，并根据这种身份采取行动，甚至是对抗“秩序和合法性”力量的明确指令。

1848年春天出现的国家结构和政治话语的转变，再加上失业的骤增，似乎使码头工人超越了2月时保皇派和共和派所说的反动而顺从的群体。但直到1849年及之后，码头工人才开始频繁出现在马赛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之中。事实上，码头工人向激进运动的这种滞后转变在马赛是独一无二的。工人政治激进化的高潮，是在1848年动荡的春天，而非其后逐渐受到镇压的时期。马赛革命运动的参与者的数字说明，在1851年或者19世纪50年代中期激进的行业，早在1848年6月的叛乱中就已经显示出了激进色彩，但其中不包括码头工人。在主要的工人阶级行业中，唯有码头工人在1848年6月时依然保守，之后才转向激进。因此，解释1848年工人普遍的激进主义化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码头工人的特殊情况。

要解释码头工人的政治变迁，我们必须认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自主性，即在考虑国家结构和政治话语的变化之外，还必须考虑码头工人政治历史的独特细节，亦即是政治的“势态的结构”。在1849年到1851年间，码头工人的政治史，和码头工人中的诗人、政治家路易·阿斯图安令人赞叹的职业生涯有着紧密联系。在1848年4月的立法委员选举中，阿斯图安最初被提名为保皇派的候选人。保皇派选择他，是因为他是一名有名气和人气的工人诗人，并认为他貌似缺乏明确的

政治立场，意味着他持有码头工人同行著名的温和的保守主义立场。但在国民议会中，他被证明是一名尽管温和、但极为真诚的共和主义者。由此，他在1849年选举中从保皇派名单中被剔除，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名以反动观点著称的码头工人。然而，民主派将阿斯图安提名为他们的候选人，阿斯图安便顺势左转，支持起社会民主的事业。阿斯图安成为了不屈不挠的运动家。尽管他在1849年以微弱劣势落败，但在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前，一直为民主社会共和国工作着。阿斯图安在码头工人中极高的威望和他勤勉而持久的宣传，无疑成为了码头工人在1849年后新的政治叛乱的主要来源。[38]

由此，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三种不同的时间性过程，来解释1848年之后几年马赛码头工人的激进化。首先，这一变迁是由一个最主要的事件促成的：国家革命性的转型与继之而起的激进话语的涌现，把“工人”变成了新的“民主社会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一对工作和政治的新观点，由此主导了1848年春天的话语，以至于即便是码头工人这样的保守派工人，也无法逃避这种新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身份。第二，第二共和国时期周期性的海上贸易衰退，无疑让码头工人比起之前充分就业的时期，更偏向于接受激进的思想。第三，路易·阿斯图安独特的政治生涯，意味着在1849年到1851年间“民主社会共和国”的信条以特殊的权威性和强度传到了码头工人那里。这些时间性过程的合流，使码头工人从原先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转型成为第二共和国时期活跃的共和主义者。

然而，所有上述因素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在路易·波拿巴政变和第二帝国建立之后，码头工人中的激进分子在地下共和运动中的日益突出。海上贸易在经历了四年的衰退之后，于1852年急速复苏，并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都保持着相对繁荣。1851年之后，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帝制国家压迫性的警察制度扼杀了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话语。1851年政变后，路易·阿斯图安被捕，尔后被羁押至瓦朗斯（Valence）的拘留所，之后转移到了贝桑松（Besançon），1853年回到马赛时，他依旧受到警方严密的监视，再也无法积极参与到当时已属非法的共和运动之中了。[39]但码头工人没有重新陷入19世纪40年代顺从的保守主义。根据表9.2的概括可知，关于镇压的档案

证据表明，码头工人是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马赛地下共和主义运动中最为活跃的行业之一。镇压越发严峻之时，码头工人参与激进政治活动就越为积极。码头工人极强的组织经验，或许是对他们日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最好解释。人们可以料到他们有能力把码头工人社团日常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很多技能、图式和常规，转置到极为不同的地下政治组织之中。码头工人最初转向激进政治时或许进程缓慢，可一旦他们选择效忠民主社会共和国，其对社会资源和机构常规的超强掌握，让他们成为了政治斗争的中心。由此，码头工人的政治性基本不是他们和生产方式之间关系的反映。社会经济环境与之依然有关，但要解释码头工人政治的演进，必须考虑国家结构和政治话语的转型，以及马赛政治和个体的具体情况。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对政治的自主性的时间的肯认，呼应了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1979；亦见Hobsbawm, 1980; Abrams, 1980）此前一段时间倡导过的“叙事的复兴”。这本书的主题之一是，任何用非还原论的（non-reductionist）方式解释历史变迁的尝试，都意味着对时序、偶连性和能动性的“叙事性”考虑。但政治的自主性不应成为历史学家可以无涉理论的特许，从而沉溺在个案的一系列事件上，或复活（就像我对路易·阿斯图安这一个案的处理）历史的“伟人”理论。我已在此处展开的对码头工人激进化过程的描述，并不是回归老套的叙事史，而是理论性地回应劳工史解释策略的危机。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在本章所指的意义上是不均衡的，亦即是说，如果其生产的不是一块日趋坚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大陆，而是由各类不同的工人阶级组成的、持续变化中的群岛，那么适宜劳工史学家的解释策略，就是追问经济轨迹和工作场所经验相去甚远的工人们如何、为何构成政治叛乱者，而非在每一次工人阶级政治激进主义背后寻找涌现的无产阶级化的证据。在某些历史个案和行业中，诸如克里斯托弗·约翰逊描绘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裁缝，最重要的单个答案就是无产阶级化。但要是我们把裁缝当成是19世纪工人阶级经验的缩影就不对了。

对马赛码头工人的这项研究表明，在特定情况下，即便是享有高度特权的工人，也可能会受引导而认同那些特权较少的工人，从而为

激进的社会秩序转型而斗争。如果历史学家要想去理解由不同行业的工人参与的激进叛乱，如1833年到1834年、1848年到1851年和1870年到1871年的法国工人起义，在《改革法案》（Reform Bill）前夜或宪章运动中英国工人广泛出现的骚动情绪，1850年纽约工人起义，或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我们都要追问，新的或现存的社会常规、经济变迁、国家结构与政治话语的转型与知名或处于战略性地位的人或团体有目的的行动的结合，是如何让（至少一段时间里）成功建构普遍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认同和纲领成为可能的。这种策略也应帮助我们解释为何在据称能生产一个越来越统一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阶级团结的胜利反复表现出短命的特点。马赛码头工人的例子有助于我们了解到，社会主义和阶级意识是政治斗争偶然而脆弱的成就，并非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和自动的产物。

确实，马赛码头工人只是一个个案。但只要对单独案例加以仔细选择和充分分析，我们也能获得极为丰富的信息。适当地理解码头工人的历史，能解释变动时代中社会再生产的动力学、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均衡的时间性的重要性；能组织生态学在解释制度持久性方面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政治相对于剥削和特权的赤裸裸事实的自主性，以及占尽天时地利的个体推动政治和文化转型的力量。为历史社会科学发展出一套适当的解释词汇，极为仰仗这类由理论动机驱动的对特定案例的探索。

注释：

本章的一个版本曾经以下述名目发表“Uneven Development, the Autonomy of Politics, and the Dockworkers of Nineteenth-Century Marseill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1988）:604—637。杰夫·埃利、简·戈尔茨坦、霍华德·基梅尔道夫（原文作Kimmeldorf。——译者注）、比尔·雷迪和琼·斯科特曾阅读或批评过该章的不同版本。

1　．今时今日，比之我当初发表此文初稿时，此说已然不复准确。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劳工运动的急剧衰落对历史编纂学来说最重要的影响，是有关领域产出和声望的下降。这也导致了

其他研究兴起，如关注劳工运动的弱点，或追溯19世纪的去工业化过程。对19世纪法国的研究，见朗西埃（Rancière，1981），刘（Liu，1994）和约翰逊（Johnson，1995）。对劳工史现状的进一步思考，见休厄尔（1993）。

2．约翰逊（Johnson，1971，1975，1979），阿明扎德（Aminzade，1979和1981，尤见第二章），科特罗（Cottereau，1980）以及富尔（Faure，1977），都对法国手工业者进行了研究。威伦茨（Wilenz, 1984）对19世纪美国工人的研究，亦有相似论点。

3．此外，近年来研究工厂工人和矿工的劳工史学者已经发现，看似典型的无产阶级，并不像经典研究里所说的那样受严格控制、被统一剥削。他们形成了紧密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看重自己的技术，确保重要的工作区块里的自治，和雇主常常处于商业分包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雇佣劳动。尤其见于雷迪（Reddy，1984）和哈里逊（Harrison, 1978）的讨论。

4．这些结论来自1848年6月叛乱时被抓获的叛乱者、以及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之后被当成是危险的革命者的人的统计数据。罗讷河口省档案馆（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s Bouches-du-Rhône，本章缩略为ADBdR。即马赛所在省份的档案馆。——译者注）里能找到相关数据的文献：M6/137；M6/100。休厄尔（Sewell，1974b和1974c，尤见115—116）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析。休厄尔（Sewell, 1989:176—177）对马赛鞋匠进行了研究。

5．哈维（Harvey, 1982）和普殊同（Postone, 1993）对我思考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影响。

6．如大卫·哈维（Harvey, 1982）中对此有所应用。

7．19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早期的争端，最终摧毁了码头工人的特权地位，这个说法来自地方上的小册子和警局档案，都保存在罗讷河口省档案馆里。在此期间，两位社会调查员奥迪冈（Audiganne，1860:2，265—268）和洛朗（Laurent 1865:2，547—552）也对码头工人社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有关更早几十年的史料更为薄弱，但还是比关于其他行业的史料丰富，尤为有价值的是复辟

时期（1814—1830）市长办公室的报告，现保存于马赛城市档案馆（Archives de la Ville de Marseille，后缩略为AVM）系列1（series I）中。已故的维克多·阮（Victor Nguyen）在为获得高等研究文凭所写的论文中（Diplôme d'Études Superieur, 1961。该文凭是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获得博士学位前可以申请的文凭，缩写为DES，在法国现行教育体系中已不复存在。——译者注），对码头工人有极为精彩的研究。可惜此文只有最后一部分发表了出来，而我对前几个部分更感兴趣（Nguyen, 1962）。我尽管和阮先生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但也从他的研究里学到了很多，本章的注释便会表现出这点。在1967年和1968年与阮先生几个小时的谈话里，我对马赛的历史及马赛档案里的谜团获益良多，彼时我正在进行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还有一些近期的研究，包括科尔尼（Cornu, 1974, 1999）和克拉弗里（Claverie, 1999）。尤其重要的是冈蒂尔（Gontier, 1988），该研究系统挖掘了多种关于码头工人的"文学"资料，对码头工人社团的章程变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细致重建了马赛港的地理和组织。

8 ．所有行业的收入数据可见于*Travaux* （1837—1873:4, 52—53；5, 346—347；9, 72—73），及"Enquête sur le travail agricole et industriel," Archives Nationales: C947。

9 ．这些数据基于对马赛婚姻登记信息进行的计算机分析，覆盖的年份包括1821—1822年，1846年，1851年和1869年（AVM, series 201 E）。婚姻登记显示了新郎和他们的父亲的职业。对这些数据更为详尽的讨论，见休厄尔（Sewell, 1985b,尤见317—319）。这项定量研究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编号为Grant SOC 72-05249-AO 1所资助的。

10 ．1789年和1817年章程的情况，可见于AVM: 111/35, 1370。也可见于赞奇（Zanzi, 1969:4—7）和洛朗（Laurent, 1865:2, 458—459）。

11 ．Laurent（1865:2, 549—550）；Nguyen（1961:15）。1000法郎相当于当时一名技术工人一整年的收入。

12 ．这些是1817年的章程的条款，1853年时被少量修改过。

1853年章程是和1817年章程的复本一起出版的，见ADBdR: XIV M25/1。

13 . AVM: 1 I 1/35, 1370; ADBdR: XIV M25/1（原文为I，恐为讹误，译者更订之。——译者注）;Nguyen（1961:14—15）。

14 . AVM: 1 I 1/35, 1370; ADBdR: XIV M25/1; Gontier（1988:30—33）; Nguyen（1961:16）; Laurent（1865:2, 549）.

15 . 巴兹曼（Barzman, 1999:59）指出，19世纪20年代的勒阿弗尔的市政当局仍使用一种将不同码头工人分成三类的清单，明确了他们工作的特定位置，且只有在清单上出现的人才可以在码头工作。这些做法似乎随着更为公开自由的1830年七月王朝的到来而受到抑制。皮热涅（Pigenet, 2004）认为，法国港口码头的劳工制度，在19世纪前半期具有“隐蔽的行会体系”的特性（258）。但他的证据似乎仅仅来自马赛和勒阿弗尔。迄今为止，我都没看到有史料能说明其他港口有和马赛码头工人社团的复杂性和权力相当的码头工人组织。

16 . 皮热涅（1988:258）说明了勒阿弗尔的地方权威是用这个获得合理性的。

17 . 参见市长的通信，收录于AVM: 1 I 1/36。

18 . 阮（Nguyen, 1961:28）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史料，是针对不同谷物的计件工资的价格表，它们表明在1818年到1853年间，价格上涨的比例不到10%。

19 . 马赛的人口从1821年的109485增长到了1851年的195135（Sewell, 1985b:147）。1847年到1851年间，在马赛港支付的关税金额比1817年到1821年间增加了178%，进入港口的船只的载货量比1825年到1829年间（数据最早覆盖的年份）增加了121%。选择不同的起止年份来进行比较，会出现不同的数字，但几乎所有的估计都表明，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到40年代晚期，海洋贸易有着大约1—2倍的增长。数据来自Julliany（1842, 1:145, 162），Bousquet and Sapet（1857:25—29）和*Travaux*（1837—1873:1, 70; 19, 92）。

20．有关海洋贸易更为完整的讨论，见休厄尔（Sewell, 1985b:18—23）。

21．《关于农业和工业工作的调查》（“Enquête sur le travail agricole et industriel”）的判断（Archives Nationales: C947）比较可靠，认为19世纪中期码头工人的数量是2500人，而更精确的数据来自1851年的普查，从每10户家庭中选取一个样本，给出的数字只有1530人。我怀疑码头工人社团送到商会调查者那里的数据明显偏高，因此，我们在接受任何当下基于不够可靠的数据的估计时应保持机警。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关于1851年之前对特定行业的普查数据。故此，来自婚姻登记处的数据可能是最好的替代选项。特定行业中结婚的男性数量，不仅取决于行业中总雇用人数，也和行业中的年龄结构、结婚年龄和结婚率的变化等等有关。尽管如此，对一段时间内一种职业规模大小的变化，这种统计可以给出足够精确的初步估计。

22．码头工人社团1817年的章程里，明确提出街边临时工必须穿着保护服（pallier）的要求，ADBdR: XIV M25/1。

23．码头工人、货夫和装货工人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出身。1846年和1851年在马赛结婚的货夫和装货工人中，只有37%出生在马赛，而码头工人中有89%都出生在那里。有41%的货夫和装货工人是农民的儿子，还有29%是非技术工人的儿子。

24．这也许解释了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在日记中提出的问题，她曾在1844年的《法国之旅》（“tour de France”）中短暂访问了马赛。特里斯坦称，签订了工作合同的码头工人有时会雇用意大利女工，他们压榨这批人的工资，却要求她们干一样的活儿。特里斯坦谴责了这种雇用“白人奴隶”的牟利行为，并将其作为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的剥削”的例子（Tristan, 2001:1, 61;也见于Cornu, 1999:173）。

25．这一结论似乎和冈蒂尔（1988）关于码头工作劳动分工的变迁的分析相一致。

26．冈蒂尔（1988:27—30）极好地讨论了工头和为他们工作的码头工人的关系。

27 ．弗朗索瓦·马聚（François Mazuy）是一名当时对马赛社会的尖锐的观察家，他指出在19世纪中期保护性的关税制度下，“要送一个包裹或者一只桶，都是很难的事情”。而码头工人的工头“自幼在海关的迷宫中长大”，所以才有能力处理“这些细琐的事务”，有能力“在遇到大麻烦的时候，在码头上拯救他所代表的家族”。

28 ．卡里埃（Carrière, 1973:2, 875—984）对18世纪马赛的商业资本主义有清晰而细致的描述。

29 ．关于马赛贫困和犯罪的地理图景，见Sewell（1985b:109—126, 228—232）。

30 ．从这个角度来说，马赛和法国其他主要港口，如波尔多、南特及勒阿弗尔有所不同，这些港口都位于主要河流的河口，而马赛是由密集发展的城市所包围的多山的海岸入口。另三个城市的码头都足够宽阔，能容纳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铁路路轨，而这对马赛的旧港口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见Higounet（1980），Le Beuf（1857:272），Aussel（2002:170）和Corvisier（1983）。

31 ．引文来自1817年的章程。1853年的章程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但也更为详细地说明了指控码头工人的流程，不过也基本上参照了1817年草案，后者则是参照了1789年的草案（ADBdR: XIV M25/1; AVM: 1 I 1/35）。

32 ．在此时的法国，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ies/sociétés anonymes）是一种形式相当新颖的公司，第二帝国的政府强烈支持它们来处理主要的基建项目（见Girard 1952）。

33 ．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形成的保守派国民卫队的情况极不正常，此事由革命派市政委员会会议关于国民卫队的报告详细记录（AVM: I D73,开会时间为June 10, 1848）。

34 ．安托万·奥利韦西（Antoine Olivesi, 1950:76）在他关于马赛公社的研究中，把艾蒂安描述为一位“有使徒精神的纯粹的革命家”。（根据奥利韦西此书的脚注，这段描述是当时老艾蒂安的同僚，马赛公社运动的幸存者阿芒德·埃尔贝[Armand Elbert]的记述中写下的，见Armand Elbert, “Les événements revolutionnaries de

Marseille: 4 septembre 1870—1874 avril 1871, Notes d’un survivant”, 1931，以及Antoine Olivesi, *La Commune de 1871 à Marseille et ses Origines,* Paris: Riviere, 1950。——译者注）

35 ．对于晚宴的描述，可参阅共和派报纸《人民之声》（*La Voix du people*）, June 8, 1849。

36 ．休厄尔（Sewell, 1985a）和斯考切波（Skocpol, 1985）对这些关于法国革命的问题有所交流。

37 ．休厄尔（Sewell, 1980, ch.11）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定篇幅的论述。

38 ．阿斯图安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1849年春天到1851年秋天，散见于ADBdR的警局文件与激进派的报纸《人民之声》及其后继者《人民》（*Le Peuple*）。

39 ．阿斯图安死于1855年，享年33岁。1853年，在他回到马赛之后不久，为了拯救落水孩童，而跃入冰冷的港口水域之中，并死于染病（Masson, 1913:27）。

---

(1) 《阿拉德法令》，法文为Le décret d’Allarde，在阿拉德男爵皮埃尔· 吉尔贝· 勒鲁瓦（Pierre Gilbert Le Roy）的主导下通过，故以其爵位命名。《勒沙拉普利埃法》，法文为La loi Le Chapelier，由伊萨克-勒内-居伊· 勒沙普利耶（Isaac-René-Guy Le Chapelier）草拟，深化了《阿拉德法令》的内容。直至1864年自由党政治家埃米尔· 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主导的《奥利维耶法》（La loi Ollivier）通过后，法国工人方才重新获得了结社和集会的自由。—— 译者注

(2) 该法案于1810年通过，法文作Le code pénal，因当时正处拿破仑· 波拿巴的统治时期，故称之为拿破仑《刑法典》，以与1791年通过的、法国大革命之后首部《刑法典》加以区别。—— 译者注

(3) 键控穿孔机操作员的工作是在有网格的卡片（类似答题卡）上打孔，作为计算机数据输入的方式，实现信息书写、存储和转移。由于信息输入的量非常大，在依靠这种技术完成信息输入的年代，计算机公司（主要是IBM）雇用女性来完成这项工作，从而催生了穿孔机操作员这个行业。从189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低技术的工种一直存在于计算机行

业之中。—— 译者注

(4) 里弗尔即livre，旧制度时期法国的货币单位。至1795年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法郎为标准货币时，其与里弗尔的比例为1法郎兑换1里弗尔3旦尼尔（即1.0125里弗尔）。—— 译者注

(5) Dauphin字面意思即海豚，该称号自1350年开始使用，至1830年退出历史舞台（1791年到1824年由于反对王权，这个称呼也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由于法国国王腓力六世在1349年获得了安贝尔二世（Humbert II）的海豚庄园，继承了海豚的头衔，此后就成为了王太子的称号。此处所说的王太子是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Marie Antoinette）的第一个儿子路易·约瑟夫（Louis Joseph），其出生后就被认定为第26世法国王太子，但不足8岁便早夭。—— 译者注

# 第十章　重塑社会科学中的“社会”：一位阐释主义者的宣言

我们清楚知道，“社会的”（social）[(1)] 是那种典型被用来说明很多事物的形容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它最终几乎什么也说明不了……确切地说，我们都认为，如此意义模糊的词……是由历史之神（historical providence）的特殊裁决造就的，用作一本期刊的名字，由此希望期刊不要筑起高墙，而是发散、自由，甚至是恣意地向周围传递出它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自由批评和全方位的主动性。

——1929年，吕西安·费夫尔（1953：19—20）解释为何他与马克·布洛赫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来命名他们的新期刊。

“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所指为何？这问题看似无关痛痒，却日益令人难以回答。对此，多数社会科学家似乎不愿多费思量，只有少数人才略有涉猎。例如，许多经济学家兴许希望自己的学科能成为数学的一部分，不少心理学家也可能更希望自己被归为生物学家。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些社会科学的其余核心学科，都视社会范畴（the social）[(2)] 为重要概念，但这些学科极少关注该如何定义它。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用到“社会的”或“社会”这两个术语，但他们侧重辨析的术语主要是本学科内充满争议的特定关键词，如地理学中“空间”（space）与“场所”（place），人类学中的“文化”，还有政治学中的“政治”与“理性”。社会学，顾名思义是社会之学（socio-logy），告诉我们这是“研究社会的科学”，并理所当然地用起“社会的”与“社会”这两个术语。根据我在这个学科里广泛的参与式观察，当你请社会学家来定义社会范畴时，得到的多是出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两个词的同义反复式解答。社会学家显然认为他们的学科是研究社会的科学，但他们阐明的更多的是这个词中“科学”这一半，而非“社会”这一半。只要社会学家能让自己和同行

确信自己在研究的是一门科学，他们通常就会满足于让社会科学里的“社会”自生自灭，不作多问。

悖谬的是，相比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学科，历史学这个半社会科学半人文的两栖学科，近年来展开了更多关于社会范畴的讨论。尽管我在第二章中抱怨过，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在过去20年里过于轻易地接纳了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广泛转向，但这也确实引发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对“社会”的地位的质疑。不少历史学家甚至把“社会范畴”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作为根本问题（Joyce, 1995; Cabrera, 2004）。而且，文化史学家让我们强烈感受到，类似“社会范畴”这样的概念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发轫、转型的，从而是历史性地构成的。[1] 我在本章中对于社会范畴的反思，将会以历史学家的讨论为起点，但我会进而假设，我们如何定义社会范畴对其他社会科学而言也很重要。

关于社会范畴的问题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社会科学家往往会羞于提供清楚的本体论说明。前文对社会学家的评价，似乎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家：他们在对“科学”（即我们如何获得有关世界的知识）进行理论化时，似乎比对社会范畴进行理论化更为自如。换言之，社会科学有极为发达的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但无论是在表述还是假设方法论时，它实际上都会涉及本体论。譬如“方法论个人主义”看似是一种方法论的主场，但这也假定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本体论，即任何“社会的”现实都可以化约为个人和他们有意志的行动。不论是采纳方法论个人主义还是其他方法论立场，如多元实证主义、理性选择、社会网分析、后结构主义和诠释学，都内蕴对社会世界的本质的概念化。我们在社会科学里所能学到的，以及我们如何获得学习社会科学的能力，都与我们的社会本体论密不可分。本章写作的前提是，社会学家与其让我们现有的概念化变成方法论立场中未加表述和验证的必然结果，不如先明确界定社会范畴的概念。

读过前几章的人，应该留意到了我对方法论的强烈偏好。坦率地说，我承认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描述同时是阐释（诠释）性的和历史性的。如此描绘任何社会行动、制度或事件时，都涉及两个核心问题：

其一是它们对体验者的意义是什么；其二是它们在变动的框架中处于何种位置，才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研究的对象能够破译这些意义。研究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用什么方式重构上述意义和经验才能既真实地反映所研究的不停变动的世界，又能让研究者的读者可以把握。本章旨在提出一种对社会科学的阐释性概念而言合用的社会本体论，以此重塑社会范畴。不过，诚如读者会在本章末看到的那样，我认为要建立一种完整的关于社会范畴的阐释性本体论，必须用到一些通常不被当成是诠释学宝库中的方法。

在本书中大部分章节里，尽管充分意识到结构这一概念在本质上的隐喻属性，但我每每思考到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时，依然相当仰赖这个概念。本章则要讨论对社会生活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隐喻。我将从社会范畴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语言游戏”开始，并以该术语也应同时被辩证地视为一种“建成环境”作结。有位读过本章较早版本的读者认为，我把对结构概念的讨论转移到语言游戏，减弱了前文中强烈的社会学侧重。我希望情况并非如此。我想要做的，是以新术语提出一种社会本体论。对我来说，这种本体论和前几章里我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展开的、以“结构”路径研究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似乎是兼容的。不可否认，无论是“语言游戏”还是“建成环境”，都没有那种让“结构”隐喻充满魔力的修辞力量，但这样可能也有好处：如此一来，“结构”一词承载的沉重语义负担得以时不时脱离我们的分析，过去解释时被造成解释封闭（explanatory closure）的语言遮蔽的问题也得以展现。我认为，本章要完成的理论化，和我最早在第四章中解释过、并在其他章节中广泛应用的有关结构的论点完全兼容。我对兼容性的知觉是准确的，还是只是巧言令色，都需要我的读者阅后作出评断。

## “社会的”与“社会”的历史与用法

“社会的”与其同源词“社会”都背负了含义模糊的恶名，既不可或缺又难以把握，可谓十分矛盾。简单回顾“社会的”与“社会”这两个术语的历史及其在日常学术语言中的运用，至少可以厘清我们共有的困惑的本质。“社会的”与“社会”都源自拉丁语里的socius，意指朋友或

同伴。在早期的使用中，“社会”指的是积极的同伴关系（如“他们寻求别人的陪伴[society]”），尔后指涉“一群为共同利益和目的而聚集的人”，也就是一个通过自愿结社行为形成的合作集体（如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或外科医师会[Society of Surgeons]）。这两层意思都涉及人们积极自愿地聚集这层含义。社会在当代的主流含义，也就是其更为被动、抽象、普遍和物化的用法，要到17世纪方才在英语中越发常见。这种意义上的社会，指的是“生活在或多或少有秩序的社群里的人的总和”，或“身处同一组织和政府之下的人”（《牛津英语词典》），如“敬畏……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或“为了社会的利益”（Williams, 1983:291—294）。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对社会进行最为广泛的哲学理论化的成果，就是“社会契约”的理论，它事实上兼有后两种意思。根据社会契约理论，被动、抽象和普遍的意义上的社会是一种正式的联合行动的产物，而这一最初的行动带来了权利、义务及公民与政府的界限。在18世纪中俯拾皆是的社会契约理论里，我们多少还能见到一些积极和未被物化的含义。

时至19世纪，占据主流的是一种更为抽象意义上的社会。19世纪的社会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来说，社会是区别于国家的人类活动场域，且原则上处于国家的外表面。这个定义发端于18世纪反专制的政治理论。在18世纪至19世纪，这个含义常常在用“市民的”（civil）形容“社会”（Cohen, 1998:369—372）。这种用法除了区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外，通常还引申出一层更宽泛的含义，这层含义源自18世纪的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先于国家而生，国家由此应服从社会的需要。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即便基本不认同原始的社会契约理论，也依然认为国家应市民社会的要求而生并从属于市民社会。但在整个19世纪，“社会”广为人知的意义越发趋于宽泛、抽象和普遍。“社会科学”早年的倡导者，比如圣西门，就开始把社会抽象化为“社会规律”，它非人格化、不具名，并独立于构成它的个人的意识。与自然规律一样，社会规律能被科学研究把握（Baker, 1964）。孔德也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社会的，他创造了“社会学”这个术语来指涉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在对社会范畴进行物化的过程中，涂尔干的说法达到顶峰，他认为社会是“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集体实在，对个体施加了外部制约（Durkheim, [1912] 1965:29）。

这种把社会当作物化的总体（reified totality）来解读的做法，的确是当代学术界和日常用语中的主流用法，其他含义都要退居二线。[2] 如今，这个术语仍能用来指涉正式的组织（如“法国历史研究会”[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或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而同伴关系的这层含义似乎已然不合时宜。含蓄地将“社会”等同于“民族”或“民族国家”（如“法国社会”或“约旦社会”），无疑推动了该术语抽象用法的概化和标准化。而正如我所说，近年来，起码是在学术性的用法中，含蓄地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将这一术语置于一定的语义学压力之下。由于“全球化”的进程让我们越发无法将民族国家视为边界封闭的社会秩序，我也发现比起二三十年前，自己使用“社会”一词的频率明显降低，也日渐踌躇不决。[3]

在当代的用法里，形容词性的“社会的”比起名词性的“社会”更具歧义性。“社会的”可以指作为物化总体的社会（如“社会规律”和“社会规范”），而伙伴关系或社交的这层意义（如“社交聚会”和“他有丰富的社交生活”）依然存在。即便是在学术意义上，“社会的”也不一定用来指称那些与作为整体的社会有关的事物。该术语也被用在关乎特定人或群体间关系的方面（如“社会网”或“纽约艺术家的社交圈”）。“社会的”一词的歧义性，让“全社会的”（societal）这个新术语被发明出来，很多社会学家会在指称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性时，会用到“全社会的”这一术语。“全社会规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的规范，而“社会规范”指的是只得到“次于全社会”的群体认可的规范。“全社会的”这种用法的普遍化，似乎或多或少弱化了“社会的”这个术语特有的歧义性，但迄今为止，需要区分全社会与社会的情况不多，而这也仅仅是“社会的”一词歧义性的表现之一。另一组诞生于19世纪的对立概念——“社会的”和“个人的”，让“社会的”所指涉的含义更模棱两可。这一区分很大程度上出自对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实践的批判，目的是给对手打上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烙印，并与充分的“社会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如团结、关心穷人的命运与同理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成了强有力的道德责任。这层意思就用到了“社会问题”这类术语中，也很快衍生出了“社会主义”这个新术语，并依然存在于我们熟悉的“社会活动家”这类术语中。显然，社会主义大抵是男人

的事情，但从道德责任的意义上来说，在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话语中，“社会的”还拥有明确的女性变体，它关注工人阶级家庭层面的缺陷（而非工人工资不足），并将女性中产阶级义工认定为对被改革选择的能动者（Riley，1988）。社会范畴的这种女性化的、社会向善论（meliorist）的概念，持续在“社会工作”这一当代学科中激起回响。

简言之，“社会范畴”是一个尤为复杂或多义的概念。在多数学术研究里，“社会的”事实上会让人想起上述不同含义的混合体。由此，“社会史”这个概念，似乎能同时指友谊和社团的日常纽带的历史，人与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关系的历史，在某一特定社会或多个社会的总和中这类关系的总体的历史，以及穷人与受压迫者斗争和苦难的历史。但“社会的”这个术语的难度不只在其歧义性和多义性上。实际上，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核心分析性术语都是多义的，信手拈来的就有理性、符号、结构、领袖魅力、代价、原因和剥削等等。[4] 但在歧义性与多义性之外，“社会的”有非常特殊的模糊性，甚至是神秘性，这是其他术语所缺少的。

要理解“社会的”一词的模糊性，我想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标准的学术分工，这种分工基于形容词（如“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与对应名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别。这些术语大多是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获得了现代意义，并在19世纪末区分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其所涉复杂，可以是人类学，也可以是不同“人文”学科，如文学、古典学、艺术史、音乐学和哲学）所研究的不同生活和活动场域。但如果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四个看似平行的术语并非真正对等。“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通常被理解成指涉在特定类型的制度中进行着的特定类型的活动。但“社会的”并不指向特定的制度所在，而是囊括了所有制度性场域和活动类型。这种差异表明，不同学科的研究主题并不对等：经济学、文学和政治学通常被看成是对有限的、可命名的领域的研究，但社会学似乎可以研究所有领域，涉及任何包含于整体的“社会”的活动。[5] 这种差异也表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可以把“社会的”理解成包括或归纳了另外三个被假定为与之平行的范畴。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看成是社会的子集，似乎无可指摘；但说经济、

社会和文化是政治的子集，则显然会被认为反直觉并引发争论。理解这种不对等的另一种方式，是注意到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社会的”三组区分中，前一个词似乎更突出，但后一个词则没有。在每一组区分中，“社会的”都仅仅是通过区分它与其他特殊且（更）易定义的场域来定义，而其本身缺乏明确的定义。在每一组对照中，“社会的”指的是相当模糊而又关键的剩余范畴。这表明在各对照术语组中前一个词命名的内容之外，还有其他的力量、结构和关系会决定人类行为。

事实上，“社会的”一词特殊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空洞。恰恰相反，这个术语的模糊性正是因为其所涉含义过于饱和。文化史学家基思·贝克认为，这种情况从启蒙运动时代就开始了。当时，社会这个概念取代了宗教，成为了“秩序的终极基础”（Baker, 1994:113）。在启蒙运动所创造的祛魅的世界里（这也是社会科学自设的研究目标），“社会”与“社会范畴”逐渐被用来指涉过去由诸如神意（Divine Will）和神的天命（Providence）这类宗教概念再现的、极为复杂并在根本上不可知的实在——人类存在。“社会范畴”继承了神谜样的本体论所指，但对终极实在的再现方法又非常不同，它表现的并非难以捉摸的神人同性（anthropomorphic）的意志，而是复杂的“人类关系中的相互依存”的构成物（1994:114）。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哲学家”（philosophe）这个词条里，狄德罗与达朗贝尔（d’Alembert）写道：“可以说，市民社会是上帝在人间的神。”贝克指出，当代学者也认可这点。他强调，“社会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框架。任何质疑其优先性的人都会被告诫：社会范畴是我们用来称呼‘真实实在’（the really real）的名字。它系缚了我们脚下赖以生存的土地，表现了话语的流沙之下的实在的岩床”（1994:95—96）。[6] 尽管社会史学家经常质疑贝克所提出的“社会范畴”所具有的优先性，但是他为我们当前无法定义“社会的”与“社会”指出了历史根源。之所以“社会范畴”这个概念模糊又神秘，是因为其身上仍有神的痕迹。这个词不同的用法一直都与一种内蕴的、普遍的本体论含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视为构成人类存在这一基本实在的、复杂相互关联性的总体。

贝克对18世纪“社会”与“社会的”所具含义作出的历史性诠释，极好地例证了当代的文化史。他的研究不仅清楚分析了两个术语在18世纪的概念范畴，也厘清了当下的理论谜团。它完成了一项至关重要又富于启发性的“后现代”的任务，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通常视为坚固而不容置疑的思想基础，实际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建构，并因此是不稳定且可以质疑的。“社会范畴”不是“真实实在”，而只是一个通常被看成是指涉了“真实实在”的符号。贝克提醒我们，“社会范畴”是一种历史性构成的话语事实，不是真实世界不证自明且永远有效的范畴。但把“社会范畴”当成一种话语事实理解，并没有解决其在18世纪新出现的用法试图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为人类生活提供本体论基础。由于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占据的仍是由启蒙运动创造的、世俗而祛魅的世界，他们也就无法避免如此世界中提出的本体论的问题与焦虑。

故此，承认“社会范畴”与“社会”仅仅是“真实实在”的广义能指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历史”本身正是类似的术语。“历史”最古老的意思，或多或少直接来自其作为“故事”的根意，指对过去的叙事或再现。这些古老含义包括：（1）“一种叙事、传说或故事”；（2）“以时间、重要性或公共事件的顺序来书写的叙事，构成了连续且有序的记录”；（3）“涉及过去事件的知识分支”（《牛津英语词典》）。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历史”也被用来指历史可能会叙述的日常发生的序列，即“一系列与特定国家、社会、人、事等等有关的事件”。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历史也开始被用来表达更抽象的意思，即“在过去发生的事件的总和”。在《关键词》（*Keywords*）一书中，雷蒙·威廉斯指出，在这种用法里，“历史”被看成是“人类的自我发展”，由此，“过去发生的事件不被视为特殊的历史群（*histories*），而被视为一个连贯与相互联系的过程”。他将这种用法追溯到维柯（Vico）或苏格兰启蒙作家所写的新“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ies）（Williams, 1983:146）。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是与其同时代出现的、广义上的“社会”等同。历史是人类过去的全部，也被认为能决定或形塑人类的现在与未来。正如“社会规律”与“社会力量”被视为控制了“社会”，所以“历史规律”和“历史力量”也被认为支配了历史。如果社会是我们的上帝，那历史就是同一个上帝，被视为能

通过时间行动。认为“历史”这个术语的难解性、神秘性和抽象性，与“社会的”或“社会”难分轩轾是合适的。“社会”与“历史”仅是自我创造的世俗人类存在这一启蒙观念的两个方面，且现代与后现代的人也同样视之为终极的本体论基础。

可就算放弃使用“社会的”并转向使用“文化的”这个术语（如“文化史”），我们也无法避免“社会范畴”一词广义的本体论意义的困境。随着文化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它也开始背上了与“社会的”与“历史”同样沉重的本体论负担。而且，使用“文化”这个术语的历史，事实上是和使用“社会”和“历史”的历史相似的。18世纪之前，文化最重要的含义是积极意义的教化（cultivation），但在18和19世纪，它出现了一种更为抽象的含义，即一个民族或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通过这种教化得到发展的生活方式、美学和思想的形式。最终，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文化”逐渐用来指人类存在整体的、由象征构成的基础（Williams, 1983:87—93），拿马克斯·韦伯的隐喻来说，文化就是人类悬浮其中的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这种广义的用法，也是人类学的特点，即把特定族群（如博罗罗人、恩登布人或巴厘人）都定性为或多或少可互换的“文化”或“社会”。与“社会”或“历史”一样，“文化”也指普遍、世俗和由人类创造的现实，只不过以某种不同的方式描述这种现实。到了更晚的时候，“语言”和“话语”也成为了指涉人类生活的世俗本体论基础的广义能指。不过，就算把社会史一词中的“社会”替换成“文化”或“话语”，也无法消解贝克所发现的暗藏于“社会的”与“社会”这两个术语中的本体论问题。我相信，长远来看，任何用这种方法来缓解社会范畴一词所具有的模糊性的尝试，都只会把同样根本性的模糊性和修辞力量转移到替换词上，诸如文化、语言或话语。

## 全世界即文本？

那么，我们要如何脱离这种认识论的泥潭呢？我认为，之所以我们被“社会的”这个术语困住，部分是因为“社会的”与“社会”在日常用语中常常以这种高度广义的基础性方式使用。要想在我们的学术语汇

中禁绝“社会的”一词的这种用法，或用其他术语取而代之，无疑都是徒劳的。而且，“社会的”这一概念极高的笼统性，也使之成为一个容量巨大的容器。我认为，在指涉我们自启蒙运动以来视为人类生活终极本体论基础的“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借用贝克的说法）的总体方面，这个词优于任何替代品。我深信，我们要直面贝克在社会范畴中发现并与之搏斗的难题，也必须即刻承认围绕在这一终极基本概念的周围的、某种不可化约的模糊性或神秘性的存在，且在将其尽量明确地概念化的同时进行尽可能的澄清。我由此提议，我们应该继续把“社会的”接纳为我们的基本术语，并认为“文化”和“语言”这类术语包含于社会范畴之中。

另外，给社会范畴所指涉的概念容器（conceptual container）某种内部结构和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此方能用这个概念来找出、明确和解释人类关系相互依存的本质和动力。我建议从回顾这个术语的原始含义入手。“社会的”最先指的是友谊或同伴关系，即社会学家所谓的面对面的关系。我认为，该术语所有的衍生含义都是其原意的隐喻性延伸。由此，除却无中介的、面对面的关系这层原意，“社会的”与“社会”也用来指各种有中介的（mediated）人类相互关系形式，如自愿形成的团体、居于某种有序共同体中的个人的总和，也可以指物化的“社会”总体，其社会规律能被社会科学识别出来。我认为，要从概念上把握“社会的”，可行的方法是将这个术语视为把人置于与他人的“社会”关系里的各种中介（mediation），尽管这些中介本身不会让他们成为同伴，但能用某种方式，使一方成为对方世界里相互依存的一员。

我们首先应该指出，这种路径与对社会范畴进行的常规性或常识性的概念化完全不同，后者的起点不是中介的形式，而是通过 中介形成的不同社会单元。从这种常识性的视角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的是“诸社会”时，视之为由众多群体、阶级、社会范畴或制度构成，而这些又是由单独的个体组成的。由此，社会范畴指的就是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与构成群体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社会结构的所谓“构件”（building-block）视角。这种理解立足于把“社会”含蓄地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并假设构成社会的社会单元与个人本身是聚

合形成一个结构化整体的有边界的单元。我认为这种常识性的视角有几个重要漏洞。第一，这种视角认为群体和社会的有界性是天生的，而非（至少不完全是）一种出现时需要解释的成果。第二，这种视角强调停滞而非过程，认为历史变迁一旦发生，就一定是已经构成的群体之间的紧张、冲突或对立造成的后果，而非群体自身形成、重塑或消解的永存过程。第三，这种视角意味着作为所有社会结构的基本构件是自主且既定的，而非他们所参与的社会进程不断变化的产物。第四，此说假定，“社会”中的发展是内生（autochthonous）的，是有界社会的单元之间关系的产物。这会使它在概念上很难考虑到超越给定社会边界的重要过程、忠诚和力量的影响。

我无意否认社会范畴的构件模型所强调的现象的重要性。群体、制度、阶级、族群、职业等范畴确实常常设法建立相对清晰的边界，并对这些边界加以有效维持。的确，历史变迁常常从界限分明的群体和制度的冲突或紧张中产生，个体也确实常常建立起长期持续的稳定认同。现代民族国家中很多关键的发展，导致了其内部的力量和关系显著地延伸到其边界。但对我来说，所有这些现象，似乎是更为基础的社会进程的偶连的历史后果，而非整体社会秩序的基本构件。我所认为的基础，是有中介的人类行动的流和序列，以及作为其中介的人为创造的、且因此可变的形式。我当然并不否认制度、有边界的群体或国家边界有时也是作为人类行动流的中介的、人为创造的形式之一，但它们也隶属一系列更广泛的现象，其性质与空间几何结构（有些边界模糊，有些极为宽泛，有些相互渗透或纠缠）往往与社会范畴的常识模型所假设的构件极为不同。

构件模型显然是一个隐喻，把“社会结构”比作建筑的结构。这种建筑学意义上的结构，是一个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认识论隐喻，可以在所有科学中看到，不论是物理学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与人文学科。我要在此处发展一种对社会范畴的更为阐释主义的理解，它基于一种更为晚近且得到广泛应用的认识论隐喻，即社会（或社会范畴）和语言类似。当今极负盛名的“语言学转向”，正是以这种隐喻为基石，并在20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横扫人文科学。对社会或社会秩序的这种语言隐喻，已经和我们相伴了半个世纪。我们可以将之上溯到

1949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著《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的出版；要是从一种极为不同的英美观点来看，它以1953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的出版为起点。[7] 此后，人类文学中语言隐喻的传播与变异的历史变得丰富而复杂，且基本尚未成文，“语言学转向”但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伟大的思想运动之一。[8] 只要说出在这一复杂且不断演进的传统中有所建树的主要思想家的名号，便能一目了然。例如，路易·阿尔都塞（1969）、J.L．奥斯汀（J.L.Austin, 1962）、罗兰·巴特（[1957] 1972）、米歇尔·德·塞尔托（1984）、娜塔莉·泽蒙·戴维斯（1975）、雅克·德里达（1976）、米歇尔·福柯（1971）、弗朗索瓦·菲雷（1981）、克利福德·格尔兹（1973a）、尤尔根·哈贝马斯（1984）、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80）、托马斯·库恩（1962）、雅克·拉康（1977）、J.G.A．波科克（1975）、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74）、马歇尔·萨林斯（1976）、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1978）、维克多·特纳（1976）与雷蒙·威廉斯（1983）。

我认为，以语言来隐喻社会范畴效果极好；借用启蒙时代的辞藻来说，这是因为这个隐喻是建立在事物本质上的：由于人类是使用象征符号的动物，所以我们能把人类的社会行动理解成语言性的。人类取得的很多成就都是最字面意义上的对语言的使用：例如，我们协理活动、制定计划、沟通情绪状态，和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固定我们经验的意义。但是，之所以语言作为隐喻 如此有力，是因为当人类为事物赋予意义，并把这些意义传播给他人时，采用的方式严格说来是非语言的，像是姿势、图像或制造物件，但它们的意义分配方式和语言极为相似。图像，姿势和其他实践能被看成是拥有语义（有意义的符号系统）和句法（syntax，一系列组合这些符号的规则）的；同样图像或姿势也能被看成是拥有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的。这种划分来自伟大的结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966）。两者差别在于，语言指一系列已知的、且必须能被共时性地把握的规则，而言语则是一系列必须被历时性地把握的实践流。语言作为结构或体系，实现并约束了言语。也就是说，语言给了言说者（或生成图像或姿势的人）表达的工具，并由此限制表达的内容；而

言语既通过将结构实例化的方式再生产语言，又通过延展、屈折或细化规则的方式转变语言，有时是纯粹为了找乐子，有时则是寻找理解不可预知的世界的适当途径。正是因为非语言的有意义行动也具有准语言的特点，语言才成为社会范畴的丰富隐喻。

语言隐喻亦涉及一种特殊的、受语言变化影响的方法论实践，我称之为范式性解释（paradigmatic explanation）。这种解释的形式，通过明确使人类行动者得以生产行动的范式或符码，来思考它们所生产的人类行动的模式，比如找出语音、语义和句法中暗藏的规则它们能使某种语言的言说者表达出能被理解的句子；或是找出词汇、修辞、文体传统（stylistic conventions）等等，它们让语言言说成为特定话语的一部分。换言之，它把特定的语言表现（performance）实例解释成（多为隐含的）既有符码的实例化。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966）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970）等先锋语言学家，勾勒出了不同语言形式的二元逻辑，并最具影响力地发展了这种解释形式。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范式性解释都是通常被称为“阐释性”的方法中最基本的研究工具。阐释主义学者通过“阅读”文本、仪式、图像、一系列行动或其他意义宝库，来展开这种研究，并试图重构语音、肖像、技术、语义、修辞、建筑、姿势等已经拥有的符码，这些符码由文本或文本类比物提供实例，也可以被推定为符码作者的具体行动依据。

社会范畴这一广义上的语言学概念，已影响了几乎所有人类科学的领域，就我所知，唯一的例外是经济学。语言隐喻影响最大的学科，除了显然以研究语言的意义为主的文学研究外，应该是人类学和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史这两个庞大而蓬勃的分支学科，都基于社会范畴的语言学模式。本章中，我将采取的研究策略是聚焦当代文化史的本体论假设；但我也同时认定，自己的论点在阐释性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广泛有效。我将从讨论前文提过的当代领军文化史学家基思·贝克的论点开始。他极为有力地论证了使用毫不妥协的语言学路径研究历史的可能性；所以，对我的论证来说，这种观点也是极好的起点。[9]

贝克在极具开创性的著作《发明法国大革命》（*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的前言中，首先提出了他所谓对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语言学”定义，并紧接着指出社会范畴也是纯语言学意义上的。他说，政治

> 是任何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对对方或整体所提出的竞争性主张进行衔接、协商、执行和强制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政治文化就是构成这些主张的一系列话语或象征实践……从这个观点来说，政治权威本质上就是语言权威：首先，政治功能是在特定政治话语的框架内得到定义和分配的；其次，政治功能的行使采纳了该话语所维持的术语的权威性定义。

在将政治定义为一种语言现象后，贝克回应了可能的反对意见，即这种定义是否“否认了社会利益和政治实践的相关性”。他的回应是从一个清晰的本体论立场出发的，直截了当地否认了“独立于象征意义的社会现实”的存在。

> 所有社会活动都有一个赋予其意义的象征维度，就像所有象征活动都有一个赋予其要点的社会维度。这是为了说明，界定话语领域和它以外的非话语社会现实的诉求，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一个本身由话语构成的行动领域。事实上，这些诉求区分了不同的话语实践（不同的语言游戏），而不是区分了话语和非话语的现象。（Baker, 1990：4—5）

在这段话的开头，贝克宣称人类活动有“社会的”与“象征的”两个相互平行并看似对等的维度。贝克对维度的说法，暗示着社会行动的所有领域，都是同时由“社会的”与“象征的”思考构成的，也就是说，社会范畴与象征范畴相互并完全对等地形塑着对方。在建立这种看似平行的关系后，贝克强调所谓“社会现实”本身是“由话语构成的”，从而成功否认了这种关系。他的论点似乎意指，“社会范畴”是一个幻象，援引此说乃是一种分析性的错误；也就是说，看似话语受到的“社会”影响，其实是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联系。换言之，我们可以说，贝克正在把社会范畴（此处仍作“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解）重新

定义为一种完全互文 的存在。他似乎想表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完全通过语言这种媒介 来发生。就我的理解来说，贝克这里说的语言不是一种隐喻，而是用了其字面含义。似乎对他而言，社会范畴确实是 语言。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必须把历史或社会理解成一种复杂而多层次的文本，这种文本构成了人类本身，而我们人类本身也在持续书写与修正文本。

但究竟哪一种文本才是世界？贝克专长研究所谓“上层”政治文化，即政治理论和形式化的政治观点。形式化的政治观点的世界无疑是高度文本化的。但即便贝克强调所有 人类实践都由话语构成，他也确实在自己的经验性历史研究中基本没有谈到通常由“社会的”一词所引起的各种实践，如工作关系、消费、社交模式、亲属关系、制度性动力、地位等级或物质文化。所以，我们必须深信他的说法，最好把这类实践领域理解成“语言游戏”，由此便能通过语言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充分分析。另一位研究近代早期法国文化史的领军人物罗杰·夏蒂埃，对贝克认为所有这类人类活动的场域都是语言性或文本性的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Baker and Chartier, 1994; Chartier, 1997）。他强调，就算是在文化实践的领域中，文本模式的适用性也严格受限。他警告说，“经验不能被化约成话语”，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警惕滥用‘文本’这种范畴，因为对这个术语的实际应用常常是不恰当的……它与话语策略相比，在战术和程序上几无相似之处”（Chartier, 1997:18—19, 20）。对夏蒂埃来说，保持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分极为重要。他认为，“组织话语生产的书面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诠释学的理性，与定性了所有其他实践领域的理性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Chartier, 1997:77）。

但要细致观察夏蒂埃所谓“非话语实践”分析的例子，其中很多具有令人惊奇的“文本”特质，如路易·马兰（Louis Marin）对图像逻辑的分析（1988, 1993），米歇尔·德·塞尔托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分析（1984），以及米歇尔·福柯对规训的微观技术（microtechnologies）的分析。诚然，这些分析所关注的实践的逻辑——图像表征（iconic representation）、城市漫步（urban strolling）或不厌其烦的身体训练（meticulous bodily training），

严格意义上都不算是语言学的逻辑，但从更宽泛和隐喻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文本的”实践；用夏蒂埃对文本性（textuality）的定义来说，这些都“基于由惯例确定意义的符号”，并“构成向阐释开放的符号体系”。[10] 尽管夏蒂埃尖锐批判了他所谓“美式‘语言学转向’”，但他并不否认所有社会生活都是由象征符号构成的。他仅仅强调，构成社会生活的象征实践不能被化约成话语 的形式。夏蒂埃提醒我们，文化史研究的实践中，有很多（也可能是大多数）并不是由语言的特定符号学机制控制的，而是由其他许多极为独特的符号实践（semiotic practices，图像、戏谑、空间、技术、姿势、仪式、规训等）所控制。

我所说的符号实践，指的是通过某些符号进行信息交流的实践，因此它们向阐释开放。我同意夏蒂埃的看法，认为把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作为符号学实践的一般能指会有误导性，可能会让我们忽略由非语言规则运作的实践。但我认为，夏蒂埃的观察与其说是驳倒了贝克关于所有人类实践的“话语”构成的观点，不如说是使其越发复杂和丰富，指出意义世界远比言语和书写的世界宽广。[11] 夏蒂埃提醒了我们，世界是文本的说法终究是一个隐喻，而我们对意义的隐喻性“写入”（inscription，也就是我们的符号学实践）是固化在包括语言在内的许多媒介里的。以亲属关系为例，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真正的语言现象：确实存在基于亲属关系的一套结构化的术语，也确实存在许多规定了亲属间恰当形式的感受和行为的话语。但作为一个意义体系，亲属关系也是被“写入”或者说是固化在性、繁衍、金钱或物质商品的交换，还有安全感、愤怒感和忠诚感里的。[12] 亲属关系不仅限于“写”在文本或言说中，还被“写”在身体和物质财产的脚本中的。

我认为，要想抓住这个世界隐喻化的“文本性”这一本质，可以借由深入考虑贝克所借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一说。贝克对语言游戏这一隐喻的使用似乎说明，要理解我们认为是“社会范畴”的不同实践，关键在于展现它们是如何由语言实践构成的。但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使用“语言游戏”这个术语时，想说明的重点刚好相反。他认为，“语言游戏”隐喻表明，要想了解文字的含义，我们必须理解词语

在其中被使用的、结构化且有目的的活动的系统——“游戏”。确实，文字是这种活动的关键部分，因为它们是语言 游戏。但文字的意义不是固有的，而是由文字在活动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游戏 ’这个术语想要强调的事实是，说出 语言是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Wittgenstein, 1958:11）也就是说，即便特定的活动涉及特定的语言用法，即便语言是这一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但活动（即“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不能化约 为语言。就算这些活动中有很重要的部分由语言构成，但构成这些活动的不只是语言。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开篇中所谈到的语言就明显表现出了这一点。他让我们去想象一种用来让建筑工人与其助手沟通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有四个字，分别是“砖”“柱”“板”和“梁”。在这个语言游戏里，当建筑工人说出一个字，如“板”，助手就要把这个拿给他。这种被维特根斯坦定性为“完全原始的语言”的例子清楚表明，这种由四个字构成的语言，只在涉及建筑的活动或语言游戏里有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类情况下，建筑工人才能拿到各种建材，并把它们用来造房子、庙宇或是仓库（3）。除非明白要造的是什么建筑，明白为什么建材必须要递给建筑工人，以及建材是如何堆砌成结构，不然，单单知道构成语言的字词没有任何用处。的确，维特根斯坦是一位语言哲学家，在《哲学研究》里，他实际上几乎没有系统关注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中非语言的方面。不过，如果我们想要严谨地使用他的概念来分析历史进程，我认为我们需要对维特根斯坦隐喻中的“游戏”层面和“语言”层面以同样严谨的方式来思考。 13

由此，思考许多和“原始”游戏截然不同的情况（最典型的是竞技体育游戏）也许会有所帮助，因为这类游戏中，语言言说本身是相当次要的。以篮球比赛为例，不同的动作和有意义的对象当然都有专门的语言学术语，例如“罚球”“传球”“篮板球”“边线”“篮板”“控球后卫”“三分线”“背身单打”“跳投”“挡切战术”“大前锋”“假动作”“快攻”“三秒区”“造犯规”“紧迫防守”等等。篮球中的许多方面都会用到语言，有书面的规则、兴许由裁判口头解释的违规、靠语言建立和解释的比赛战术、教练告诉球员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指导，联赛中代表城市或学

校参赛的球队，球队与所在城市或学校间的等同，都是靠无休无止的谈话和书写维系的，也都表明篮球运动是由语言构成的。但多数让篮球比赛得以运作并区分有技术和平庸的球员或球队的知识和战术，首先由身体和动作构成，而非语言。球员要完成跳投或灌篮，靠的是彼此的眼神交流，而非言语沟通；这两个动作也是靠肢体的模仿和重复来掌握的。在教授篮球技巧的过程中，语言的角色本身对动作的语域而言十分关键，例如“确保投球前你已经跳到最高”“给球加点弧度”或“延长你的随球动作”。可以说，这种动作知识本身构成了一套符号系统。拥有运动能力的球员，能发出和回应其他球员的肢体信号，也有能力进行有意义的动作创新，从而引起队友和对手的回应创新。这些信号和回应也能被有认知能力的观察者所阐释和理解。有种说法是，因为战术通常基于动作的欺骗，所以打篮球的运动能力是符号性的，就像假动作模仿了跳投的开始动作，旨在让防守球员起跳来阻挡预期的投球，当防守球员正在下落时，投球者能趁机完成不受阻碍的跳投。可我极度怀疑任何认为这种系统由真正的语言规则运作的说法。我们可以把篮球的动作维度分析为有语法和语义，或是由与其他符号的对比关系确定其自身意义的符号系统。但我怀疑的是，使用全然话语或语言学的模式开展分析，可能会在根本上误读比赛的动力学，错失真正赋予篮球特性的独特逻辑，甚至一般的动作知识体系。14

思考诸如篮球这样的游戏，能强化和激化夏蒂埃反对当前的文化史暗含的语言还原主义的论点，并重新评估贝克提到的语言游戏一词的含义。实践（或语言游戏）多样而相互关联的诸领域，构成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它无法化约成通常所谓的话语。但我认为篮球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些实践或语言游戏是有意义的行动的复杂系统。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是符号系统；换言之，因为它们将话语与非话语性的符号实践相连，我们可以称它们为符号复合体。由此，它们和通常用来研究语言现象的方法大家庭之中的成员一样，都通过明确让人类行动者有能力生产出实践的范式或符码，来解释所观察的实践的特征。要想纠正我在第二章论及的文化史中“社会范畴的薄化”，就要大大拓展文化史研究的论域和野心。为此，我们可以把我们对严格意义上的话语（即语言表现）的关注，转向具体说明有意义的实践所蕴符码或

范式的尝试。这种尝试或许抗拒语言分析，也可能在传统上被当成是在因果上限制或形塑了话语的某种“非话语的社会现实”。这种尝试的典型例子已然可见，如理查德·别尔纳茨基（Richard Biernacki）对19世纪英国和德国工厂里极为隐晦而实际的雇佣劳动概念如何构造了工作经验的研究（1995），华康德（Loïc Wacquant）对拳击手的身体实践的研究（1995, 2004），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对物理学机械仪器的“语言”的研究（1997），还有安东尼·华莱士（Anthony Wallace）对19世纪美国的机械思维的符号学作出的简短又精彩的补充（1978:237—279）。

当贝克称自己提及的社会性维度也指涉由话语构成的行动领域，上述这种历史研究的纲领就仍属于贝克学说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算扩大或隐喻化这一版本的贝克的学说，这种历史研究纲领仍然在贝克所界定的范围内：他提及的社会性仍然指涉由某种符号 实践构成的行动领域。可一旦指出这种研究揭示的范式或符码很可能受另一套形式、媒介、语言符码都极为不同的符号逻辑控制的话，那么贝克的说法就要面临重大调整。这种文化史的激进化，并不体现出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已有的话语方法，如文学批评或“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来简单地理解不同“语言游戏”间相互关系；相反，这种文化史的激进化，意味着要寻找更多不同的符号学方法。[15] 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更为细致地关注不同媒介里出现的、采用各种不同逻辑的符号实践是如何相互衔接 的。

## 衔接问题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我所说的“衔接”有三条解释，一指“接合（jointing）的行动或过程”，二指“被接合的状态”，三指“接合或交汇的模式”。在话语中，衔接意味着不同话语处于彼此连接或“接合”的状态。用后结构主义的话来说，接合不同话语的操作通常被称作“缝合”（suturing）。相比而言，“衔接”能用来指已连接的话语间的自然接合，一如人类体内节节衔接的脊椎，而“缝合”可以指外科医生把之前相互分离的肌理缝在一起的积极干预。对文化史来说，话语的衔接

或缝合问题不可或缺。例如，莉奥诺·达维多夫（Leonore Davidoff）[3] 与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曾论及，在19世纪的不列颠，一种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话语如何附着在有关中产阶级家庭的话语中，并形成了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观念（1987）。我也解释过相似的情况，即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后几年，激进工人如何把个人自由的话语与行业团结的合作话语接合起来，创造出围绕“社团”（association）这一关键术语展开的原社会主义（proto-socialist）形式的阶级意识（1980：194—218; 1981）。在这两个例子中，文化史学家解释了特定的、有动机的语言发明行动如何融合或接合了之前不同的话语领域，从而永久影响了如今已经相互衔接的各领域中的语义与句法。

可一旦领悟到这些话语自身是嵌进“语言游戏”的，有关衔接的问题就会立刻变得复杂。如果顺着我上文的阐释，那么，总体 上构成语言游戏的不只是语言。任何认定话语是语言游戏的讨论，都要考虑语言实践和其他形式的符号实践的衔接，两者共同相连才构成了语言游戏。当然，文化史学家无疑已将该问题纳入研究之中了。所以，当达维多夫和霍尔讨论中产阶级家庭的话语时，既引用了诗歌和手册，又说明了这些话语如何同新的建筑形式与园艺实践相衔接，从而让这些话语在诸如伯明翰的埃吉巴斯顿（Edgbaston）[4] 等社区中得到特定的、高度强化的物质性实例（1987:357—396）。又如，在讨论19世纪早期法国手工业的行业语言时，我解释过话语如何与特定的手工业者组织的形式，以及手工业者在作坊中控制生产的方法衔接起来（Sewell, 1980, 1981）。相似地，回到我之前举过的篮球运动这个例子，它也包括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符号实践间的衔接。篮球中不同的肢体动作和战术，是被同时衔接到那些被称为教练和球员的技术话语、年轻非裔美国城市男性之荣耀的生理符码、篮球评论员的媒体话语、规制了球场上比赛进程的规则架构、体育明星的广告话语，以及与天才球手输送一道制定球手经济收入的财务策略等之中的。我坚持认为，一旦开展文化分析，就会直面不同符号模态之间相互衔接的问题。

语言游戏不同模态之间的连接，通常被认为会形成一种或多或少

稳定的联合。比如，篮球的动作战术和控制比赛进程的规则是相互维系的。正是语言同其他符号实践的相互协调，最先构成了语言游戏。[16] 但这种接合远不算完美。出现在不同符号实践模态衔接中的不完美和滑移，对我来说，似乎是这些游戏（即社会生活）之整体形态变迁的重要素材。沿用篮球的例子，有一类重要的动作战术是发明新技术，使之既符合已有规则，又能改变现状，以利于使用这种战术的球队的需要。这会引发规则的补偿性变化，从而引发新的创新，并进而引起规则新一轮的变化。最终结果是，随着时间推移，规则、肢体动作和比赛的整体形态都会发生显著变化。早期篮球比赛中的创新，就是雇用格外高大的球员，他们有能力停在篮下防守，当球快要到达篮筐的时候，只要轻轻跃起，便能阻断球路。其结果是采取了这种战术的球队，便有可能压制所有其他球队。这让制定规则的机构引入了新的犯规原则，即所谓“干扰入球”（goal tending），它禁止防守球员在进攻球员投球、球位于下降轨迹时向下时触球。[17] 从那时起，这种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动作战术家找到利用球员身高优势这种新方法，而规则制定者试图以消解这种身高优势来回应。规则制定者的应对之道包括引入“三秒违例”，避免高个球员面对进攻时在篮下过久停留，同时加宽了罚球圈，扩大了三秒违例的施用范围，还引入了三分线，让远距离投球获得更高分数，给能在远距离投球时命中率较高的矮个球员提供优势。这些都使动作和规则的符号实践不断协同进化，相互衔接，构成了篮球比赛。

不同模态的符号实践之间滑移的生成性，几乎不限于篮球这样的一整套符号实践。比如，威廉·雷迪近期关于情感史的研究中，滑移的问题就很重要。雷迪认为，情感的话语词汇是和感受的变化相互衔接的，这鼓励或抑制了某些感受的状态，并导致了特定时空中出现不同的情感文化。但他也认为，这些情感文化从不固定，因为即便情感话语深深形塑了感受的动力，但就本质和逻辑而言，情感和话语极为不同，所以不能无缝匹配（2001）。本书第八章中关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攻占巴士底狱的研究，也说明了衔接中滑移的问题。我已经解释了1789年7月14日后的几天时间里，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如何把这场城市叛乱再现为主权人民的正当起义，并由此在城市暴力的模态中，衔接了革命新的、至关重要的范畴中的人民主权话语。城市群众行动的符

号学与人民主权理论的符号学相互衔接，改变了彼此的意义和潜力，并强化了群众的权力与人民主权的意识形态。这种创造了新的政治范畴“革命”的衔接再也不可逆转。革命的精灵一经获释，便再也无法塞回瓶中。而与此同时，革命的语言游戏变动不稳，随着群众暴力再度兴起，政治理论便不断进行着新的调整，而理论中的话语创新又引发了新的“革命”暴力出现的可能。不同种类的符号实践相互衔接后的滑移，成为历史变迁的重要来源。

但此类滑移仅是不同符号实践的衔接错置（articulatory misfit）中的一种。与之同样重要的，是正在衔接的实践所在的不同范围、尺度或位置上的错置。我再来用篮球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在前文中指出，篮球中的动作战术和年轻非裔美国男性之荣耀的生理符码是相互衔接的。由于大学从非裔美国人的城市工人阶级社区中招募了很多优秀的球员，教练、裁判和白人球员发现，比赛还要适应和控制特定非裔美国工人阶级的规范，这些规范约束着有关身体恐吓的主张和抵抗。彼此不同但相互衔接的符号实践（非裔美国工人阶级社区之荣耀的符码和大学体育馆里的运动实践）在空间或位置上的错置，导致了肢体动作和情感态度的显著变化，即便是成长于富裕的白人郊区的大学篮球运动员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还有一些例子中，相连的符号实践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运作，二者的衔接似乎采用的是无声的强制，而非语言学或诠释学模型所假设的主体间的理解。以中产阶级的财务稳健性这种语言游戏为例，无论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阪、奥斯陆、台北或亚特兰大，他们都会留出一部分存款，以备未来之需。这种语言游戏显然涉及以复杂的方式相衔接、并通常互相强化的一些符号实践，如节俭的话语、维持存款数额的实践、延后消费的特定策略等。但所有这些实践都与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期货市场间接衔接，市场的波动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暴涨或扫清一位中产阶级储户的户头。只要稍想就能明白，货币期货市场也属于我在本章中讨论的语言游戏。从外汇交易员的角度来看，阿根廷比索与日元是一场高风险游戏里的筹码，这场游戏是一个极为自给自足的符号系统，拥有自身的规则、策略、范畴特点、词汇、信号、奖励和动机。但货币贸易交易游戏的起伏的结果，可能导致与之相连的其

他游戏中的玩家遭受重创。2001年阿根廷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便是一例，当交易员系统性地卖空比索后，阿根廷的储户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账面存款的价值严重缩水。在此过程中，阿根廷中产阶级财务稳健性的语言游戏本身也被金融海啸暴力拆解，掠夺了游戏参与者的财富，降格了节俭的话语，存款行为由此被抛弃，大宗购买不是被短期推迟，而是被无限期推迟。

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资产阶级储户来说，阿根廷比索的危机似是某种极端的情况；暴力和不可预测性构成了符号实践间衔接的特点，语言模式似乎失效。对于这类衔接，我们似乎倾向于举手投降，转而讨论系统性力量或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但如果想要理解这种地方行动者被其全然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毁灭的社会悲剧，我们需要试图重构具体的符号实践及其衔接以得到更多的分析成果，而非影射“系统”或“动力”。事实上，这种“宏观”的概念只有被具体指明的时候，才会有分析效用，比如解释系统或动力是如何由相互关联的语言游戏构成的。我们也常倾向于认为，宏观或微观的进程是正在进行的，或至少是在不同“抽象层次”上可被理解的。但外汇交易员的符号实践，其实和中产阶级储户一样具体（也一样抽象，因为两者都在处理高度抽象的价值符号）。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外汇交易员在工作中所使用的技术，让他们有能力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中操作，而且他们的活动碰巧涉及更多资源，他们每天的交易额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远远超出阿根廷中产阶级储户中最积极的人的想象。

我们所认定的宏观关系，大部分是仅仅衔接了权力极大和范围极广的符号实践。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关系并非唯一的例子。类似的社会悲剧，诸如无人飞机射出的导弹把一场阿富汗乡村婚礼炸成碎片，或是叙利亚移民工人因为二十年前犯下的一桩小罪而骨肉离散、被逐出美国，都能用类似的方法得到解释。正如这两个例子所表明的，以军事和民事为伪装的国家，是一个覆盖域极广且权力极大的符号实践网络。由此来看，它很像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语言游戏的集合。国家的语言游戏与普通人生活的衔接，也可能显得极为专制和暴力。然而，除非细致观察过很多不同范围和尺度中具体符号实践的特定衔接，不然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这种专制和暴力。至少暂时而言，我

们似乎有必要指出，最好把微观和宏观关系之间的差异，理解成不同范围和尺度下的符号实践间的差异，而非抽象程度不同的实践间的差异。

在结束对衔接问题的讨论前，我想再补充说明一点，即认识到符号实践拥有多种多样的模态，以及语言游戏总是包含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模态间的衔接具有什么样的分析性价值。在我看来，作出这样的区分，要远胜于把语言的概念延伸到覆盖所有符号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能让我们认识到语言所具有的某些十分重要的特点，这类特点在其他于我称为语言游戏的实践束内相互衔接的符号实践中或是缺席，或是不存在。我首先思考的是语言的自反能力（reflexive capacity）。语言有能力反射自身，用较为抽象的话来说，语言的使用者有能力把自己及其同伴所使用的语言（或者是图像和运动实践）用语言反射出来。事实上，使用者可能对这些反射本身作出了反思，琢磨自己用于反射的语言是否足以达到她的目的；又比如，是否需要用弗洛伊德式的论点补充其常用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评价话语。

无疑，其他符号模态也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自反性。比如，艺术史学家指出，画家在评论艺术表现的已有传统时，或许会讽刺性地使用裸体画的风格传统，也可能会发展一种使人注意到绘画媒介的风格。又比如，篮球运动员可以通过夸张模仿对手的肢体动作，来达到欺骗的目的。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实践具有特殊性：比如，语言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和复杂性，能通过动词的时态表现出时间性，或是能区分出直陈式、虚拟语气和条件语气。这些特殊性都让语言成为一种极为适合反思和评价的媒介。我对篮球中的动作创新和作为回应的规则创新之间辩证关系的讨论，能用来说明语言作为一种反思的媒介的特殊价值。让个头特别高的防守球员驻守篮下，来破坏对手投球的这种动作创新，能在比赛中造成危机，可能会大大降低比赛的得分和观赏性。但这种由动作产生的问题是由语言解决的，例如制定运动规则的机构通过商议来改变成文的规则。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商议和解决变更规则、保护比赛完好的问题。此处，篮球照例被当成社会生活整体的象征；其中，语言里的反思、商议和论证，在支配各种符号实践中扮

演了不均衡的角色。换言之，我乐于承认，把语言选为符号实践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形式或许是合适的，因为语言的自反能力令其能够支配各种符号实践，从而对这些符号实践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只有我们愿意把语言的概念限定在恰当范围内，而非宣称所有人类行动都是语言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正确认识语言的特殊力量。

## 超越符号模式？

在对社会范畴的重塑中，我们走到哪一步了？我是从考虑语言学转向提出的本体论立场开始的，这种本体论立场认为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即“社会范畴”）是以语言 为媒介来建立和维持的。而我也曾提出，我们要把这种认为社会范畴是“语言的”这一论断推出语言或话语本身的领域，以适当地包含其他类型的符号实践。这种符号实践与语言大致属于同一谱系，因为我们能用类似的方法论程序，对这种符号实践进行有效的解释或阐发。如此一来，社会范畴应该被概念化为不仅由语言中介构成，还由创造并维持了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的所有种类的符号中介（如运动、图像、建筑和情感等）构成。我进一步认为，我们需要对不同符号实践间的衔接 进行尤为细致的观察，因为构成社会范畴基本单元的“语言游戏”本身是在多种媒介中的符号实践里合成的。我特别强调过，不同符号实践间的接合或衔接是社会生活中张力和转型的重要来源，因为在实践相互接合时错置在所难免。错置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符号实践体现在逻辑不同的各种媒介中（如动作、言语、建筑、图像和价格等）。原因之二，是构成语言游戏的各种符号实践在覆盖范围上往往不同，这意味着在特定语言游戏中衔接的符号实践，也很可能被衔接到其他语言游戏里，在这里，它们和其他逻辑截然不同的符号实践相连，从而反过来通过最初的衔接点作用于原初的语言游戏。（想想篮球和非裔美国城市男性荣誉符码的案例。）我一直在阐述的这种符号模式，说明社会范畴是一个复杂的网络，语言游戏是在其中衔接的节点，衔接的是各种相互重叠又形态各异的符号实践。所有这些肯定远远超出了社会范畴由语言构成这个原始定义。我也认为，这有助于丰富社会范畴的意涵，并且没有偏离语言学转向所定义的广阔论域。

但有这种社会范畴的符号概念真的就够了么？就算语言是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中一种主要甚至是最 主要的中介，那是否会有一些无法用符号学的方法完全捕捉到的、重要的社会中介的形态？由于定量方法和实证主义认识论长期主导了美国的社会科学，多数社会科学家（或至少是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之外的大多数）都会认为，单靠符号学方法无法充分理解社会世界。阐释性方法（常被叫作“定性”方法）在所谓“硬”社会科学中整体处于边缘和守势。与阐释主义者的范式性解释相比多数社会科学家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我称之为机械论的解释形式。机械论的解释擅长于明确因果，而非范式或表现。符号学的解释只能应用于人类，而机械论的解释显然能应用于说明物理性质。而借机械论类比人类关系，则是社会科学长久以来的首要目标。在最简单的机械论解释里，一些现象（因）的存在决定了另一些现象的出现（果）。所以，用热量把水温升高到100摄氏度，就会导致了水的汽化。当然，支配社会现象的定律总是采取概率性的形式，这是因为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极为复杂。通常来说，采用机械论来进行解释的社会科学家，倾向于效仿自然科学家，赞成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使用形式化的计量手段，如搭建数据库、制表、计算比率和百分比，以及进行统计检验。定量研究的支持者，通常相信社会范畴是由具有可测量的属性或变量的稳定实体和可以用类似定律的形式来表述的变量间因果关系组成（Abbott, 1988）。就算有例外，这类学者还是倾向于轻视阐释性研究，视之为“文学”或“非科学”，担不了社会科学之名。

就算我搭建好了自己那部分数据库，绘制了自己那部分图表，但在阐释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认识论斗争中，我还是坚定站在阐释主义者的阵营。但我也认为，拒绝定量研究和机械论解释的做法是鲁莽而幼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阐释性社会科学这座房间里的大象，也就是各种符号实践所面临的、时常出现的强势经济约束和压力，这些都不只是当下才有的情况，起码在约五百年前、资本主义时代刚刚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了。经济学家成功地让自己成为这类约束和压力的极佳阐释者，宣称必须要机械地理解它们，并采用定量研究的手段。无疑，我们很难拒绝这种说法，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似乎已经帮助经济学家抓住了经济关系的要义。我认为，尽管定量对经济学研究

而言不可或缺，但这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特殊的符号性。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的著名论断有云，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倾向于把所有定性关系转变成有关经济价值的定量关系（1977）。在我看来，商品形式自身必须被理解成一种文化建构。货币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系统，它在各种看似无关的事物间，如在孟加拉织工的技能、堪萨斯小麦的产量和在圣保罗提供信贷的途径间，建立了量化的等价关系。但这种定量的象征形式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现实的抽象化”（real abstraction），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世界的真正质地（Postone, 1993）。有人会说，商品形式的无处不在意味着所有不同的符号实践都被衔接到了一种尤为强势的语言游戏谱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之中，其形式在本质上是定量的，也由此可以进行数学分析。

对支配性符码的阐释和处理，维系或转变了构成社会生活的符号实践。通常来说，参与符号实践的不同行动者，对各种符码阐释或处理的意义有着一种主体间的理解。资本主义语言游戏的特殊性，在于所有商品都是通过货币这种普遍的、世界性的象征媒介彼此间衔接起来的。由此，游戏中的行动者会时常受到来自自身可及的符号范围之外的行动的冲击。故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者为例，他们既要忧心与自己直接衔接的语言游戏中出现的变化，像是时尚产业或羊毛和人造纤维等竞品的生产，还要忧心和他们棉制品生产者关系甚远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会对他们产生残酷的定量约束，例如股市波动、借贷成本，或是不同货币间的汇率。这些资本主义语言游戏的参与者面临的社会现实中的极为重要的方面，从现象上呈现为价格数据波动的综合，它们通过看似无声的机械性因果关系，而非符号性符码的主体间调整来影响参与者。倘若如此，如果身处最强势和最广泛的、形塑我们生命的语言游戏复合体中的玩家，以定量和机械的形式来体验他们相互关系中的重要方面，那么，即便是基于单纯的符号模型的社会范畴概念，也需要考虑定量的方法。所以，作为坚定的阐释主义者，我必须支持接纳定量推理在方法论上的必要性。

但我断然不支持定量社会科学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形态错把社会世界的可量化性视为本体，错误地假设了世界在性

质上必然是由可量化的单元构成，并认为这些单元正是世界的本质。我认为这种观点会造成反常的、严重的后果：它遮蔽了无数资本主义语言游戏能生产可量化的社会关系形式这一符号学性质，删去了资本主义语言游戏以其与其他一系列不可量化的符号实践之间的衔接形塑自身的方式，掩盖了我们对量化的着迷本身产生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普遍商品化的事实。关于最后一点，即我们的文化对统计的着迷，有个简明而不高明的例子。人们在翻报纸上体育新闻版（与本章的次级主题对应）时，就能读到各种统计数据：如棒球员的击球率和长打率，以得分、篮板、抢断和罚球的百分比给篮球球员排名，或是橄榄球四分卫评分与电脑排名。体育迷也成了统计数字的狂热消费者，这是当代文化之细小又具有说服力的事实。

所以我认为，主流社会科学的错误在于把社会生活可量化的特点当成其本质。实际上，这种特点历史性地产生于可量化的资本主义语言游戏的兴起和转移扩散。但我不会用这个论点来揭穿定量推理的真面目。如前文所述，要理解资本主义语言游戏调动的人类关系相互依存这一极为真实有力的模态，定量推理是很重要的。但此外我也认为，定量推理能让我们意识到和分析即便是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关系的可量化性。此说看似自相矛盾。如果像我这样假设所有社会关系都是由符号生成的，那么，定量推理或机械性的因果模式，为何能让我们观察到符号研究自身无法轻易触及的社会世界的特点呢？

我认为，要把定量推理的效用和机械性的因果模式的效用分开考虑。定量推理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类行动中的规律性是由各种符号实践（主要是因为它们源自或多或少稳定的符码或范式）所生成的。一旦商品形式普遍化，我们便能构想，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量化编码就成为可能，符号生产的规律性就能用数学手段来处理和阐释了。所以，定量推理强有力的抽象、缩略和概括的方法，可以优雅地捕捉和表述符号视角难以把握的语言游戏的规律性。击球率的例子告诉我们，统计确实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棒球比赛的知识；但即便比赛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的，其根本的符号形式却基本不是资本主义的。击球率无疑将托尼·格温（Tony Gwynn）在本垒的符号性表现扁

平化，但也确实告诉我们他下次击球时命中的可能性。关注统计数据的不止是球迷。棒球队也有一套复杂的统计结果，如此一来，球队经理既能了解某个球员的击球率，也能知道球员在面对空垒和垒上有人时、面对左手或右手投手时，或投手站在投手土墩上时，击球率有怎样的差异。在球队经理进行战略决策时，这类统计数据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比如是否使用一名替补击球员，或是否派出一名左手替补投手。

这么一来，我们就能从完全实用的角度论证量化的效用。在击球率等例子中，数学手段概括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让我们得以厘清单靠阐释性的手段无法准确说明的现象。所以，思想史学家使用大型的语言数据库来追溯词语新用法的出现时间，社会史学家绘制出一段时间内各种形式的抗议的涌现情况，辨识出食物骚乱和抗税运动何时会让位给罢工、游行和政治集会。[18] 在其他场合，定量研究权充代理之用，因为不可能借此获得有关符号实践的全部信息。历史学家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早已亡故，无法直接观察，更不必说访谈。故此，历史学家在研究大众宗教实践的变迁时，转向分析亡人遗嘱中请求弥撒的频率，或通过计算婚礼见证者中商人、律师和医生的比例，来分析19世纪各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Vovelle, 1973; Sewell, 1985b）。这种实用的简化应该也是必要的（起码是可取的），即便是在能得到的符号史料基本充足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

鉴于符号实践是和其他很多覆盖范围极为不同的符号实践相互衔接的，即便是地方性极强的研究，如果没有得到某种形式的简化，也很容易失控。例如，要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资本主义体面生活之当代实践，就不得不讨论到世界货币期货市场中的投机活动导致的2001年的比索巨幅贬值。这些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过。即便研究者有能力细致分析纽约、新加坡和伦敦的货币期货交易员的符号实践（Salzinger, 2003），他也可能认为，这样做绕开了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中产阶级的注意力。要是转而依靠对比索兑美元汇率暴跌的定量概括，这位研究者的分析就无疑可靠了。对缺乏有关过去的仪式和话语的史料的历史学家，和对无法细致研究其论题中相互衔接的所有符号实践的民族志学者来说，在不放弃所有社会关系都由符号实践构成这一点的前提

下，定量技术无疑是可用与正当的。

## 未预结局问题

机械因果论的议题，似乎也会引发难解的本体论疑团。如果所有人类行动都是由符号生成的，我们又为何要求助于采用机械性而非符号性逻辑的各类解释呢？从本体论来说，机械因果论与社会生活的符号学概念根本不相容。但我认为，人类社会行动中有一个无处不在的问题——行动的未预结局（unintended consequences），能使机械因果论有了说服力。在分析资本主义语言游戏时，我简略提及了这个问题，认为参与者定期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而造成波动的原因在他们的符号实践范围之外。但未预结局显然不局限于经济行动的场域。人类行动时常付诸歧义性或多义性的符号，即便是在同一场语言游戏里，其他参与者解释与使用符号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故此，行动的结果偏离了任何特定行动者的意图。行动者永远无法确定其他人如何回应一桩事件或一条信息；于是乎，所有行动者的行动综合在一起的效果，可能会破坏每个单独行动者的意图。由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是相互衔接的，某一游戏中的行动便会受制于其他语言游戏中的阐释和回应，而后者中的最初的玩家可能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行动者永远无法充分意识到让他们的行动得以可能的条件，而这些条件还会在行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变化，从而让行动偏离了他们的预期目标。又或者，这些条件会使行动的效果产生系统性的偏差，产生非预期性的、（至少在最初）难以辨别的累积后果。

由于同时分析并参与社会生活，我们常常遭遇到我们所认为的行动的阻碍或行动效果的阻碍。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以及我们研究的人们身上，“看不见的力量”或“无声的强制”似乎发挥着作用。这些力量或强制有可能强化或者弱化各类符号实践的效果，强迫人们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让他们有能力去做自己从未想过能去做的事，或是使行动产生与发起人的预期大相径庭的效果。我们不断体验到自身符号知识的不足，体验到自己缺乏控制后果和认识行动条件的能力。这让我们称之为社会范畴的人类关系之相互依存显得极为庞大又难以控

制，其作为人类存在终极基础的神秘性得以不断恢复。我认为，正是无法控制社会范畴的经验，让机械因果论变成一种分析社会生活的可信办法，从而似乎能合理地把“社会范畴”看成是一个场域，其中不知名的因果力量或体验，即遥不可及的规律性，在我们身后支配我们的生活。

未预结局显然早就是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定义经济学的问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有一句自相矛盾而又有力的断言，即在自由市场的体制下，行为都是自私的，丝毫不考虑自身对公众的后果，却有利于公共利益（common good）。自此之后，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解释，在以金钱为中介、以获得物质为动机的匿名交换体系中，市场如何能运用一种逻辑，来不断逃出各类经济行动者或有益或有害的狭隘目的。因此，经济学的确是研究未预结局的科学；也是因此，经济学似乎是一门非常糟糕的科学，它利用日益复杂的计算手段，反复论证着面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时人类智识的弱点。但该学科的道德主旨恰好相反：其实一般来说，经济学是一门相当乐观的学科。虽说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是类似物理学的准演绎性的数学科学，但它也是一门实用的数学诠释学，旨在破解经济波动的疑团，使我们得以控制它们。每每发现经济行动者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了阻碍，经济学不仅为我们提供（至少是指出）要如何规避或抵消阻碍。尽管经济学发展出了运作于经济行为者背后的因果机制的数学模型，其预期的实际效果则是要让这些机制变得可见，并发展出能让经济活动置于人类目的控制下的符号协议；换言之，就是让它们不再单纯是机械性的。

在用这种实用的数学诠释学明确解释资本主义语言游戏时，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力量已经得到了证明。在世界各国政府，或类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极具影响力的准政府机构中，经济学家往往身居高位，制定大量重要决策。至于他们在管理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上到底有多大成效，显然是有争议的。关于经济学的效果，有个老掉牙的笑话，它说经济学是一个真正反周期的行业，因为最需要经济学家的时候总是在出现整体性经济危机的时候，而这正是他们最能明确证明自己无法理解或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但我们也要留意到，在

过去的几十年里，公共机构以外的领域对经济学家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形式经济学是资本主义语言游戏中的一种愈发重要的符号实践，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食物链的顶端。这是急速成长的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专长之一就是用数理经济学的手段将金融业务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发展在我们学术界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涌入商学院，商学院教员的收入也在飞速增长。当代专业经济学与逐利性商业活动结合的例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该公司的两位创始人罗伯特·C．默顿（Robert C. Merton）和迈伦·S．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98年倒闭之前，该投资基金的资产名义价值曾一度高于美国政府预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及其所导致的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几近崩溃，善意地提醒人们，经济学家实用的数学诠释学并不足以掌握一切。但经济学家发展出的数学手段仍然指导着大量金融产业，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经济学至少被看成是资本主义语言游戏中的重要参与者，为市场的神秘运转提供了能够控制的元素。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讨论经济学，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其他社会科学家都该效仿经济学家。事实上，我坚信经济学家对数学手段的使用，显著增加了其思想上的力量；但他们对数学手段的沉溺，也同样危险地局限了他们的视野，将很多不能用数学手段来揭秘的关键性经济问题置于学科界限以外。在我看来，缺乏严谨的阐释性研究纲领的经济学，作为一种实用的诠释学是残缺的。但我认为，经济学的重要性在于，这种最为机械性的社会科学，实际上也有一种反机械的实际主旨，其内在目标是发展数学和非数学的符号协议，使得明确的符号控制，即对不同资本主义语言游戏中的符号实践施加各类规制的政策，能够制约看不见的机械性经济力量。[19]

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用明显的机械因果论展开的讨论里，也出现了相同的内在目标。当社会科学家谈到机械性约束时，其效果是让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复杂过程变得清晰可见，也由此让思想干预成为可能，比如讨论较高的社会阶层出身如何使人在知识和教育优势之外得以取得经济和事业成功，或是讨论“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如何

限制了女性获得更高的公司权力（Morrison, White, and Van Velsor, 1987）。在这个语境里，“玻璃天花板”是一个尤为深刻的隐喻。这是商界女性在晋升过程中不可见又在某种意义上极为真实的障碍。社会分析家们通过让我们意识到了这种看似机械性的障碍的存在，有效地敦促我们弄清是哪种语言游戏里的哪种符号实践造成了障碍，又要如何去改变这些实践来消除障碍。这一主旨甚至存在于基本上不怎么明确考虑政策问题的历史学或人类学中。于是，历史学家通过说明非预期性的、未被认识的社会过程实际上是由复杂衔接的符号实践建构的，证明了这种建构能被，也在历史上一直被符号实践的变迁修复、毁灭、重构、抛弃或投入的不同应用中。

简言之，社会科学家对机械性解释的依赖（就像他们对定量推理的依赖一样），可以被正当化为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举措，一种抽象、缩略和概括我们认识的现实最终由复杂衔接的符号实践构成这一点的手段。在这种阐释之下，机械因果论的语言应被看作是一个中转站，其目的是用更为阐释性的方式解释建构现象的人类实践；这种解释和单纯机械性的解释不同，也会（至少能在大体上）包含现象如何得到解构或重构的迹象。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家参与了机械性的论证，而是他们常常让论证物化，假定社会世界事实上是 由复杂的机制构成的。我认为，合适的研究程序不是将机制物化，而是应该把机制性的论点作为实现社会科学真正目标的手段，也就是把看似机械性的起因去物化（dereifying），明确事实上建构了人类社会行动的未预结局和未被认识的条件的、相互衔接的符号实践。[20]

## “社会建构”的意义

不难发现，“社会建构”这个隐喻已经在之前的几个段落里反复出现了，部分取代了本章开篇中讨论的语言隐喻。从字面上看，建构的隐喻似乎不在语言学转向所标识出来的论域里，而无疑隶属社会结构的“构件”观念所在的隐喻领域里，和阐释性社会科学分庭抗礼。但近年来，“社会建构”的隐喻（和概念），在阐释主义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中相当显眼。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1966年出版的名作《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里，首先引入了“社会建构”这个术语。只要快速检索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在线目录会发现，在此书出版后的十年里，社会建构这个术语只在两本馆藏图书的标题中出现，但在1977年到1986年间有19本书，之后17年中有不下88本书在标题中用到了这个词。这个统计还没算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几十本书的副标题里出现的文化建构、语言建构、历史建构，又或是科学真理的建构、疯癫的建构、社会性别的建构和同性恋的建构。这当然也不包括许多在题目之外用到了社会建构隐喻的书和文章。有关标题的经验数据说明，社会建构的隐喻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流行，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降已然极为常见。这一时间节奏几乎与美国人文科学中所谓“文化转向”的时间完全吻合；而在历史学界，这一节奏也暗合了文化史的兴起及其对历史研究最前沿的社会史的胜利。

社会建构的隐喻通常用来表示被视为自然或必要的概念或社会形式，如族群、民族、精神疾病、种族或性别角色，实际上是历史上偶连的社会产物，是一系列特定的、复杂的人类行动的后果。建构隐喻的政治主旨是想说明：例如，性别角色可以用某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置，民族也可能会在未来的政治图景中完全消失。其分析性主旨是提供一种历史性的描述，说明某些概念是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如此广泛地制度化、如此彻底地植入习惯、如此筑入假设、词汇和景观中。社会建构的隐喻强调了社会约束和机制具有的历史性或累积性，它们时常影响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到达意想之外的终点。这说明，我们之所以缺乏对我们生活的形态的话语控制，原因之一是行动常常受制于习惯性或根深蒂固的偏见，而我们又无法完全理解这些偏见的符号起源。

有趣的是，早在语言学转向之初，建构语言的构成元素就已经出现了。就像我在前几章提到的，开创了法国的语言学转向的学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第一本名作，就叫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也引入了“语言游戏”的概念，这通常被认为是英语世界语言学转向的起点。在这里，他讨论的是一种假想出来的、由四个字构成的语

言如何构成一种建筑的“游戏”。但建构的语言在这一时期的意义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有显著的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在标题中使用的“结构”一词无疑表现出了他极强的科学野心，因为结构这个术语早已是自然科学中常见的认识论隐喻。而且，列维-斯特劳斯的论点是尤为反建构主义的。他视结构为本质上给定的存在，视之为人类文化形式中表面变化的不变来源，视之为社会科学家要发掘的隐匿现实。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 1966）里解释，他在研究中发现的心智结构（用另一种建筑隐喻来说，其运作很像拼装　）最终是嵌入大脑的生物学结构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和物理学家的结构一样，不是社会建构的，而是永久和本质的。而且，他的结构人类学是完全共时性的，这与19世纪社会科学的进化论风格刚好相反，后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形态安然存在。

比起列维-斯特劳斯，维特根斯坦的理论立场与社会建构主义更为协调。但维特根斯坦从来没有用他关于建筑的例子来探索语言游戏建造了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建筑的语言游戏在文章的前20页之后就消失了，被国际象棋、其他棋类游戏、语法规则、数学、面部表情等等例子取代。显然，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观察首先是为了阐明现有的语言哲学命题，如关于意图、命名、度量、描述、记忆、定义之类的内容。我的直觉是，维特根斯坦之所以选择建筑这个例子，是因为建筑日常的物质性灵韵有助于消解当代哲学话语的稀缺性和抽象性。但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路径本质上是共时性的，他感兴趣的是语言如何卷入各种生活形式中，而非各种语言游戏如何随时间出现、延续和转型。

简言之，语言学转向之初就已经出现了表示建构的语言。但只要该传统下的作品保持着纯粹的共时性形态，建构隐喻的过程性潜力就会处于完全休眠的状态。结构被认为对分析者和社会行动者而言是给定的，但结构如何构成的问题仍未被提及。社会建构的历时性隐喻的出现，标志着语言学转向中所谓的历史学转向的出现，这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繁荣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历时性研究的新兴趣点（见McDonald，1996）。有人也许会因此想到安东尼·吉登斯，

他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谈到，社会学家有必要从通常认为是共时性的结构的问题意识，转向他称之为“结构化”的历时性过程（1976, 1979），或者转向伯纳德·科恩（1978）、马歇尔·萨林斯（1981）和雷纳托·罗萨尔多（1980）等人类学家在同一时期提出的文化的历史转型问题。

正是语言学转向中的历史学转向，让行动过后沉淀的后果引发的问题扩大至此，也让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阐释性社会科学中现实的社会建构这一概念得以广泛传播。但即便竭尽语言隐喻的全力，也不足以解决这类问题。语言隐喻的有用之处，尤其在于解释为何行动会采取特定的形式。为此，它将行动重新指涉回让行动者得以执行特定行动的技能、知识、礼仪、习惯等符码。这显然是一个共时性的程序。但用语言隐喻解释符号性符码为何采取特定形式，或其如何产生、持续和转型，恐怕力有不逮。为了解答这类问题，阐释主义学者转向建构隐喻，它为语言隐喻提供了一种外部但必要的补充。我认为，我们应更明确地认识到建构隐喻在阐释性社会科学的当代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和语言隐喻的不稳定关系。

建构隐喻和语言隐喻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首先是时间性不同。语言学中的索绪尔革命根植于语言的共时性维度对历时性维度的优势，即语言 对言语 的优势。对索绪尔及其追随者而言，前者体现了语言的系统属性，而且只有悬停语言使用中的差异和变化，我们才能发现和明确语言的系统性规则、符码或范式。尽管在原则上认可符码可能会历时而变，索绪尔语言学却把这类变化放在一边，把语言 视为不变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从分析中排除了随时间变化的问题。语言的系统属性也在索绪尔的体系中获得了解释力。要解释言语 （即特定、多样和短暂的语言表现），可以回过头参考构成语言 的系统性符码。本章通篇讨论的这种基本的共时性程序（即我所谓的范式性解释），就位于社会生活中应用的语言隐喻的背后。这种范式性解释的共时性模式，实际上能用来说明符号修辞变化的问题，但仅限于使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它可以借由说明新的修辞从何而来来说明这些新修辞如何从形式上 出现：是从现有符码中某个元素倒装而成，还是将现有修辞中的某一元素与另一种现有修辞接合，形成与原来均不相同

的新修辞。换言之，语言的解释模型能明确转型的形式本质，但采用的方法必须是非时间性的，即将之再现为符号系统中现有元素在根本上可逆的逻辑的再衔接。这种解释模式尚无法充分揭示的是符号实践中转型的时间节律和持续时间。

建构隐喻暗指一种极为不同且完全历时性的时间性。建构是一个源于动词的名词，意指建造的过程 ，它由人类行动者完成，并随着时间推移延续。（谚语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意义的社会建构或文化建构，也暗指一个在时间上延续的过程，需要人类行动者的持续努力。社会建构也意味着意义一旦建成就有留在原地的强烈倾向，例如，社会建构的性别关系或科学真理往往成为被视为自然和广为接受的、持久的世界特性，正如建筑一经建成后就会成为物质环境中的持久特征。建构隐喻暗含的时间性总是历时的，无论它指的是建筑的过程 ，还是建成后的持久性 。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由社会建构的事物都能被概念化为既存在于时间之中，又存在于时间流逝中。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试图用语言学的程序解释社会范畴时，难免发现自己被迫去阐述历时性的维度，诸如有关社会建构隐喻的问题。语言学路径能有效描绘出对历史行动者而言可用的概念资源，也能让人满意地、形式性地分析这些资源是如何在创新性行动中被创造性使用的问题。但至于如何概念化这些行动所具有的持续性后果，语言学路径自身无法提供出路。哪些创新会硕果累累，而哪些又会一无所获？创新的后果如何、为何、在何种程度上背离了发起者的原意？为何一些创新很快转变成了常识，而另一些则依然处于困境和争议之中，甚至被很快遗忘？单纯用语言学的视角无法解答或融贯表述上述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者关注语言创新是如何筑入世界的问题。而历时而成的建构隐喻，正是表述这个问题的一种手段。

这导致了语言隐喻和建构隐喻第二个显著的不同。建构隐喻至少隐晦地强调了被语言隐喻归结为背景的内容，即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21] 语言也许是人类活动中最为非物质性的，除人类身体之外不需要其他物质媒介，而建构（即物质客体的建造）明确、根本地是物质性的。[22] 我已在前文指出，形式上的符号创新本身转瞬即逝，并在逻辑上可逆。只有当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被筑入世界，并能产生长期的、

物质性的、对行动者来说重要的影响，它们才能对既有的符号性符码产生持久的转型。以篮球中的跳投为例，这原本算是极不好看的动作创新，但它最终取代了定点投球，成为球员必备的投球动作之一，成为成功的创新，是因为把这种动作筑入身体技能的球员能赢得更多分数和比赛。这种优势是物质的，也是可证明的：对防守球员来说，跳投的球很难截，原因是进攻球员可能会在全速奔跑时做出跳投动作，也可能在原本背着篮筐的情况下忽然转身、正面投球。相似地，在1789年夏天之后的几个月和几年时间里，城市起义和人民主权的衔接之所以取得成功，并非因为新的符号修辞有形式上的美感，而是因为这种修辞调动了巴黎和外省成百上千的法国男女对国民议会的方案产生的身体和情感能量。这种物质性的能量在1789年8月4日之夜得到证明并广泛扩散。彼时，国民议会利用了新的革命符号修辞所赋予的权力，彻底转变了法国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制度结构，如废除乡村封建庄园体系、废除大量经济和荣誉特权、没收教会所控制的土地，将之转变成“国家财产”（biens nationaux），从而支援新的革命国家的财政。这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彻底的社会（亦是文化与政治）建构项目。国民议会通过采用新的行政和制度秩序、新形式的财产权以及新的国家财政基础，让革命深深筑入公民的日常生活和策略性盘算里。这让革命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在地事实”（fact on the ground），且似乎无法逆转，即便是25年之后拿破仑败北、波旁王朝复辟时，亦无可逆转。我认为，跳投和作为新的政治范畴的革命所表现的情况确实是普遍性的。要解释符号实践（即社会生活）中重要且持久的变迁，我们只能追溯物质世界中符号创新造成的延伸效应，并说明这些效应如何建构了在地事实——这些事实的出现和延续强化了（也可能是改变了）最初的符号创新。

## 建成环境

社会建构隐喻所阐明的被物质性地实例化、在时间上持续的过程，对我理解未预结局问题极为重要。但我也相信，社会建构这个术语就算能说明一些问题，也远不足以作为描述现象的标签。这个术语常用来说明社会世界一些单一的特点事实上是被建构的，如性别角

色、民族、种族差异或科学。而且，运用了这个术语的研究常常强调语言意义的变迁，但又不充分考虑作为语言变迁条件的物质世界转型。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术语，来强调整个社会世界的建构性以及物质性实例化的重要性，这会把任一给定的社会建构都仅仅看成是普遍性建构（并持续重建）的物质社会构造的要素之一。我向人文地理学借用了“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这个术语，因为觉得它能较好地完成上述使命；我也将用本章剩余的篇幅，讨论其作为认识论隐喻的价值。当然，任何一个来自日常语言的术语都不能摆脱棘手的含义，社会科学的学术日常用语也是如此。“建成环境”一词最主要的困境也是在于它有一段本质上是的共时性的过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地理学家倾向于把建成环境一词中的“建成”（built）按照字面上的过去分词来理解，用来表示人类已在地球表面建成的住房、道路、水路、矿井、田野、港口等等的总和应当被视为决定了植被位置、人口流动模式等类似问题的一整套给定的结构性约束。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一代地理学家才用到这个术语所含的过程性的意义，认为建成环境是持续重建的，采用的方式是选择性开发、拆除、建造和重复使用现有物质结构和景观，以及对既有场所、空间和物质结构的意义和使用进行重新定义。本书读者应该比较熟悉这种转变了（参见例如，Harvey，1985）。我在这里要讨论的，也是这种比较晚近的、过程性意义上的建成环境。

我在此将“建成环境”这个术语作为一个认识论隐喻，作为理解道路、下水管道系统、机场、工厂和住房以及整个社会世界的途径。一如语言隐喻，建成环境隐喻同样得益于其建立在物的性质之上。毕竟人这种动物一直在改变环境。人类行动是在物质世界中进行的，但又深刻转变了世界的性质，以适应人类的目的。其具体做法是重新排布世界内的元素，例如通过农业、工业，以及建造建筑和通信设施。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确在字面意义上建造并持续再造自己的物质环境。建成环境和语言一样，对我们既有约束力也有推动力。我们出生在建成环境之中，就像生在语言之中。建成环境是我们的社会存在的强大中介。我们的每日常规、我们的互动对象、我们谋生的方法、我们对可操控世界的界限的感知、我们聚集人群来协调行动的手段，一直是由建成环境这一既推动又约束的中介来调和的。人类活动也反过

来改变了建成环境。人类活动持续重建了我们栖息的世界，但重建的方式又是基于建成环境已有的约束和可能性。因此，已在空间上固定的、现存的资源储备，会持续对未来的社会世界产生影响。

建成环境的这些特点也能被隐喻性地延伸，从而成为整个人类生活的特点。我们生来就在固化的常规、制度环境、判断习惯和生产方式之中，这些是我们人类相互关系的中介。但是，通过依照生活中特定和给定的形式行动，我们能再生产和改变常规，替换或改革制度，学会用不同方式作出判断，并发明新的生产技术。我们不仅在生活中留下了由集体行动转变的物质构造，将其留给后人，还能在行动中交织出拥有新的模式、新的资源分配和新的符号实践协议的社会构造，以构建后人的行动。不过，现有生活的形式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inertia）。这些形式常常能在时间推移中持续，在充满社会转型的片段中保留下来。隐喻性延伸后的建成环境概念的方方面面在马赛码头工人的例子里表露无遗。复辟王朝市长的适时行动，城市和港口的物质形态，码头工人、商人和市政当局的关系积累，码头工人社团的制度性巩固，“缪斯”的日常运作，职业继承的做法，码头工人与货夫和装货工人间结构性但一直变化着的关系，还有一些第九章所分析的滨海区生活所具有的其他特点，都形成了一个持久又可变的社会性与物质性的复合体。正是这种复合体，让码头工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得以极强地控制自己的社会命运和经济命运。

很明显，社会建构的概念更适合用于由建成环境隐喻性定义的复合体，而不是语言的隐喻性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的社会行动者建造、传承并重建了社会建构。建构渐渐把自己变成了生活常识的形态，就像我们有时说到的景观。随着时间推移，建构慢慢积累，并在物质世界中实例化。例如，性别差异就被筑入家庭住宅中，这可见于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u，1977）所分析的卡拜尔人昏暗潮湿的女性区域和明亮干燥的男性区域之间的对比，以及多洛雷丝·海登（Dolores Hayden，1984）所分析的20世纪美国郊区的厨房。建构也在身体中得到物质性的实例化。性别在我们身体的运动和姿势、我们的音调变化和感受的真切情感中得到了表达和体验（Young，1990a, 1990b）。种族的社会建构与皮肤的生理颜色相应，并因此被当成身

体事实来体验，同时也被筑入美国城市种族隔离的社区和公共空间里。把现有对社会建构的思考放到建成环境这个更大的隐喻框架里，有助于我们巩固建构的成就，更明确有力地去思考作为人类相互关系中介的力量和约束有哪些历史性地沉淀和物质性地实例化的特性。在历史学领域，把社会建构的观念附着在建成环境的认识论隐喻上，能帮助“增厚”文化史研究，将历史学在文化转向后大量抛却的经典社会史问题和问题意识，如地理位置、人口动态、生产资料和关系、阶级结构或制度框架，以一种新的方式与文化史有效联系起来。

建成环境与语言的隐喻，似乎支持的是不同的社会研究风格。但重要的是，两者间的关系并非敌对或对抗。社会建构的隐喻已经发展为语言学转向开拓的论域中不可或缺的特点，这一事实似乎说明，我们应该把语言和建成环境的隐喻看成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对立的。在我看来，两者应被看作是单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或两种视角，我们称这个整体为社会范畴，即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此处值得留意的是，这两个相互补充的隐喻基于人性的两个方面之上，这两个方面可以称为智人（*homo sapiens* ）与工匠人（*homo faber* ），它们在存在和系统发育（phylogenetically）的意义上也不可避免地缠绕在一起。存在性的缠绕表现为正是由于人类是象征符号的使用者，有能力创造、处理和沟通计划，并因此能用非常根本的方式转变生活环境；而系统发育性的紧密缠绕是指，直立的站姿和可以转动的大拇指，让工匠人得以与智人的本质特征——对象征符号的使用同步进化。[23]

我认为应该把语言和建成环境的关系看成是辩证的。探寻符号形式和物质实体的相互构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辩证关系。马歇尔·萨林斯在反思夏威夷历史时（1981，1985），或许最为巧妙地说明了这种辩证关系，对此我已在本书第七章详细讨论过。人类学家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进行历史学转向似乎再合适不过了，萨林斯便采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词汇。萨林斯认为，符号行动从某种角度来看算是文化图式或范式的应用，但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中的指涉行动，因为它们表明了真实存在的客体（如库克船长）是文化范畴（此例中即神祇）的实例。当其他不同范式支配了客体的行动时，或当客体受制于不受指涉行动所控制的自然过程时，或出于其他原因，被指涉的

客体未按预期展开行动，那么客体所在文化范畴，以及构成最初范式的、有组织的范畴系列，都要面临重新定义。一旦大量出现反常的指涉行动，或是有足够不稳定的接合和足够强有力的行动者，原有范式就可能发生永久转型，引发与原先完全不同的表现。萨林斯使用了由列维-斯特劳斯原来的共时性模式，使之具有历时性和辩证性。这种辩证性在于，在给定范式里发生的行动，反过来影响并转变了最初的范式。

但夏威夷这个例子是否与字面意义或隐喻意义上的建成环境有关？萨林斯认为转型的关键在于指涉，那指涉是不是单纯发生在语言内的行动？可指涉也总是这个世界的某些特点的指涉。诚如萨林斯所说："在世界内的行动中……（文化范畴）获得了新的功能性价值。文化的意义因其所背负的世界而改变。"（1985:138）由于人类存在是物质性的，我们根据范式生成的行动，不断以其物质性的实例化向我们的文化范畴施压。我们的文化范畴也反过来持续向世界施压，或把英格兰船长标识成神，或把西方的枪支和舰船标识成玛那。库克船长遇刺后，其骨骸得到了妥善保存，成了夏威夷国王的珍宝，成了夏威夷建成环境的一条根本特性，成了赋予夏威夷国王以不列颠玛那的重要权力来源，让来自西方的贸易商品成了国王及其忠诚贵族的财富，包括用来征服其他岛屿、并有史以来首次一统夏威夷群岛成为一个统一王国的枪支和舰船。正是物质性的实例化，让符号指涉中的变化得以反过来转变了使最初的参照成为可能的范式。对我来说，语言给世界带来的压力和世界给语言带来的压力，似乎恰当表现出了语言和建成环境之间辩证的相互关系。

萨林斯充满异域风情的故事所归结出的辩证法是普遍的。由符号生成的实践，必然会产生基于建成环境的社会性中介。符号实践是由具身的个人本身及其利用的物质媒介表现出来的，后者包括人类身体，墨水和纸张，木头、石头、金属和纤维，土壤、水、动物和植物，硅芯片、铜线、激光束、阴极管和光缆。我们符号实践的开展将这些物质媒介组织、结合、积累并区隔于地球表面特定位置。通过利用物质媒介的特性，符号性符码的实行和创造性转型得以现实化，但这些媒介也因受符号之外的其他决定性因素的影响而受约束，并因此

反过来作用于利用了自身的符码，例如身体需要食物和性欲、随年龄发生变化以至最终死亡；纸张和墨水要得到保护才能持久保存；要保持土壤需要补充其矿物质和有机物含量才能保持肥力；信息能通过光缆飞速传递；肉类和谷物都会腐坏但速度不同；造房子和拆房子都要花钱。人类行动的物质媒介（请记住这也包括人类身体）和符号实践不停相互作用，能产生稀缺与充盈，改变实践的意义，限制话语的传播，或使其可用范围远远超出其出生地，让一种符号实践有能力取代另一种，造成某些实践（小麦种植或因特网的发展）与特定地理位置（乌克兰或旧金山市）间的联系变得明确。作为建成环境和语言的社会范畴通过各种方式持续而必然地纠缠在一起。

社会范畴符号性和建构性的要素间辩证式的纠缠关系也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尽管这些地方没有18世纪的夏威夷这样的异域风情。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 1978, 1996）、道格拉斯·马西和南希·登顿（Douglas Massey & Nancy Denton, 1993）对美国城市中种族隔离效果的研究表明，符号过程具有广泛的建成环境效应，创造出的过程、力量或结构的形态和动力又超越了创造它们的话语。对黑皮肤的污名化，是一个早已深深扎根于美国生活的符号事实。这一符号事实的一个广泛效果是大量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住房歧视。不过，尽管住房歧视是符号性地生成的，它也能产生强大的建成环境效应，比如，实际上将非裔美国人限制在北部工业城市特定的居民区里。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种地理上的区隔对非裔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强有力的负面效果，甚至超过了此前种族污名化将黑人限制在城市隔都中的持续而直接的效果。因此，当就业机会向外转移到郊区时，非裔美国人发现自己与潜在的就业机会产生了物理距离，从而无法追随这些机会。这导致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社区中的特定生活问题恶化，如高失业率、低收入、恶化的住房条件、店门紧闭、犯罪的吸引力上升、广泛出现的酒精和毒品滥用，以及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此例中，符号事实在空间和地理上持续产生效果，并沉淀于城市的物质景观中，自动与对黑皮肤的污名化这一最初的符号事实一同运作，并同时对其产生反作用。我想用这个简短的例子说明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我认为，话语性或符号性的过程（即有意义的人类行动）产生了建成环境的逻辑（即空间上的固定以

及物质性的实例化、增加和延续的逻辑）所支配的结构或力量，而建成环境的逻辑也制约了符号过程（通过稳定、破坏这些过程，或将它们置于转型的压力之下）。要对社会范畴进行充分的概念化，必须认可符号和建成环境的逻辑，并找出两者间辩证的相互关系。

这里对建成环境还有最后一点强调。就像各种符号实践或语言游戏在范围和尺度上大相径庭，不论是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上的建成环境也都各有分殊。当下国际货币交易的语言游戏，假设并建立了一个由卫星和光缆联系的、复杂的全球计算机网络（即最字面意义的建成环境），也同时涉及世界范围内共享的一系列商业机构、法律和规则以及英语这种通用语（lingua franca）。这使得交易员能相信一名新加坡的交易员的行动能即刻被法兰克福和圣保罗的同行理解，并继续其符号实践。构成19世纪大英帝国的符号实践，就包括建成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军港和装煤港，以及建立并解释殖民差异（colonial distinction）的仪式，使殖民地公务员在德里、堪培拉、仰光或内罗毕都具有一定的辨识度（见如Ranger，1983; Cohn，1983）。和符号实践的情况一样，不同尺度的建成环境之间的相互衔接问题，例如开展贸易的"世界城市"中当代全球金融网络和不同社区实践的衔接，或是英国殖民地公务员的规范和乌干达村民的习俗的衔接，标出了当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前沿阵地。

至此，社会科学中"社会"是 什么？我将以回答这一最初问题作结。社会范畴是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复杂而不可逃避的本体论基础。对其最恰当的理解，一是相互衔接并不断进化的符号实践网络（这是语言隐喻），二是它建立和转变了为实践提供母体、并约束了实践结果的物质框架（这是建成环境隐喻）。由此看来，分析社会范畴的根本手段是阐释性的；也就是说，要重构使语言表现得以生产的符号性符码来理解语言表现。但这种阐释性方法必须加以扩展，以囊括语言表现具有的建成环境效应，也就是人类相互关系的物质母体的社会建构和历史延续。用来理解建成环境效应的方法可能会包括量化、数学运算，以及勾勒出看似机械性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时，务实地求助于这类方法的情况可能在所难免。但对这类方法必须批判性地使用，以抵制主流社会科学对数量和机制进行物

化的强烈偏好。我们必须把的自己目标理解成对社会生活的去物化过程，揭示出看似看不见的社会力量与无声的社会强制实际上是符号性生成的行动的产物。

## 尾声：诠释性的量化

这种对“社会范畴”及其所包含的研究中的去物化纲领的概念化，对于我们思考定量研究来说非常重要。长久以来，我感觉定量和阐释性方法论给出的典型描述夸大了两者间的真实差异。鼓吹定量方法论的人通常采用形式统计推断的假设和方法，以及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语言。相反，“阐释主义者”倾向于采用文学理论和格尔茨式的“深描”。如果我们想基于两种方法论宣言来判断，那么使用这两种传统来研究的学者似乎会被无法沟通的认识论鸿沟隔开。这种印象似乎可以由有关研究者的私下态度证实：定量研究者通常认为阐释主义者是不科学的、思路混乱且无可救药的；而阐释主义者多半认为量化研究者笨拙又死脑筋。但这种假设定量和阐释性方法属于截然对立的认识论宇宙的看法，在理论上存在问题，也在实践中受到质疑。这种认识论二元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是，证据的话语形式和计量形式，是以非常相似的方法生产出来的：都是人类行动者依靠象征性的沟通系统，并将他们的观察固定于某种文本中。事实上，由同一象征性固定行动产生的同一文本，有时候会被定量研究者和阐释主义学者同时使用。所以，阐释性地解读遗嘱，可以解读出对家庭关系、死亡和来世的态度，而用统计分析，可以了解立遗嘱者的职业、职业流动的经历、物质财富的类型或亲属网络。任何想要说明这两种智力操作占据不同且无法沟通的认识论空间的方法论话语，都会让我感到怀疑。

这导致了认识论二元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任何读过大量定量社会史研究著作的人都会留意到，区分出作品里的“阐释性”和“定量”认识论空间的边界极为困难。话语文本常被用来阐释定量的发现，甚至用来建立计算所基于的范畴。我们也可以在定量发现的基础上阐释话语陈述，如反映特定一代的人口经验，或特定职业群体的经济视角。社会史学家在构筑历史学论证时，常迂回在定量和话语的资料与方法

之间。我在本书第九章里对马赛码头工人历史的分析，算是表现定量和符号性证据如何相互严密交织的典型例子。而且，一些定量手段事实上是对文本的话语特征的评估。由此，米歇尔·沃韦勒通过对遗嘱用语之意义变化的著名统计研究，追溯了18世纪普罗旺斯的“去基督教化”过程，考察了这类语言在时间以及社会类别、性别、地理位置上的统计差异（Vovelle，1973）。任何假定话语方法和定量方法之间存在无法避免的认识论鸿沟的说法，似乎都被沃韦勒等学者完成的历史著述实践驳倒。而且，社会史学家的作品，似乎普遍认为话语分析和定量分析之间有认识论的延续性，这意味着两种方法无非是对同一社会世界的两种不同视角。

沃韦勒的例子也应该让我们意识到，不是所有话语分析都符合阐释方法的通常模型。这类分析实际采用的手段极为多样，从相对直觉到高度形式主义的手段都有可能。列维-斯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者有时和定量社会学家同样客观，对历史辞典编纂者而言，用定量的手段研究词位的使用是常有的做法。定量研究本质上是非常形式化的，但在很多定量研究中，诠释学元素同样存在，然而这点就极少被承认，遑论被强调或理论化了。专门研究复杂定量数据集的学者通常称之为“熟悉数据”的过程也是定量研究的一部分。定量研究者并非先验确定应把案例放入哪种范畴以及要用哪种分析技术，而是先要进行大量的初步探索（不仅是“阅读”统计表格、图表或指标），而这与保罗·利科所描述的“诠释学循环”极为相似（Ricoeur，1971）。研究者对适合数据集的范畴作出猜想和假设，并据此设定一套统计度量，在结果中找到异常，完善或更改假设，使用更正后的假说来再次质询数据集，以此类推，直到发现分析中所使用的范畴能令人满意地真实反映数据集的内在结构。在对数据集发出这种阐释性质询时，研究者可能也会转而观察非量化的信息源，例如，试图从学徒工的契约中了解水管工人是该被归类为建筑工人还是冶炼工人。事实上，这种“诠释性的量化”还没有获得进入书籍或文章等出版物的渠道。我认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担忧的是，他们一旦承认自己用了这种方法，可能会受到“篡改数据”的指控，可事实上他们只是想对定量“文本”的内在结构有足够了解，让自己能对其有效“阅读”，深化探究。我认为定量研究者有必要更多地反思，他们对自己的数据集所作的阐释性质询有怎样

的认识论内涵。我认为，定量社会研究真正的重点，事实上是对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作出敏锐和深入的检视，而非可统计验证的“一般性”法则的不断退缩的幽灵。作为一名已进行文化转向的前计量历史学家，我的这些经验告诉我，定量研究者的真正研究程序和阐释性方法之间的共同点之多，远超主流方法论学者的猜想。

注释：

本章糅合了《社会史中的“社会”发生了什么》（“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Social’ in Social History”）一文中的些许段落，收录于*Schools of Though: Twenty-five Years of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ed.Joan W.Scottand Deborah Keates. Copyright © 2001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许可后再版。基思·贝克与简·戈尔茨坦曾为本章早期版本提供过有益建议。

1 ．有关“社会的”一词的意义变迁，见乔伊斯（Joyce，2002）中的论文。

2 ．在20世纪晚期关于潜在极权主义政治秩序的讨论中，尤其是对国家触手暂时无法触及的组织要采取何种形式的讨论中，“市民社会”一词复苏。但这些讨论多用形容词性的“市民的”（civil）来修饰社会，因为未经修饰的用法将指包括所有国家和非国家机构的总体，见科恩（Cohen, 1998）。

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及其诸多拥趸所属的“世界体系”的社会科学流派，强烈挑战了习惯上被视为等同的“社会”和“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我们通常认为是不同而自治的“社会”，其实只是更大的全球社会总体中的次级单位（Wallerstein，1974a，1974b）。不同于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实体化为全球“社会”的看法，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 1996）认为，日益增多的移民与交通通信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巨大的跨国文化流动，由此，世界越来越由他所谓的“全球族群图景”（即相互重叠的跨国族群共同体）构成，而非不同而有界的社会。

4 ．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概念的多义性与它们的中心性相连，因

为它们的中心性是通过同时调用许多相关的意义而得到加强的。而且，演说家和作家都很想通过延展概念意义来覆盖现有的争论，从而利用术语的力量，于是，概念的中心性又加强了多义性。关于仪式语境中符号的权力和多义性之间的关系，见特纳（Turner, 1967:50—51）。

5 ．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文学研究的阵地显著扩张，故此，英语系或德语系的学者现在不但研究电影、大众文化、艺术、建筑和音乐，还关注历史学话语、社会科学、生物学、新闻学、物理学技术。伴随着文学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的显著扩张，文化和语言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也得到了同样的膨胀，于是，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里，文化和语言这两个术语挑战了“社会的”和“社会”这两个人文科学中的基本概念。

6 ．贝克这段引用了法语的《百科全书》，我将之译为英语。

7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并不为英语世界所熟悉（1961，1963a，1963b，1966，1969）。值得注意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以所谓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样板，而后者已经挪用且无疑显著转变了更古老的、在科学中享有盛誉的结构的建筑学隐喻。事实上，基于语言隐喻的社会研究学派在法国就是通常所说的“结构主义”。

8 ．语言学转向各个方面的历史，见多斯（Dosse, 1997）和梅吉尔（Megill, 1985）。

9 ．需要指出的是，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 1996）独立阐述了与贝克非常接近的立场。

10 ．夏蒂埃（Chartier, 1997:81）在和D.F．麦肯锡（D.F.McKensie）的讨论中如此定义了文本。有关文本概念的类似扩展，见Ricoeur（1971）。

11 ．休厄尔（Sewell, 1998）对夏蒂埃的立场作出了更为广泛的批判性评价。

12 ．施耐德（Schneider，1968）认为美国亲属关系的核心象征

符号是性交的观点极为著名。

13 ．这里我遵从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谈话中提出的建议。

14 ．华康德（Wacquant，1995，2004）提出了一种与我非常不同的运动符号实践。

15 ．需要承认，此处提及剑桥学派的思想史并非无意。贝克的文化史研究很好地继承了剑桥学派的传统，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 1996:34）在解释他所提倡的以真正的语言学手段研究历史的方法时，特别引用了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的例子。

16 ．在我看来，此处对语言游戏的讨论，和我在第四章中对结构的讨论极为相似。

17 ．全美大学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在1944年引入了避免干扰入球的规则，限制诸如来自俄克拉荷马农业与机械学院的（Oklahoma A & M，即今日的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译者注）鲍勃·库兰（Bob Kurland，7英尺，约2.13米。——译者注），或者是来自德保罗大学（DePaul）的鲍勃·米坎（Bob Mikan, 6英尺10寸，约2.08米。——译者注）之类身高较高的球员的优势（Hollander, 1973:39, 127）。

18 ．丹尼尔·戈登（Daniel Gordon，1994）使用了美国法语词库研究（American Research on the Treasury of the French Language）来展现诸如社会、社会的、社交的、社交性等术语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使用情况。查尔斯·蒂利（Tilly，1985，1995）计算了不同形式的抗议的发生率变化。

19 ．似乎还应指出，对经济实践的所谓“放松管制”，实际上只是改变了监管的形式。

20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对机械性隐喻的使用都意味着物化。比如我可能会说连接了不同的符号实践的“机制”，但这只是意味着我想要详细说明这种联系，这就像我在解释踩下油门如何导致了汽车加速时，要详细说明机械活动链条中每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事实

上，我主要使用的“衔接”这一重要隐喻本身就是准机械性的。

21 ．这里所谓“隐晦”，是因为有人用建构隐喻想象世界上的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仅出现在语言中。

22 ．对于口语来说这当然是没错的，但对书面语言来说就不同了，它需要某种物质媒介将其固化，比如纸与笔，泥土与楔子，或者是晶体管与阴性射线管。

23 ．参见格尔茨（Geertz, 1973c）清晰通透的讨论，亦可见本书第六章。

---

(1) 此处的着重为休厄尔所加。—— 译者注

(2) 本章中出现的“society”均译为“社会”，形容词性的“social”均译为“社会的”，名词性的“the social”均译为“社会范畴”。—— 译者注

(3) 原文将Leonore误拼为Lenore，此处更正。—— 译者注

(4) 原文将Edgbaston误拼为Edgebaston，此处更正。—— 译者注

# 参考文献

Abbott, Andrew. 1988. “Transcending General Linear Reality.” *Sociological Theory* 6:169—186.

——. 1991. “History and Sociology: The Lost Synthesi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5:201—238.

——. 1992. “From Causes to Even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428—455.

——. 1999.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Chicago Sociology at One Hund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1.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brams, Philip. 1980. “History, Sociology, Historical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no.87:3—16.

——.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bu-Lughod, Lila. 1986.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1.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ed. Richard G.Fox, 137—162.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Agulhon, Maurice. 1968. *Pénitants et Francs-Maçons de l’ancienne Provence.* Paris: Fayard.

——. 1970a. *La vie sociale en Provence intérieure au lendemain de*

*la revolution.* Paris: Société d'Études Robespierristes.

——. 1970b. *Une ville ouvrière au temps du socialisme utopique: Toulon de 1800 à 1851.* Paris: Mouton.

——. 1970c. *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 Paris: Plon.

——. 1979. *Marianne au combat: L'imagerie et la symbolique républicaines de 1789 à 1880.* Paris: Flammarion.

——. 1987. "Vu des coulisses." In *Essais d'égo-histoire* , ed. Pierre Nora, 11—59. Paris: Gallimard.

Althusser, Louis. 1969.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127—186.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Amin, Ash, ed. 1994. *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Aminzade, Ronald. 1979.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olidar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Toulouse."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 ed. John M.Merriman, 85—105.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1981.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Study of Mid-Nineteenth-Century Toulouse, Fr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2.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ime."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456—480.

Anderson, Perry. 1980.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Verso.

*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 1984—1994. Cambridge, Mass.: Tozzer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Appadurai, Arjun. 1991. "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 ed. Richard G.Fox, 191—210.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ppleby, Joyce,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1994.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W.Norton.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New York: Verso.

Arthur, W.Brian. 1988.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 In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 ed. Philip W.Anderson, Kenneth J.Arrow, and David Pines, 9—31. Redwood City, Calif.: Addison-Wesley.

Asad, Talal. 1982. "Anthropological Conceptions of Religion: Reflections on Geertz." *Man* 18:237—259.

——. 1993.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udiganne, Armand. 1860. *Les populations ouvrières et les industries de la France* . 2d ed. 2 vols. Paris: Capelle.

Aussel, Michel. 2002. *Nantes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1830—1848: Du mouvement mutualiste aux doctrines utopiques.* Nantes: Ouest Éditions.

Austin, J.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ustin-Broos, Diane J. 1987. "Clifford Geertz: Culture, Sociology, and Historicism." In *Creating Culture: Profiles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141—159. Sidney: Allen and Unwin.

Baehrel, Réné. 1961. *Une croissance: La basse Provence rurale, fin XVIe siècle—1789: Essai d'économie historique statistique.* Paris: S.E.V.P.E.N.

Baker. Keith M. 1964.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erm 'Social Science.'" *Annals of Science* 20:211—226.

——. 1990.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stitution of Society: Notes for a Conceptual History." In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ed.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95—120. Amsterdam and Atlanta: Rodopi.

Baker, Keith Michael, and Roger Chartier, 1994. "Dialogue sur l'espace public." *Politix* 26:5—22.

Barthes, Roland. [ 1957 ] 1972. *Mythologies.*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Barzman, John. 1999. "Les relations entre les pouvoirs publics et les dockers au Havre, XIXe-XXe siècles." *Dockers de la Méditerranée à la Mer du Nord: Des quais et des hommes dans l'histoir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11 au 13 mars 1999* , 155—169. Aix-en-Provence: Edisud.

Bederman, Gail. 1995.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ll, Catherine. 1992.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ndix, Reinhard. 1956. *Work and Authority: Ide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1964.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New York: John Wiley.

——. 1978.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nedict, Ruth. 1934. *Patterns of Culture.*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New York: Meridian.

Berger, Peter, and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Doubleday.

Bezucha, Robert J. 1974.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Early July Monarc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iernacki, Richard. 1995. *The Fabrication of Labor: Germany and Britain, 1640—191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loch, Marc. 1964. *Feudal Society.*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7. "A Contribution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In *Land and Work in Medieval Europe,* trans. J.E.Anderson, 44—81.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0. *French R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Edited by Janet Sondheim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as, Franz. 1966. *Kwakiutl Ethnography.* Edited by Helen Code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onnell, Victoria, and Lynn Hunt, eds. 1999.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is, Paul. 1960. *Les paysans de l'Ouest: Des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dans la Sarthe.* Le Mans: Vilaire.

Boltanski, Luc, and Laurent Thévenot. 1987. *De la justification: Les économies de la grandeu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90. *L'amour et la justice comme competences: Trois essais de sociologie de l'action.* Paris: Métailié.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Editions du Minuit.

——. 1988. *Homo Academicus.* Translated by Peter Colli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squet, Casimir, and Tony Sapet. 1857. *Étude sur la navigation,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 de Marseille, pendant la période quinquennale de 1850 à 1854.* Marseille: Camoin et Dutertre.

Boyer, Robert. 1986. *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 Une analyse crit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Braudel, Fernand. 1958.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iés, Civilisations* 13:725—753.

——. 1966.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2 vols. Paris: Armand Colin.

Brenner, Robert. 1998.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New Left Review* 229:1—265.

——. 2002.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Verso.

Briggs, Laura. 2002. *Reproducing Race: Race, Sex, Science and*

*U.S. Imperialism in Puerto Ric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ightman, Robert. 1995. “Forget Culture: Replacement, Transcendence, Relexific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0:509—546.*

Brubaker, Rogers. 1985. “Rethinking Classical Social Theory: The Sociological Vision of Pierre Bourdieu.” *Theory and Society* 14:745—775.

Bryant, Christopher G.A., and David Jary, eds. 1991.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London: Routledge.

Burguière, André. 1983. “La notion de mentalités chez M.Bloch et L.Febvre: Deux conceptions, deux filiations.” *Revue de Synthèse* III/112:333-48.

——. 1995. “Le changement social: Brève histoire d’un concept.” In *Les formes de l’expérience: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 ed. Bernard Lepetit, 253—272. Paris: Albin Michel.

Burckhardt, Jacob. 1958.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 Harper.

Burawoy, Michael. 1989.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ersu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765—769.

Burke, Peter. 1987. “Les îles anthropologiques et l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 In *Philosophie et histoire,* ed. Christian Descamps, 49—66.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 1990.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2. “History of Events and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I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ed. Peter Burke, 232—248.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Burnham, Walter Dean. 1967. “Party System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s,* ed. William Nisbet Chambers and Walter Dean Burnham, 277—30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ton, Antoinette. 2001. “Thinking Beyond Boundaries: Empire, Feminism and the Domains of History.” *Social History* 26:60—71.

Cabrera, Miguel A. 1999. “Linguistic Approach or Return to Subjectivism? In Search of an Alternative to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24:74—89.

——. 2004.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Marie McMahon. Foreword by Patrick Joyc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Calhoun, Craig. 1996. “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Terrence J.McDonald, 305—33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alhoun, Craig, Edward LiPuma, and Moishe Postone, eds. 1993.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rrière, Charles. 1973. *Négociants marseillais au XVIIIe siècl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économies maritimes.* 2 vols. Marseille: Institut Historique de Provence.

Certeau, Michel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e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krabarty, Dipesh. 1989. *Rethinking Working Class History: Bengal, 1890—1940*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artier, Roger. 1987. *Lecture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aris: Seuil.

——. 1988.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lated by Lydia G.Cochra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5.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the Codex to the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97.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hauncey, George. 1994.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Chorley, Katherine. 1943.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Clark, Terry Nichols. 1973. *Prophets and Patrons: The French Univers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averie, Elisabeth. 1999. "De l'artisanat à l'age industriel sur les quais à Marseille: Du portefaix au docker(XIXe-XX siècles)." *Dockers de la Méditerranée à la Mer du Nord: Des quais et des hommes dans l'histoir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11 au 13 mars 1999, 75—83.* Aix-en-Provence: Edisud.

Clifford, James. 1986.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ed.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98—12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8a. "Introduction: The Pure Products Go Crazy." 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1—1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b.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21—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Marcus,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hen, Jean. 1998. “Civil Society.”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gen. ed. Edward Craig.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Cohn, Bernard S. 1980.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State of Pla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198—221.

——. 1981.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1980s: Towards a Rapprochemen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2:227—252.

——. 1983. “Representing Authority in Victorian India.”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165—2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 Introduction by Ranajit Guha. Delhi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nze, Werner. 1967. “Soci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7—16.

Corbin, Alain. 1975. *Archai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19e siècle.* 2 vols. Paris: M.Rivière.

——. 1982. *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 L’odorat et l’imaginaire social, 18e—19e siècles.* Paris: Aubier Montaigne.

——. 1994. *Les cloches de la terre: Paysage sonore et culture sensible dans les campagnes du XIX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 1995. *Time, Desire, and Horror: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Senses.* Translated by Jean Birre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ornu, Roger. 1974. “Les portefaix et la transformation du port de Marseille.” *Annales du Midi* 86:181—202.

——. 1999. “Du portefaix au docker: Des mythes industructibles?” *Dockers de la Méditerranée à la Mer du Nord: Des quais et des hommes dans l’histoir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11 au 13 mars 1999,* 171—178. Aix-en-Provence: Edisud.

Coronil, Fernando, and Julie Skurski. 1991. “Dismembering and Remembering the Nation: The Semantics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Venezuel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288—337.

Corvisier, André. 1983. *Histoire du Havre et de l’estuaire de la Seine* . Toulouse: Privat.

Cottereau, Alain. 1980. “Étude préalable: Vie quotidienne et résistance ouvrière à Paris en 1870.” Introduction to Denis Poulot, *Question sociale: Le Sublime, ou le travailleur comme il est en 1870, et ce qu’il pent l’être* , 7—102.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Crapanzano, Vincent. 1986. “Hermes’ Dilemma: The Masking of Subv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 ed.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51—7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rnton, Robert. 1971a. “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113—132.

——. 1971b. “Read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Daedalus* 100:214—56.

——. 1983.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aint Séverin."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 75—106. New York: Basic Books.

Daumard, Adeline. 1963. *La bourgeoisie parisienne de 1815 à 1848.* Paris: S.E.V.P.E.N.

Davidoff, Lenore, and Catherine Hall. 1987.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 1780—18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vis, Natalie Zemon. 1975.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On the Lam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572—603.

Derrida, Jacques. 1976. *Of Grammatology* .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yon, Pierre. 1967. *Amiens, capitale provinciale* . Paris: Mouton.

DiMaggio, Paul. 1979. "Review Essay: On Pierre Bourdieu."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1460—1474.

Dirks, Nicholas B. 1996. "Is Vice Versa? Historical Anthropologies and Anthropological Histories."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 ed. Terrence J.McDonald, 17—5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Dosse, François. 1987. *L'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 "la nouvelle histo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 1994.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Translated by Peter V.Conroy Jr.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97.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 2 vols. Translated by Deborah Glassm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owns, Laura Lee. 1993a. "If 'Woman' is Just an Empty Category, Then Why Am I Afraid to Walk Alone at Night? Identity Politics Meets the Postmodern Subjec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414—437.

——. 1993b. "Reply to Joan Scot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444—451.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blin, Thomas. 1979.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 1826—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ubosc, Prosper. 1848. *Quatre mois de République à Marseille, 24 fevrier—24 juin* . Marseille.

Duby, Georges. 1973. *Le dimanche de Bouvines* . Paris: Gallimard.

Durkheim, Emile. [1912] 196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 Translated by Joseph Ward Swai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Easthope, Anthony. 1993. "Romancing the Stone: History Writing and Rhetoric." *Social History* 18:235—249.

Egret, Jean. 1977. *The French Prerevolution* 1787—1788.

Translated by Wesley D.Camp. Introduction by J.F.Bos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isenstadt, S.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 . Glencoe, Ill.: Free Press.

Eley, Geoff. 1996. “Is All the World a Text?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Two Decades Later.” In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 ed. Terrence McDonald, 193—243.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ley, Geoff, and Keith Nield. 1995. “Starting Over: The Present, the Post-modern and the Moment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20:355—364.

Epstein, James. 1999. “Spatial Practices/Democratic Vistas.” *Social History* 24:294—310.

Ermakoff, Ivan. 2000. “Strukturelle Zwänge und Zufällige Geschehnisse: Die Selbstauflösung der französischen Republik in Vichy am 10. Juli 1940.” In *Struktur und Ereignis* , ed. Andreas Suter and Manfred Hettling, 244—256. Sonderheft 19 of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Evans, Peter B.,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rge, Arlette. 1986. *La vie fragile: Violences, pouvoirs,et solidar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Faure, Alain. 1977. “A propos de Perdiguier: Qu’est-ce que le compagonnage?” Introduction to Agricol Perdiguier, *Mémoires d’un compagnon,* 7—33. Paris: François Maspero.

Faure, Alain, and Jacques Rancière. 1976. *La parole ouvrière* (1830—1840).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Febvre, Lucien. 1953. “Vive l’histoire: Propos d’initiation.” In

*Combats pour l'histoire* , 18—33. Paris: Armand Colin.

Finlay, Robert. 1988. "The Refashioning of Martin Guer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553—571.

Fink, Carole. 1989. *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tzsimmons, Michael P. 2003. *The Night the Old Regime Ended: August 4, 1789,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Flandrin, Jean-Louis. 1976. *Familles: Parenté, maison, sexualité dans l'ancien société* . Paris: Hachette.

Foucault, Michel. 1971.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 Translated by Alan Sher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uret, François. 1971. "Le catechisme révolutionnair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6:255—289.

——. 1978.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 . Paris: Gallimard.

——. 198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 Translated by Elborg F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La Révolution: De Turgot à Jules Ferry* , 1770—1880. Paris: Hachette.

Furet, François, and Mona Ozouf, eds. 1988.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Paris: Flammarion.

Galison, Peter. 1997. *Image and Logic: 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rden, Maurice. 1970. *Lyon et les lyonnais au 18e siècle* .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Gascon, Richard 1971. *Grand commerce et vie urbaine au 16e siècle: Lyons et ses marchands(environs 1520—1580).* Paris: S.E.V.P.E.N.

Geertz, Clifford. 1960. *The Religion of Java* .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1963a.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63b. *Peddlers and Princes: 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zation in Two Indonesian Town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65. *The Social History of an Indonesian Town*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8. *Islam Observed: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Morocco and Indonesia*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3a.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b. "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412—453.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c. "Ethos, World View, and the Analysis of Sacred Symbol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126—141.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d. "The Growth of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Mi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55—83.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e.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193—233.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f. "The Impact of the Concept of Culture on the

Concept of Ma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33—54.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g. “Person, Time, and Conduct in Bali,”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360—411.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h.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87—125.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i. “Ritual and Social Change: A Javanese Exampl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142—169.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73j.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3—30.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a.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b. “Art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94—120.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c. “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73—93.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d. “Found in Translation: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ral Imagination.”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36—54.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e.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55—70.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3f. “The Way We Think Now: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Modern Thought.”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147—163.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lu, Victor. 1971. *Marseille au XIXe siècle* . Edited by Lucien Gaillard and Jorgi Reboul. Introduction by Pierre Guiral. Paris: Plon.

Genovese, Eugene. 1974.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 New York: Pantheon.

Giddens, Anthony.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ies* . London: Hutchinson.

——.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Volume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 Lodon: Macmillan.

——.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nzburg, Carlo. [1976] 1980.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 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C.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2] 1983. *The Night Battles: 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 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C.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irard, Louis. 1952. *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du Second Empire* . Paris: Armand Colin.

——. 1961. “La Politique des grands travaux à Marse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In Chambre de Commerce de Marseille, *Marse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Exposition, conferences, colloque organisés à l’occasion du centenaire du palais de Ia Bourse, 10—26 novembre 1960* . Paris: Plon.

Girard, Réné. 1977.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 Translated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odechot, Jacques. 1970. *The Taking of the Bastille: July 14, 1789* , Translated by Jean Stewart. Preface by Charles Tilly. New York: Scribners.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 New York: Doubleday.

——. 1967a.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 . New York: Pantheon.

——. 1967b. “On Face Work.” I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 , 5—46.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Goldstein, Jan, ed. 1994. *Foucaul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 Oxford: Blackwell.

——. 2001. *Console and Classify: The French Psychiatric Profess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stone, Jack A. 1990.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4. “Is Revolution Individually Rational?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139—166.

Gontier, Claudie. 1988. *Docks en stock: La manutention portuaire marseillaise: hommes, territories et techniques, 19e—20e siècle* . Marseille: C.E.R.F.I.S.E.

Gordon, Daniel. 1994. *Citizens Without Sovereignty: Equality and Sociability in French Thought, 1670—1789*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David M.,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bert, Pierre. 1960.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 2 vols. Paris: S.E.V.P.E.N.

——. 1996. *Un parcours d'historien: Souvenirs 1915—1995* . Paris: Fayard.

Gould, Roger V.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uld, Steven Jay. 1989. *Wonderful Life: The Burgess Shale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y* . New York: W.W.Norton.

Gramsci, Antonio. 1971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1b. "Americanism and Post-Fordism."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 ed. and trans.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y Nowell Smith, 277—31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Grendi, Edoardo. 1996. "Repenser la microhistoire?" In *Jeux d'échelles: La micro-analyse à l'experience* , ed. Jacques Revel, 233—243. Paris: Seuil/Gallimard.

Griffin, Larry. 1992. "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403—427.

——. 1993. "Narrative, Event-Structure Analysis, and Causal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094—1133.

Guiral, Pierre. 1956. "Le cas d'un grand port de commerce:

Marseille.” In *Aspects de la crise et de la dépressio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1846—1851* , ed. C.-E. Labrousse, 200—225. Vol.19 of *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La Roche-sur-Yon: Imprimerie Centrale de l’Ouest.

——. 1957. “Quelque notes sur la politique des milieux d’affaires Marseillais de 1815 à 1870.” *Provence historique* 7:155—174.

Habermas, Jürgen.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 Translated by John Viertel.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2 vols. Boston: Beacon Press.

Hall, John R. 1984. “Temporality, Social A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Quantification in Historical Analysis.” *Historical Methods* 17:206—218.

Hall, Stuart. 1988.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 London: Verso.

Hanagan, Michael P. 1980. *Artisans and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ree French Towns* , 1871—191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andler, Richard. 2002. “Cultural Theory in History Toda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1512—1520.

Harrison, Royden, ed. 1978. *Independent Collier: The Coal Miner as Archetypal Proletarian Reconsidered* . New York: Saint Martin’s.

Harvey, Davi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5.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sm*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yden, Dolores. 1984. *Redesighing the American Dream: The Future of Housing Work, and Family Life* . New York: W.W.Norton.

Hebb, D.O., and W.R.Thompson. 1954. “The Significance of Animal Studies.”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ed. Gardner Linzsey, 532—561.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Held, David, and John B.Thompson, eds. 1989.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gounet, Charles, ed. 1980. *Histoire de Bordeaux.* Toulouse: Privat.

Hill, Christopher. 1964a. *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h.

——. 1964b. *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h.

——. 1972.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Hilton, Rodney. 1973. *Bondmen Made Free: Medieval Peasant Movements and the English Rising of 1381.* London: Temple Smith.

Hindess, Barry. 1986. “Actor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Social Theory in Transition,* ed. Mark L.Wordell and Stephen P.Turner, 113—126. London: Allen and Unwin.

Hirsch, Joachim. 1983. “The Fordist Security State and New Social Movements.” *Kapitalistate* 10:75—88.

Hobsbawm, E.J. 1959.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64.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 1971.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Society.” *Daedalus* 100:20—45.

——. 1980.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Some Comments.” *Past and Present,* no.86:3—8.

——. 2002. *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Hobsbawm, E.J., and George Rudé. 1968. *Captain Sw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Hollander, Zander. 1973. *The Modern Encyclopedia of Basketball.* Rev. ed. New York: Four Winds.

Holt, Thomas C. 1995. “Marking: Race, Race-making,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1—20.

Huizinga, Johan. 1954.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of the Forms of Life, Thought, and Art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XIV and XV Centuri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Hunt, Lynn. 1978. *Revolution and Urban Politics in Provincial France: Troyes and Reims,* 1786—179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d.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nald B.Inden. 1976. *Marriage and Rank in Bengali Culture: A History of Caste and Clan in Middle Period Benga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akobson, Roman. 1970.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2 vols. Paris: Points-Seuil.

Jameson, Fredric.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59—92.

——.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The Cultural Tur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London: Verso.

Jessop, Bob, et al. 1988. *Thatcherism: A Story of Two Nations* New York: Polity Press.

——. 1992. "Fordism and Post-Fordism: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In *Pathways to Industrial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d. Michael Storper and Allen J.Scott, 46—69. London: Routledge.

Johnson, Christopher H. 1971. "Commun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before Marx: The Icarian Exper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657—667.

——. 1974.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 Cabet and the Icarians, 1839—185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5. "Economic Change and Artisan Discontent: The Tailors' History, 1800—1848." In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ed. Roger Price, 87—114. London: Croom Helm.

——. 1979. "Patterns of Proletarianization: Parisian Tailors and Lodève Weavers."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 John M.Merriman. New York: Holmes and Meyer.

——. 1995. *The Life and Death of Industiral Languedoc, 1700—1920: The Politic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Richard. 1978. “Thompson, Genovese, and Socialist-Humanist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6:79—100.

Joyce, Patrick. 1993.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of Social History: A Note of Response to Mayfield and Thorne, and Lawrence and Taylor.” *Social History* 18:81—85.

——. 1995.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20:73—91.

——. 1996. “The End of Social History？ A Brief Reply to Eley and Nield.” *Social History* 21:96—98.

——, ed. 2002. *The Social in Question: New Bearings i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Judt, Tony. 1979. *Socialism in Provence, 1870—1917: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French Lef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lliany, Jules. 1842. *Essai sur le commerce de Marseille.* 2d rev.ed. 3 vols. Marseille: J.Barile.

Kaye, Harvey J.1984.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d. 1988. *The Face of the Crowd: Studies in Revolution,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Selected Essays of George Rudé.* New York: Harvester/Wheatsheaf.

Kaye, Harvey J., and Keith McClelland, eds. 1990. *E.P.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essel, Patrick. 1969. *La Nuit du 4 Août 1789.* Paris: Arthaud.

Keylor, William R. 1975. *Academy and Community: The*

*Foundation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meldorf, Howard. 1988. *Reds or Rackets? The Making of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Unions on the Waterfro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imbal, Roger. 1990.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Kirch, Patrick V., and Marshall Sahlins. 1992. *Anahulu: 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 in the Kingdom of Hawaii.* Vol.1, *Historical Ethnography,* by Marshall Sahli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rk, Neville. 1994. “History, Language, Ideas, and Postmodernism: A Materialist View.” *Social History* 19:221—240.

Kleinman, Daniel Lee. 1995. *Politics on the Endless Frontier: Postwar Research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Kristeva, Julia. 1980.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Edited by Leon S.Roudiez. Translated by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uhn, Thoma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can, Jacques. 1977. *Ecrits.*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LaCapra, Dominick. 1972. *Emile Durkheim: Sociologist and Philosoph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2. *Madame Bovary on Tri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3.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5.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9. *Soundings in Cr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1.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aitin, David D. 1986. *Hegemony and Culture: Politics and Religious Change among the Yorub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atos, Imre. 1978.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mont, Michèle, and Annette Lareau. 1988.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ociological Theory* 6:153—168.

Lamont, Michèle, and Robert Wuthnow. 1990. "Betwixt and Between: Recent Cultural Sociolog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The New Synthesis,* ed. George Ritzer, 287—31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sh, Scott, and John Urry. 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aurent, Emile. 1865. *Le pauperisme et les associations de prévoyance: Nouvelles études sur les sociétés de secours mutuels, histoire-économie politique-administration.* 2d ed. 2 vols. Paris: Guillaumin.

Lawrence, Jon, and Miles Taylor. 1993. "The Poverty of Protest: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A Reply." *Social History* 18:1—16.

Leach, Edmund R. 1968. “Ritual.”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David L.Sills, vol.13. New York: Macmillan.

Le Beuf, E.B. 1857. *Du commerce de Nantes: Son passé, son état actuel, son avenir.* Nantes: Imprimerie William Busseuil.

Lebrun, François. 1971. *Les hommes et la mort en Anjou au 17e et 18e siècles: Essai de démographie et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s.* Paris: Mouton.

Lefebvre, Georges. [ 1949 ] 1971.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R.Palm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32 ] 1973. *The Great Fear: Rural Panic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ranslated by Joan White. Introduction by George Rudé. New York: Vintage.

Lehning, James R. 1980. *The Peasants of Marlh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mily Org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Lepenies, Wolf. 1988.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The Rise of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R.J.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petit, Bernard, ed. 1995a. *Les formes de l’experience: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Paris: Albin Michel.

——. 1995b. “Histoire des pratiques, pratique de l’histoire.” In *Les formes de l’experience: Une autre histoire sociale,* 9—22. Paris: Albin Michel.

Les Annales. 1989. “Tentons l’experienc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4:1317—1324.

Lequin, Yves. 1977. *Les ouvriers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1966.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2 vols. Paris: S.E.V.P.E.N.

——. 1975.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aris: Gallimard.

——. 1978. *Montaillou: 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1979. *Carnival in Romans.* Translated by Mary Feene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1982. *Paris-Montpellier, P.C.-P.S.U., 1945—1963.* Paris: Gallimard.

Levi, Giovanni. 1988. *Inheriting Power: The Story of an Exorcist.* Translated by Lydia G.Cochra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1. "On Micro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in Historical Writing,* ed. by Peter Burke, 93—113.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évi-Strauss, Claude. 1949. *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61. *Triste Tropiques,* Translated by John Russell.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 1963a.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63b. *Totemism.* Translated by Rodney Needham. Boston: Beacon Press.

——. 1966.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49 ] 196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Translated by James Harle Bell, John Richard von Sturmer, and Rodney Needham. Boston: Beacon Press.

Lipietz, Alain.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is in Global*

*Fordism.* Translated by David Macey. London: Verso.

Liu, Tessie P. 1994. *The Weaver's Knot: The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Struggle and Family Solidarity in Western France, 1759—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omnitz-Adler, Claudio. 1991. "Concepts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Culture." *American Ethnologist* 18:195—214.

Loyseau, Charles. 1666. *Traité des orders et simples dignitez.* In *Oeuvres de maistre Charles Loyseau.* Paris: Chez Jean Dupuis et G.Alliot.

——. 1994. *A Treatise of Orders and Plain Digniti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owell A.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cas, Colin. 1988. "The Crowd and Politics between Ancien Regime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0:421—457.

——. 1991. "Talking About Urban Popular Violence in 1789." In *Reshaping France: Town, Country and Reg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 Alan Forrest and Peter Jones, 122—136.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94. "Revolutionary Violence, the People, and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vol.4, *The Terror,* ed. Keith Michael Baker, 57—79. Oxford: Pergamon.

Lüdtke, Alf. 1995.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Translated by William Templ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usebrink, H.-L., and R.Reichardt. 1983. "La 'Bastille' dans l'imaginaire social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1774—1799)."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0:196—234.

——. 1990. *Die Bastille: Zur Symbolgeschichte von Herrschaft und Freiheit.* Frankfurt: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79]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2,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 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gadant, Ted W. 1979.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The Insurrection of 185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in, Louis. 1988. *Portrait of the King,* Translated by Martha M.Houle. Introduction by Tom Conley.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3. *Des pouvoirs de l'image: Gloses.* Paris: Seuil.

Markoff, John. 1996.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Martin, Emily. 1987. *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Marx, Karl. 197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Introduction by Ernst Mande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19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ssey, Douglas S., and Nancy Denton.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on, Paul, ed. 1913. *Les Bouches-du-Rhône: Encyclopédie départementale.* Vol.11, *Biographies.* Marseille: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 des Bouches-du-Rhône.

——. 1922. *Les Bouches-du-Rhône: Encyclopédie départementale.* Vol.9, *Le Mouvement économique.* Paris: Champion.

Mayer, Margit, and Roland Roth. 1995.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st-Fordist Society." In *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by Marcy Darnovsky, Barbara Epstein, and Richard Flacks, 299—319.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Mayfield, David. 1991. "Language and Social History , " *Social History* 16:353—357.

Mayfield, David, and Susan Thorne. 1992. "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 Gareth Stedman Jones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Social History* 17:165—188.

——. 1993. "Reply to 'The Poverty of Protest' and 'The Imaginary Discontents.'" *Social History* 18:219—233.

Mazuy, François. 1853. *Essai historique sur les moeurs et coutumes de Marseille au XIXe siècle.* Marseille: Arnaud.

McDonald, Terence, ed. 1996.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egill, Allan. 1985. *Prophets of Extremity: Neitzche, Heidegger, Foucault, and Derrid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yer, Jean. 1966. *La noblesse bretonne au XVIIIe siècle.* 2 vols. Paris, S.E.V.P.E.N.

Mills, C.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ch, Leslie Page. 1983. *Paths to the City: Regional Migr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 New York: Sage.

Molino, J.1986."L'événement de la logique à la sémiologie." In *L'événement* :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ze à Aix-en-Provence par le centre Méridional d'Historie Sociale* , 251—270. Aix-en-Provence: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rrison, Ann M., Randall P.White, and Ellen Van Velsor. 1987.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Can Women Reach the Top of America's Largest Corporations* ?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Moss, Bernard H.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1830—1914*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ousnier, Roland. 1972. "Les concepts d'ordres, d'états, de fidelité et de monarchie absolue en France de la fin du XVe siécl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écle." *Revue historique 502:289—312* .

Namier, Sir Louis B. 1929.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 .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Nguyen, Victor. 1961. Crise et vie des portefaix marseillais, 1814—1914. Diplôme d'Études Superieure,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Humaines, Aix-en-Provence.

——. 1962. “Les Portefaix marseillais: Crise et déclin, survivances,” *Provence historique 12:363—397.*

Novick, Peter. 1988.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a, Pierre. 1974. “Le retour de l’événement.” In *Faire de l’histoire,* vol.1, *Nouveaux problèmes* , ed. J.Legoff and P.Nora, 285—308. Paris: Gallimard.

——, ed. 1984—1992. *Les lieux de mémoire* . 3 vols. Paris: Gallimard.

——. 1996—1998.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beyesekere, Gananath. 1992.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livesi, Antoine. 1950. *La commune de 1871 à Marseille et ses origines* . Paris: M.Riviere.

Ortner, Sherry B. 1984.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6:126—166* .

——. 1989. *High Religion: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Sherpa Bhuddis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5. “Resis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fusa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173—193* .

——. 1996.*Making Gender: The Politics and Erotics of Culture* . Boston: Beacon Press.

Ozouf, Mona. 1976.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9* . Paris:

Gallimard.

Paige, Jeffrey M. 1978.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 New York: Free Press.

Palmer, Bryan D. 1990. *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 .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87. “Response to Joan Scot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31:14—23* .

Parsons, Talcott. 1959. *The Social System* . Glencoe, Ill: Free Press.

Patterson,Thomas. 1989.“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Implications for Historians.” *Social History 14:83—88* .

Perrot, Jean-Claude. 1975. *Genèse d’une ville moderne: Caen au XVIIIe siècle* . 2 vols. Paris: Mouton.

Perrot, Michelle. 1974. *Les ouvriers en grève: France 1871—1890* . Paris: Mouton.

——. 1987. “L’air du temps.” In *Essais d’ego-histoire* , ed. Pierre Nora, 241—292. Paris: Gallimard.

*Le Petit Robert. 1984. Le Petit Robert: Dictionnaire alphabètique et ana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 Paris: Le Robert.

Pigenet, Michel. 2004. “Les travailleurs de la manutention portuaire ou les métamorphoses du modèle corporatif.” In *La France malade du corporatisme? XVIIIe-XXe siècle* , ed.Steven L.Kaplan and Philippe Minard, 253—278. Paris: Editions BELIN.

Piore, Michael J., and Charles F.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 New York: Basic Books.

Pocock, J.G.A. 1975.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itrineau, Abel. 1965. *La vie rurale en basse Auvergne au XVIIIe siècle* . 2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ostone, Moishe. 1993. *Time, Labou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binbach, Anson. 1987. "Rationalism and Utopia as Languages of Nature: A Note."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31:30—36* .

Ramsay, Clay. 1992. *The Ideology of the Great Fear: The Soissonnais in 1789*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anger, Terence.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Colonial Africa."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211—2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ncière, Jacques. 1981. *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 Paris: Fayard.

Readings, Bill. 196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ddy, William M. 1984. *The Rise of Market Culture: The Textile Trade and French Society, 1750—190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The Invisible Code: Honor and Sentim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1814—1848*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1.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1858* . Vol. 1. Paris: Plon.

Revel, Jacques. 1995. "Introduction." In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 ed.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1—6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ed. 1996a. *Jeux d'échelles: La micro-analyse à l'experience* . Paris: Seuil/Gallimard.

——. 1996b. "Présentation." In *Jeux d'échelles: La micro-analyse à l'experience* , 7—14. Paris: Seuil/Gallimard.

——. 1996c. "Micro-analyse et construction du social." In *Jeux d'échelles: La micro-analyse à l'experience, 15—36* . Paris: Seuil/ Gallimard.

Ricoeur, Paul. 1971.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Social Research 38:529—562* .

——. 1974.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 Edited by Don Ihd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Riley, Denise. 1988. *"Am I That Name?" 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 in History*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che, Daniel. 1978.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province: Académies et académiciens provinciaux, 1690—1789* . Paris: Mouton.

Roediger, David R. 1991.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in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 London: Verso.

Roemer, John E. 1982. "New Directions in the Marxist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Politics and Society 11:253—287* .

Rosaldo, Renato I. 1980. *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8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Celebrating Thompson's Heroes: Social Analysis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E.P.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 ed. Harvey J.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 103—12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oseberry, William. 1982. "Balinese Cockfights and the

Seduction of Anthropology." *Social Research 49:1013—1028* . Reprinted in *Anthropologies and Histories: Essays i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17—29* .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Ross, Dorothy. 1991.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stow, W.W. 1960.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rowth* . 2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ubin, Gayle.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Reiter, 157—21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Rudé, George. 1959.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2. *Wilkes and Liberty: A Social Study of 1763 to 1774*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64.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 New York: Wiley.

Sabean, David Warren. 1984. *Power in the Blood: Popular Culture and Village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Property, Production, and Family in Neckarhausen, 1700—187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Kinship in Neckarhausen, 1700—187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bel, Charles H. 1988. "Protoindustry and the Problem of Capitalism as a Concept: Response to Jean H.Quataer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33:30—37* .

Sabel, Charles H., and Johnathan Zeitlin. 1985.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ss Production: Politics, Markets, and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 no. 108:133—176.

Sahlins, Marshall. 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1.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85. *Islands of Histor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9. "The Cosmology of Capitalism: The Trans-Pacific Sector of the World Syste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4:1—52*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andeur in Hawaii from 1810 to 1830." In *Culture Through Tim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 edited by Emiko Ohnuki-Tierney, 25—5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The Return of the Event, Again: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Great Fijian War of 1843 to 1855 between the Kingdoms of Bau and Rewa." In *Clio in Oceania: Toward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 ed. Aletta Biersack, 37—100.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1944. "The Discovery of the True Savage." In *Dangerous Liaisons: Essays in Honor of Greg Denning* , edited by Donna Merwick, 41—94. Melbourn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1995. *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lzinger, Leslie. 2003. "Market Subjects: Traders at Work in the Dollar/Peso Market."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

Samuel, Raphael. 1977.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Steam Power and Hand Technology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6—72* .

——. 1991. “Reading the Sig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2:88—109* .

——. 1992. “Reading the Signs: II. Fact-Grubbers and Mind-Reader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33:220—251*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 Edited by 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lbert Riedlinger. Translated by Wade Baskin. New York: McGraw-Hill.

Schneider, David M. 1968. *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ccount* .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76. “Notes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e.” In *Meaning in Anthropology* , ed. Keith H.Basso and Henry A.Selby, 197—220.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Scott, James.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oan W. 1974.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a.“On Language, Gende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31:1—13* .

——. 1987b. “A Reply to Criticism.”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32:39—45* .

——.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1. "Women's History." In *New Perspec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 ed. Peter Burke, 42—66.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2. "Experience." 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 ed. Joan W.Scott and Judith Butler, 22—40. New York: Routlege.

——. 1993. "The Tip of the Volcano."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438—443* .

——. 1996. *Only Paradoxes to Offer: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well, William H. 1988.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Sociology and My Career." In *Sociological Lives: Social Change and the Life Course* , vol. 2, ed. Matilda W.Riley, 119—143,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Sewell, William H., Jr. 1967. "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6:208—218* .

——. 1971.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1974a. "Etat, Corps and Ordre: Some Notes on the Social Vocabulary of the French Old Regime." In *Sozialgeschichte Heute: Festschrift für Hans Rosenberg zum 70 Geburtstag* , ed. H.U.Wehler, 49—68. Göttingen: Vandenhoek und Ruprecht.

——. 1974b. "Social Change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Marseille." *Past and Present,* no. 65:75—109.

——. 1974c. "The Working Class of Marseille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Worker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ed. Peter Stearns and Daniel Walkowitz, 75—115.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La Confraternité des prolétaires: Conscience de classe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6:650—671* .

——. 1985a.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57—85* .

——. 1985b. *Structure and Mobility: The Men and Women of Marseille, 1820—187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Uneven Development, the Autonomy of Politics, and the Dockworkers of Nineteenth-Century Marseill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604—637* .

——. 1990a.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Loyalties in France: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de a Differe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18:527—552* .

——. 1990b. “How Classes Are Mad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P.Thompson’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E.P.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 ed. by Harvey J.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 50—77.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3. “Toward a Post-Materialist Rhetoric for Labor History.” In *Rethinking Labor History: Essays on Discourse and Class Analysis* , ed. Lenard R.Berlanstein, 15—38.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94. *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The Abbé Sieyes and*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Historical Events 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Inventing Revolution at the Bastille.” *Theory and Society 25:841—881* .

——. 1998. “Language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History:

Backing Away from the Edge of the Clif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1:241—254* .

Shankman, Paul. 1984. "The Thick and the Thin: On the Interpretiv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Clifford Geertz." *Current Anthropology 25:261—279* .

Skinner, Quentin. 1978.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 1984.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Cultural Idiom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the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s of State Power: A Rejoinder to Sewell."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86—96* .

——. 1988—1989. "An 'Uppity Generatio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Macroscopic Sociology: Reflections at Mid-Career by a Woman from the Sixties." *Theory and Society 17:627—644* .

Skocpol, Theda, and Margaret Somers. 1980.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174—197* .

Smelser, Neil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ory to the British Cotton Industry* .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mith, Bonnie G. 1980. *Ladies of the Leisure Class: The Bourgeoises of Northern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1995 Annual* . 1996.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omers, Margaret Ramsay. 1986.“The People and the Law: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Popular Identity.”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8.“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271—3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ansell, Christine. 1987. “Response to Joan Scot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31:24—29.

Stearns, Peter N.1967.“Some Comments on Soci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3—6.

Stedman Jones, Gareth. 1983.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The Determinist Fix: Some Obstacles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History in the 1990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2:19—35.

——. 2002. “The New Social History in France.” In *The 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s: Britain and France,* 1750—1820, ed. Colin Jones and Dror Wahrman, 94—10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eedman, Carolyn. 1986. *Landscape of a Good Woman: A Story of Two Lives.* London: Virago.

——. 1994.“Bimbos from Hell.” *Social History* 19:57—67.

Steinmetz, George. Forthcoming.“Scientific Author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Ford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Modernity in American Sociolog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ed. George Steinmetz.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4.“American Sociology’s Epistemological Unconscious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Fordism: The Ca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In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ed. Julia Adams, Elisabeth Clemens, and Ann Orloff.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Regulation Theory, Post-Marxism,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6:176—212.

Steinmetz, George, and Ou-Byung Chae. 2002.“Sociology in an Era of Fragmentation: From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Back Again.”*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111—137.

Stinchcombe, Arthur. 1978. *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toler, Ann Laura. 1995.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one, Lawrence. 1965.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 1559—1641. Oxford: Clarendon.

——. 1979.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 85:3—24.

Suny, Ronald Grigor. 2002.“Back and Beyond: Reversing the Cultural Tur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1476—1499.

Suter, Andreas. 1997.“Histoire sociale et événements historiques: Pour une nouvelle approche.” *Annales: Histoires, Sciences Sociales* 52:543—569.

Swidler, Ann. 1984.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73—286.

——. 2001. *Talk of Love: How Culture Matt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aylor, Michael. 1988.“Rationality and Collective Revolutionary Action.” In *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 63—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rborn, Goran. 1980.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Thernstrom, Stephan. 1964. *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 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ancz.

——.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Thompson, John B. 1989.“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n *Social Theory of Modern Societies: Anthony Giddens and His Critics,* ed. D. Held and J.B. Thompson, 56—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64.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9. “Collective Violence in European Perspective.”In *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Robert Gurr, 5—34.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72a. “How Protest Modernized in France.” In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ed. William Aydelotte, Allan Bogue, and Robert Fogel, 192—25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2b. "The Modernization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France." In *Perspectives on Modernization: Essays in Memory of Ian Weinberg,* ed. Edward B. Harvey, 50—95.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77. "Getting it Together in Burgundy." *Theory and Society* 4:479—504.

——. 1981. "The Web of Conten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ities." In *Class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Action,* ed. Louise Tilly and Charles Tilly, 27—52.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1984.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 1993. *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 Oxford: Blackwell.

——. 1995.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 Cambri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illy, Louise A., and Joan W.Scott. 1978.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Toews, John. 1987. "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879—907.

Traugott, Mark. 1985. *Armies of the Poor: Determinants of Working-Class Participation in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 184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ravaux de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Marseille.* 1837—1873. 36 vols.

Tristan, Flora. 2001. *Le tour de France: Journal* 1843—1844. 2 vols. Paris: INDIGO et Côté-Femmes Editions.

Trotsky, Leon. 1932.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Max East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Turner, Steven Park, and Jonathan Turner. 1990. *The Impossible Science: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Turner, Victor W. 1967. *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Veeser, H.Aram, ed. 1989. *The New Historicism.* New York: Routledge.

Venturi, Robert, Denise Scott Brown, and Steven Izenour. 1977.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The Forgotten Symbolism of Architectural For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Vernon, James. 1994."Who's Afraid of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History and Its Discontents."*Social History* 19:81—97.

Villar, Pierre. 1962. *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 Recherches sur 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des structures nationales.* 3 vols. Paris: S.E.V.P.E.N.

——. 1982. *Une histoire en construction: Approche marxiste et*

*problématiques conjuncturelles.* Paris: Galimard, Seuil.

Vine, Barbara [Ruth Rendell]. *A Fatal Inversion.* New York: Bantam Books.

Vonnegut, Kurt. 1985. *Galapagos.*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Vovelle, Michel. 1973. *Piété baroque et déchristianisation en Provence au XVIIIe siècle: Les attitudes devant la mort d'après les clauses des testaments.* Paris: Plon.

Wacquant, Loïc. 1989.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A Workshop with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cal Theory* 7:26—63.

——. 1995. "The Pugilistic Point of View: How Boxers Think and Feel about Their Trade."*Theory and Society* 24:489—535.

——. 2004. *Body and Soul: Notebooks of an Apprentice Boxer.* New York: Oxford.

Wallace, Anthony F.C. 1978. *Rochdale: The Growth of an American Village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a.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74b."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6:387—415.

Walters, Ronald. 1980."Signs of the Times: Clifford Geertz and the Historians."*Social Research* 47:537—553.

Watson, Graham. 1989."Definitive Geertz."*Ethnos* 54:23—30.

——. 1991."Rewriting Culture." In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ed. Richard G.Fox, 73—92.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s.

——.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2 vols.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deen, Lisa. 1999.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Syr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eks, Jeffrey. 1982."Foucault for Historia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4:106—119.

White, Hayden.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8.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99.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iener, Annette. 1976. *Women of Value, Men of Renown: New Perspectives in Trobriand Exchang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Wilentz, Sean. 1984.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s, Paul. 1981.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William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Wittgenstein, Ludwig. [1953]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G.E.M. Anscombe. New York: Macmillan.

Young, Iris Marion. 1990a. “Breasted Existence: The Look and Feeling.” In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189—20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90b. “Throwing Like a Girl: A Phenomenology of Feminine Body Comportment, Motility, and Spatiality.” In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141—15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Zanzi, Josette. 1969. “Les Portefaix marseillai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émoire de Maîtrise, Faculté des Lettres d’Aix-en-Provence.

Zhao, Dingxin. 2001.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再版后记

由衷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冲编辑为本书再版创造了机会，得以修正上一版中的错误。鉴于2020年孙宇凡发表在《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2辑中的《结构、转型与事件时间性：休厄尔〈历史的诸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的内在批判》，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清晰阐释了作者的学术贡献，此版删除了原译序，并推荐读者阅读该篇论文，作为本书的导读。

此次校改过程中参考了孙宇凡的论文中所用的部分术语翻译，但书名并未以《历史的诸逻辑》译出，以保持两版书名的一致性。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郦菁副教授对部分社会学术语的译法提供了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对于各类一实多名的情况，本版译文有些采用了常用译名而非标准译名，有些采用了意译术语而非直译术语，均以夹注展示原文，以便读者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吕子涵编辑在校改过程中为部分社会学和人类学术语的译法提供了建议，并细致校阅了原文，对此深表感谢。

原作中的单词拼写错误、词语脱漏和页码错误等问题，译者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校对和说明。限于时间与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此版仍不免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朱联璧　费　滢

2021年6月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by William H.Sewell Jr.

Copyright © 200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21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